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保尔·拉法格

葛兰西与共产国际

关于苏南冲突

安东·潘涅库克

马林(亨克·斯内夫利特)政治传记(摘录)

列宁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大事记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
共产党情报局)》(简介)

人 民 出 版 社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五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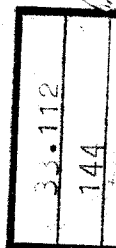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236,000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700

书号 11001·490 定价 1.05元

(只限国内发行)



编辑说明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是不定期的丛刊，目的是为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国际共运史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同志提供资料，并共同探讨国际共运史上的有关问题。

本丛刊登载国际共运史方面的专题论文和文献资料，重要人物的传记，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和流派的介绍文章和研究资料，并酌量选译国外重要研究论文。丛刊还辟有动态、书讯等栏，介绍国内外研究国际共运史方面的有关情况。

本丛刊发表的文章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文责由作者自负。

欢迎读者对本刊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以便不断改进。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编辑部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五辑目录

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 保尔·拉法格.....沈炼之(1)
楼均信
- 葛兰西与共产国际.....毛韵泽(16)
- 关于苏南冲突.....姜琦(36)
- 新经济政策和联共(布)党内的左倾反对派.....杨彦君(59)

人物传记

- 安东·潘涅库克.....李宗禹(82)

组织机构介绍

- 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概况.....夏道源(100)

外论选译

马林(亨克·斯内夫利特)政治传记(摘录)

-〔荷〕弗·梯歇尔曼(129)
华一彦译

保尔·拉法格和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

- 批判.....〔法〕克洛德·维拉尔(155)
公直译

第二帝国末年的工人活动家欧仁·

瓦尔兰(摘录).....[法]让·布吕阿
承 中译 (173)

法国杂志发表关于巴枯宁的新

材料.....[苏]娜·米·皮鲁莫娃
顾家庆译 (195)

文 献 和 资 料

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部分解说.....[法]保尔·拉法格
建 恩译 (214)

革命的次日.....[法]保尔·拉法格
李枫秋译 (230)

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苏]A·季维尔编
谷 松译 (240)

列宁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大事记.....[苏]A·И·娜尔齐索娃编
吴式之译 (281)

书 刊 简 介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

情报局)》.....方光明(314)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24—1927年中国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叙 一(317)

一本关于马林的传记.....商 鼎(319)

卡尔·考茨基的回忆录——《回忆与探讨》.....启 迪(321)

国 外 动 态

英共筹备建立工运档案馆.....黎 明(324)

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马克思主义 传播者保尔·拉法格

沈炼之 楼均信

拉法格是法国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家，也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革命理论家。早在青年时代，拉法格就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尤其是在工人党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他进行了艰难复杂的长期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拉法格正是在长期参加革命实践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中，有机会结识了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刻苦学习了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才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①

一

拉法格的青年时代，正是路易·波拿巴在法国建立第二帝国并实行军事专制统治的时代，它的残暴的警察统治引起了青年拉法格的强烈不满和反抗。1864年，拉法格在巴黎大学医学院学习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页。

时,同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积极参加反对帝国的斗争,很快成为当时学生运动中的带头人。拉法格和进步青年共同组织了秘密革命团体“未来社”,并经常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沙尔·龙格创办的民主刊物《左岸》上发表文章,竭力主张共和,反对帝制,猛烈抨击波拿巴的残暴统治。

当时,作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拉法格,还深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基本上属于蒲鲁东派,但是,他喜欢和工人交朋友,同他们一起进行政治斗争,关心他们的困苦生活。在革命大学生中,他是最早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决裂的一个。拉法格后来回忆说:“时间使我睁开了眼睛,今天我们看清了他们(资产阶级共和派——引者)是帝国的支持者,是它的安全阀……于是,我们断然和他们决裂了。我们离开了他们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沙龙。我们把自己安顿在拉丁区,并且只和工人们相往来。”^①

1864年12月底,法国首都巴黎建立了第一国际支部。拉法格不久就参加了这个支部,并成为它的最活跃的一员。两个月后,他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到伦敦向国际总委员会汇报工作。这是拉法格第一次和马克思会见,这次见面给了他毕生难忘的印象。回国后,拉法格更加强了与波拿巴斗争到底的决心。不久,他与著名的布朗基主义者雅克拉尔共同发起,于1865年10月底在比利时列日召开国际大学生代表大会。会上,拉法格公开揭露波拿巴的反动独裁统治,号召法国青年团结起来,共同为推翻第二帝国进行坚决斗争。他还大胆地提出“废除三色旗,采用红旗为国旗。”^②因此被学

① 热卢鲍夫斯卡娅《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倾覆和第三共和国的诞生》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9页。

② 梅特隆主编《法国工人运动人名辞典》1975年法文版第13卷第167页。

校反动当局永远开除了学籍，这第一次的意外打击，反而促使拉法格更加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1866年2月，拉法格到达伦敦。在伦敦的几年生活，成为他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他一边进英国大学继续学医，一边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把全部空余时间用于革命活动。3月6日，拉法格被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兼西班牙通讯书记。拉法格参加了总委员会的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经常与马克思交往，认真听取马克思的教诲，虚心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拉法格还积极参加在伦敦的第一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活动，与支部内部的蒲鲁东主义右派展开斗争。在伦敦的近三年时间内，拉法格开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逐渐成为一位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组织家。

1868年7月，拉法格修满医学课程，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就与新婚的妻子劳拉·马克思共返巴黎。他除了行医外，把全部精力投入继续反对第二帝国的斗争。

拉法格在巴黎经常与布朗基派和蒲鲁东主义左派来往，利用一切机会向工人运动活动家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和基本思想。他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尤其是重新翻译被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歪曲和篡改了的国际共同章程法译本，用真正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拉法格还十分重视做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亲自参加了巴黎沃希拉尔区的第一国际支部，既与支部内以托伦为首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进行斗争，又努力帮助瓦尔兰摆脱托伦的影响，使他成为工人运动中的出色领导人。

在拉法格的努力下，法国国际支部不断加强。1870年4月18日，巴黎各支部召开联合大会，成立了巴黎联合会，拉法格当选为联合会委员。这一年在法国其他城市，也先后成立了三个联合会，

国际在法国的组织领导工作得到了加强。拉法格以十分喜悦的心情，马上写信给马克思，报告大会的盛况，他说：“这次全体会议的积极之处在于：所有的成员都感到有集中起来的必要，工人阶级对于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以及对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有了清楚和明确的觉悟。您，阶级斗争的骑士，如果亲眼见到了这种情景，肯定会很高兴的。”^① 恩格斯得到这个消息后，也很满意，他说：“法国工人的行动真了不起。这些人现在重新开始活动了，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这方面他们是能手。”^②

正当无产阶级加强组织，准备与帝国作最后斗争时，波拿巴发动了普法战争，并于1870年9月2日在色当惨败被俘，帝国已名存实亡。9月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宣告成立第三共和国。移居波尔多的拉法格，敏锐地觉察到新成立的“国防”政府实际上是卖国政府。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理想的共和国，拉法格决心与它展开斗争。当时，资产阶级共和派想利用他的声望，曾请他担任省长，拉法格断然拒绝，表示决不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他在波尔多创办《国防报》，揭露临时政府的卖国行径。在一封公开信中他愤怒地指出：“你们使祖国陷于屈辱和毁灭的深渊，难道不怕为此承担严重的责任吗？”^③ 他还在波尔多重建国际支部，被选为支部的书记，积极宣传抗战到底，打退入侵者。同时，他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成立公社而作好准备。拉法格在波尔多的各项活动中，充分表现出他既是一个炽烈的爱国者，又是一个有远见的社会主义活动家。

① 热卢鲍夫斯卡娅《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倾覆和第三共和国的诞生》第2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3—504页。

③ 雅克·吉罗《公社和波尔多(1870—1871年)》1971年巴黎法文版第217页。

二

七十年代以后，拉法格已经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舞台上。1871年3月18日，当巴黎公社伟大的革命爆发后，住在波尔多的拉法格立即为声援公社而斗争，并于4月6日，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到达革命中心巴黎，在巴黎居留十三天之久。他会见了公社领导人，接受了公社委派的任务。他曾写信给马克思，希望国际加强对公社的领导。回波尔多后，他以《巴黎之行》为题，在报上宣传公社事业的伟大意义，同时，他日夜奔忙，准备在波尔多组织象巴黎公社那样的革命。

公社失败后，他受到梯也尔反动派的追捕，被迫离开法国。到达西班牙后，立即投身于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掌握了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国际的大量罪证材料。

1872年9月，拉法格作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地方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国际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在这场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阴谋集团之间“生死存亡”的决战中，拉法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发挥重要的作用。会后，拉法格协助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全面清算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正式文件：《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①。

海牙大会的决议，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根据本国实际情况，为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而斗争。侨居在英国的拉法格，深深懂得要取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有工人政党的领导。为此，他虽然远离祖国，对法国的工人运动仍十分关注。他为在法国建立工人政党作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

出了极大的努力，这是拉法格一生中参加革命实践的中心点。

首先，拉法格积极帮助盖得为建党作好充分准备。他多次写信给盖得，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希望盖得办好党报，做好宣传和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指出办好报纸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紧密团结和认真负责的编辑部。而且忠告盖得，要始终把握住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才能取得解放。同时，拉法格还严厉批评盖得对争取群众的支持不够，“甚至走错了路”。^①在拉法格的帮助下，盖得为创立“独立的和战斗的工人党”做了大量工作，在工人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建党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

1879年10月，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人党，终于在马赛工人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马克思十分高兴地说：“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②从此，法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其次，拉法格与盖得一起，共同为制订工人党的纲领而努力。1880年5月初，盖得来到伦敦，通过拉法格的引见，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四人共同商讨并制订了基本上正确的党纲草案。1880年11月，在工人党的哈佛尔代表大会上，批判了布鲁斯、马隆等人妄图取消党纲，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使党纲正式获得通过。

第三，拉法格始终与工人党同呼吸共命运，为维护党的纲领，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各个方面对党内机会主义的可能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① 《拉法格致盖得》(1879年6月)，见《法兰西年鉴》1962年俄文版第4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1页。

(1)拉法格强调工人党必须坚持革命的政治路线,反对改良主义。当布鲁斯、马隆为首的可能派妄图用改良代替革命时,拉法格先是说服、劝告,多次写信给他们,希望他们从速改正错误,站到马克思派一边,参加革命的行列。拉法格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革命,反对只图眼前利益的改良。党决不能忘记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信中说:“我们分歧的根源……在于我们以什么观点看待运动。”你们“不同意”我们的纲领,而制订了什么“市政纲领”,企图通过改良取得自治权,这是完全违背科学理论的。^①但是可能派拒不改正错误,拉法格就同他们坚决斗争。

(2)拉法格强调工人党的集体领导作用,反对个人独裁。工人党建立后,可能派就妄图把马隆推上台,实行个人专断的领导。当这一阴谋被马克思派识破后,他们又嫁祸于人,胡说拉法格在党内要搞个人独裁。拉法格据理驳斥,指出要搞独裁的是可能派,决不是我们,他说:“我认为,党既不应体现在盖得一人身上,也不应体现在马隆一人身上。我力争的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不是个人的专政。”^②拉法格还指出,“个人权力是必要的”,但决不能“专权独断”。^③他希望工人党必须是真正民主的,成为全体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明确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他指出,“领袖决不是制造出来的”,它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请问:“能不能制造出一个马拉?”^④

(3)拉法格在工人党内坚持原则,不怕分裂。可能派为了窃取工人党的领导权,于1881年10月,通过精心策划,建立了一个三

① 转引自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78年第11期第118—119页。

②③ 同上,第118页。

④ 同上,第120页。

十人的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他们窃取了其中的二十五个名额。接着，他们准备在1882年9月圣亚田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迫使以盖得为首的马克思派屈从于他们的领导，进而改变建党原则和正确的政治路线。

面对这一严重的挑战，拉法格回法国后，第一次亲身参加了同可能派面对面的斗争。会前，拉法格和盖得一起，不辞劳苦地深入到许多基层党组织，直接向党员群众宣传动员，提醒大家保持警惕，密切注意可能派的突然袭击。会上，可能派果然发起挑战，斗争极为激烈。为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拉法格、盖得等人在处于少数的情况下，毅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并去鲁昂召开对抗性的代表大会，一致宣布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再次肯定党纲是党的一切基层组织必须共同遵守的纲领，决定将布鲁斯、马隆等可能派的头目，开除出党。以后，可能派改称“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宗派小集团。

拉法格、盖得等人在圣亚田大会上所采取的这一坚持原则的果敢行动，赢得了恩格斯的高度赞扬，他说：“在法国，期待了好久的分裂发生了。……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马隆和布鲁斯……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①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要维护其纯洁性，就必须坚持党内的原则斗争，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遵循的一条共同规则。可能派被清除后，工人党就更加富有战斗力。

（4）拉法格积极争取主动，粉碎可能派篡夺国际共产主义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0页。

动领导权的阴谋。随着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各国工人政党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国际，来指导共同的斗争。可能派乘机勾结英国工联主义者，盗用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名义，于1888年11月在伦敦召开筹备会，决定抢先在次年7月在巴黎举行国际工人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成立新的国际组织，以夺取新的国际的领导权。

在形势万分危急的关头，恩格斯立即投入战斗，指示拉法格和工人党，迅速行动起来，主动粉碎可能派的篡权阴谋。拉法格和盖得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一方面公开揭露可能派耍弄的阴谋，指出“可能派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在社会主义党内制造分裂……为警察局效劳”，^①使兄弟党认清其本质。另一方面，积极进行筹备工作，于1889年2月在海牙举行有各国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正式决定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拉法格为大会起草了呼吁书和通知书，工人党还专门举行会议商讨筹备事宜。拉法格亲自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使会议胜利进行，终于建立了第二国际，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可能派也同时举行会议，但处境不佳，变成宗派会议而陷于失败。恩格斯为此而高兴地指出：“不管怎样，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想要各自在法国和英国窃取领导权地位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要取得国际领导权的妄想则失败得更惨。”^②可能派篡权阴谋被粉碎后，内部产生了分裂，开始走向衰落，而工人党在国际国内的威信却大为提高。

拉法格还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

① 转引自苏联《近代现代史》杂志1959年第5期第1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2—243页。

反对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米勒兰主义即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思潮。

1899年6月，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参加了瓦尔德克-卢梭资产阶级内阁，任工商部长。拉法格和盖得一起，坚决反对这一背叛事件，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决不能搞阶级合作。拉法格还认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就是败坏、损害社会主义的荣誉和利益，就是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与革命社会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在1899年12月于巴黎召开的法国各派社会主义者联合代表大会上，拉法格在发言中指出米勒兰入阁是“政治机会主义”，是党员自私的政治利益的反映，无产阶级必须永远抛弃这种机会主义方式的政治行动。尔后，在1900年9月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拉法格坚决支持盖得在大会上的严正发言，指出这种背叛行为，只能使党在工人中威信扫地。强调无产阶级要取得解放，必须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905年法国统一社会党建立后，拉法格作为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各次代表大会上，仍然坚持革命原则，直至1911年逝世前几个月，在圣康坦党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反对机会主义者鼓吹通过市政改革，进入社会主义的改良道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能取得解放，从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三

在拉法格看来，无产阶级要取得解放，不仅必须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且还必须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去武装全党和广大群众。因此，广泛传

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革命任务。拉法格曾写信给恩格斯说：“原理已由你和马克思创立，现在必须找到一些宣传鼓动家把它传播开来。”^①拉法格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他经常在工人党报刊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1891年春天，知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勒卢阿-博利约曾写书公开攻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拉法格两次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撰文驳斥他的反动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1900年2月，拉法格还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一文，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批判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拉法格怎样从左边批判康德，批判康德对于自在之物的看法不够唯物。

拉法格还和盖得一起，不辞劳苦，不怕坐牢，奔走全国各地，参加大型辩论会，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阶级敌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歪曲和攻击。1892年1月，拉法格与盖得一起，在波尔多的一次演说会上，公开批驳了两个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神甫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得到了听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同年5月，拉法格在巴黎举行公开演讲，严厉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德莫连污蔑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比什么都坏等种种谬论。拉法格指出，这不是学术讨论，这是一场严肃的战斗，“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击破某些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②拉法格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资本主义社会中

① 参看《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73页。

② 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1页。

存在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空想，而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制度。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没有特权的阶级。那里只有劳动者，……一切人都是平等的。”^①拉法格有理有据的演说，使上千名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听了哑口无言，显示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拉法格对那些死心塌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御用文人，极为痛恨。他曾愤愤地说：“应当撕下他们的舌头，并且拿去喂狗。”^②

拉法格很重视对工人骨干的理论学习和培养工作。从1884年5月开始，他和法国工人党另一位领导人杰维尔合作，利用每个星期天，在巴黎举办工人理论讲座，宣传马克思主义。拉法格讲唯物主义历史观，杰维尔讲《资本论》纲要。他事先把讲稿寄给恩格斯审阅，获得了恩格斯的好评。拉法格在讲座中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并号召无产阶级骨干分子，一旦革命时机成熟，就要“手拿武器”，“起来暴动”，夺取政权。他强调“国家政权的夺取成为解放被压迫的、革命的阶级所必须的条件”。“被压迫的阶级……应当掌握国家机器，按照自己斗争的需要改造它并且把它的全部力量转向对付敌对阶级。”^③拉法格实际上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拉法格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拉法格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

① 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第21页。

② 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94页。

③ 同上，第75、50、77页。

常常通宵达旦、忘我写作。

拉法格研究了原始社会史，出版了《财产及其起源》（1895年），分析了从原始社会开始，各个历史时期所有制的演变和发展，论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可避免。他研究了思想的起源，出版了《思想起源论》（1909年）这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批判了唯心主义，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观点，强调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他研究了美国的托拉斯，写出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1903年），指出资本的大量集中，表明“资本主义已演进到特殊阶段了”。他揭穿了美国并不存在阶级斗争的谎言。他研究了宗教的传说和起源，写出了大量反对宗教迷信的论著，指出宗教是资本家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工具，上帝不过是为资产阶级追求“物质利益”的偶像，阐明了“上帝的观念既不是天赋的观念，也不是先天的观念，而是后天的观念”。^①因此，无产者只能靠自身的斗争去争取解放。拉法格还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文艺批评，写出了《雨果的传说》、《左拉的〈金钱〉》等许多著名作品。他的理论著作不但对团结和教育法国工人阶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高度评价，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但是，拉法格并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长期参加社会实践，而且进行大量的理论著述，但由于个人认识上的局限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复杂的社会现象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免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甚至是严重错误。

在理论上，在他早期的著作中，还受着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正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195页。

是针对这一点，马克思在1882年曾经指出：“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①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还存在着错误，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上，表现出左右摇摆。

在实践中，有时还表现出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倾向。例如，他曾把嚣张一时的布朗热沙文主义运动，当作“人民运动”；把反动派一手制造出来的冤狱德雷福斯案件，当作资产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不予理睬；在他参与制定的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中，为了争取农民的选票，对小农的私有心理和富农的雇工剥削作了无原则的让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原则。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以及书信中曾对拉法格的错误提出过尖锐批评。

尽管如此，对拉法格来说，错误毕竟是次要的，他始终是法国一位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的思想，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思想，必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的思想，必须坚持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辉。

还值得一提的是，拉法格在参加革命实践和进行理论宣传时，处处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高尚品格。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曾受到经济上、思想上、政治上的严重打击和迫害，三个孩子在贫病折磨中夭折，劳拉经常卧床不起，无钱治病，负债累累。反动派又多次审讯迫害他，两次把他投进监狱。但是，拉法格置生死于度外，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怀着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顽强地坚持战斗。他的这种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07页。

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心目中只有人民，关心群众，忘我无私的献身精神，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具有必胜信念的坚定事业心，同样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世界上古史纲》 本书编写组编写 上册1.15元 下册1.25元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王芸生编著

第一——七卷共7.32元，第八卷即出

《世界史》 上册 古代史 本册主编崔连仲 排印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萨那、孙成本、余定辉等编写 0.79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编著 排印中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葛兰西与共产国际

毛 韵 泽

安东尼奥·葛兰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为时不长，仅四、五年的时间（1922—1926年），起初他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前往莫斯科工作，后来又作为意共的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五两次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的其他会议和有关工作。他是个国际主义者，也是个爱国主义者。在他领导意共的这段期间，国内的形势非常复杂，既要对付改良主义者的干扰和破坏，又要对付法西斯的暴行和镇压。总的说来，葛兰西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在具体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上，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方法，因此他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不平静的，有时甚至进行过激烈的斗争。难怪当时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季诺维也夫曾抱怨说，葛兰西“在承诺上含糊其词，因此在实现这些承诺时，同预期的效果恰巧相反”。^①

一 童年生活和早期活动

葛兰西，1891年诞生于意大利的撒丁岛，父亲是当地土地登记

^① 陶里亚蒂《意共领导集团的形成》，1962年罗马“重新团结”出版社意文版第142页。

所主任，后因侵吞公款入狱，从此家道中落，葛兰西不得不在11岁那年去打零工自行糊口。他后来回忆道：“我为了每月赚九里拉（折合每天一公斤面包），每天要干十小时活，星期天也不例外。零活是搬运超出我力所能及的大量土地登记册；因此一天干下来浑身酸痛，我不知暗自痛哭了多少夜晚。”^①葛兰西从小体质羸弱，四岁时，女佣不慎把他从楼梯上摔下来，脊柱受伤，没有及时就医，后来长大就成为驼背，身高不满五尺。

葛兰西从小学习非常刻苦。1910年，他考取了都灵大学的奖学金。1913年，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积极参加了都灵的工人运动；1915年，学校的菲薄奖学金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他被迫退学。1917年8月，他领导了当地的反战运动，被选为社会党都灵支部书记。就在这期间，葛兰西阅读了法文版的马克思著作，如《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他在《狱中札记》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所有的基本原理，它不仅建立了完整的世界观、总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而且也给生活带来了完整实际的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形成了总的完整的文化。”1917年以后，葛兰西才接触到列宁的著作。照陶里亚蒂的说法，葛兰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葛兰西同陶里亚蒂等人创办了《新秩序》周刊（后改为日刊），领导了1919年和1920年都灵大罢工期间的“工厂委员会”运动。1920年，“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以后，意大利社会党都灵支部在《新秩序》周刊上发表了葛兰西制订的纲领。其中写道：“意大利

^① 葛兰西《“现代君主”及其它著作》1957年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公司英文版第11页。

阶级斗争的当前特征是工农业工人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提出用明确的暴力手段夺取生产资料的问题。”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很大，可是，要采取前进的坚决步骤，决不能单靠战后年代指导自发的革命激情的办法。而当时社会党内就流行这一套办法。这样就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乐观主义，认为革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态度可能要比反对革命和企图限制工人的需要更加危险。因此有一件事就显得非常重要：需要有一个坚决的领导班子，他们要懂得许多问题，包括完成当前的巨大任务，替工人阶级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做好准备工作。

《纲领》继续写道，可是，社会党领导人面对这种革命的可能性却惶惑不安和裹足不前。当统治阶级正准备反击和加强墨索里尼褐衫党的作用时，社会党的领导却满足于听任事态的发展。“目前，意大利阶级斗争的局面就是以前的局面：要么革命无产阶级为了把生产和分配转变成能复活生产力的新模式，而起来夺取政权；要么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作出巨大的反应。要迫使工农无产阶级从事奴隶劳动，就不惜使用暴力：他们企图无情地打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机关（社会党），而把经济抵抗机关（工会和合作社）合并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里面去。”

《纲领》在分析意大利形势时还写道：“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缺乏协调，没有使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因为社会党的领导机构已经表明：他们对于现阶段国内、国际的历史发展一窍不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斗争机构所负的使命也是一窍不通。社会党在发生的事件面前好象是个旁观者，它从来没有依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提出自己的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它既不向群众发布通俗的指令，也不进行总的领导，统一和集中革命行动。”^①

^① 葛兰西《“现代君主”及其它著作》第13—16页。

葛兰西把这份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题为《为了社会党的新生》的纲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赞扬了葛兰西的这份《纲领》，并由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宣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意大利社会党“都灵支部对该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即载于1920年5月8日《新秩序》杂志上的纲领，是符合共产国际的一切基本原则的。因此，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该党根据自己的章程和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时，要讨论这些建议……”^①

1921年1月15日，意大利社会党在里窝那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中心问题是讨论社会党对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际的“二十一条”这一决议应采取的立场。在大会前两天，葛兰西主编的《新秩序》刊登了由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签署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里窝那代表大会的贺电。电文中指出：“意大利的整个形势不允许对改良主义者作任何原则上的妥协。为了意大利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最深远和最重要的利益，必须同改良主义那样一种倾向彻底决裂。……我们要坚决而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必须在屠拉梯、达拉贡纳之流和共产国际之间进行选择。”^②

这份电报的发表，使社会党既要表示忠于共产国际，又要维护改良主义者在社会党内的权利这种矛盾政策处于尴尬的局面。因此，在六天的里窝那代表大会上，塞拉蒂企图说服葛兰西为首的左派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拉科西和卡巴克契也夫，要他们相信，似乎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与众不同，实际上他们是中派（温

① 《共产国际文件》196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中文版第1卷第159页。

② 同上，第264—265页。

和派)。如果把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这样重要的战士开除出党,就会影响社会党的战斗力。

大会最后对争持不下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是:塞拉蒂主张有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但不开除改良主义者的提案,得九万八千零二十八票,占第一位;葛兰西、博尔迪加主张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二十一条”,要把改良主义者开除出社会党的提案得五万八千七百八十三票,占第二位;屠拉梯主张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的提案,得一万四千六百九十五票,占第三位。^①

在这种情况下,亚马多·博尔迪加起来宣布共产党人退出社会党成立意大利共产党,并成为共产国际的意大利支部。意共成立大会(也即莱亨会议)上,葛兰西领导的都灵支部参加了共产党,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博尔迪加、福蒂奇阿利、特拉契尼、格里科和里波西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盖纳里被派往共产国际作为意共的代表。意共成立的日子是1921年1月21日。这个新建立的党完全由亚马多·博尔迪加一人主持。葛兰西虽然作为创始人之一,但对于意共从社会党分裂出来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事后写道:“反动势力的目的是想把工人们推向他们在资本主义早期看到的那种状态,那时工人们是分散的、孤立的;是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他们没有任何阶级觉悟,也没有夺取政权的任何理想。里窝那的分裂(它使绝大部分意大利无产者离开了共产国际),毫无疑问是反动势力赢得的最大一次胜利。”^②

① 参看《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263页。

② 陶里亚蒂《意共领导集团的形成》第102页。又见G·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个革命家的一生》1973年纽约英文版第147页。

二 同共产国际的风风雨雨

“统一战线”的策略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一项新策略——“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内容是：（1）共产主义先锋队必须领导广大工人群众为他们最主要的利益进行日常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共产党人甚至愿意同社会民主党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领袖们进行谈判；（2）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是追求某种议会目的或其他所谓上层“竞选同盟”，而是共产党人愿意同所有属于其他党派的工人进行共同斗争，以保卫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3）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不但要取得宣传鼓动上的效果，而且还要取得组织上的效果。要抓住一切机会，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组织上的据点（如工厂委员会、各党派和无党派工人监察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等等）；（4）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的国家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①

列宁用日本在旅顺口的行动作比喻，把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对比，他说共产国际已经从进攻的策略转入了包围的策略，用渗透的方法代替了公开的武装斗争。列宁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说：“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共产党，这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在跟谁打交道，对谁可以寄予充分的信任。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中派！’……现在必须前进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在建党以后学会怎样准备革命。在很多国家内，我们甚至还

① 参看《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544—545页。

没有学会怎样掌握领导权。”^①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的策略也转变了。列宁也曾说明，这个策略提纲是一种妥协。^②但对意大利困难很大，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是新近分裂的，两党的领导人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地位。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离开里窝那会议上的分裂仅半年时间，因此，在意共看来，要同社会党人缔结联盟，就等于承认这一分裂是一个错误。

1922年3月20—24日，意共在罗马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草拟的一系列决议，就是意共党史中著名的《罗马提纲》。《提纲》中表述的意共总的政治路线，反映出意共领导集团对“统一战线”的立场。总的政治路线主要有下面三点：（1）无情地批判资产阶级左翼的纲领以及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以参加议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任何活动；（2）不参与资产阶级左派的改革活动；不支持和不参加他们的联合行动；不进行任何“从下层”结成统一战线；（3）为了赢得群众的支持，意共不随意更改它的纲领，等等。^③

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葛兰西认为，这会使人误解，似乎我们也可以同天主教人民党搞统一战线，而天主教人民党同社会党都是资产阶级，不能作为统战的对象。他指出，德国的条件同意大利的条件不同，德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社会党以无产阶级为基础；而意大利的社会党是以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议会的多数派可以起到维护落后工人的权利的作用；而在意大利却不同，如果提出工人政府的口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1—462页。

② 《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308页。

③ A·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传记》1977年伦敦和新泽西英文版第177、178页。

号,人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意共是无产阶级的党,还是农民的党?因此,由于意大利文化落后和混乱的局势以及社会党的左派可能反对统一战线,意共就不宜提统一战线这个总的口号。^①

这期间意共领导人对统一战线策略的看法、观点是一致的。罗马代表大会后,葛兰西被选为意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

对“统一战线”策略改变看法

1922年5月,葛兰西去莫斯科。在离开意大利以前不久,他已预感到意大利面临着“统一以来历史上最大的危机”。^②这指的是法西斯夺取意大利的政权。因为这时葛兰西已经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得到不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也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可是博尔迪加还继续认为,法西斯是资本豢养的最后一个暴力统治的制度,它象征着即将来临的崩溃。由于博尔迪加不接近群众,对于这个问题又采取纯理论性的探讨,因此他没有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支持的。他低估了法西斯的力量和看不到它持续的时间会很长,从而使他拒绝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认为社会党人同法西斯是一丘之貉,两者都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形势造成严重的威胁。

葛兰西在莫斯科一方面受到列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于1922年10月夺取了政权,事实证明了葛兰西的预见。因此当马蒂阿斯·拉科西(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同他谈到,如果博尔迪加坚持现在的路线就要被共产国际开除时,葛兰西

① 参看《新秩序》1922年4月6日。

② 《池塘里的石子》,见《新秩序》杂志1922年3月12日。

说：“我要竭尽全力帮助共产国际解决意大利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事先不在党内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要撤换亚马多·博尔迪加是不可能的。根据意大利的形势，撤换亚马多不是单单找另外一个干部来代替他的问题；从工作能力来讲，他至少一个人能顶三个人用。”^①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心意思是革命的政党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却。他说：“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事先聚集力量等等。那时敌人就会很容易挑起我们去进攻，然后打败我们，使我们后退好多年。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给自己准备有退却可能的这种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不仅从理论上来看是如此。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察一下如何保证自己退却的问题。我认为，除了从我国革命经验中吸取其他一切教训外，如果我们还能注意到这个教训，那么，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很可能对我们有好处。”^②

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工人政府”（或“工人”和“农民”政府）的口号，并估计了政权形式的几种可能性：除了清一色的自由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共产党不能参加外，下面三种情况都能参加：（1）工人、农民的政府；（2）有共产党参加的工人政府；（3）真正无产者工人的政府（由共产党组织的）。

由于意大利社会党在1922年10月决定开除改良主义者，并且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还通过决议，批准意大利社会党

① G·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个革命家的一生》第1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0页。

加入共产国际。根据共产国际的章程，每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支部，因此大会决定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立即合并，名称为意大利统一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①

关于两党合并的事，意共代表团在讨论时本身就意见不一致：塔斯卡支持国际的决定；博尔迪加继续顽强抵制，并且要求共产国际延期作出最后的决定；葛兰西则提出折衷的方案：意共立即同社会党内的“第三国际派”进行合并，而不是同整个社会党进行合并，这个建议最后被大家勉强接受。于是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商讨合并事宜。博尔迪加被任命为委员之一，但他拒绝参加，结果由葛兰西、斯科西马罗和少数派的塔斯卡参加了会谈，社会党方面是萨拉蒂和马菲。葛兰西向社会党提出的合并条件主要有：（1）要求允许意共提出社会党应开除的党员名单；（2）撤回社会党的议员；（3）新的中央委员中共产党人应占三分之二；（4）所有党报都有共产党人的编辑；（5）意共对领导机构的任何领导人有无否决权。

虽然，这时葛兰西已经同意共产国际的计划，两党进行合并，但他有自己的看法。1923年4月，葛兰西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表示：“我们为维护意大利的传统和共产党的健全基础，已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关系到意大利革命的命运问题，而目前正在奠定党的组织基础，又正是处于意大利革命濒临危险的时刻。”他说，意大利的形势同匈牙利相仿，存在的危险性也是一样的，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去搞合并是错误的。②

这期间国际形势对革命越来越不利。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危机

① 参看《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576页。

② A·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传记》第201页。

已经被控制住；德国和法国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定；巴尔干国家中严禁共产党人进行活动；1923年初，法西斯政权迫害共产党达到了高潮。在一个星期内，警察逮捕了五千名党员，其中有劳工联合会的书记、做工会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省市的共产党议员，而且没收了所有共产党的活动基金。这一次，刚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的博尔迪加和格里科以及他们的大多数亲密战友也都被捕了。1923年6月，意共转入地下，改选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斯科西马罗、陶里亚蒂、塔斯卡、伏塔等人担任执委会委员。葛兰西由于有政府通缉令，不能回国。

回到“统一战线”正确策略的道路上来

1923年4月，博尔迪加在狱中写了一份《告意共全体同志书》。他的论点的矛头完全针对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口号。他号召意共的领导和国际负责意大利的有关机构对这封公开信进行讨论。他认为，如果意共没有讨论出具体的一致意见，那么，现在的这些领导也就不应当再参加党的决策机构。博尔迪加又说，他很愿意把他的这份公开信分发到其他国家去讨论。

是年5月1日，陶里亚蒂写信给仍在莫斯科的葛兰西，要他在公开信上签名，葛兰西拒绝接受这个文件。他认为，党应当抛弃这种脱离群众的空论家的立场，去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不当过于关心自己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逐步前进去实现自己的政治行动，不要老是瞅着镜子不动。如果我们能把工作做好，就能把社会党吸收进来；从而也能解决革命的首要问题：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摧毁蛊惑人心的普遍传统”。^①

^① 1923年5月18日葛兰西给陶里亚蒂的信，见《意共领导集团的形成》第67—69页。

葛兰西在给陶里亚蒂的另一封信中写道：“三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在意大利是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很难用简单的论战方法去消灭旧的残余。为了瓦解这个形成传统的有机体，我们必须采取巨大和细致的政治行动。共产国际的政策完全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①

这之后不久，为了贯彻他的政策，葛兰西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先后写信给都灵时期的老战友，向他们耐心说明：要摆脱目前共产国际的僵局，必须甩开博尔迪加和少数反对派，把组织问题的讨论转变为如何在意大利展开有效工作问题的讨论。他认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联合起来对付法西斯主义。

12月，葛兰西被派到维也纳去，担任该城共产国际新办事处的领导人。1924年3月，他编辑的《新秩序》杂志又开始出版。他通过这份刊物，把自己不同意博尔迪加的观点传达到全党。

1923年秋，共产国际领导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1923年10月德国共产党起义也象1921年那样失败了。

这时，共产国际的总政策（包括“统一战线”和“工农政府”的口号）是根据革命已进入低潮为基点，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尽力保卫它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政治组织作为当前的主要目标。葛兰西在分析欧洲特殊形势时也认为，意共有必要采取灵活的政策和阶级联盟。他不同意博尔迪加对共产国际政策的看法。他说，第一、俄国共产党人的政策概念的形成是有国际内容的，并不是民族内容的；第二、中、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决定广大无产者阶层的形成，而且也建立了一个更高的阶层：工人贵族以及他们的附属物——工会官僚机构和社会民主团体。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建

^① 陶里亚蒂《意共领导集团的形成》第65页。

立起来的这些政治上层建筑，使欧洲的革命问题复杂化了，不能照搬俄国群众上街闹革命、直接解决问题的经验；而是要求群众性的行动更缓慢、更谨慎，要求革命政党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比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月到11月应用的更复杂、更长期化。①

1924年5月4日，葛兰西从维也纳回到意大利。不久，他参加了在科摩举行的意共党的秘密会议。这时博尔迪加已经出狱（1923年10月无罪释放），也参加了会议。于是他们两人的意见分歧公开交锋了。博尔迪加认为，意共不必在群众中匆忙开展工作。葛兰西说：“博尔迪加，你不着急，可是我们这些同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人，却是非常着急的，正象工人和切身受到法西斯专政、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那样在着急。”②他有力地说明了当时的形势是：行动迟缓会招来失败。③

当时，葛兰西认为，意共的主要任务不仅要使党成为自觉的党，它的活动应该把革命口号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中去作为日常工作，而且要使“工农政府”的口号成为全国性的问题。

此后，他开始不停地访问各个城市，躲避法西斯警察的追踪，进行讲演，宣传自己的观点，组织党的工作。他讲演的论点有二：（1）任何有效的革命必须把农民包括在内，因此必须研究南方的农民问题；（2）党应当把本身看作是教育者或知识者。他的这两个论点明确地说明革命可以立刻进行准备。

这一期间，葛兰西被选为意大利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移居罗马领导意共议会党团，同法西斯进行斗争。他希望通过一个全国

① 陶里亚蒂《意共领导集团的形成》第196—197页。

② A·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传记》第213页。

③ 德劳兹《分歧》第156页。

的立法机构赢得全国的舆论。在另一方面，他开始把意共改造成一个半秘密的组织，这样可以在法西斯的疯狂镇压的条件下继续开展工作。1924年，他把社会党塞拉蒂的“第三国际派”同意共联合起来。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已经建立起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新的领导班子，把老的《新秩序》派如陶里亚蒂、特拉契尼等人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个领导班子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既要反对博尔迪加的左倾，又要反对塔斯卡的右倾。塔斯卡的论点有三：（1）资产阶级国家的危机可以不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2）现存的国家是可以利用的；（3）社会民主党似乎是无产阶级的右翼。葛兰西批评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了。^①因此，照葛兰西自己的说法，从1923年到1924年，执行共产国际的这一策略是在“蜿蜒前进”。

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同共产国际关系中，意共保持独立自主的问题，葛兰西早在1924年3月在维也纳给特拉契尼的一封信中已经提到过。葛兰西认为，意共可以接受共产国际总的战略指导，但这种指导必须符合民族情况，不影响意共独立的创造性的政策。如果尽义务地去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那是不会有成果的。^②

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从这次大会起被称为国际的“第三时期”，大会提出的总的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化”。《布尔什维克提纲》第七章中写道：“……布尔什维克化同宗派和联邦主义的倾向是不相容的。列宁主

① A·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传记》第230页。

② 参看陶里亚蒂《意共领导集团的形成》第261页。

义的世界党必须是强有力的联合，它不是通过呆板的纪律，而是通过意志和行动的一致来联合的…… 每一个党必须大力支持国际的领导。它必须使广大的群众明白：在当代严重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工人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受一个中心领导，他们才能赢得胜利。”^①

但是，葛兰西领导的意共还是一如既往，走着自己独立自主的道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葛兰西虽然接受共产国际对博尔迪加批评的政治和思想内容，但对于共产国际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非常不满。1924年12月，他通过陶里亚蒂（当时在莫斯科作为意共的代表）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批评：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地区领导机构不要光考虑自己只是主席团命令的執行者。即使这些命令对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十分重要，也必须在发布时做到使人心悦诚服。这就是说，必须事先经过充分讨论，让各国领导人有可能向主席团对本国的形势和政治路线作出充分的解释。”^②

1925年2月，葛兰西在莫斯科重申：意共的实践不可能附属于任何一种总的发展的利益。他反对所有党的活动要适应联共党的要求，把共产国际当做一个“世界的党”，似乎每个特殊地区的利益都得服从整体利益。^③

1925年是意共最艰苦的年代，法西斯的专政加强了，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惨遭迫害，

① 《共产国际文件》英文版第2卷第199页。

② 《陶里亚蒂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上的讲演》1969年罗马意文版。

③ 参看A·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传记》第223页。

工人图书馆被纵火焚毁，4月，陶里亚蒂被逮捕，意共在葛兰西的领导下越来越采取秘密的活动方式。

这期间，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写了一本题为《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文中批评了意共提出的大力依靠非法活动而不是公开的政治活动。曼努伊尔斯基在谈到“布尔什维克化”时，要求意共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10月17日前夕冲破警察围堵的经验中汲取教益。葛兰西立刻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反驳的信。他指出，意共从1924年4月到1925年5月党员增加了三倍，而且意共在无产阶级政党中，1924年的选票一直维持在1921年的水平。他还坦率地说，意共所遇到的反动派攻击的问题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此“要求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判断意共的情况时要谨慎、精确些，不要象他发表的文章那样轻率。”^①

1926年1月，意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里昂代表大会）上，罢免了博尔迪加的领导职务，选出了以葛兰西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以后，意共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就更为明显了。

1926年10月，葛兰西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要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他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独揽大权。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在任何社会要建立一个普遍的基础，必须最终用民族的语言来阐明一个特殊的文化、语言和一系列的传统；国际主义的革命团结固然需要，但国际主义用统一的模式在政治上是有害的。^②

① 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内的守法主义和烧炭党运动》，1925年罗马意文版第16页。又见J·卡麦特《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起源》，1967年斯坦福大学英文版第181页。

② 卡尔·博格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1980年伦敦英文版第112—113页。

葛兰西在入狱以后还拿第二国际采取僵硬方式的国际主义为例，说明被动和惰性产生的由来。因为“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应该开个头。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谁要开个头，自己就会孤立；因此，他们等待大伙儿一起行动，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人进行活动或组织活动了。”^①

但是，葛兰西也反对博尔迪加死抱住“不妥协”的原则同共产国际进行论战。他认为，要研究的是如何改善党干预本民族实际情况的能力，要从“一个民族大多数的观点”提出问题，民族革命大众所需要的是一个用来证明统一战线正确的论据，而不是拒共产国际的策略于千里之外。

最后一次的重要政治活动

1926年10月14日，由于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问题，葛兰西以意共“政治办公室”的名义寄给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一封信。信中的言词既委婉又含蓄。他担心俄国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会使国际和意共分裂。他在信中写道：

“同志们，在这九年的世界历史中，你们对各国的革命力量起到了组织作用和推动作用。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你们工作的规模和复杂性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今天，你们正在破坏这些工作，你们在蜕化，由列宁建立起来的联共的领导作用正在冒功败垂成的危险。我们的看法，你们似乎过于热衷处理俄国问题，因而看不到俄国问题本身的国际性，也使你们忘记俄国战斗者的使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国际利益的范围内才能完成。”^②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1973年伦敦英文版第241页。

② 葛兰西《政治论文》1978年伦敦英文版第429—430页。

葛兰西在信中很希望联共中央的大多数同志在斗争中能适可而止，不要采取极端措施。但是1926年10月23—26日，联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开会时，以多数通过的决议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开除出政治局；季诺维也夫被免去共产国际主席团的职务。

这封给联共党的信是葛兰西作为自由人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1926年10月31日，法西斯政权借口有人企图暗杀墨索里尼，乘机通过了“非常法”，命令一切反对派组织立即解散，并设立了一个“保卫国家”的“特别法庭”，这时起就大批逮捕共产党人。葛兰西虽然身为意大利议会议员，也未能幸免，他在1926年11月9日被捕，从此进入他生活的新时期，进行艰苦理论著述的时期，一直到1937年逝世为止。

三 营救葛兰西！

葛兰西被捕后，共产国际参与过几次营救，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他在监狱的条件是有所改善的。第一次是在1928年7月，当时苏联破冰船“克拉辛号”在北极救起了意大利诺比莱探险队的七名队员。陶里亚蒂就写信给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建议苏联政府是否可借这件事派一个代表团去同墨索里尼交涉释放葛兰西，把他送到苏联。在陶里亚蒂写此信时，“克拉辛号”仍在执行任务，要把失踪的意大利人全部找到。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机会，但是代表团交涉了一段时间，没有成功就停止了。取得的收获是：葛兰西及其他被捕的同志有单独会见家属的权利。^①

^① 参看保罗·斯普里阿诺《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党（入狱期间）》，1979年伦敦英文版第50页。

第二次是在1932年初，苏联以历史学家、外交家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凯尔任策夫为主要代表同罗马教廷谈判交换政治犯的问题，这次苏联释放了曾在1923年被宣判过死刑的契普拉克主教，本来争取释放葛兰西作为交换其他在押主教的计划的一部分。梵蒂冈的外交代表古塞普·比札尔道（后来的红衣主教）曾到都灵监狱探望过葛兰西，但没能会见，只留下了一张表示问候的名片。后来，谈判中断，没有成功。^①

第三次是在1934年12月，当时苏联驻意大利大使弗拉基米尔·波特金向墨索里尼提出以释放一名间谍为条件，换取葛兰西，墨索里尼断然拒绝。但这一材料只是197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尼古拉·朱可夫斯基的一本回忆录《外交见闻》中曾提到过。^②

第四次是在1935年1月13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反意大利监狱条件的运动委员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陶里亚蒂、瑞士共产党员霍夫曼耶等人。决定的行动计划主要有：（1）以争取释放特拉契尼作为国际运动的中心，因为他在狱中病势严重，早就该援用刑法第176条予以假释（这时葛兰西已经援用该条法律获得假释）；（2）在葛兰西假释之后，继续进行为葛兰西获得完全释放的运动。其次要成立一个规模更大的同法西斯监狱条件进行斗争的委员会，并提议意大利政治家尼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等各国著名人士参加这个委员会。^③

此后，在1937年2月，意共国外负责人贝蒂受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委托，并通过季米特洛夫的“渠道”，为葛兰

① G·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个革命家的一生》第269—270页。

② 参看保罗·斯普里阿诺《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党（入狱期间）》第88页。

③ 参看同上，第103页。

西物色一个合适的医生，可是他找到的那位医生还没来得及动身前往，葛兰西已于1937年4月27日逝世。享年仅46岁。

1937年，《团结报》（意共机关报）第六期登载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葛兰西的悼词，其中写道：“葛兰西的名字将用金字镌刻在工人阶级的旗帜上……也将永远印记在所有爱好自由、和平人们的心坎中。”悼词结尾的署名是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洛佐夫斯基等16名执行委员。

葛兰西不仅是意大利的民族英雄，而且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是个杰出的国际战士。葛兰西以创造性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例如他的“工厂委员会”理论是汲取了俄国革命初期“苏维埃”的经验；他的关于党、国家、“领导权”理论是从列宁主义理论脱胎而出的。但是葛兰西并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死的公式来生搬硬套。他的理论是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和意大利革命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因此，他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政治理论的某些领域，有他独到的见解。葛兰西的革命的一生，甚为短促，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更使人有瞬息即逝之感。他赞成共产国际总的战略，但他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策略，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经历了匈牙利和德国革命的失败以及法西斯在意大利登上政治舞台以后，葛兰西对革命的无产阶级用一次突击取得政权的战略的俄国经验作了重新思考，他提出了无产阶级要从事长期的日常斗争，通过思想领导权把人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最后夺取政权的战略；其他如对国际主义的新提法等一系列问题，在我们研究葛兰西思想时，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苏南冲突

姜 琦

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冲突，1948年南共被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开除，这是四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桩大事。

—

任何国际组织的出现，总是为了适应特定历史环境的需要，共产党情报局的出现也正是适应了战后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遭到溃败，英法两国被严重削弱，而美国却依仗它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美国前总统胡佛宣称：“目前，我们，只有我们，掌握着原子弹，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全世界。”^① 1947年3月，美国抛出了杜鲁门主义，其主要内容是，美国趁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控制已经力不从心，不得不退出这块地盘的时机，杜鲁门公开宣布：“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的

^① 胡佛《论美国的道路（1945—1948）》1949年纽约英文版第14页。

行动，去填补真空，这是美国的责任”，而且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的回答。”美国的这个政策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继杜鲁门主义之后，1947年6月，美国又抛出了“马歇尔计划”。其主要内容是，美国乘西欧之危，以“复兴欧洲”为名，在经济上行控制西欧之实，这一国策是由马歇尔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的一篇演说公开出来的，因而得名。“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美帝国主义疯狂推行大国称霸世界的严重步骤。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一出笼，立即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响应，英国政府表示完全支持“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法国政府也准备“毫不迟疑”地加入进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笼，在东欧诸国也引起了一系列反响。有些国家内的反共势力乘机加紧活动，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这种情况在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都曾发生，最为突出的是匈牙利。当时匈牙利小农党头目、共和国总统菲伦茨·纳吉就派人与美国政府联系，请求将“杜鲁门主义”应用于匈牙利，在得到美国支持后，他们就阴谋进行武装暴动，匈牙利党和人民及时粉碎了这个阴谋。西欧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依仗“杜鲁门主义”的撑腰，相继把共产党从联合政府中撵了出去，如1947年5月5日法国社会党拉马迪埃政府将法共一脚踢出政府，同年5月31日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加斯贝利政府将意共赶出了内阁。

“马歇尔计划”抛出后，东欧一些国家的政府，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都有过要参加并表示。6月5日马歇尔发表演说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马上表示要对美国的提议予以详细研究。6月24日捷政府决定设立一个关于马歇尔计划问题的小组。7月初，捷政府命令捷驻法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定于7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国家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波兰外长莫

杰莱克斯基也转告波兰驻法大使说，波兰打算参加巴黎会议。1974年7月9日由哥德瓦尔特率领的捷政府代表团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临行前几小时得知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政府已撤销了参加巴黎会议的打算，哥德瓦尔特心神忐忑不定，当天晚上苏联政府领导人在接见捷政府代表团时指出：“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捷政府参加马歇尔计划，这是对苏联的敌对行为。”^①哥德瓦尔特回旅馆后，立即电告布拉格，赶快撤销出席巴黎会议的决定。但捷外长马萨里克私下却发牢骚说：“这是新的慕尼黑”，^②因为这位外长是坚决主张参加“马歇尔计划”的，他在动身去莫斯科前曾说：“捷克非常渴望参加马歇尔计划，并准备这样做，除非遭到苏联的禁止。”^③

为了反击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为了使东欧诸国进一步团结在苏联周围，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经济上，苏联立即与东欧各国广泛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以巩固苏联与东欧的经济联系，把以前流向西欧或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大宗贸易转向了东欧。西方把这些贸易协定统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

在军事上，除加强常规部队外，加速了研制原子弹的进程。

在政治上，除加强东欧各国政权建设，建立共产党一党领导的政府，并派出大批苏联专家外，决定成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加强欧洲诸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的协调行动。

关于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早就有过酝酿。1945年间，铁

① 科尔贝尔·约瑟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颠覆(1938—1948)》1959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第181—182页。

② 科弗里格·贝内特《解放的神话》第79页。

③ 《美国的对外关系》1947年英文版第3卷第314页。

托曾向斯大林提出建立一种协商性质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斯大林很赞赏这个意见。1946年6月,铁托访问苏联,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曾问铁托是否还认为有建立一个具有情报性质的新的国际的必要,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斯大林建议说:“最好由你们南斯拉夫人发起。”当晚在宴请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时,斯大林又谈到这问题,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复活任何形式的第三国际,但有必要建立一种情报机构,以便经常开会,交流一般的经验和作出一些决定。但是这个机构作出的决议不应该束缚任何对决议持有异议的党。斯大林问季米特洛夫:“你认为谁应当作发起人?是你,是华尔特(第三国际活动时期铁托的名字),再或是法国人?”季米特洛夫回答说:“华尔特可以”。铁托说:“让法国人当吧。”

1947年夏,苏共中央写信给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要波兰工人党出面发起召开欧洲一些党的会议,讨论加强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波兰工人党经过讨论,同意接受这一要求。1947年9月22—27日,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波兰西南部西里西亚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的小温泉场举行了会议。

会上,苏联共产党(布)代表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会议在听取哥穆尔卡关于各国共产党必须彼此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报告后,通过了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党之间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决议,决定成立情报局,其任务为组织经验交流,在必要时,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配合各国党的活动。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并出版一份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成立情报局的决议公布后,引起了东西方强烈的反响。各国

共产党对此都表示支持。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计划的檄文，这篇檄文振奋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们斗争方向，巩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全世界的反动派，在这篇檄文面前惊惶失措。”^①帝国主义国家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竭力反对，散布了种种诬蔑。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新共产机构的成立使美国援助西欧更为迫切。美国前国务卿洛维特在10月8日记者招待会上则说：“支持这一纲领的党和政府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意图是——如果可能的话——要阻止欧洲经济复兴。对于美国人来说，现在是冷静、明晰地予以判断的时候了。”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认为，“以共产党情报局的形式重建共产国际”，“是克里姆林宫对马歇尔计划的回答”。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人们可能发现这一新步骤的含义是有效地抗衡马歇尔计划和美国对西欧十六国的领导，加强不参加该计划的东欧人民间的团结的感情。”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事实告诉我们：第一，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团结社会主义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共同对付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战略部署；第二，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宗旨看，这是一个不同于第三国际的组织。第三国际是一个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国际组织，而且明文规定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原则；而共产党情报局是欧洲九国共产党互通情报，交流经验，配合行动的机构，而且明确宣布，共产党情报局作出的决定对持有异议的党没有约束，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关系。第三，南共领导人铁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3—1204页。

托是这个组织成立的发起人之一。

二

在情报局成立后的活动中震惊全球的事件要算是1948年6月28日作出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这个决议向全世界宣告南斯拉夫共产党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国际主义，已处于“和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地位……从而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①西方人士称这一决议把南斯拉夫“革出了教门”。这一消息对当时一千五百万南斯拉夫人民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正在散步的铁托听到决议广播后，盛怒之下，拔出手枪，扫射了正在芦苇丛里呱呱鼓噪的青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第二年，就对这个组织的倡议者之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实行了如此严厉的制裁呢？为什么情报局违背了自己的宗旨，竟然把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党之间的矛盾放在首位来开展所谓内部斗争，并以断然组织措施行事呢？大量的事实表明，不是“情报局”这个组织与南斯拉夫这个成员国之间的矛盾，而是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矛盾。为什么彼此之间的矛盾竟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呢？这只有从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矛盾渐趋激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弄清楚是非曲直，从而吸取有益的历史教训。

关于苏南之间的矛盾，还在大战年代就已露端倪。

1941年4月，法西斯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仓惶逃往英国，在伦敦组织了流亡政府。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迅速

① 《共产党情报局文件集》莫斯科中文版。

组织了游击队，奋勇抗敌。当时，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奇缺，特别是在1943年，游击队处境极为艰难，曾向苏联多次提出援助的要求，并强调苏联送来的任何东西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是有重大意义的。苏联当时的处境也很艰苦，但还是表示，“尽力设法以武器支援你们”。南共派人到预定地点，等候苏联空投援助。可是，整整等了三十七个昼夜，援物终未到来，苏联的回答是“技术上有困难”。可是，南共发现，苏联在强调援助南共游击队“技术上有困难”的同时，却建议给米海伊洛维奇（南流亡政府总司令兼国防部长，反法西斯战争中与德寇勾结，同南共游击队闹摩擦）以军事援助。这事自然会使南共感到不愉快。所以，南在给苏的一份电报中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们援助，至少也请不要故意跟我们为难。”^①

1943年秋天，南斯拉夫游击队已发展到三十万人，解放了南斯拉夫一半的国土。这时，英、美、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会上承认了在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是南斯拉夫抗击德国人的基本力量。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阶段，英、美政府是全力援助在英国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武装力量的，当他们看到游击队力量日益壮大，就转向援助游击队。早在1943年开始，英国政府就派出观察员到解放区，1944年丘吉尔还派自己的儿子伦道夫和一些将军到游击队总部去表示支持他们的抗德战争。英美方面开始给予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军事援助是少量的，直到1944年下半年才给予比较大量的援助。而苏联只是在得知英美已经支援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消息之后，才于1944年开始给予援助。这对南斯拉夫同志来说，不能不感到是件遗憾的事情。

南斯拉夫人民在抗击法西斯的最初阶段，就决定摒弃逃亡在

^① 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上卷第95页。

外的王国政府，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当时苏联和西方国家都承认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第三国际还就此劝告南共“不要忘记一个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进行，建立新的政府机关是个错误。”^① 1942年9月，苏联为了加强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铁托为此向苏联提出了抗议。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南共中央决定召开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二次会议，正式讨论建立南斯拉夫临时政府问题。10月，铁托得悉英、美、苏三国外长即将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于是就成立临时政府问题打电报给莫斯科，要求外长会议在讨论南斯拉夫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南斯拉夫的意见：要求在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当前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反法西斯会议领导的人民解放委员会。苏联在接到电报后，并没有把南共的声明列入三国外长会议的议程，南斯拉夫不管苏联赞成与否，于1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策召开了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人民委员会被确定为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的执行机构，执行临时内阁的职务。会议还通过决议，剥夺流亡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并宣布国王彼得和王朝成员一律禁止返回南斯拉夫。苏联政府在得知南斯拉夫上述会议内容，特别是关于流亡政府被剥夺权力和国王彼得被禁止返回南斯拉夫后表示异议，苏联方面在写给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信中指出：“不要把这个委员会〔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看作一种政府，而要看作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力量。不要使它反对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不要在目前情况下提出废除君主政体的问题。”^②

① 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铁托传》下册第54—55页。

② 韦恩·S·维辛尼克《当代的南斯拉夫》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第121页。

南斯拉夫临时政府建立的消息传出后，英美政府先是感到吃惊。但他们考虑到在战后的南斯拉夫，铁托的力量将占优势，又误认为南斯拉夫亚伊策决议事先是得到苏联同意的，因此他们对亚伊策决议没有提出尖锐的评论。英美的这种态度又反过来影响了苏联，苏联政府鉴于南斯拉夫此举已获得英美政府的谅解，于是在事过两周以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肯定了亚伊策决议的积极意义。尽管如此，苏联和英美政府一样，仍然只承认流亡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这些情况说明，在建立南斯拉夫新政府问题上苏联并没有在道义上给予支持，其态度与英美政府相仿，南斯拉夫人民对这一点是感到困惑不解的。

战争刚结束，就的里亚斯特领土的归属问题，又增加了新的矛盾。南斯拉夫与意大利接界的的里亚斯特以及南斯拉夫与奥地利接界的卡林西亚，这些领土的归属长期来是一直存在着争议的。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要求这些领土归属于它。

英美早有占领这个地区的意图，的里亚斯特是多瑙河地区许多国家通向亚得里亚海的一个主要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丘吉尔于1945年2月27日写信给杜鲁门说：“在我看来，占有的里亚斯特似乎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铁托的游击队占领该地区以前到达那里”，“占有它就可以在法律上构成有力的根据。”^①于是英国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奉命进驻的里亚斯特地区。可是，他迟到了一步，南斯拉夫部队先他两天占领了该地区。英美立即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一方面向铁托发出照会，要他的部队撤离该地，并准备派五个装甲师开赴的里亚斯特附近，把地中海的许多舰只开往亚得里亚海，几个空军大队也待命起飞；另一方面杜

① 《杜鲁门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147页。

鲁门于5月20日致电斯大林说：“我希望我们能同样期望您运用您的影响来帮助实现我们最近给铁托元帅的照会中所概述的解决办法。”^①

苏联方面于5月23日复电杜鲁门，一方面认为铁托的部队留在那里是正确的，但又认为盟军最高司令部也可以在这一地区建立管制，并且由亚历山大元帅和铁托元帅相互协商确定分界线。苏联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可能是害怕触发一场新的战争。苏共领导说过这样的话：“南斯拉夫同志们不会不知道，经过这样一场激烈的战争之后，苏联无法进行另一场战争了。”^②1945年7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再次讨论这些地区的归属问题。莫洛托夫接受了法国提出的南意分界线，把的里亚斯特地区分为甲乙两区，包括的里亚斯特市在内的甲区，由英美两国管辖，乙区属南斯拉夫管辖。苏联在接受这个方案以前并没有与南斯拉夫商量过，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卡德尔和莫洛托夫会谈时，莫洛托夫也没有把已经决定将在第二天采取的步骤向卡德尔作丝毫暗示。

早在同年5月28日，铁托在卢布尔雅那的演说中曾说：“据说这场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认识的。不过，我们还谋求一个正义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他自己的屋子的主人；我们不要为别人而作出牺牲；我们不要在国际谈判中被当作一种贿赂；我们不想介入任何争夺势力范围的政策。”^③苏联得悉这一演说的消息后，大为不满，并通过大使馆向南斯拉夫提交一份声明，警告铁托，如果继续容许对苏联这种“攻击”，那就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55页。

② 罗伯特·巴斯和伊丽莎白·马伯里《1948—1958年苏南论争文件集》1959年纽约英文版第27页。

③ 同上，第27页。

要不客气地在报上公开批评了。不仅如此，以后在苏南公开冲突后的往返信件中，苏方还把这段讲话作为铁托反苏立场的表现。

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南斯拉夫，解放后急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南斯拉夫党和人民立志要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从1947年就着手制订发展工业的五年计划。在经济建设中南斯拉夫期望得到苏联的援助，而苏联也力求密切与东欧诸国的经济联系。1946年8月苏南两国就建立联合公司的问题正式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南斯拉夫发现苏联想在南斯拉夫原料生产中取得垄断权，而对南斯拉夫工业化计划并不热情支持。苏联代表在谈判中公开说：“你们要重工业干什么？我们的乌拉尔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在谈判到成立苏南石油联合公司时，苏方认为南斯拉夫油田的价值不能算做南斯拉夫在联合企业中的股份，他们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油田是没有直接社会价值的自然财富。苏方要求南斯拉夫出口的任何石油都要运给苏联，在头五年内免除一切税和出口税，五年期满后，南斯拉夫除征收所得税外，也无权征收其他税和关税；在公司产品出口时，应以最优惠的条件满足苏联的要求，而在南斯拉夫国内出售时，价格要包括一切生产费用和利润，以保证公司的赢利。在建立联合石油公司协议草约中还规定南斯拉夫把全部国土上的油田勘探、开采权让给该公司。苏方还要求南斯拉夫的所有石油的分配，即汽油及其他石油副产品的全部零售网由该公司控制。又如，苏方还建议设立一家苏南银行，这个银行将经营所有联合公司的信贷、结算和现金业务，以及苏南两国间的一切贸易结算业务。这个银行不是联合企业，而完全由苏联经营。由于各联合公司将囊括南斯拉夫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苏南贸易在南斯拉夫对外贸易中的巨大比重，这个银行的设立将对南斯拉夫的经济、

财政、信贷和外汇等取得全面控制的地位。这样的联合企业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南斯拉夫方面的拒绝，致使苏南经济谈判一直拖到1947年2月，才签订了一项成立两个苏南公司的协定，一个是空运公司，一个是多瑙河航运公司。在经济方面苏联对南斯拉夫的不平等待遇，南共党的领导人卡德尔同志曾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过，在这里又增加了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起来的新因素。

如果说在上面一些问题的矛盾中，还是比较克制的话，那么在对待巴尔干联邦问题上，矛盾就公开化、表面化了。西方人士把苏联公开表示不同意成立巴尔干联邦的声明，看作是苏联对南斯拉夫“发动总攻击的第一炮”。

巴尔干半岛，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希腊等国。巴尔干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是国际交通枢纽，历来是列强互相争夺的重要地区。列强在争夺巴尔干地区时，往往利用那里的民族矛盾。巴尔干人民在反对列强控制的斗争中，深感实现各民族联合的重要性。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个国家长期以来不断在马其顿问题上发生争吵。1944年11月南斯拉夫就提出了建立南保联邦的倡议，并派卡德尔去索菲亚同保加利亚领导人商谈。由于双方意见分歧，此事就延搁下来。这次保、南两国领导人会谈中，建立联邦问题又重新被提出。

季米特洛夫对发展保南关系也很热心。他曾表示，有必要在巴尔干和多瑙河国家之间建立一个联邦或关税同盟。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访问罗马尼亚，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巴尔干问题发表谈话说：“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不成熟。它还没有列入目前的议事日程，因此，这个问题还不是我们在会上讨论的题目。当这个问题成熟的时候（成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

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将和希腊一起解决它。正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将决定他们采取什么形式，是联邦呢，还是邦联；正是他们将决定什么时候或如何去成立它。我可以说，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目前已作的一切，已大大有助于将来这项问题的解决。我也可以强调地说，当建立这个联邦或邦联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去问帝国主义者，不会理睬他们的反对，将会在我们本身的利益的原则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本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必要的国际合作是息息相关的。”^①

季米特洛夫的这席谈话在国际上引起了纷纷议论。如美国的戈德曼对此提出值得人们注意的三点：第一，季米特洛夫把巴尔干联邦扩大到有一亿人的东欧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第二，把还不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希腊也包括在联邦之内，这是够大胆的；第三，把东欧组织起来这一大胆计划几乎没有顾及苏联。苏联领导人对此极为不满，在刊登季米特洛夫讲话后，《真理报》立即发表声明，用强烈的口气说：“正如著名的九国共产党声明所说过的那样，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既不是一个靠不住的和臆想出来的联邦或邦联，也不是关税同盟，而是通过动员和组织国内的人民民主力量来加强和捍卫本国的独立和主权。”^②这就是说，保、南的行动是违反了情报局的声明的。其实，保、南两国建立联邦的问题（或巴尔干国家建立联邦的问题）与情报局的宗旨并没有什么矛盾。那么苏联持如此强烈的反对态度，其症结究竟何在呢？看来还是在于苏联对南斯拉夫过于独立的外交活动感到不安：一是担心东欧其他人民民主

① 《真理报》1948年1月23日。

② 《真理报》1948年1月28日。

国家效法南斯拉夫，二是担心南斯拉夫国家和它的领袖铁托过于出人头地。

接着，苏联立即召集南、保两国代表去莫斯科磋商。保加利亚组成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三人代表团。苏联希望铁托本人参加磋商，但铁托没有去，派了卡德尔、巴卡里奇以及已在苏联的德热拉斯为代表。

可以预料，保、南两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的境遇，他们都受到了严厉的指责。苏联方面批评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上还没有养成同苏联政府磋商的习惯，为了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情况，要求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政府名义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关于相互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2月11日午夜，卡德尔匆匆忙忙被召唤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看来签订协定的一切工作均已准备就绪。莫洛托夫递给卡德尔两页纸，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书已经写好了。事后卡德尔回忆说：“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反对在外交政策上进行磋商，但为什么一切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呢？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协定的规定，为什么还要签订这么一个协定呢？这种屈辱使我感到厌恶和困窘——它只能使我想起大国对弱小国家的专断。我思索怎么办？到底签不签字。最后我决定签字。我这样做，是想不使已经紧张了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因为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我竟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的地方。因此协定的原文必须重新再写，签订的整个程序推迟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我签署了这个协定，马上便和我的同志们离开了莫斯科。”^①不用说，关于建立联邦一事当然就此作罢。但矛盾却越来越激化了。接着，在地拉那庆祝苏联红军建军节的宴会

^① 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铁托传》下册第120页。

上,南斯拉夫公使约瑟夫·杰尔贾提议为斯大林和铁托祝酒,苏联代办加加里诺夫说:“除非铁托赞成民主阵营之间的团结,我才为他干杯。”^①从1948年初就去苏联谈判的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在2月底接到苏联外贸部长的通知说,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没有必要再留在莫斯科,这实际上意味着两国贸易关系即将中断。1948年3月18日苏联通知南斯拉夫,决定撤走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第二天即19日,苏联又宣布从南斯拉夫撤走全部文职专家的决定。从此,矛盾公开化了。

1948年6月下旬,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了第三次会议。28日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决议激烈地抨击南斯拉夫党和党的领袖铁托。决议说:“情报局一致得出结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由于他们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党、反苏的观点,由于他们的整个态度和他们之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已使他们自己处于和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地位,走上了脱离反帝国主义的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的道路,走上了贩卖劳动人民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决议还说:“南斯拉夫的领导者显然是不了解,或者可能装着不了解,这种民族主义的路线只能导致南斯拉夫蜕化成为一个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丧失它的独立,并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②在决议的讨论过程中,日丹诺夫还宣称:“我们已掌握情报,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一名间谍。”^③在一片危言耸听的指责声中,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组织。1949年11月下半月,情报局在匈牙利举行第

① 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铁托传》下册第121页。

② 《共产党情报局文件集》莫斯科中文版。

③ 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铁托传》下册第156页。

四次会议，通过了所谓《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这个决议更是捕风捉影，毫无事实根据。

从1948年3月18日到5月22日，南共和苏共之间就双方分歧交换了七封信件，除了3月18日南共给苏共中央的信未发表外，其余六封信在克利索尔德著《1939—1973年南苏关系》和巴斯与马伯里著《1948—1958年苏南论争文件集》两书中都有刊载。从这六封信件和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来看，归结起来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苏联的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在南斯拉夫的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为共同繁荣经济，加强国防建设过程中互派专家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后的新课题，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在这方面创造新经验。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派专家到后解放的国家去协助工作是很受欢迎的。它同帝国主义国家派军政人员到殖民地国家去控制和剥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援助他人”的国家应该尊重受援国家的民族特点和独立自主。

例如，苏联军事专家坚持要按苏联军队的规章制度来训练南斯拉夫军队，不尊重南斯拉夫军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军事建设经验；苏联军事专家的工资要比南斯拉夫军队的将军的工资高出三至四倍，这对刚解放的南斯拉夫国家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南斯拉夫方面要求苏联军事专家尊重本民族的特点和适当削减军事专家的人数。这样的要求不能说不合理，而苏联方面把这些说成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周围造成一种“敌对气氛”，并以此为借口撤走了全部军事专家。

往返信件中谈到文职专家在索取情报问题上的意见。例如苏

联的商务代表列别捷夫向南斯拉夫的部长助理塞赞提奇索取情报，塞赞提奇告诉列别捷夫依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他无权向任何人提供重要的经济情报，苏联方面可以到南共中央和政府那里去要这类情报。也就是说，不是苏联专家中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向南斯拉夫的随便那一级工作人员索取情报的，只有南共中央和政府有权向苏联驻南斯拉夫的大使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重要情报。在存在着帝国主义间谍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下，南斯拉夫政府这样的做法是符合本民族利益，同时也是符合苏联在内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对敌的要求的。但苏方的回信中却认为“过去苏联专家可以直接索取经济情报的一些有关部门，在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认为今后必须改向南共中央去索取一切经济情报，那就是荒谬的了”。^①认为这是对苏联文职专家的“不信任”，因而撤走全部文职专家。更有甚者，如南共中央4月13日信中揭示的，苏联情报机关还在南斯拉夫雇佣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有军官、各种领导人物以及对新南斯拉夫怀有敌意之徒。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是会引起任何主权国家的正当不满的。

第二，关于南共党内生活和党与人民阵线的关系问题。苏共党在信件中对南共党进行了一系列指责，说这个党“仍处于半合法地位”，因为党组织的决议和党的会议上的报告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说南共党的内部民主气息是不浓的，理由是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指派的；说党内没有或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最突出的是党的负责人事的书记也是国家保安部长。按苏共信中的说法，这样，全体党的干部都受着国家保安部的监视，

^① 凡涉及苏南来往信件의 引文，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4分册第244—303页。

国家保安部实际上控制着党。对这些指责南共中央在复信中一一作了回答，指出在南共中央委员中，19名是由选举产生的，7名新委员是被指定的，他们是来自候补委员和党内最优秀的领导人。当时南共中央正在为召开党代表大会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在党的例会上和积极分子会议上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至于负责组织部门的书记兼任国家保安部部长，这并不妨碍党的领导工作，因为南共党是通过中央委员会来领导全党工作的。国家保安部长不过是南共中央委员之一，他本身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能说由保安部长控制党呢？这里却有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南共党内事务，诸如什么时候开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是否要在报上发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如何、安排什么人担任保安部长等等，如果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话，苏共不应该对南共进行干预和指责。

在谈到南共与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关系时，苏联方面引用铁托的一段讲话：“除了人民阵线的纲领外，南共是否有其他的纲领？没有，南共没有另外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就是它的纲领”。从中得出结论说，南斯拉夫共产党放弃了领导权，把党湮没在人民阵线之内，亦即取消了党，其结果将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的蜕化”，并引证四十年前联共党的历史说，这种观点是孟什维克的取消派观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人所共知，人民阵线是南斯拉夫人民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南共党是人民阵线的领导核心，南共通过人民阵线逐步贯彻其纲领，人民阵线把南共纲领当作自己的纲领而自愿采纳了，这就是铁托说的人民阵线的纲领就是党的纲领。现实情况也正是这样，南共党领导下的人民阵线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积极工作。南共党并没有湮没在人民阵线中，更不存在人民共和国

蜕化的危险。

第三，关于南斯拉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苏共的信件中为南共罗织的另一罪状是：“南共党没有贯彻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在迅猛增长，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相反，“在掩盖阶级斗争和调和阶级矛盾的精神状态下”使党解除武装。苏共党又一次引证历史，批判南共党在“从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和布哈林那儿借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经济改造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特别是对大量的小生产者，既要团结他们，又要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从建国到1948年仅三年时间，正在从恢复国民经济阶段过渡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南共领导根据南斯拉夫国家的具体历史特点，参考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正在摸索与苏联“略有不同的形式发展社会主义”。这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本来是无可指责的。

从往返信件中论及的这三个主要问题，可以看出导致苏南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苏共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态度对待南共党和南斯拉夫国家。苏共党完全以“解放者”、“救世主”自居，对南斯拉夫为维护本民族独立自主的正当做法都斥之为“盲目的妄自尊大”和“不知天高地厚”，是“民族主义”立场。至于说南共领导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那纯属诬陷之词。情报局采取断然组织措施，把南共开除出去，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共产党之间讨论问题的正确态度。

三

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情报局开除，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南共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敢于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顶住了被开除的压力，这是和铁托、以铁托为首的党敢于坚持原则，团结一致，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分不开的。

1941年4月6日清晨，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突然侵袭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遭到狂轰滥炸。接着德军从北面，意军从西面向南斯拉夫蜂涌扑来。懦弱无能的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不战而逃，在英国伦敦成立了流亡政府。4月17日，南斯拉夫王国最高统帅部投降，整个南斯拉夫国土为德、意、匈、保的法西斯军队所占领。南斯拉夫蒙受着空前的民族浩劫，南斯拉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具有光荣传统的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揭竿而起，毅然举行武装起义，开始了持续四年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在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

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是在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4月。1929年至1936年，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一直设在国外，领导人长期脱离国内革命实际，党内意见分歧，宗派斗争激烈。1937年，共产国际授权铁托重新组织中央委员会。铁托担任南共总书记后，坚持以马列主义原则整顿党的组织，为南共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铁托担任南共总书记后，在整顿党组织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如第一，南共中央委员会必须立足于国内，扎根于人民中间。他认为，党中央委员会如果还象过去那样，设在国外某个地

方，远离国内的实际斗争，那就不可能领导本国劳动人民取得斗争的胜利。铁托特别反对党的领导入长期流亡国外，用别人的头脑来代替自己的头脑，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而是一味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或者消极地等待共产国际指示，认为这对党的事业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因此，铁托担任总书记后，就把设在国外长达六年之久的中央委员会迁回了南斯拉夫。第二，必须保持全党的团结。铁托痛切地感到，南共过去十五年来深受宗派主义的无原则斗争之害。党的组织由于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派别争吵之中，就无法集中主要力量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铁托以为必须立即铲除宗派之争，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第三，党不能依靠接受外国的财政援助而存在，应该独立自主地解决党的活动经费问题。南共从铁托负责领导之时起，就停止接受国外津贴。党的经费主要来自本国工农群众的捐助。

南共的这次改组和整顿，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党有了一个以铁托为首的领导核心，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正是这样的党，成了南斯拉夫全国各族人民抗击敌寇的中流砥柱。

南斯拉夫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斗争是艰苦卓绝的。当时已经占领了半个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原以为征服小小的南斯拉夫就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它根本没有料到会遇到南共领导下的游击队的顽强抵抗。南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正确地把民族解放斗争和整个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牢牢地抓住了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经过四年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法西斯，解放了南斯拉夫。在战争中，南共和南斯拉夫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南共在战争爆发时的一万二千名党员牺牲了九千人，战争期间入党的党员牺牲了近四万

人，全国死于战争的达一百七十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南共和南斯拉夫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经过四年浴血奋战的南斯拉夫人民，在实现祖国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后，急切地需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可是，在苏南关系公开破裂以后，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急转直下。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急剧地削减了同南斯拉夫的贸易，停止执行向南斯拉夫提供货物的合同。南斯拉夫五年计划中投资的百分之九十五都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签订合同，这给南斯拉夫的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接着，苏联废除了同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整师整师的苏联坦克开始出现于南斯拉夫边境。

压力是巨大的，环境是恶劣的。南斯拉夫在那些日子里的确是万分困难。当时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很难想象，南斯拉夫现政府能够继续执政下去。有的干脆断言：南斯拉夫完蛋了。

但是，以铁托为首的南共和全体南斯拉夫人民，坚决顶住了苏联的压力，1948年6月28日情报局发布开除南共决议的第二天，南共举行了中央全会，通过了对情报局的答复，在答复中指出，情报局对南共的指控是不公正的，南共中央拒绝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并决定于6月30日在报上全文发表情报局的决议和南共中央对决议的答复。南共这样做，反映了南共对自己人民的充分信任，相信南斯拉夫人民有鉴别是非的能力。事实证明，南斯拉夫人民在受到震惊之后，冷静地思考了面临的严峻现实，没有因此而产生混乱，而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南共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一起承受和战胜所遇到的困难。

为了渡过困难，南共被迫向美英等西方国家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有人曾经据此断言，南斯拉夫必然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而

成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并不都是以“非此即彼”的形式存在。南共在接受外国援助时，始终坚持了民族独立自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没有作出让步，南共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

南共被开除以后，理所当然地对苏联的这种错误作法产生反感，这种反感引起了南共对苏联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渐渐地这种消极的批判发展为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重新学习和探讨。他们开始发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过于集中和过于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不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反而有利于助长官僚主义。这种集权式管理经济的弊病在南斯拉夫经济实施中也有所暴露。因此，他们试图摸索一条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又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再加上南共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以后，有着一种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的自由，只要讨论出方案，就可毫无阻力地在国内实行。正是在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南共突破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干扰，突破了经济建设中的苏联模式，创立了一整套适合南斯拉夫情况的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南斯拉夫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

新经济政策和联共(布) 党内的左倾反对派

杨彦君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从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开始实行的。它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新经济政策的所谓“新”,是对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夏至1921年初所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就是说,它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否定。实际上,它是1918年春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著作中所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的继续和发展。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就在于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倾分子在1918年春反对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计划时所坚持和鼓吹的东西。如果说,在列宁看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是在国内战争时期被迫采取的非常措施,那么,在左倾分子看来,正如布哈林后来作自我批评时所说的那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战时的’,也就是并不只适合于国内战争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①

因此,从1920年下半年起至1927年止,在酝酿、制定、实行新经

①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2期第4页。

济政策的过程中，党内的左倾分子以各种名目的反对派出现，顽固地坚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抵制、阻挠和破坏新经济政策。在此期间的一些主要的左倾反对派就是：1920至22年间以施略普尼柯夫、柯伦泰等人为代表的“工人反对派”，1920至21年间以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等人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1922年由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真理派”，1923年以米雅斯尼柯夫为首的“工人集团”，1925年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代表的“新反对派”，1926至27年间由各左倾反对派组成的“反对派联盟”等等。1920至1927年间，托洛茨基是左倾分子的主要代表，他参与和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

这段历史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制定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是不断克服“左”的过程。

本文拟对这段历史作一扼要的叙述，从中可以看到左倾分子是在哪些主要问题上反对新经济政策的。

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是在1920年11月基本结束的。在国内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消极后果已经暴露出来。特别是余粮收集制和企图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激起了农民的严重不满，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农民以种种形式，如藏匿粮食、缩小播种面积以至举行暴动，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因此，从1920年下半年起，就有不少人首先提出在农业方面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寻求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主张。早在6—7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俄粮食会议上，就有人提出了余粮收集制是

否适当的问题。在此后的几个月当中，各种报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例如《经济生活报》于9月16、19日连载的一篇题为《农业中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文章说：用强制方法由国家调节农业，在心理上和技术上都是行不通的；除了国家强制以外，还必须对农民实行物质刺激，其办法是供应商品、实行奖励、明确规定国家的要求等等；“不要对业主说他应当播什么和如何播；要对他说你向他要求什么……可用奖励来调动他的积极性”；“不要……这样坚决地拒绝粮食税的办法，这种办法同粮食垄断并不矛盾，只不过是按照农村的共同愿望改变垄断的形式而已”。

此外，有许多农民和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纷纷给党中央和列宁写信或上访，要求废除余粮收集制、规定国家征收粮食的数额。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1920—1921年秋冬，列宁曾亲自到莫斯科省的许多农村进行视察，并且亲自阅读农民的来信，接见农民的来访，参加工人和农民的会议，深入了解农村情况和群众的要求。

根据列宁的提议，1921年1月12日，党中央全会讨论了关于农民情绪的问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如何改善农民状况的措施。2月2日，中央政治局指示粮食人民委员部减少余粮征集的数量，并且停止在十三个省征粮。2月4日，列宁在莫斯科五金工人扩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必须竭尽全力搞好工农关系。会议通过的决议说：余粮收集制不仅不符合农民的利益，对于工人的状况也造成极其有害的影响，应该用固定的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2月8日，列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拟定了著名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其中说：要“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征收余粮）的愿望”，要允许“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

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①这个提纲是后来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的基础。

2月11日,《真理报》发表了西伯利亚农民奥·伊·切尔诺夫的文章《要把西伯利亚农民看作社会主义因素》,文章要求实行粮食税。2月17日,《真理报》又发表了П·索罗金和М·罗哥夫的文章《粮食税还是余粮收集制?》。作者认为余粮收集制不能使农民关心农业生产的发展,建议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文章受到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讨论和调查研究,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这已经是大势所趋。2月28日,列宁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会上正式宣布说:“在一星期以后就要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将提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问题,并且做出决定以满足非党农民和广大群众的要求。”^②

在酝酿、讨论、探索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上述过程中,左倾分子竭力维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反对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当时先后担任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负责人的奥新斯基。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吹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实行国家强制的政策。他认为,摆脱农业危机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加紧“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由国家来组织农业生产”。奥新斯基激烈攻击“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垄断”的建议,说这是一种“恢复——尽管是部分地——自由贸易”的富农方针。^③他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决不能对农民使用“资产阶级的刺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3页。

② 同上,第147页。

③ 《真理报》1920年9月5日。

激”，而只能“用国家强制的方法来巩固和组织健康的经济劳动本能”。^①1920年年底，奥新斯基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激烈地反对确定余粮收集量或规定税额的建议，说提这一类建议的人是具有社会革命党人倾向的极右分子，这一类建议“带有强烈的富农分子的味道”。他认为，如果农民手中有剩余产品，而且他们又可以用这些产品去进行自由贸易，那么在国家没有商品储备的条件下，一切产品都会被私商搞去。他“警告”说：“只要你一打开这个门，马上就会没有粮食了；谁打开自由贸易这个门，谁就会使我们的粮食政策遭到破产，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遭到毁灭。”^②

其他一些左倾分子也都竭力维护甚至主张强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尤·拉林认为，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国家调节是接近真正共产主义体制的重要步骤，而且，他说，“如果在国家与农村的关系方面采取进一步实物化的步骤，那么，结果就会逐渐导致对货币的需要的消失”。^③B·菲力波夫认为，应当“把赤贫化的农民组织成国家的农业大军”。^④M·舍弗列尔认为，“把农业变为工厂，这才真正是共和国的任务”。^⑤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这实质上是一场关于是否应当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争论。不过争论的问题不是关于具体的经济政策，而是关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和方法、关于党对待非党工农群众的态度以及如何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党在无产阶级专政

① 《真理报》1920年11月7日。

②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146—147页。

③ 《真理报》1920年11月7日。

④ 《经济生活报》1920年10月1日。

⑤ 《农村生活报》1920年11月3日。

制度中的作用等问题，——一句话，是继续坚持战时共产主义下的那种极端的集中制，用强迫的方法驱使群众去建设社会主义呢，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调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当时列宁就曾指出，工会问题争论中的真正的意见分歧，就是“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①后来，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决议说：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其实是关于应如何对待那些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农民，关于应如何对待非党工人群众，以及一般关于党在国内战争已告结束的那个时期对待群众的方法问题”。^②

工会问题的争论是托洛茨基挑起的。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然同农民发生冲突，只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在爆发世界革命以前，必须把国家和党的生活纳入战时轨道；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唯一可能的政策。托洛茨基特别热中于战时共产主义下的那种极端集中的体制。他认为，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实行“专政”、搞劳动军事化等等，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1920年，托洛茨基兼任交通人民委员以后，把军事化方法搬到了铁道、水运等各交通部门。1920年底，托洛茨基提出了“拧紧螺丝钉”、“自下而上地整刷工会”和实现工会“国家化”的口号，从而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所谓“拧紧螺丝钉”，就是要把战时共产主义下的极端的集中制和军事化方法推行下去。所谓“自上而下地整刷工会”，就是要撤换各级工会干部中不赞同他的观点的人，代之以他的派别的人马，去贯彻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5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527页。

他的政策。所谓工会“国家化”，就是把工会变为国家机关，实际上取消工会，取消工会维护工人利益、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等职能，也就是要进一步贯彻极端的集中制和劳动军事化方法。

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下的那种极端的集中制、反对劳动军事化、反对官僚主义的。他们有正确的一面。但是他们走得太远了。他们片面地高谈民主而反对集中，以至根本否认党的领导。

前面已经提到，布哈林曾经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正常形式。他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颂扬“无产阶级的国家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方法，说过渡时期的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根本无客观规律可言，完全按照无产阶级国家的意志而发展等等。所以，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布哈林组织“缓冲集团”，支持托洛茨基的纲领，实际上也是反对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但是在列宁的严厉的批评和耐心帮助下，布哈林改正了错误，后来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积极的维护者和解释者。

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酝酿已久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当大会正在进行之际，3月15日，左倾分子B·菲力波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农业危机和粮食税》的文章，说：实行粮食税的主意是“错误的，不能接受的”，不应“采取恢复小经济的措施”。文章认为摆脱农业危机的出路在于建立社会化的大生产。

“工人反对派”在代表大会上散发了柯伦泰写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力求阻挠党实现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小册子中说：“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和情绪的农民，要求各种各样的‘自由’，其中包括贸易自由和不干涉他们的事务”；农民、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

专家的影响“正在使我们的政策歪到小资产阶级的路线上去”，“我们党的明确的政策正在逐渐变为上层阶级的政策”，“这显然是一种离开了阶级路线的‘危险偏向’，是一种孕育着有害后果的、歪到‘迁就妥协’、随机应变去了的倾向”；还说“我们没有权利对领导核心的错误熟视无睹”，“我们要明确地、大胆地向领导人高呼：‘站住，请看一看和想一想！你们要把我们带领到什么地方去呀？’”“不，止步！我们决不盲目地跟着你们走”。“工人反对派”坚决要求实行“明确的、毫不妥协的政策，迅速地向共产主义兼程前进”。^①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粮食税的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实行税收制度和在地方范围内的商品流转制度，会使大工业陷于瓦解，因为农民的剩余产品首先会落入手工业者手中。弗鲁姆金断言：如果实现列宁的建议，即放弃对分配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国家垄断，那么，这就“意味着使无产阶级陷于毁灭”。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决议草案，来同列宁的决议草案相对抗。^②

在代表大会上左倾分子还纷纷向列宁递条子，说经济政策的这种根本改变“是为资产阶级、为小工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敞开大门”，“在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你们怎样保持住工人国家呢？”等等。^③虽然列宁作了详细的解释，但在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时，一些左倾分子还是投了反对票。

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只是在原则上决定要过渡到新经济政策。通过法律手续制定新经济政策的工作，基本上是在此后的一年中完成的。在此期间，左倾分子于1921年夏首先在萨马拉建立了第一个争论俱乐部，反对制定和贯彻新经济政策。1921年下半年，这

① 参看《柯伦泰选集》1977年伦敦英文版第162—172页。

② 参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28、432、444—445页。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1、225页。

种争论俱乐部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左倾分子到处进行蛊惑宣传。他们讽刺说：也可以把苏维埃政权出租；我们最好现在丧失政权，十年以后再重新夺取政权。在这些争论俱乐部里，左倾分子破口大骂，指责中央几乎犯了叛国罪。^①

十大以后不久，“工人反对派”的头目施略普尼柯夫曾去柏林同从德国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左派”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马斯洛夫等人进行串连，告诉他们说：新经济政策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马斯洛夫等人加以附和，并且补充说：新经济政策也是对西方革命的阻挠和破坏。施略普尼柯夫还在莫斯科的一个会议上攻击新经济政策是“反工人的政策”，说什么现在工人阶级不是工业的主人等等。1921年7月，柯伦泰代表“工人反对派”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声称：“新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在俄国实现复辟”，“俄国需要再进行一次工人革命”。^②1922年2月，“工人反对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一份“二十二人声明”，把党内和国内的状态说得漆黑一团，诬蔑党的政策，请求共产国际出面干涉。

十大以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形成了一个“俄共工人真理”集团。它的思想领袖是老“左派”即1908年的“召回派”头目亚·波格丹诺夫。“工人真理”集团于1922年初发表了一份“呼吁书”，攻击新经济政策是“普通资本主义的复活”，说什么在新经济政策下，党和国家的负责工作人员、工厂厂长、托拉斯经理等等，已构成一个新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受奴役，在经济上受剥削，“党已越来越丧失了同无产阶级的联系和共同性”等等。^③因此，“工人真

① 参看《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2页。

②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俄文版第368、369页。

③ 参看罗·维·丹尼尔斯《共产主义史料》1960年纽约英文版第219—223页。

理”集团号召要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党”。

1923年初，原“工人反对派”的首领之一米雅斯尼柯夫组织了“俄共工人集团”。“工人集团”声称：他们不同意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对工人事业的背叛；党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们有责任挽救党和列宁本人。^①

1923年4月，左倾分子向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匿名纲领和一个公开的声明，号召还留在党内的和已被开除出党的左倾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党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方法”，并且要求撤换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在大会上提出了“工业专政”即剥削农民的理论。同年7月，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担任领导工作的皮达可夫发出了尽量提高工业品价格的指示。这一切都是从根本上破坏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之点——巩固工农联盟的方针的。

1923至24年间，托洛茨基挑起了一场全党性的大争论。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以及“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反对派”的残余勾结在一起，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四十六人声明”，攻击新经济政策，预言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

托洛茨基在争论中遭到了失败，于1925年1月受到了最严厉的党内警告并且被解除了陆海军人民委员等职务。但是，原来反对过托洛茨基等左倾分子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于同年组成了“新反对派”。“新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在资本主义成分面前不断退却的政策；苏维埃国家的国营工业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没有多少社会主义因素；而城乡的资本主义因素却在不断增长，因而整个

① 参看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工人反对派”。“工人集团”。“工人真理派”》1927年列宁格勒俄文版第36页。

国家正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等等。

“新反对派”遭到失败以后，1926—1927年间，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残余等等，结成了党内一切左倾反对派的大联盟，先后提出了“十三人声明”、“八十四人政纲”等等，继续攻击新经济政策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以逐步侵蚀十月革命果实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是“根据分期计划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政策。^①

总之，左倾反对派直到1927年年底它们的头目都先后被开除出党为止，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对新经济政策的斗争。

二

左倾分子究竟在哪些主要问题上反对新经济政策呢？

（1）关于农业政策

到1921年春天的时候，由于战争和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农业遇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工农联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中，经济政策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巩固的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盟。当时根本不具备实现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条件，反之，小农的个体经济还有使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的余地。农业政策的出发点就是要充分发挥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办法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自由支配自己的剩余产品，有限制地容许租佃土地和雇工，逐步降低农业税，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贫农、中农，限制富农。在这种政策下，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农

^① 《托洛茨基言论》1979年三联书店版下册第274、273页。

村中的阶级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中农集团加强；贫农集团缩小，其中一部分无产阶级化，大部分逐渐上升为中农；同时富农集团也有某种程度的扩大，因有小部分中农上升为富农。但是，在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富农经济的某种增长并不可怕，而且在通过发展生产为国家增加财富、通过纳税为国家积累资金的意义上来说，对于国家是有利的。

新经济政策规定：必须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以及后来在《论合作制》一文中，一再强调说：通过新经济政策实现农业集体化，只有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经过几代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27年12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其决议在规定了要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同时，还指出：这一任务不能迅速实现，个体农民的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整个农业的基础。

左倾分子攻击在一个时期内容许农民发展个体经济、容许租佃土地和雇工的正确政策是对农民投降，是背叛工人利益和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复辟资本主义等等。施略普尼柯夫在党的十一大声称：新经济政策过分着眼于物质财富，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竟然牺牲工人的利益。托洛茨基在十二大反对发展个体农业，说它“可能成为私人资本主义的营养液”。在他看来，甚至连农业丰收也成了一种危险，他认为农业丰收“既为国营工业打下基础，也为私人资本主义打下基础”。^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竭力夸大新经济政策下农村的两极分化和富农危险。他们攻击中央忽视富农危险，并且说，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以及允许租佃土地和雇工的政策“是在农业中指靠所谓股

^① 参看《托洛茨基言论》上册第375—376页。

实农民，即实质上指靠富农”的政策，“是粉饰富农、掩盖他们使农村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企图的政策”。①

左倾分子总是指责中央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右倾保守。他们不顾客观条件，坚持要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

例如1922年初，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为十一大起草的提纲《俄共现阶段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中，主张用强迫手段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列宁在看完这个提纲后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实际上是“用共产党员的自我吹嘘来刺激农民”，“是用共产党员的笨拙的合作社把戏来激怒农民”。列宁作出结论说：“这一提纲不适用。”②

又如，1927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在提交十五大的提纲中，指责中央关于在当时情况下决不能陷入立即使广大农民群众实行集体化的幻想的提法，是“一个根本错误的方针”。他们认为：“把贫农组织为集体农庄的任务，应该作为我们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应“广泛发展共耕社、合作社的经营形式，以便尽快地过渡到集体农庄的经营形式”。③

（2）关于工业政策

左倾分子对新经济政策下的工业政策的一些主要之点都持反对态度。这些主要之点是：

第一，国营工业（主要是大工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杠杆。为了巩固和逐步发展国营工业，一方面，至1920年11月29日为止一切尚未实现国有化的工业企业一律停止实行国有化，同时对已经实

① 参看《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835、8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9、210、211页。

③ 《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855、851页。

现国有化的工业企业进行了调整：有的保留，有的实行合并，有的实行租让或租借，有的下马；另一方面，在经过调整后的国营工业企业中废除战时共产主义下的经营管理方法——“管理总局制度”，采用新的经营管理方法；实行权力下放，成立托拉斯，在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下，实行经济核算、对职工实行物质刺激等等。但是，左倾分子如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攻击这样的国营企业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

第二，在战时共产主义下，过早过快地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把大中小工业收归国有的做法，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新经济政策则容许并且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中小工业的存在和发展，同时把这种私人资本主义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很好的途径，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准备。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主要形式就是租让和租借。左倾分子只知道资本主义是祸害，他们不了解：既然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他们夸大私人资本主义的危险，说什么我们会被资本主义碰得头破血流，私人资本主义的中小工业的发展会毁灭国营大工业的基础等等。他们主张把对私营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税收至少增加三、四倍，实际上是要用剥夺的办法过早地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

左倾分子不了解资本主义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了解后者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他们硬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了解并且应该这样了解。”^①因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4页。

此他们竭力反对租让制，说什么这是卖国主义等等。

新经济政策允许并且扶植个体手工业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手工业的发展。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左倾分子认为个体手工业的发展蕴藏着莫大的祸害，因为它“可能第二次在我国造成真正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①

总之，左倾分子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下，国营工业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又在发展；因此，新经济政策下的工业政策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3）关于商业政策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探讨了关于贸易是城乡结合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的问题。他科学地论证了必须利用贸易及其手段（商品、货币、信贷、银行、市场等）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新经济政策规定：要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存在和发展，并且逐步把它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如合作社、代销等）。

正如列宁指出的，左倾分子却主张实行禁止贸易那种愚蠢的、等于自杀的政策，他们认为，不取消市场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一条孟什维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虚无缥缈之路。施略普尼柯夫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于允许农民自由做买卖、对于列宁提出要学习经商的口号进行冷嘲热讽。左倾分子中有些人说：“既然共产党人此刻把商业任务，把最普通、最简单、最庸俗、最微贱的商业任务提上了日程，那还能谈得上什么共产主义呢？这岂不是完全要使人灰心失望，说什么都完了吗？”另一些人则振振有词地

^① 《托洛茨基言论》上册第374页。

说：“你讲国营商业干什么呢？在牢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作生意。”^①

左倾分子竭力破坏新经济政策下的贸易政策。第一，他们主张把私人资本主义商业企业的税收如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一样，至少提高三、四倍，实际上是要用剥夺的方法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商业。第二，他们破坏商业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扩大剪刀差，无限制地提高工业品的价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一文中还从理论上“论证”了这种实质是剥削农民的价格政策。他说：“这样的政策是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历史地产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自由竞争，造成本国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价格，通过剥削小生产而得到额外的利润，从而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价格政策奠定了基础。”

（4）关于经济建设和计划经济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已开始进行国家工业化工作的1926年和1927年间，联共（布）总结了进行经济建设、制定经济计划的许多宝贵经验。

第一，经济计划与市场、农业收成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相联系，因而不可能包罗一切，只能随着公有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扩大，并且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加以修改。实际上，历次的计划都不止一次地作过重大的修改。^②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左倾分子却攻击这就是“毫无计划”。他们不考虑农业收成，尤其是不考虑市场因素。他们认为，价值规律以及商品经济的一切规律都已部分地被消灭了。他们无视客观情况和客观规律，企图用一个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6、74、80页。

② 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315页。

一成不变的经济计划包罗一切。他们把“计划”、“计划因素”看作免除一切经济以及其他灾祸的灵丹妙药。

第二，制定经济计划“必须严格同市场容量和国家财政力量相适应”。^①左倾分子则主张制定“超工业化”的计划。他们要求不顾国力而大量投资，说什么“应当从不断增加工业投资的坚决政策中寻找出路”。他们指责1927年公布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的五年计划右倾保守，指责国家预算“不成其为加速工业化”的预算，甚至说：“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提出这种缩手缩脚、悲观透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②

第三，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既不能追求二者都达到最大的数字，也不能片面地追求积累。但是，左倾分子却要求二者都达到最大数字，尤其是片面地追求高积累。^③为了取得大量资金来实现“超工业化”，他们主张实行“工业专政”，即除了加重税收以迅速剥夺私营工商业之外，用无限制地扩大剪刀差的办法剥夺农民，“吞噬”农民经济。这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显然，左倾分子的这种主张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农业发展的停滞，会缩小工业原料来源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从而会急剧降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最后会破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四，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处理好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尽量把资金从农业方面抽到工业方面去，或者拒绝吸收农村资金来建设工业，都是不正确的；一方面必须重视重工业，以便提供大量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轻工业，以便满足人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9页。

② 参看《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881、882、878页。

③ 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379页。

民的生活需要并为建设重工业积累资金。^①左倾分子片面地强调工业而忽视农业，片面地强调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他们指责中央没有执行“工业是‘主导因素’的政策”，没有下决心更快地实现工业化。^②他们甚至说党忘记了发展重工业的根本任务。

(5) 关于政治思想和物质利益原则

在新经济政策下，联共（布）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列宁的著作都一再强调：为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一方面，党的宣传教育机关，红军的政工机关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把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同他的贡献直接联系起来。

左倾分子对政治思想工作毫无兴趣，一味迷信战时共产主义下的那种强迫命令的“军事化”工作方法和“棍棒教育”制度。他们说，谁反对这种工作方法，谁就是可耻地向考茨基主义投降。同时，左倾分子把物质刺激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就是足够的刺激；如果再使用物质刺激，那就只会把人们“刺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们断言：“以货币支付工资，区分工资级别和劳动种类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③各个左倾反对派都主张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例如托洛茨基就讲过：“在消费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但后来，1927年，各左倾反对派的联盟为了骗取工人的信任和支持，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顾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片面地要求“坚决地提高工人的工资”，“逐年逐月地”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④当时联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317、379页。

② 参看《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832页。

③ 《柯伦泰选集》第166页。

④ 参看《托洛茨基言论》上册第360页；下册第886页。

共(布)中央指出,左倾反对派提出这种既不合理又不可能做到的要求,完全是为了煽动人心。

(6)关于党的领导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由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以及此后的几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些相应的决议再三强调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既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又保证党的集中统一,禁止一切派别活动。一切左倾反对派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和破坏党的领导,坚持搞派别活动。他们提出了许多谬论。

第一、“工人反对派”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党成了执政的党,它要照顾各个阶级的利益,因此,它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会由于成分单一,所以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只有它才最彻底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反对派”还认为:党对经济建设是外行,“党可以培养红军战士、政治工作者或实行某些已拟定好的计划的实际工作者,但不能培育出共产主义经济的创造者”,因此,领导经济建设“不是党的任务”,“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工会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①

第二、在领导方法上,左倾分子各执一端:托洛茨基坚持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极端的集中制,不给民主;“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等则反对集中,把民主绝对化,认为“即使在战场上……工人民主也是抗敌的最好的武器”。^②他们企图用无政府主义的极端

^① 《柯伦泰选集》第184、176页。

^② 转引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第11卷第472页。

民主化的药方来医治官僚主义等弊病。例如米雅斯尼柯夫主张让一切反动分子，“从君主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他说：“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而出版自由就可以把它们揭露出来。”列宁在给他的信中指出：“你想医治共产党，但却抓住一张一定医死人的药方。”^①

第三、所有的左倾分子都鼓吹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例如奥新斯基在《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需要什么？》一文中说：既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共产党是唯一的党，党外无党，因此，党内必须有派，“没有各种意见的交锋，没有不同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便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民主”，“党内各种倾向和派别的合法化”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先决条件。^② 1923—24年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等人美化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派别斗争十分尖锐、党陷于分裂边缘的“布列斯特和约时代”是“超民主”的时代，认为那种党内生活状况是合乎愿望的理想的东西。由各左倾反对派骨干分子共同签署的“四十六人声明”甚至认为，容许各个派别自由活动是党的生机之所在，是摆脱一切困难的唯一出路。

列宁在《党内危机》一文中曾指出：“派别斗争有它的客观逻辑，甚至最好的人，如果他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到在实际上同无原则的恶意煽动没有任何差别的地步。”^③ 列宁的话不幸而言中了。1922—27年间，从米雅斯尼科夫起到托洛茨基止，联共（布）党内一切左倾反对派的骨干分子都坚持派别活动，发展到了进行恶意煽动的地步。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1—494页。

② 参看《真理报》1920年12月26日。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5页。

* * *

左倾分子严重地干扰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他们今天打起这个反对派的旗号，明天打起那个反对派的旗号，一次又一次地挑起争论，大大地分散了党的注意力，妨碍党全力抓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中心工作。

左倾分子提出的一些“极端革命”的口号，很能迷惑人，使一部分党员、干部、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对新经济政策产生了怀疑、不满、对立和抵制的情绪，从而妨碍了新经济政策的顺利执行。

在左倾分子的煽动下，一部分党员因不同意新经济政策而退党，不少党的和苏维埃的干部采取公开抵制或阳奉阴违的手法，拒绝执行新经济政策。

左倾分子散布的所谓“新经济政策是反工人的政策”等谬论，在工人中起了很坏的作用。1923年8月，他们煽动工人举行了规模不小的罢工，他们甚至企图把罢工转变为政治示威。

新经济政策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原来，农民甚至不愿意把农具送到苏维埃的铁匠铺里去修理，怕修好以后就“归公”。甚至向农民发放种子时，他们都不敢签名，怕一签上名字就算参加“康姆尼”了。要召开会议更是难得很：农民总是借故不到、迟到或者溜走。一听到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农民奔走相告，开起会来挤得水泄不通，宣布散会了，他们还不走。可是，当时农民也有顾虑，有些农民说：粮食税政策“是一种新的进攻，其目的是要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以便将来（大约到秋后）又转回到余粮收集制。”还有一部分农民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不给国家提供任何东西，只伸手向国家要东西，他们对新经济政策表示不满，责备政府缺乏“共产主义精神”等等。左倾分子对新经济政策的攻击，引起和加重了农民的怀疑和顾虑。

受害最深的是那些本来富有革命热情而又缺乏锻炼的分子和青年。例如当时出现过不少散布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的诗作：“从前是整洁，美丽；现在是买卖，投机”。这些东西是左倾反对派煽动起来的。^①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头两年中，几乎有一半共青团员因思想上感到“苦闷”、“迷惘”而退团，而且有许多人自杀。1926年，布哈林在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三次非常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在批判左倾反对派时引用了一个青年所写的一封信。这个青年在信中倾诉了他在新经济政策下思想上的“苦闷”和“空虚”，说出了打算去搞流氓抢劫活动的想法。他说：布尔什维克已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新经济政策下，布尔什维克把重点放在和平建设上，每天都向耐普曼、富农和私人主动性让步，这根本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因此，他感到前途渺茫，产生了混日子甚至铤而走险的想法。布哈林以充分的证据指出：青年中的这些混乱思想是左倾反对派对新经济政策的诬蔑、歪曲和攻击所造成的。

前面已经谈到，左倾分子还曾跑到国外和共产国际去反对新经济政策。在他们的影响下，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和荷兰共产党内的“左派”，对俄国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评。1922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扩大会议上，有些外国共产党人以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实行新经济政策会葬送社会主义而嚎啕大哭。

由此可见，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联共（布）党内的左倾分子，在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起了很坏的作用。

1922年12月，列宁在准备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7页。

发言提纲中写道：“怎样到达社会主义呢？”接着回答说：“就是要通过新经济政策。”^①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是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左倾反对派对新经济政策的攻击和它们提出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史论文集》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	1.75元
《德国史论文集》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编	0.60元
《日本史论文集》	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	排印中
《英国史论文集》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编	排印中
《非洲史论文集》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	排印中
《中英关系史论丛》	王绳祖著	排印中
《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	北大、东北师大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	排印中
《世界现代史论文集》	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编	排印中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440页。

人 物 传 记

安东·潘涅库克

李 宗 禹

安东·潘涅库克是荷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73年1月2日生于荷兰的瓦森，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从1903年起，他和海尔曼·果特等人一起同该党以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机会主义多数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07年，同果特、罗兰·霍尔斯特等人创办《论坛报》，从而在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了一个左派集团“论坛派”。1909年“论坛派”被开除出党。之后，潘涅库克、果特等左派创建了自己独立的政党即荷兰社会民主党。1912年曾经同考茨基进行公开论战，批评了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反对社会民主党右派的背叛行为。他拥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但在某些问题上持保留态度。1918年，他参与创建荷兰共产党。1920年，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前夕，他发表文章反对共产国际的纲领，从而公开暴露了他同列宁和共产国际的严重分歧。

潘涅库克在二十年代初以前，除了在荷兰进行革命活动外，同德国工人运动联系十分密切。他很长一段时间直接参加了德国党的活动。1919年还短时间地主持了共产国际西欧局的工作。因

此可以说他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

在潘涅库克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候，他已经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他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一生中相当长的时期总是一面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一面从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这可以说是潘涅库克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他在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天文学，1896年获得了学位。1896—1906年受国家委托从事天文测量工作，在荷兰莱顿市天文台任观测员。1915年发表了有份量的天文学论文。俄国十月革命后，他还一度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1925年以后，他主要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51年又发表了重要的研究论文。1960年逝世于阿姆斯特丹。

列宁在伟大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坚决支持潘涅库克1912年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考茨基的论战。但在1920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则把潘涅库克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的一个主要代表加以批评。这件事本身也反应出潘涅库克的思想发展过程。

反对修正主义的战士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几乎与此同时，又发生了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事件。此后，修正主义思潮便在国际范围内发展起来。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兄弟，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在这种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24页。

背景下，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也出现了以特鲁尔斯特拉和万-科尔为首的机会主义和以潘涅库克和果特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斗争。这个特鲁尔斯特拉，正如列宁所说的，是比德国的考茨基更滑头的机会主义者。他施展各种手腕，力图把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潘涅库克、果特、怀恩科普等人驱逐出党。这个党的领袖们提出了一系列机会主义政策，并且企图把这些政策强加于全党。他们为了迎合荷兰部分工人的宗教情绪，主张对在学校内进行传教的人发给国家补助金。而更重要的是，机会主义领袖主张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各项政策，同自由派实行合作，以求得他们答应实行社会改良。他们主张修改党的纲领，放弃伯恩斯坦所谓的“崩溃论”，即放弃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潘涅库克等左派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政策。潘涅库克、果特、罗兰-霍尔斯特原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刊物《新时代》的编辑。1907年他们被排挤出该杂志编辑部，于是就创办了自己的报纸《论坛报》，而特鲁尔斯特拉则不择手段地对它进行迫害，煽动党内的一些人反对“论坛派”。1909年2月13—14日在德文特举行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上，由于拥护特鲁尔斯特拉的人占多数，结果通过决议停办《论坛报》，并创办一个隶属于中央机关报下的“副刊”来代替它。《论坛报》的编辑们由于坚决反对这一决定，被开除出党。1909年，潘涅库克、果特等人创建了荷兰独立的左派政党——荷兰社会民主党。以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旧党仍然用“荷兰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名称。

荷兰党分裂后，第二国际曾试图从中进行调停，以恢复党的统一。但是调停失败了，因为第二国际采取偏袒机会主义者的立场，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制造分裂。荷兰社会民主党要求加入第二国

际,也因此遭到拒绝。

1905年潘涅库克应邀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党校开设“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讲座。当时在这所学校讲课的还有考茨基、卢森堡和希法亭等人。潘涅库克在柏林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07年6月25日,柏林警察总监向普鲁士内务大臣报告说:“潘涅库克在他的祖国是该国社会民主党的热心的有影响的成员,在该党内,他高举正统派的大旗,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实践的修正主义。”^①1909年,潘涅库克来到德国造船工人和码头工人比较集中的不来梅居住。不来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中派和左派的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潘涅库克到达后不久,就卷入该地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内部的斗争。他积极支持约翰·克尼夫主编的《不来梅市民报》(该报原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来梅地方组织的机关报,后来实际上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报),为该报撰稿。他在工人群众中间多次做报告,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潘涅库克的活动在不来梅左派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他1909年写的《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一书。这是潘涅库克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列宁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列宁就写了《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对书中的主要观点作了详细介绍,认为这本书是用科学态度研究工人运动中产生分歧原因的“一次值得注意的尝试”。^②

潘涅库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理论上对工人运动中出现修

① 卡尔·恩斯特·默林《不来梅的社会民主党(1890—1914)》1968年汉诺威德文版第11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44页。

正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科学的探讨。他认为,工人运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有内部斗争。这种斗争并不是反常的,并不是单纯的幼稚病,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的现象。工人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大流派不能归咎于个人或集团犯了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潘涅库克认为,工人运动的增长本身、资本主义在各国和各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不同、资本主义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而实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等等,都是引起工人运动内部策略分歧的深刻原因。

潘涅库克对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本质作了很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修正主义只“强调实际的改良工作,并且认为对革命和我们运动的革命性的一切探讨都纯粹是脱离实际的空话”,“它看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只是看到他们的有机的联系。它认为社会不经过明显的转变可以不知不觉地长入社会主义”。^①修正主义认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而无政府主义则根本不顾细小的工作,认为“革命应当突然带来彻底的突变,建立一种新制度,而除了经常谈论这一点外现在什么事情也不做”。^②潘涅库克针对修正主义者散布的改良主义幻想指出,改良主义者总是不让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利益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对立,不让无产阶级提高明确的阶级意识。改良主义者并不是无产阶级“怀有好意的朋友,而是敌人,而且是远远比反动派更危险的敌人”。^③潘涅库克得出结论说: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流派。它们想把资产阶级世界

① 《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1909年汉堡德文版第41页。

② 同上,第42页。

③ 同上,第56页。

观同无产阶级思想结合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产物。只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才能引起无产阶级思想上的彻底变化，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同考茨基论战

同考茨基的论战是潘涅库克一生中光辉的一页。潘涅库克1905年应邀到柏林党校任教时，同考茨基直接建立了联系。此后，荷兰左派同考茨基的关系是友好的。果特曾将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译成荷兰文出版。考茨基也曾为果特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作序。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扩大。1912年潘涅库克同考茨基的论战，集中地表现了荷兰左派和考茨基分子之间的原则分歧。

1903—1906年期间，荷兰和德国党内一直在进行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争论。1905年俄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的群众政治罢工的新形式，对西欧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群众罢工问题的争论在德国更加扩大和加深了。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特别是同工会的一些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原则分歧。左派认为群众罢工不仅可以用于经济斗争，而且也必须用于政治目的。考茨基在德国党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口头上虽然同意群众罢工，但是他认为这种方式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即只能在群众不能再加以阻止的情况下使用。不仅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某些领导人还采取措施压制关于群众罢工的讨论。1910年，卢森堡写了一篇文章《下一步怎么办？》，强调只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才能迫使普鲁士反动当局实行选举制度的改革。但考茨基拒绝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第二年，

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群众行动》一文，维护他关于群众罢工的观点。这样就引起了潘涅库克同考茨基的论战。

潘涅库克同考茨基的笔战主要是在《新时代》杂志上进行的。他们你来我往，总共发表了六篇争论文章。文章的顺序是：考茨基《群众行动》（1911年，《新时代》第30年卷）；潘涅库克《群众行动与革命》（1912年，《新时代》第30年卷）；考茨基《新策略》（1912年，《新时代》第30年卷）；潘涅库克《考茨基论新策略》（1912年，《来比锡人民报》第19卷）、潘涅库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策略》（1912年，《新时代》第31年卷）；考茨基《最近的激进主义》（1913年，《新时代》第31年卷）。双方的争论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的：

一、关于群众罢工问题。在德国党内关于这个问题的斗争是很曲折的。190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在左派坚决斗争下，通过了关于举行群众罢工的决议。1906年在党的曼海姆大会上，右派又占了上风，作出了实际上否定群众罢工的决议。1910年，德国工人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要求取消限制工人选举权的三级选举制。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对群众的革命行动进行了种种阻挠，不准群众进行这一斗争。在所有上述斗争中，考茨基的态度起了很恶劣的作用。考茨基认为，在德国只有十分之一的群众已组织起来，其余的人则没有组织起来，仍然受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支配，因此不可能在“如此混杂的群众”中发现“统一的阶级性”。^①考茨基强调，为了形成这种“统一的阶级性”，就必须等待，就必须继续不断的做组织工作。潘涅库克则认为，群众罢工是形成阶级意识的最好的学校，他说：“在考茨基看来，这种革命是未来的行动，是一种政治灾变，我们应当做的莫过于积聚我们的力量，集合训练我们的队伍，为最

^① 考茨基《群众行动》，《新时代》1911年第30年卷第1册第656页。

后决战作准备。我们认为,革命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正经历它的第一阶段,因为只有通过夺取统治的斗争,群众才能集合起来,受到训练并且形成一个能够取得统治的组织。”^① 潘涅库克分析了群众罢工产生的客观原因。他在《群众行动与革命》一文中说:“这一发展决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这是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是资本主义新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② 潘涅库克强调,在帝国主义加紧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的情况下,由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的软弱无力,“群众自己必须出来直接维护自己的权利”,“群众行动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演变的自然而然的的结果,并且越来越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斗争形式”。^③

二、关于议会斗争和工会斗争问题。考茨基把议会斗争看成工人阶级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斗争形式。潘涅库克早在《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一书中就说过,议会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正常形式”,所谓“政府”不过是议会多数派的“委员会”。^④ 但是他认为,这个机构仍然是“对工人阶级最有效的教育工具之一”。^⑤ 潘涅库克同考茨基论战时,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尽管潘涅库克对考茨基的“议会痴”进行了批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仍然把群众行动看作是“对议会斗争的改善”,^⑥ 也就是说,应当把议会内和议会外的斗争互相配合起来。同样,潘涅库克认为,工会斗争

① 潘涅库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策略》,《新时代》1912年第31年卷第1册第274页。

② 潘涅库克《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1912年第30年卷第2册第541页。

③ 同上,第542页。

④ 潘涅库克《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第68—69页。

⑤ 同上,第76页。

⑥ 潘涅库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策略》,《新时代》1912年第31年卷第1册第368页。

不会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工会在阶级斗争中可以给予工人实际的教育。总之，潘涅库克当时认为，议会和工会是不可缺少的机构，它们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是有益的。这与他在第一次大战后对议会工作和工会工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而考茨基当时认为，潘涅库克想用群众行动代替议会工作，说他是“群众行动痴”。

三、关于打碎国家机器问题。这是潘涅库克同考茨基论战中涉及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潘涅库克在《群众行动与革命》一文中说，“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代国家这个强力工具”，只有到“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① 潘涅库克提出的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个问题德国的左派从来没有说得这样明确、肯定。考茨基恰恰把这个问题抓住，大作文章，从而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本质。考茨基在《新策略》一文中列举了资产阶级内阁中的各个部之后说，“现在内阁中没有一个部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可以取消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的某种变动”。因此，考茨基得出结论说：“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一如既往：通过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且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但不是破坏国家政权。”^②

列宁高度评价了潘涅库克的原则立场，认为在这场争论中“反对考茨基而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考茨基则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上“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

① 潘涅库克《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1912年第30年卷第2册第543、544页。

② 《考茨基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124、126、133页。

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①

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公开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战争。潘涅库克在整个大战期间坚决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特别是要同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决裂。列宁对于荷兰左派的这一立场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以果特和潘涅库克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培养出了彻底的、忠诚的、热情的和自觉的国际主义者。”^②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潘涅库克被驱逐出德国回到荷兰，但是他同德国的不来梅左派和柏林左派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继续为柏林的左派报纸《光线报》撰稿。1915年9月，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为了团结各国左派，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坚决支持召开这次会议，并在会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由于考茨基分子在会议上占据多数，左派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被通过。但是这次会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③ 潘涅库克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荷兰人只有罗兰－霍尔斯特参加），但他完全支持以列宁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考茨基分子的斗争。1916年，潘涅库克和罗兰－霍尔斯特担任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机关报《先驱》杂志的主编，宣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观点。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8、269页。

② 同上，第2卷第6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6页。

荷兰左派在大战期间一直坚持以下三个指导思想：（一）彻底实行国际主义，他们认为真正的斗争应当在世界资本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展开；（二）彻底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特别是应当坚决反对考茨基分子；（三）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群众直接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潘涅库克在德国的一些拥护者（主要是不来梅和柏林的一些左派），在大战期间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为首的斯巴达克派在是否单独建立左派组织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在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以后，德国不来梅和柏林的左派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叫做“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巴达克派则于1917年4月同考茨基派联合组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前者完全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决议，后者则在同考茨基分子彻底决裂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的领导机构起先设在柏林，后来迁到不来梅，在那里创办了《工人政治报》，由约翰·克尼夫主编。潘涅库克积极为该报撰稿，对德国的这部分左派施加影响。

潘涅库克1916年初写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任务》^①是一篇集中反映他在大战期间观点的重要文章。

潘涅库克首先正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寻找原料和销售市场的冲突。他认为这次大战之所以爆发，“首先是帝国主义力量的加强，其次是无产阶级的削弱”。^②而无产阶级力量的削弱是因为改良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内日益占统治地位，这个党“内部已经腐烂，没有能力完成新的任务了”。^③

潘涅库克认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实现社会主义是紧密相

① 最初发表于《先驱》杂志第1期。

② 汉斯·曼弗雷德·博克编《安·潘涅库克、海·果特〈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策略〉》（以下简称博克《组织和策略》）1969年德文版第88页。

③ 同上，第90页。

联的。帝国主义不仅向无产阶级实行进攻，而且也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实行进攻。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了反对压迫的力量，“只是帝国主义才造成了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造成了社会主义到来的条件”。^①

潘涅库克强调，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再也不能使用旧的斗争手段了。社会民主党议员尽管在议会中可以对帝国主义的政策进行批评，但是不可能影响这种政策，因为政策不是议会制定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一小撮人（德皇以及贵族、将军、银行家）制定的。潘涅库克在这篇文章中继续发挥了他同考茨基论战时提出的关于打碎国家机器的观点，认为统治阶级的组织是国家政权，因此“无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②

潘涅库克一再强调的新的斗争方法就是群众行动。他认为，只有群众行动才能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总之，潘涅库克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关于世界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本质、关于打碎国家机器和关于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等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从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他在议会斗争的问题上已经开始暴露出片面的观点。他说：“三十年前，议会制是革命的，当时群众的反抗行动是没有结果的、因而是革命的，现在，议会制往往是不革命的，因为它不是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加强，而是使它受到削弱。”^③从潘涅库克片面强调群众的直接行动而不谈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作用可以看出，他在世界大战后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

① 博克《组织和策略》第92页。

② 同上，第95页。

③ 同上，第94页。

上采取极左立场就不是偶然的了。

同列宁和共产国际分道扬镳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潘涅库克、果特等荷兰左派是热烈拥护的。果特曾经把列宁誉为“世界革命的先锋战士”。潘涅库克则把十月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第一步。他高度赞扬俄国革命过程中群众创造的革命组织形式——苏维埃。但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潘涅库克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极左观点，同列宁和共产国际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爆发后，潘涅库克到德国进行宣传活动，主要是为“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1918年起改名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这个组织作旅行报告。上面已经提到，“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是大战期间由德国不来梅和柏林的左派建立的一个组织。潘涅库克同德国的这个组织的关系一向十分密切。不仅如此，这个组织也可以说是在潘涅库克的思想影响下建立的。1918年底在德国革命的浪潮中，“斯巴达克联盟”改变了过去的观点，同意德国的左派联合起来单独建立自己的政党。1918年底，德国共产党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也有“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成员。在会上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同原“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的一些成员，如奥托·吕勒、保尔·弗勒里希等在党是集中制组织还是联邦制组织、是否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是参加现存工会还是另外建立新的组织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经过表决，以六十二票对二十三票压倒多数通过了拒绝参加国民议会选举的决定。大会多数人还赞成退出现存工会而另外成立新的组织。“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左派”分子坚

持的上述观点，也是潘涅库克在大战后期以来从理论上论证的观点。在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海德堡代表大会上经过激烈斗争，通过了关于参加国民议会选举和工会问题的正确决议。1920年2月，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开除党内的“左派”分子。1920年4月，被开除的“左派”分子在柏林单独建立了一个党，称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该党通过了潘涅库克的亲密战友果特参与起草的纲领，对当时德国的革命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过左的估量，宣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党”，提出要“消灭任何领袖的政策”，摆脱“任何领袖领导的道路”^①等等。这个纲领一公布，潘涅库克立即表示同意。

共产国际建立后，潘涅库克、果特和罗兰-霍尔斯特等人曾被委派担任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局的领导人，但由于他们坚持极左观点，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方针和路线，1920年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解除职务。此后，潘涅库克同共产国际的分歧越来越发展。1920年4月间，也就是在列宁写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同时，潘涅库克以霍纳这个笔名发表了《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策略》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杂志上，后来以《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的策略》为题作为小册子在彼得格勒出版。共产国际二大以后，潘涅库克又写了一篇“补遗”连同正文在维也纳出版。

潘涅库克的这篇文章是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的代表作。

潘涅库克把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几乎看作是一样的。他认为共产国际内部已开始出现了从第二国际搬来的机会主义政策和机

^① 汉斯·曼弗雷德·博克《1918—1923年的工团主义和左派共产主义》1969年德文版第406页。

会主义的斗争方法。他说,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制度已经代替了议会活动,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会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但是共产国际仍然要求西欧的无产阶级进行议会活动和工会活动,因此,机会主义必然成为共产国际中的巨大危险。

潘涅库克反对参加议会活动的主要论据是,“议会制是通过领袖进行斗争的典型形式,在这一斗争中,群众起着次要的作用”,由于议员、个别人进行着主要的斗争,这就必然使群众产生别人可以代替他们进行斗争的幻想,从而必然要阻碍群众自己的积极性。潘涅库克认为,议会活动不仅产生“领袖支配群众的反革命效果”,而且也产生“腐化领袖的倾向”,因为领袖们为了保持他们在议会中的地位,必然要玩弄外交手腕,而这样做的结果是“议会最后不再作为达到共产主义的手段,而是使共产主义作为宣传口号服务于议会政治”。^①

潘涅库克反对参加议会斗争,也同样反对参加工会活动。他说:“工会曾经同资本、同资本造成的绝对贫困作过斗争,它曾经限制过资本的这一倾向,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生存下去。在这方面,工会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完成了它的作用,从而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一个要素。但是,一俟革命到来,无产阶级不再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要素而变成了这一社会的消灭者的时候,工会就同无产阶级相对抗了。”^②他认为,工会同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尽管有“形式上的民主,但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③,工会的反革命势力不可能通过改变其领袖而遭到摧毁或削弱。总之,潘涅库克号召西欧的无产阶级坚决“退出工会”。谁要是主张参加

① 博克《组织和策略》第138、139页。

② 同上,第140页。

③ 同上,第141页。

工会，谁就是“机会主义者”。这样一来，共产党人势必脱离广大的工人群众，所以列宁在批评“左派”的这一错误时说，“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①

潘涅库克对苏维埃制度是衷心拥护的，但是他对苏维埃的作用却往往作出过火的评价。他认为苏维埃制度是群众自己创造的“自我行动”机关，它不仅消灭“国家官僚”，也可以消灭“工会官僚”。^② 苏维埃制度的发展可以使无产阶级“用完全的专政形式代替不完全的专政形式”。^③ 潘涅库克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无产阶级群众本身来行使，而不能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来行使，否则就是“不完全的”专政。他说：“‘坚定不移的少数人’不可能解决只有发挥整个阶级的积极性才能解决的问题。”^④ 他这里所说的“坚定不移的少数人”是指党而言的。可见潘涅库克不仅把党同苏维埃对立起来，而且把党和阶级、党和群众也完全对立起来，他这里提出的也就是列宁所批判的那个问题：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初稿曾分发给代表们讨论。潘涅库克的小册子《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策略》也曾分发给代表们讨论。潘涅库克的观点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批评。会后，他专门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个“补遗”。在这篇“补遗”中，潘涅库克更加明确地指责列宁和共产国际已经走上“机会主义”道路。他说：“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⑤和俄国的领导同志已经完全站到机会主义一边，从而使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08页。

② 参看博克《组织和策略》第141页。

③ 同上，第152页。

④ 同上，第134—135页。

⑤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这一派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占了上风”^①。潘涅库克根本不同意列宁对“左派”共产党人的批评和帮助。他在谈到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时说，这本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的作者个人。因为其中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论据，大部分都是别人使用过的。新鲜之处在于，现在是由列宁来使用”。不仅如此，潘涅库克竟认为，列宁是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需要”来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他说：战争已经破坏了俄国的工业基础，“俄国为了重建经济，迫切需要机器、火车头和工具，而这些东西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未受损伤的工业才能提供。因此，它需要同其余的世界，特别是同各协约国进行和平的贸易，而这些国家为了阻止资本主义的崩溃，又需要俄国的原料和粮食”。这样，俄国就不得不“试图同资本主义世界签订某种暂时的协定，出卖俄国的一部分自然财富，放弃直接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② 潘涅库克把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如参加议会斗争和工会斗争，关于利用矛盾，尽可能多的争取同盟者等等，都一概看成是对西欧资产阶级的妥协，甚至实际上把列宁本人也说成是出卖国际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这是十分荒谬的。这件事说明，潘涅库克不仅根本不理解列宁对“左派”的批评和帮助，而且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潘涅库克的思想对当时德国的“左派”的影响是巨大的。多年来德国的“左派”分子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位当然的鼓舞者和顾问。潘涅库克，特别是果特，长时间地具体参加了德国党的一些活动和内部斗争。在潘涅库克的影响下，德国“左派”相继建立了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如“工人总联合会”、“工人总联合会（统一组

^① 博克《组织和策略》第162页。

^② 同上，第163、164页。

织)”等等，他们把党和群众、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否定党的领导，只是空谈革命，空谈共产主义，结果只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事无成。

潘涅库克和果特支持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920年11月曾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同情党接受参加共产国际。但是该党坚持极左立场，一直表示反对共产国际的纲领。在共产国际三大期间，该党在潘涅库克和果特的支持下企图在共产国际内部建立一个“左派反对派”。由于响应者寥寥无几而宣告失败，结果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三大以后，潘涅库克、果特公开走上反对共产国际的道路，他们建立了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左派共产主义国际”，指责共产国际是“反革命的组织”。^①这样同共产国际的矛盾就达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由于这个所谓的“国际”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组织，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921年，潘涅库克参与创建了荷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其纲领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但这个党也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

潘涅库克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天文学的研究工作，但也并未完全放弃政治活动。他仍然不断地著书立说，宣传他的被称之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学说。1938年，潘涅库克写了《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一书，全面地批判列宁的哲学思想，竟说列宁了解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殖民资本主义”，列宁了解的“社会革命仅仅是消灭大土地所有制和沙皇专制制度”，“列宁从来不懂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②等等，这说明，潘涅库克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道路越来越远了。

① 博克《1918—1923年的工团主义和左派共产主义》第424页。

② 潘涅库克《作为哲学家的列宁》1975年伦敦英文版第97页。

组织机构介绍

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概况

夏道源

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直到1943年5月正式解散。它从一诞生起就向全世界公开宣告：共产国际的建立是为了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第一国际的事业，把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进而消灭一切阶级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国际的各种组织机构按其原来设想，就是为此目标而陆续建立的。它的概况如下：

一 世界代表大会

这是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是由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构成的。凡是被批准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通称为“某某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每个共产党和组织在世界代表大会上享有的表决票数，由代表大会根据每个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及其在该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作出特别决定予以确定。

世界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章程，讨论和决定

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纲领和策略中的重大问题。共产国际的中央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均由世界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

共产国际的非常代表大会，必须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或根据属于共产国际的占半数的政党在上届世界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要求，才能召开。

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最初每年举行一次，后来改为两年一次，但实际上没有实现。它在1919年至1943年期间总共只举行过七次世界代表大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是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三十五个政党和组织的五十二名代表，其中三十四人有表决权，十八人有发言权。

参加这次大会的俄国共产党(布)代表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契切林等。大会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在1919年3月4日的会议上做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报告，获得了到会代表的普遍支持。大会没有经过讨论就通过了列宁的报告提纲。

根据列宁的提议，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解散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议。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发表了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号召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和由它选出的五人组成的执行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大会开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各次会议都在莫斯科进行。参加

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来自四十一个国家六十七个组织的二百一十七名代表，其中一百六十九名享有表决权。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各共产党的代表占一百三十六名，另有十五名共产党代表只有发言权。在这六十七个组织中，有二十七个共产党，十个青年团，其余的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意大利和法国的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西班牙劳动民族联盟……等组织。

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在各国共产党力量迅速增长、革命路线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研究如何克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危险，确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原则、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大会前，列宁发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重要著作，为大会做了思想和理论准备。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列宁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反对让机会主义政党和中派加入共产国际，并为此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

列宁提出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提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土地问题提纲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这次大会上都被通过为大会的决议。

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制定共产国际的纲领、组织原则、战略和策略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四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左派社会党的代表，还有国际妇女联盟和国际青年联盟的代表。接近共产国际的团体也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大会。

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无产阶级最初几次革命斗争的经

验，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新的战略和策略，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大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并且指出，必须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进行坚决的斗争，清除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影响，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列宁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列宁拟定了《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他就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和意大利问题在大会上发了言，并做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列宁在阐明共产国际的策略时指出，不把群众争取过来，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听取列宁的上述报告以后，一致通过了这个策略和俄共(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举行。大会在彼得格勒开幕，从11月9日起改在莫斯科继续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各国的五十八个共产党组织的四百零八名代表，其中三百四十三名代表有表决权。此外，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国际工人救济会和美国黑人组织等都派了代表出席。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列宁向大会做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他强调指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继续对资本主义实行进攻策略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可能退却和如何保证顺利退却的问题。

这次大会通过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批准了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会运动中的任务和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通过了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等决议。大会强调共产党必须根据统一战线的策略在群众中从事长期的坚韧

不拔的工作。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四十九个国家的六十个组织：四十六个共产党；四个其他政党：爱尔兰工人同盟、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意大利第三国际派；十个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农民国际委员会、国际工人救济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红色体育国际，等等。它们共派出参加大会的代表五百一十名，其中三百四十六名享有表决权。

这次大会是在资本主义战后危机第二阶段开始时召开的。它从资本主义可能取得暂时的和相对的稳定出发，研究和制订了共产国际的新策略。

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8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五十七个国家的六十五个组织的代表五百三十二名，其中三百八十一名享有表决权，一百五十一名享有发言权。

这次大会是在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第三阶段开始时召开的。它的特点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在日益加深和扩大，阶级矛盾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非常尖锐。大会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确定了共产国际的新任务。此外，它还通过了经过反复修改的共产国际的新纲领和新章程。

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共有六十五个政党参加，其中有二十三个合法政党（俄共（布）除外）。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三百七十一名，享有发言权的代表一百三十九名。

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威胁的问题，号召各国党为建立、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斗争，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建议各国共产党可

以在某种条件下加入“联合阵线”的政府。

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这是世界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它由世界代表大会选出并对后者负责。

共产国际刚成立时，由于条件不成熟，并没有选出执行委员会。大会只是通过了一项《关于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它规定共产国际的工作委托执行委员会办理，该委员会由最重要的国家各派代表一人组成，并且责成俄国、德国、德属奥地利、匈牙利、巴尔干联盟、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共产党“立即派代表参加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它还规定：“在海外代表尚未到达之前，由执行委员会所在国家的同志承担该委员会的工作。”^①

但是，在上述各政党中，除俄国党和匈牙利党以外，都未及时派出一名常驻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共产国际初期的全部活动实际上是由俄共（布）代表负责主持。季诺维也夫当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另有数名俄共代表先后担任书记职务。直到1920年7月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时候，才通过了共产国际组织章程，并据此在大会上选出了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按照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工作由世界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该国共产党承担。该国共产党在执行委员会内应指派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五人。此外，十到十三个最重要的共产党各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执行委员

① 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196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中文版第1卷第47页。

会。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名单必须由每年一度的世界代表大会批准；参加共产国际的其他组织和政党有权派享有发言权的代表一人参加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至少每六个月召开一次，要有半数以上的委员出席，才算合法。

在1921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没有直接选举执行委员会，但决定将它扩大，规定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四十票表决权的党可派代表两名，有二十至三十票表决权的党可派代表一名，俄国共产党（布）可派代表五名，其余的党在执行委员会中则享有发言权。按照这种新规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可以吸收较多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但在1922年12月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执行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办法又做了新的修改。它的全部成员改由共产国际主席团一次总提名、大会总表决的办法选出。采用这种选法，除了俄共（布）以外，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团体都不能由自己决定本党或本团体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人选。

此外，这次大会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扩大会议的组成也做了具体规定：执行委员会必须由主席、委员二十四人和候补委员十人组成，其中至少须有十五人常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一般应该每四个月举行一次，其组成人选应当包括：（1）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十五人；（2）德国、法国、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党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各三人；（3）英国、美国、保加利亚和挪威的代表各两人；（4）有表决权的其他支部代表各一人。

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及其与所属各支部的关系，章程的主要规定如下：

1. 在世界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共产国

际的领导机关，有权给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发布指示，并监督它们的活动；共产国际各支部必须遵守和贯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将违反共产国际纲领和章程，或违反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决议的整个支部、部分成员和个别成员开除出共产国际。被开除者有权向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共产国际各支部的纲领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遭否决，支部有权向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3. 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指导性的机关刊物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和正式文件；各支部的其他刊物也应尽可能地刊登这些决议；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纪录必须按时送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接受同情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政党参加国际，作为享有发言权的成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地址选在莫斯科。由于苏俄当时正在进行国内战争和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处在资本主义各国的严密封锁和包围之中，共产国际与国外的联系中断。为了打破这种困难处境，争取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它在1919—1920年期间先后成立了下列几个局来进行这项工作。

1. 在基辅设南方局。这个局是在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久建立的。主要负责人是拉柯夫斯基和巴拉巴诺娃等人。他们曾把南方局的活动从乌克兰扩展到巴尔干各国，并且派代表参加过西欧社会党的代表大会。

南方局存在的时间很短。1920年波兰军队进攻基辅时，该局成员撤退到莫斯科，从此停止活动。红军解放乌克兰以后，它也未再恢复活动。

2.在柏林设西欧书记处，或称柏林局。这是由列宁直接派秘密特使托马斯于1919年10月在柏林建立的一个共产国际分支机构。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列维、蔡特金等都是它的成员。起初，它西欧，特别是在德国起过重大的政治作用，但是，后来主要是承担联络工作，专门负责组织各种技术人员、信使和联络员小组，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各项指示从莫斯科传到柏林，再由那里传到欧洲其他地区。

1920年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撤销了西欧书记处的建制。

3.阿姆斯特丹局。这是由列宁直接派出的另一个秘密特使鲁特格尔斯在荷兰成立的一个共产国际分支机构，但仅存在两个月左右，就因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违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方针而被撤销。它的职权在此以后全部移交给了西欧书记处。

4.斯德哥尔摩局。这是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前在那里设立的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国外联络站。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它就成了莫斯科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保持联系的一个据点。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莫斯科对外联系问题已经解决，斯德哥尔摩局便被正式撤销。

5.维也纳局。这是由匈牙利和奥地利共产党人组成的一个共产国际分支机构，又称“巴尔干局”。1919年夏，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以后，有一批匈牙利共产党员逃亡到维也纳，不久即与奥地利共产党人合办了一个《共产主义》周刊，维也纳局就是以这个周刊编辑部为基础组成的。该刊主要撰稿人是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格尔哈特·爱斯奈和卡·弗兰克以及匈牙利共产党员拉斯洛·鲁达斯和迪约尔吉，等等。他们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周刊上宣扬“左派”共产主义，曾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但直到1922年3月，维也

纳局才被共产国际主席团正式宣布取消。

从1929年起,共产国际又先后设立了西欧局、东欧局、斯堪的纳维亚局、南美局、南非局和东方局,作为地区性的领导机构。^①

共产国际成立后还先后创办了《共产国际》(1919年5月创刊)和《国际新闻通讯》(1921年创刊)两个机关刊物,用英、法、德、俄等四种以上文字出版。这两个刊物的编辑部成员都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派。

三 共产国际主席团

1920年,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选出以后,起初并没有设主席团,只是从中选出了五名委员组成一个执行局,它实际上是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机关。

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局的成员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鲁德尼扬斯基、迈耶尔和柯别斯基。该局后来扩大,在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除上述五人以外,还增选了贝拉·库恩、罗斯梅、科能和拉狄克等人。^②

从1921年8月开始,执行局改称主席团。按照规定,主席团必须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召开的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选出,其中包括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各一人,他们只享有发言权;主席团至少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每次应有半数以上的成员参加,才算合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选出的主席团成员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布兰德勒、苏瓦林、特拉契尼、克里比赫

①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中文版第1册第77页。

② 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1卷第583页。

和卡耳,候补委员是瓦列茨基和库西宁。^①按照章程规定:共产国际主席由世界代表大会选出,既是执行委员会主席,又是主席团主席。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即由代表大会选任为共产国际主席,所以,他既是执行委员会主席,又是主席团主席。

主席团只对选出它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在它闭会期间担任它的全部工作。主席团有权设立各种常务局(如南方局、西欧局,等等)和它认为需要增加的部或委员会,并向各支部派驻自己的特派代表,以便指导和监督它们的工作。按照“特派代表”的权限规定,这种代表人员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各支部挑选的最有资格的领导人担任,享有广泛的权力,可以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各支部遵守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的情况和它们执行世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决议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并且每月至少上报一次工作结果。

在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于1926年被撤职以后,主席团曾进行一次改组,没有再保留这种主席职称。根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取消共产国际主席建制的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外成立了一个政治书记处,由布哈林负责主持它的全部工作。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章程规定:政治书记处由主席团选出,是决策机关,同时也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会议准备问题,并且是它们的执行机关。实际上,政治书记处是它们休会期间的共产国际最高机关。

共产国际主席团为了行使它的各种职权和加强对各支部的领导,从1922年底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调整。按照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改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今后工作的决议》,在

^① 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1卷第585页。

主席团下面设立了下列各种机构：

1、总书记处，原称书记处。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巴拉巴诺娃、别尔津、沃罗夫斯基和拉狄克曾先后担任过书记。他们的职权当时不大，只是协助执行局处理日常工作。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书记处由库西宁、拉科西和洪别尔-德罗组成。从1922年底开始，它改称总书记处，由科拉罗夫（担任总书记）、皮亚特尼茨基、斯切克尔、库西宁和拉科西等五人组成。书记处没有独立政治组织的职能，只是主席团的一个执行机构，但它的权限已比过去扩大了。

由于初期设立的许多局存在的时间不长，或者名存实亡，很少有什么活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2年改组以后，采取了一种报告员制度来实现它对各支部的领导。按照改组的规定，主席团应为每个重要国家指定主管的报告员及其助理员，负责筹划各支部的工作。报告员一般应该是执行委员会或主席团的委员，如果不是，则应在主席团一名委员的监督下进行工作。此外，他还必须是负责报告该国支部工作情况的本国人，并且常驻莫斯科。实行这种报告员制度，是想吸收更多的外国共产党负责人来参加共产国际中央领导机构的工作。

报告员和助理员的另一项任务是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各部门或委员会提供有关的情报资料，助理员通常是共产国际情报统计部的合作者，但在主管报告员的监督下进行工作。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4年向第五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在此以前先后担任报告员和助理员的人选^①如下：

① 《从第四次到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4年英文版第109页。

国 别	报 告 员	助 理 员
1. 德国、荷兰和瑞士	拉狄克、霍尔勒, 后是蔡特金	莫尔勒, 后是爱森堡
2.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	纽拉特, 后是蔡特金	爱森堡、西辛克塞和佩鲁索
3. 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	普鲁赫尼亚克和科茨切娃; 库西宁负责芬兰; 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负责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4. 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	科别茨基, 后是库西宁	
5. 讲英语的国家	马克曼努斯, 后是斯图亚特和昂特	起初是华伦尼乌斯
6. 南美洲(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	施蒂纳(詹纳里和葛兰西起初负责西班牙和葡萄牙)	
7. 意大利	詹纳里和葛兰西, 后是特拉契尼	奇阿林尼
8. 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	苏瓦林、列维和杜努瓦	
9. 巴尔干国家	科拉罗夫	符约维茨、巴杜列西和萨普罗夫
10. 东方部	片山潜和萨法罗夫	

在上述这个工作报告中还列举了报告员和助理员在此期间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报告的统计数字：^①

报告

德国报告员·····	123
法国报告员·····	11
意大利报告员·····	25
巴尔干国家报告员·····	29
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报告员·····	42
南美(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报告员·····	33
北美报告员·····	8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报告员·····	17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 匈牙利的报告员·····	10
东方部报告员·····	7

2、十一个地区书记处。上述报告员制度实行以后，困难很多，未能达到原定目的。1925年12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责成联共(布)代表团力求加强共产国际的机构，同时实行日益增强外国党在领导共产国际方面的影响的方针”。^② 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代表团的上述建议，在1926年3月成立了十一个地区书记处，把它所属的各支部所在国家按地理原则划分为十一个地区，每个地区设立一个书记处，由共产国际派一位主管书记和该地区支部的代表组成，故称“地区书记处”。

按照《组织地区书记处的决议》，“这些地区书记处都是共产国

① 《从第四次到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第109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95页。

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机构，在它的领导和监督下进行工作。每个书记处有责任系统地研究和分析该地区的国情和共产党的情况，为共产国际所有执行机关准备问题，执行这些机关的决议，并且监督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执行这些决议的情况。”^①实际上，每个“地区书记处”等于共产国际书记处的一个分部。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总书记处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可以吸收更多的外国党的领导人来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十一个“地区书记处”^②的划分如下：

- 1、法国、法属殖民地、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
- 2、德国。
- 3、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
- 4、英国、爱尔兰、荷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属印度和荷属印尼。
- 5、美国、加拿大和日本。
- 6、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南美各国。
- 7、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
- 8、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 9、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
- 10、苏联。
- 11、近东和远东（中国、朝鲜、蒙古、土耳其、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3、组织局与组织部。

组织局是在1922年底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的一个新领

① 《真理报》1926年4月4日。

② 同上。

导机构。它的权限很大,可以“讨论和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各种组织问题和财务问题”,^①书记处也隶属于它。1924年的修改章程规定:“书记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组织局的执行机构”,^②书记处的成员都是组织局的成员。例如,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结束时,组织局是由新当选的五名书记(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洪别尔-德罗、盖施克、特伦)加上外国党的其他九名代表(席勒、特古斯基、邓恩·米凯茨维奇、马克曼努斯、库恩、彼特罗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党的代表各一名)组成。

在主席团下面还设立了一个组织部。组织局与组织部的职能差别起初不明显,1923年12月执行委员会才明确规定:组织局是决策机关,负责决定政策;组织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与各共产党的关系,承担改革共产国际各支部组织结构的任务。

组织部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五次扩大全会(1925年3月)和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期间,曾同时召开过两次组织会议,由各党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参加。会上要求各党贯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以生产支部为基础改组党的组织结构的决定,特别是要求各党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原有结构。

4、宣传鼓动部。

这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的另一个重要机构。它的任务是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提高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的理论水平。但它在1923年刚成立时,由于工作人员缺乏,基本上没有开展工作,只是为俄共报刊提供一些关

① 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1960年伦敦英文版第2卷第119页。

② 同上。

于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的消息，或为外国共产主义报刊撰写有关苏维埃俄国与俄共(布)的专题文章。

为了改进和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共产国际在1924年6月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对上述这种“停滞状态”提出了严厉批评，并且通过了一个改进宣传鼓动工作的《提纲》，在1925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上又通过了《关于组织宣传鼓动工作的几点规定》，它们都特别强调加强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求共产国际各支部改变迄今对待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培训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消极态度，规定各党必须建立宣传鼓动部，以便扩大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并建议确定各种宣传制度，成立中央党校和各种初级训练班(夜校、定期讲座、星期日学校，等等)，为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创造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条件。

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是贝拉·库恩。他当时与执行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包括俄国共产党宣传鼓动部)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小委员会，负责领导该部的一切工作。它每年举行两次扩大会议，吸收各党主管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干部参加。

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下面设了四个处：(1)群众鼓动工作处：利用各种场合和时机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国际的纲领和政策；(2)宣传工作处，或称党的教育工作处：组织各国共产党选派负责干部和青年党员到莫斯科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或从事理论研究；(3)新闻出版处：负责组织各种马列主义理论教科书和其他理论著作的编写和出版工作；(4)情报工作处：负责收集、整理和交流各国共产党的革命工作经验。

5、预算委员会。

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财务机构。它是在1921年第

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的。最初，它是由执行委员会选派赫克尔特、贝拉·库恩、瓦列茨基、拉科西、波波夫^①等担任它的全部工作。从1924年7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预算委员会人选则由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它的主要成员是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盖施克、特伦、马克曼努斯、一名捷克委员和一名意大利委员，另加一名候补委员保尔·特古斯基。^②

预算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处理与共产国际各支部有关的财务问题。按照规定，它有权决定各共产党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交纳会费的数额，按照各党不同的迫切需要（如竞选、出版和机关的开支）分配所收到的会费总额，并监督各党的财务工作，以保证它拨给的经费用于既定的目的。预算委员会的工作则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进行监督。实际上，当时能够向共产国际交纳巨额会费的，只有俄国共产党，其他党由于尚未掌握政权，或者处于非法状态，所交会费都很少，只有象征性的意义。

6、其他机构。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新设立的机构，除了上述各个重要部门以外，在主席团下面还成立了东方部、情报统计部和国际联络部。但由于它们的工作机密性很强，过去公开报道的文字材料很少，而且不易找到，这里只能极简单地说明一下它们的任务性质。

东方部的任务主要是保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日本、朝鲜、荷属印尼、波斯、土耳其、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国共产党组织的联系，经常邀请它们的代表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去讨论关于进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活动》1923年俄文版第15页。

②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57期，1924年8月12日第614页。

行革命斗争的各项重大的原则问题。

情报统计部的任务主要是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供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情况和它们所处的社会状况。

国际联络部的任务主要是与处于非法状态的各国共产党保持联系。

以上各部（宣传鼓动部除外）的活动和工作都由组织局统一领导。

四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

共产国际的监察机构最初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后来规定必须经过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才算有效。

国际监察委员会是在1921年第三次代表大会才决定成立的。当时曾建立一个“临时国际监察委员会”，但未进行任何活动。

1922年底，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国际监察委员会应当继续存在，由代表大会每年选定两个毗邻支部，分别从其中央委员会中各选三名代表担任监察委员，但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这次代表大会结束时，指定了德、法两国支部承担在第二年（即1923年）组织国际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但未能实现。直到1924年7月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才从各主要共产党代表中选出十七名委员正式组成了国际监察委员会。它的成员是：墨菲、勃罗德、阿斯特罗基拉多、克尼希、劳埃森、詹纳里、斯图契卡、安加里迪斯、普鲁赫尼亚克、索尔茨、费利克斯·柯恩、卡辛、克里比赫、卡巴克契也夫、波格尔曼、施蒂纳和麦吉德。^①

关于国际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

^① 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英文版第2卷第573页。

规定如下：

(1) 处理针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各机构提出的申诉，并向它提出处理建议；

(2) 处理个人或整个组织就共产国际支部（即共产党）对他们采取的纪律措施所提出的申诉，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处理建议；

(3) 监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财务；

(4)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监督各党的财务。

上述职权范围，在1924年提交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修改章程草案中把(1)和(4)项都删去了，其它两项内容基本保留，但提法略有不同。在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章程中，对国际监察委员会的职权重新作了规定。它责成“国际监察委员会审查有关共产国际各支部的统一和团结问题以及评定某支部内个别成员的行为是否符合共产党人标准的问题”。^①

按照重新确定的国际监察委员会的上述基本任务，它的职权^②规定如下：

(1) 审理那些因政治上的意见分歧而受到纪律处分的党员对党中央的行为的申诉；

(2) 审理共产党中央机关成员的类似案件以及监察委员会认为应由它审理的或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策机关的建议提交给它审理的关于个别党员的案件；

(3) 监督共产国际的财务。

此外，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修改的章程中还规定：“国际监察

①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中文版第1册第79页。

② 同上。

委员会不干预各党内部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以及组织上和行政上的纠纷”；“国际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所在地，由国际监察委员会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后加以确定”。

五 共产国际的国际机构

共产国际为了扩大它的政治影响，为了争取和组织各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它所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和活动，曾先后成立了许多国际性的群众组织，作为它的辅助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

1、红色工会国际。它是一个革命的工会国际联合组织，1921年7月成立于莫斯科，拥有俄国、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等国的八百万工会会员。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由此选出中央理事会和执行局，由洛佐夫斯基担任总书记。

红色工会国际的执行局设在莫斯科。它在中欧、英国、巴尔干和多瑙河地区、拉丁美洲分别设立分局（又称书记处），后来又增加一个东方局。关于它们与执行局的关系，红色工会国际在1923年6月举行的第三次中央理事会曾就此通过一项决议。决议强调莫斯科执行局的巨大作用，要求设在国外的分局必须服从它的领导。它规定：“执行局决定这些分局的组成和职权范围，保证这些分局不超越所规定的宣传、鼓动、联络和情报的范围。每个分局必须在执行局的直接监督下完成自己的工作。只有在执行局认为必要的时候，它才能扩大自己的工作范围。”^①

红色工会国际的任务主要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反对各国工会

^① 《关于红色工会国际第三次中央理事会的报告》1923年德文版第81页，转引自E.H.卡尔《苏维埃俄国史》英文版第8卷第943页。

中的改良主义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宣扬的阶级合作政策，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它在自己存在的历史时期内(1921年至1937年)，曾为争取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提高生活水平，争取发扬工会民主和使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苏俄人民亲近，争取东方各国劳动群众与工人结成同盟，争取消除战争威胁和反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坚决的斗争。

红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非常密切。它曾派三名代表参加后者的执行委员会，经常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发表联合声明。从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这种联系办法取消，改由双方的中央领导机关举行联席会议，各派三名代表组成行动委员会来贯彻共同的决议。

1923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曾规定：“共产党员在工会进行工作，必须与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保持完全一致”，各国共产党必须保证“组织在工会中的无产者在红色工会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①

1935年，红色工会国际按照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坚持保卫民主的原则基础上，使它所属的一部分工会组织加入了几个大的改良主义工会和左派工会，两年之后，即在1937年，它就自动停止了活动。

2、国际工人救济会。这是国际无产者的救灾组织。它是1921年9月在柏林成立的救济苏维埃俄国灾民委员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创始人是著名的活动家蔡特金、罗曼-罗兰和肖伯纳等人。它的总部先设在柏林，1933年以后迁至巴黎。

国际工人救济会的首要任务是对苏俄灾民提供物资救济。它

^①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33年俄文版第379页。

在1921—1922年内募集了五百万金卢布捐款；向苏俄运送了大量食品和药品。它在二十年代促进许多国家的革命群众成立了苏俄友谊协会，组织了许多外国工人团体移居俄国，并由他们来建立农业企业或集体农场，以协助苏联人民恢复国民经济。

1925年5月，上海发生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以后，国际工人救济会积极参加了1925年8月16日在柏林举行的声援中国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大会，在会上宣布募集了一百万金马克来支援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还讨论了“中国斗争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意义”，并在大会结束时提出了“不许干涉中国”的口号。

国际工人救济会在世界许多国家设立了支部，拥有一千万会员，出版了五十多种刊物。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停止了救济工作，变成了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国际组织。

3、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又称国际红色救济会）。

这是一个专门救济遭受政治迫害的革命战士的国际组织。它的任务是从法律上、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援被监禁的革命战士及其家属子女和烈士家属。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把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小职员群众，把一切遭受资本剥削和民族压迫的人，一切渴望劳动战胜资本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不问他们属于何种党派。

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创始人之一是马尔赫列夫斯基。1922年8月23日，他在《共产主义论坛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波兰局机关报）发表了一封救济遭受资产阶级恐怖迫害的受害者的呼吁书，同时上面签名的还有捷尔任斯基、加涅茨基、柯恩和安施里赫特等人，接着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共和国募集捐款。这种活动受到了当时正在进行会议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热烈赞扬和大力

支持。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成立的。它在1923年3月2日选出了执行委员会，由马尔赫列夫斯基担任主席，科拉罗夫为共产国际的驻会代表，总部设在莫斯科。它的机关报叫《国际灯塔》，每月用俄、英、德等几种文字出版。从1923年起，它把每年3月18日定为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国际日。

这个国际组织的发展很快。它在1927年拥有会员八百多万，到1933年增加为一千三百七十多万。1937年，它在世界七十四个国家建立了支部，其中苏联支部最大，有会员九百万名。

1924年7月14日至16日，它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会议。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一百零八名，其中除苏联代表以外，三分之二的代表来自其他各国支部。这次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救济在资本主义反动黑暗时期为革命而遭到监禁和迫害的战士；通过了在农民和妇女群众中进行工作和救济政治避难者的决定；制订了组织章程。

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成立以后，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与争取解放的运动。它的著名活动家季米特洛夫、赫尔曼、萨柯和万策第等，积极参加了救济奥地利（1934年）二月战士和西班牙（1934年）十月战士的运动，组织了救济在1936—1939年由于反对法西斯干涉西班牙内战而惨遭迫害的受难者的运动。它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反对法西斯国际集团的斗争中，大力扩大了国际主义的团结力量。

4、农民国际。这是1923年10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农民国际组织。参加者有来自苏俄、波兰、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墨西哥、挪威、瑞典、芬兰、印度支那和日本等国农民组织的代表。它的领导机构叫农民国际委员会。托·东巴尔是它的领导人之一。

农民国际的主要任务是捍卫劳动农民的利益。它向全世界农

民提出了“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的口号。

农民国际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国际土地问题研究所，出版了一个《土地问题》月刊，专门研究全世界土地问题。它出版的其他刊物有《农民国际》（它的机关报）和《国际农民公报》，专门报道各国农民运动的情况。

1925年4月，农民国际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者有来自三十九个国家的七十八名代表，其中七名来自亚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确定农民国际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劳动农民摆脱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影响和领导”，使他们从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

1925年秋，农民国际主席团曾不断发表关于各种国际时事的声明，如反对摩洛哥战争、支持国际合作社运动、反对战争危险等声明。1925年，朝鲜发生水灾时，农民国际曾及时组织救济朝鲜灾民的工作。同年8月，农民国际曾向在马赛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发出电报，询问他们是否支持东方殖民地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和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否要求停止叙利亚和摩洛哥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和要求从中国撤出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等等。

5、红色体育国际。这是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参加者有来自苏俄、德国、法国、瑞典、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萨斯-洛林的代表，由波德沃伦斯基担任主席。它的会员在苏联有二百万，在捷克有十二万，在其他国家的会员人数则较少。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了一名代表参加体育国际执行委员会；1924年下半年，它又指示各国共产党“要特别关心体育运动”，以便吸引各种体育组织来参加和加强反对法西斯和军

国主义的斗争，因为体育组织是“进行军训和加强纪律的最好方式”。

红色体育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联系很密切，凡是在红色工会力量强大的地区，红色体育国际的组织都发展很快。

1923年2月，体育国际委员会决定在柏林建立一个西欧局，以加强同西方各国体育组织的联系。

1924年10月，体育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工人阶级必须自觉地利用体育锻炼为无产阶级各种目的服务的原则，并宣布体育国际向一切承认阶级斗争的无产者开门。

6、国际妇女书记处。这是1920年在莫斯科成立的一个妇女国际组织。它的领导人是著名的蔡特金和柯伦泰等人。

国际妇女书记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派有常驻代表，可以在会上对一般性问题发表意见，对与妇女运动有关的问题则享有表决权。但国际妇女书记处通过的一切决议和采取的一切重大措施，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才能生效。

国际妇女书记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团结女工努力完成共产国际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吸引各国妇女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而进行革命斗争”。^①

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对国际妇女书记处工作的领导，在1921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在妇女中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方式》的提纲。它向全世界的女工指出：“只有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她们才能从千百年的无权地位、备受奴役和不平等的状态下获得解放”；它规定各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地方的党委

^①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中文版第1册第358页

员会、州(省)委员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下都设立妇女工作部或委员会”，以便进行广泛的妇女工作。

这个提纲成了国际妇女书记处的工作纲领。在它的指导下，国际妇女运动发展很快。但是，国际妇女书记处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设立的一个妇女工作部取代了它的全部工作。

7、青年共产国际。这是1919年11月在柏林成立的青年国际组织。它的领导人之一是明岑堡。参加这次成立大会的，有来自苏俄、德国、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丹麦、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西班牙、捷克等国青年组织的代表。这次会议通过了正式成立青年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加入共产国际而作为它的一个支部进行活动，并且通过了青年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章程。

青年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对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实行集中领导，对青年的各种社团组织给予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支援；在没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地方建立新组织，开展广泛的青年群众运动，捍卫青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特别是开展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1921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它所属各支部以争取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为目的；它在1922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立工人青年统一战线的任务；它在1924年6月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1928年8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规定它在工会工作中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对广大青年群众积极进行工作。

青年共产国际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积极参加了德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工人阶级的多次革命发动，在群众运动中捍卫了

青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青年群众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它在五十多个国家中共拥有三百七十万三千名会员，在教育和动员青年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1935年9月，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提出了为反对法西斯进攻和战争危险而建立广泛的青年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

1936年和1938年，青年共产国际在日内瓦和美国先后召开了国际代表会议，在反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侵略和干涉西班牙共和国的斗争中实现了国际青年的统一行动。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青年共产国际作为它的一个支部，随即也宣布解散。

8、共产国际合作社工作部。这是在1922年成立的一个国际性机构。早在1921年7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有美舍利亚科夫提议开展国际合作社运动，争取“把合作社改造为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机构”。他为此而提出的一个提纲，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1922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合作社工作者国际会议又建议共产国际设立一个国际合作社工作部，并且要求各国共产党都相应地设立这种工作部。它的任务是在国际合作社运动中采取各种组织措施和策略措施来结束改良主义者在国际合作社运动中所推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使合作社变成捍卫劳动群众利益的斗争工具，并引导一切合作社组织和革命工人组织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而结成统一战线。

据1924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指出，共产党人在许多国家为实现这些任务所进行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例如，当时在德国二十九个合作社中就有十多万共产党员社员，在德国，

1924年全国合作社会议的八百名代表中,就有六十名共产党员;在法国同年召开同类会议时,在四千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就占了二百三十名;国际合作社联合会当时在根特举行的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四十五名中央理事中,有十三名共产党员,其中十二名是苏联人,一名是捷克人。苏联代表团在这次会上所提出的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危险以及反对合作社中立化的口号,获得了许多国家代表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历史学年鉴》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

精装每册 2.85 元

平装简本每册 1.25 元

《史学情报》是《年鉴》的附册,每年出版四册,三、六、九、十二月出书,每册约十二万字左右,定价0.50元。

以上两书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如读者在当地新华书店无法购到,可向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发行科邮购。

马林(亨克·斯内夫利特) 政治传记(摘录)

[荷]弗·梯歇尔曼

编者按：马林，即亨克·斯内夫利特(1883—1942)是共产国际和荷兰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1919—1923年间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建党初期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他也是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本书是他的简要传记，原文是荷兰文，1974年出版；1978年西德波洪出版了由K.维努布斯特和S.施密特-拉德曼翻译的德文本。我们根据德文本将该书的《共产国际内的讨论》、《中国》两章及《与共产国际决裂》一章的一小部分译出发表，供研究共产国际历史和中共党史的工作者参考。书中涉及中共历史的材料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核对，使用时请注意。

共产国际内的讨论

一方面，欧洲工人运动的衰落，尤其是德国没有发生决定性的

突破,另一方面,一些亚洲国家出现了民族革命运动的骚乱,这些都加强了国际革命运动对东方的关注。处于孤立状态的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尤其如此。这一方面的最初迹象表现在新的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后来,约在1920年,共产国际也照这样办了。1920年7月和8月,斯内夫利特以马林的名字同怀恩科普和万-列文作为荷兰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他也代表三宝垄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即后来的印尼共产党)和伊斯兰教联盟。大概是根据列宁的建议,斯内夫利特被任命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秘书。^①这使他有可能会为制定不发达世界的共产主义战略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相当新的天地,这方面的问题人们还不能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在1900年以后就已经从事这项工作,但总的说来仍然停留在决议上和限于进行某些学术性的辩论。

这是第一次研究殖民地问题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会上除了来自殖民地的参加者外,主要是俄国人介绍了他们在解决民族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建立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方面积累的多少可以类比的经验。提纲也就是来自以列宁和罗易为代表的这两个阵营。这两者以十分不同的方式代表了一种新的更加“东方的”倾向,其目的是发挥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其他地区的革命潜力。列宁主张支持——在一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放运动以及同农民运动结成同盟;如果可能的话,就应当建立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苏维埃。在1920年7月26日的演说中,他也曾指出,通过或许会出现的西方苏维埃政府的支援,有可能使落后国家越

^① 根据罗易的说法,是萨法罗夫首先建议罗易担任主席;然而罗易的反建议被通过了,斯内夫利特担任了这一职务;萨法罗夫成了秘书。(罗易《回忆录》第381页)

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斗争一定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分开。

罗易和斯内夫利特在对东方的重要性的评价上超过了列宁。他们倾向于把世界革命的重点放在这里，这也是由于考虑到殖民地在经济上对于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但是，在如何使他们在东方的策略具体化方面，他们的设想是很不一样的。斯内夫利特完全赞同列宁原来那份提纲草案，即必须使所有的共产党都来支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放运动。罗易和亚洲其他代表在农民运动问题上同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否认有必要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他们显然已经预见到这方面包含的危险。列宁认为，整个农民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罗易则认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使无地的贫穷农民对资产阶级保持独立性；同样，它必须从一开始就领导整个群众运动，而且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是如此。罗易举印度的情况为例，那里由于最近时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场新的农民和工人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是不受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控制的。

也有另一个西方派别反对亚洲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一派别拒绝同资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实行联合。塞拉蒂及其追随者的意见是，必须把无产阶级行动的重点放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上。在这两个反对派集团的压力下，列宁的提纲在提交委员会讨论的阶段作了某些修改。主要是用“民族革命解放运动”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提法。在最后的文本中，连“民族”这个限定词也取消了，只提“革命运动”。但这恐怕不能说是一个让步。列宁明确地肯定，任何一个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为在不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者。在列宁的压力下，罗易在委员

会中起草的提纲被大大削弱了。尽管如此，这个提纲的主要内容在许多方面却与列宁的截然不同，以偏向列宁的中间人面孔出现的斯内夫利特却故意忽视了这一事实。塞拉蒂拒绝支持斯内夫利特和占绝大多数的既赞同列宁提纲又赞同罗易提纲的人，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两个提纲都不能自圆其说，因为被奴役的民族的真正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才能实现，而不能通过同似乎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暂时的联盟去实现，这种联盟只能导致降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讨论结束时取得的虚假的一致后来还带上了某种奇特的性质，因为罗易出于疏忽把原来激烈反对资产阶级的文本发表了。这种虚假的一致更加突出地表明，对提纲可作各种不同的解释。罗易的提纲很快就处于次要地位——这说明日益受俄国支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很不关心那种可以理解的对亚洲的统一战线策略提出的批评——，但是那种含糊不清的情况几乎没有因此有所减少。事实上整个讨论是很不明确和含糊不清的，而且通过的提纲，很快就不再能真正阻碍对亚洲资产阶级给以一种哪怕只是暂时的支持了，这肯定不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多数人的本意。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同时并存了一段时间，但是它们彼此不是截然分开的：一方面设想的是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前途，革命会蔓延到东方，随之那里就会越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另一方面设想的是西方革命遭到失败的前途，那时亚洲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西方的革命低潮，旧的和新的俄国利益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压力和苏联的迅速官僚主义化在共产国际政策上所投下的浓重阴影，日益限制了在实践中作出不同解释的余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没有认识到，实际的历史发展已经使他们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学术辩论的性质。

遍体鳞伤的苏维埃国家需要在与它处于敌对地位的世界中极其迅速地确定边界和找到可靠的盟国。俄国领导人认为，从现有的大国和政府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亚洲民族资产阶级那里，比从无产阶级那里更容易得到这些东西。他们通过不同的、起初并不总是平行的轨道——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俄国的党、共产国际——和在不同的方面实现了这一企图。在土耳其和波斯，在这些极其重要的亚洲边界上，经过开始一段拖延之后，苏俄很早就支持了现有的政府，并没有考虑那里的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压制的情况。在印度这样纯粹的殖民地国家里，苏俄领导人的兴趣集中在民族主义的抵抗运动上面。但是在幅员广大、好几个权力中心互相角逐的半殖民地中国，他们在两个方面展开行动，起初同北京的由变化不定的“军阀”拼凑势力所控制的正式政府合作，稍后也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在广东的依附于军阀的对抗政府打交道。只有在认识到这个对抗政权是值得重视的时候，俄国的中国政策的重心才转移到南方，这是适应实际力量对比的做法，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服从了这种做法。

但是，所有这一切在1920年还是无法预料到的，同样无法预料到的是，斯内夫利特的一些政治见解与这一发展情况十分吻合，尽管斯内夫利特并不象俄国领导人那样关心苏俄的切身利益。长远起作用的革命考虑为恰当地认识上述过程（日益偏重国家利益、把国家和政党结合起来）制造了困难，何况人们对于这一过程也是毫无准备的。如果感情用事地把苏维埃国家和世界革命等同起来并从这一点出发看问题，那么实际上谁也不能把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分，这就是：一方面，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很不完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在外交上去适应现存的世界关系，另

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要实行革命的政策。实践家斯内夫利特对这一点是特别无能为力的。他感到，他的暂时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的倾向是受到列宁的保护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批判性讨论对他的影响很小，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他甚至大肆宣传共产党人参加民族主义运动和采取积极的态度接近伊斯兰教和泛伊斯兰主义。

同时他基本上以他在爪哇从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工作的实际经验的解释者自命。在回到荷兰以后，他对伊斯兰教联盟的评价日益肯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斯内夫利特所知，伊斯兰教联盟变得日益激进的那种态度已使它的领导人遭到了迫害。《自由言论》(1917—1918)之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完全未对伊斯兰教领导人的软弱态度提出从前那样的尖锐批评，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一个有经验的读者却可以从《自由言论》的谨慎的评论中看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方面的必要的保留态度。当然，斯内夫利特仍旧是消息灵通的，因此他不得不在他从中国写给《自由言论》的《流亡者通信》(1921年9—10月)中肯定伊斯兰教联盟丧失作用及其领导人软弱无力。然而他在描绘伊斯兰教联盟及其同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的关系时还是称颂备至，这从他刚回到荷兰时和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已经可以觉察出来了。

中 国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斯内夫利特显然取得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其他领袖的信任。他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久以后，被派往远东执行任务。他要前往上海，对远东各国的运动进行调查

研究,建立联系,并弄清楚在那里是否应当和可能建立一个管理该地区的办事机构。

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主张为远东和中东设立一个宣传局。1920年9月他在巴库参加了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没有积极进行活动,此后他从莫斯科回到荷兰。1921年初他在荷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使自己的驱逐令得到撤销。3月23日他向(荷属东印度)总督递上申请书。但是荷兰当局对他在苏俄的所作所为非常了解(据说他在居留中国期间也受到荷兰外交机构和英国租界当局的严密监视),因此比以前更加不愿意支持他的新的亚洲计划。斯内夫利特在途经新加坡时会见了巴尔斯和达尔索诺,并在上海(他在那里设立自己的总部)进一步同印尼共产党代表进行会晤。他及时地密切关心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直到1922年底一直同它保持良好的接触,但是由于交通困难,他本人的直接经验已经过时,他对民族主义抱着顽固的幻想,再加上其他原因,他越来越不能掌握那里的复杂的发展情况了。

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探索远东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潜力。1921年他与他在上海的合作者俄国人尼可尔斯基一同被任命为伊尔库茨克的书记处成员,这个书记处是共产国际为中国、日本和朝鲜设立的东方局。这个书记处监督他在这一地区(那时还包括印尼、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工作。

在中国,随着“五四运动”等等展开了一场反对凡尔赛处理中国利益的方式(主要是偏袒日本)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特别是指向协约国列强、外国资本和军阀。这一运动经过几次挫折以后发展成1925—1927年的社会革命。斗争的第一阶段(1919—1921)的具体成果是:现代工人运动有了某种程度的萌芽,成立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社团,从而为创立中国共产

党准备了基础。在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书记处代表维金斯基的提议下,这些社团于1920年改组成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是经过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准备工作,陈独秀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据张国焘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陈的《新青年》逐步转为小组的机关刊物。为了在工人、学校和工会等中进行工作,专门创办了一个刊物《劳动界》。接着成立了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考虑到当时的成员复杂,我们对这里的“共产主义”一词应当理解得比较广泛一些。

1921年6月6日斯内夫利特到了上海,那时1919年的高潮已经减退。军阀和太上军阀的割据还在全盛时期。工人运动薄弱,1921年6月^①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地下活动的萌芽阶段,这一情况使斯内夫利特很难找到能产生广泛影响的联系点。

列宁和其他俄国领袖早就以批判的态度表示对孙中山感到兴趣,但是苏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首先集中考虑北京政府。它之所以有可能这样做,是因为1920年期间,一个亲日本的、极端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阀集团垮台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已赢得促进中国统一和保护劳工声名的军阀吴佩孚在华北掌权。历届俄国公使优林、派克斯、越飞和加拉罕艰苦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24年达到了所渴望的目的:正式承认苏维埃俄国,容忍它在外蒙古的事实上的权力地位和它在满洲的中东铁路的权力。

吴佩孚是所谓直系的首脑,这是根据北京所在的直隶省或河北省起名的,该省出了一些军阀。他可以很好地利用一切支持来反对华北铁路网中某些同他敌对的亲日集团。中国共产党人凭借

^① 应为7月。——译者注

同吴的良好关系在一个时期内(1922年)能够在铁路工人中开展相当规模的工会工作。^①当他看到共产党的影响太大并且在河北爆发了几次反对英国企业的罢工时(直系军阀也同英国资本有密切关系);吴的“进步性”减少了。他禁止十六个地区铁路工人俱乐部合并成京汉铁路总工会。此后在这条铁路上爆发的抗议总罢工被他血腥镇压了(1923年2月7日)。三十五人死亡,伤者大大超过此数。这一事件标志了军阀开始对工人运动采取强硬态度。尽管发生了许多次同情罢工,但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在1923—24年的过早的衰退。这就使斯内夫利特十分渴望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人的亲密合作易于实现。

不能确定斯内夫利特是否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大会。很可能他仅仅出席了由于警察干扰而突然中断的第一次会议。不管怎样,在他于1921年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最初几次接触时,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完全同意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策略。当然也有一些集团对民族主义并不抱否定态度。在与吴佩孚联合之前,广东地区的共产党人已与那里的督军、军阀陈炯明进行合作,而孙中山和国民党是非常依靠陈的支持的。据张国焘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不得不严肃地要求广州支部的某些在1922年6月陈炯明举行政变后仍旧继续支持他的党员遵守纪律,甚至不得不将其中的一个开除出党。连斯内夫利特也曾有一个时期对这位“开明”军阀(当时是孙中山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十分尊敬,陈似乎力求在广东实行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并曾在1922年1月与斯内夫利特在广州谈过几次。但是党内多数人倾向于最大限度地保持党

① 这一与吴佩孚合作的政策主要是李大钊推行的。关于斯内夫利特在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一直有争论。(参看布兰特《斯大林的失败》第24页;迈斯纳《李大钊》第211页;伊萨克斯《悲剧》第61—62页;惠丁《苏维埃政策》第301页)

对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并直接面向无产阶级，尽管暂时还不得不把重点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上；他们固然愿意支持孙中山，但是不愿意把他的革命同自己的革命混淆起来。

共产党人通过工会工作和工人学校已经在华中和华北的工人中产生一些影响。与半合法的党大致同时成立了合法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它立即在开展现代工人运动和组织 1921—1922 年的各次大罢工中起了核心作用。1922 年 4 月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有来自十二个城市的一百六十名代表出席，他们是拥有三十万会员的约一百个工会选出的。但斯内夫利特对 1921 年初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却评价不高，这个团体给他以某种宗派组织的印象。成立代表大会的十二个或十三个参加者代表七个地区小组，这些小组是由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激进民族主义的分子组成的。斯内夫利特对形势的这一看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抱很大怀疑态度，因此他确实不赞成立刻就成立共产国际的支部，而是赞成成立一个宣传小组。中国共产主义者却并不希望共产国际多加干涉。斯内夫利特有可能受到疏远，甚至受到抵制。据张国焘说，他们认为他相当傲慢。

他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期望起初也不高。他认为爪哇的无产阶级比中国工人有更高的阶级觉悟。他认为在中国开展工人运动和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的前景是十分有限的。斯内夫利特认为极其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几乎全是小土地所有者并且对政治漠不关心，因此也没有什么潜力。在这一方面他背离了列宁的总方向，但肯定同共产国际的多数领导人是一致的。

国民党并没有给他以强烈的印象，因为这个党是一个以孙中

山为中心的各个集团的松散的混合体，而孙本人首先致力于通过与军阀结成不可靠的同盟来扩大军事力量。尽管如此，斯内夫利特仍努力争取同它密切合作。为此目的，从1921年末到1922年初，他在桂林同孙中山发生接触，在广州同国民党其他领袖发生接触。1921年12月10日，斯内夫利特离开上海到南方旅行三个月。他经过汉口和长沙（湖南省）到达广西省的桂林，孙把他准备北伐的军队集中在那里，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北伐”。

这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同孙发生接触。维金斯基已在1920年秋天与孙谈过。外交事务人民委员契切林已几次给孙写过信（1918年8月1日；1920年10月31日；1921年8月28日），并在第二封信（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中建议建立贸易关系。孙中山并不反对。他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他是懂得重视苏俄的发展的。几年前他还曾相当天真地说，中国将能通过一次土地改革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思想受到列宁的尖锐批判。斯内夫利特告诉孙关于俄国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消息，这使他感到放心，使他加强了认为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说，新经济政策同他自己的“民生主义”原则很接近，这一原则是他的政治体系中除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以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组成部分。他对同俄国联盟不太喜欢，因为他担心帝国主义的干涉。他认为只有当他在中国的力量在军事上、政治上得到巩固以后，中国和俄国才能作为盟友而解放亚洲。很可能斯内夫利特曾试图说服他相信，国民党必须扩大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得很好的、依靠几个阶级的中国人民的统一政党，而且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不管孙对这一点是怎么考虑的，但他在当时过多地考虑他的军事计划，因此对于共产党人的友好尝试无法接受。唯一的成果是同苏俄建立非正

式的关系，并且答应派他的一个最优秀的部下到俄国去，这就是蒋介石，他于1923年中赴莫斯科。斯内夫利特当时肯定除此之外还曾建议设立一所军官学校，这就是后来的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担任。

1922年初斯内夫利特开始认为合作的可能性比较有把握了。1922年1月爆发了省港海员大罢工，新的斗争浪潮和民族情绪的高涨开始了，这使他对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产生信任。国民党在南方的广东省工会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怀疑并使他相信，国民党在南方已经能够接近工人和士兵群众。他认为南方的群众比共产党影响较大的上海和华中的群众更加进步，在战略上更加重要。他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鼓吹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应当联合起来，推动整个运动进一步向左发展。这一战略同共产国际报刊上传统的仍旧相当消极的报道是相差很大的，更不必说它是大大违背红色工会国际的路线了。结果是，苏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在1923年底对此作出了极其尖锐的反应，加以纠正。象季诺维也夫、萨法罗夫、罗易这样的人所体现的共产国际传统的激进路线在远东革命和共产主义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1月21—27日召开）上还有强烈的表现。这次大会有斯内夫利特邀请的一些东亚国家的代表（包括国民党和印尼共产党）出席，它是“巴库”会议的继续。在大会上，国民党的代表陶某处境非常窘迫，但是大会的激进态度同俄国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某些做法早已同这一政策亦步亦趋）比起来实际上已经是落后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底召开）通过了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运动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于东方说来，这一统一战线也已被扩大成一个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力量联合的“反帝统一

战线”，这包括要对农民群众采取积极的态度。尽管有各方面的人不时表示出严肃的顾虑，罗易也接受了这一路线。

列宁 1920 年的提纲已把这一方向当作一种可能性考虑在内。由于西方革命运动进一步衰退和东方的斗争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且考虑到中国的潜在力量并没有被一直较小的共产党充分利用，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愈来愈接近斯内夫利特的立场了。1922 年 2 月，斯内夫利特被要求提出报告。三月底当他还在北京时，他大概已向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代表派克斯作了报告，后者那时正在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此后他于 1922 年 4 月 24 日乘船离开上海赴欧洲。1922 年 6 月 16 日他在阿姆斯特丹就“俄国革命同东方各民族”这一题目发表了一次热情的演说，他在其中预计，国民党不能长久维持自己的过分严格的纪律。^① 7 月他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起草了一个给 1922 年 7 月 17 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的报告。据斯内夫利特说，国民党的成分是：部分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领导；侨居在海外殖民地的资本家，他们在财力上支持党，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党的领导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士兵、丧失阶级的分子，还有工人。他特别强调这一无产阶级成分的重要性，有一次甚至用了“工人党”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按照他的阶级分析，他所提出的是一个不存在支配阶级的多阶级政党的设想，一个民族主义的群众性政党的设想，这个党既不是资产阶级的党，也不是工人的党，他认为这样的党对于一个想争取工人的革命组织来说是理想的用武之地。尽管斯内夫利特没有注意到农民，但是他通过对作为统一战线基础的国民党的阶级分析

① 国民党固然实际上是一些领导人小集团的混乱的集合，没有严格的组织基础，但同时形式上却具有一个在孙中山独裁领导下的十分专制的组织结构。

毕竟在某种意义上预先接触到后来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关于四个阶级联盟的设想,尽管差别还是很大的。斯内夫利特认为,为了能在南方开展工会工作,就必须尽一切可能对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给予支持。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肯定,国民党领袖们曾对他声称愿意为在他们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提供机会。他根据这一点,也许首先是在共产国际内部,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加入国民党,以便取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开展政治工作的可能性。在他赴莫斯科之前他似乎没有说出这一想法;很可能他是打算先在莫斯科争取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他的想法,以便后来凭借更高的权威来克服中共的反对。共产国际在1922年7月听从斯内夫利特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据维金斯基说,共产国际接受了他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却没有深入讨论其实际的后果。不管情况是怎样的,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7月18日会议的简要报道没有提到加入国民党。斯内夫利特同中国共产党的宗派情绪进行了斗争,因为通过国民党与工人组织的合作,南方的形势对中共特别有利,而广州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希望这样的。斯内夫利特获得了如下的全权委托书:“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收到这一通知后必须立即移驻广州,并在与菲力普^①同志密切联系下进行一切工作。共产国际远东局,1922年7月于莫斯科”;这一通知由维金斯基签署。

斯内夫利特在回到中国后肯定立即尝试把他自己关于统一战线和加入国民党的观点付诸行动。8月初他在杭州西湖召集了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部分地加入国民党并在上海同

① 即斯内夫利特。

孙中山进行谈判的政策，虽然有人表示反对。孙中山在两个月以前又一次不得不逃离广州，这是由于他原来的合作者陈炯明不赞成孙中山的北伐并举行了政变。孙中山处于困境，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因此愿意接受俄国的帮助。不过他对于与中共结成平等的同盟却不感兴趣。他坚持由他的在原则上包揽一切的国民党实行独裁，而他自己在这个党内又是独裁者。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成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并且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帮助实现民族革命，这是另一回事。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孙就曾对居领导地位的或者起这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说过，如果他们想参加革命，他们就必须成为国民党党员。他显然认为他的党是一个大的革命团体，他要把共产党人的小团体纳入其中，以阻止它分裂大的统一体。据说斯内夫利特在同孙中山讨论时也援引了他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经验作为论据。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后不久，就有第一批共产党员于8月在杭州加入了国民党。

在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一位中国代表^①发言谈到加入民族革命政党的必要性，说这是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并且为了使共产党不致孤立。但杰出的共产国际领袖拉狄克却认为必须对中国同志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应当走出自己的书斋，去组织群众并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更好地进行联合。在1923年1月12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斯内夫利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终于正式批准了斯内夫利特所鼓吹的亚洲统一战线的“加入（国民党）形式的变种”。

这是同修改苏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政治纲领同时发生

^① 即刘仁静。——译者注

的。1922年底北京的谈判重新进行时，越飞力求与孙发生接触，以便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1923年1月26日，孙和越飞很出人意外地宣布了一个相当广泛的协定：

1. 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缺乏条件；

2. 俄国准备根据1920年加拉罕声明关于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①

3. 孙同意，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只能根据中俄两国政府的协议进行改组；

4. 苏俄决无意思与目的，在内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②

第一条在俄国关于协定的简要报道中被略去了。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某些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样否定共产主义目标不十分高兴。斯内夫利特同越飞和孙中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可能在这一方面起了中介和推动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多数党员刚刚同社会主义以前的旧思想观点决裂，很刻苦地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在原则上特别喜欢对

① 在1919年7月25日的所谓第一次加拉罕声明中已宣布将中东铁路以及一切煤矿、金矿和森林的租借权交还中国，不要任何补偿。但1920年9月27日的第二次加拉罕宣言已经比较慎重，谈到按照苏俄的需要利用这一铁路。在北京的谈判（1921—1924）中更加不谈单纯的交还了（惠丁《苏维埃政策》148—932页）。斯内夫利特由于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深切同情，因此对苏俄保护自己利益的现实因素很不感兴趣。据说他在自己的中国活动时期结束后仍旧保持这一立场并因此同托洛茨基对立（多伊彻《被放逐的先知》第55页以下）。

② 参看《与越飞联合宣言》，见黄季陆主编《总理全集》上卷《宣言》第40—41页。——译者注

资产阶级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和把工作集中在工人阶级方面，他们对孙中山及其信徒是不信任的。因此尽管斯内夫利特十分努力，仍旧需要花费一些精力和时间，尤其是凭借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压力，才能削弱中共的正统主义思想，使它同意加入国民党。^①

1922年年中，斯内夫利特正在欧洲，中国共产党发表两个对统一战线有利的宣言。在第一个宣言中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封建的”同伙（首先是军阀）的斗争；第二个宣言强调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前的民主革命阶段中，工人应同小资产阶级合作。

宣言认为资产阶级处于这一联盟之外，而且还强调了阶级独立性。宣言表示对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斗争要给予全力支持。

但是仅仅在1923年6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内夫利特才能凭借共产国际的全部势力作为后盾，并依靠以前的对手陈独秀作为采取和解态度的调停人，真正贯彻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其内容是：资产阶级现在领导民族革命，弱小的无产阶级将在这一革命中担任左翼，除一些例外，中国共产党人将一致加入国民党，必须提高国民党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威信。代表大会的出发点是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新指示，这一指示由斯内夫利特提出，包含以下要点：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必须同反对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否定这一中心问题就意味着否认社会经济基础，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实行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结合；领导权当然要由工人阶级的党掌握；共产党员有义务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并把工人组织成工会；中国共产党必须推动国民党进

① 据勃兰特（《斯大林的失败》第31页）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仅仅宣布暂时同斯内夫利特意见一致，他们指望莫斯科能修改或者干脆撤销斯内夫利特的方案。他们还估计，斯内夫利特没有得到具体的委托。

行土地革命，没收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在国民党内必须竭尽全力反对孙中山和军阀（外国资本的代理人 and 苏俄的敌人）联合。

张国焘回忆说，他在斯内夫利特的住宅里从由瞿秋白临时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看到了下列要点：

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二、中国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治批评的自由；

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据张国焘说，斯内夫利特倾向于把后两点放在次要地位，而中国的领导人恰恰想突出这两点。主要由于总书记陈独秀已在某种程度上让步——尽管是很不乐意地——斯内夫利特勉强取得了多数。双方票数相等，但陈的投票算两票。

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认真加以考虑的大会，而斯内夫利特对这一问题是不大感兴趣的。从1922年9月起，中共党员彭湃已开始在军阀陈炯明统治的广东省的比较闭塞的海丰和陆丰地区组织农会。彭湃受到总书记陈独秀和广东省中共领导的支持。但是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主张动员农民，并且象国民党已在广东实行的那样建立以农民为基础的军事政权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彭湃的活动。毛起初支持斯内夫利特的主要对手张国焘，但后来赞成多数派，也就是说，大体上赞成斯内夫利特的纲领。接着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而受到斯内夫利特特别激烈的攻击的张国焘则落选了。似乎也有一些中共党员由于反对这一新的路线而转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而青年团则在一个时期内成了反对派的主要

阵地。由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这一反对派被战胜了，在 1923 年 8 月青年团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青年团表示拥护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由于苏联领袖凭借自己较高的威望施加压力（例如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对陈独秀施加了压力），由于直系将军们在华北用武力镇压了工人运动（1923 年 2 月），以及中共（二百到三百党员）同国民党（十五万党员）相比力量薄弱，还由于估计到组织不健全和混乱的国民党恐怕很难大大限制中共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终于让步了。但是斯内夫利特并未能使中国共产党人同意按照他本来要求的那种程度从属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政治方针的范围内仍旧继续尽一切可能使自己的党作为自主的组织向前发展，并且在工会运动中尽可能独立地开展自己的工作；农民运动的情况也是这样。

1923 年间，俄国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变。尽管它继续谋求同北京的正式政府签订一个条约（后者正是由于自己日趋削弱也许会愿意在事实上承认俄国在亚洲的实力地位），尽管它仍旧企图利用广州、北京、其他军阀和日本彼此之间的对立，但是与孙中山的南方国民党政府的联盟已经在它的政治战略中占优先地位。莫斯科和广州都受到孤立或者威胁，并且被西方抛弃，它们彼此接近了。结果是俄国在军事、政治和其他领域全面提供援助，并派来米哈伊尔·鲍罗廷领导的特别代表团。鲍罗廷是俄国政府和党的代表（但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直到 1927 年他是中国战线上的中心人物。在这一情况下，中国的共产国际政策和斯内夫利特的“加入策略”越来越成为次要因素了。

尽管中国保持弱小和分裂肯定是符合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但孙中山多少年来仍旧力求优先取得它们的支持。1923 年晚春

他还请求美国公使舒尔曼促使英国、美国、法国共同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年的干涉。他提出一个详细的计划，规定由外国对所有省会实行军事占领并大规模任用外国的军事和非军事专家。孙中山认为苏俄、中共和工人运动对他的支持只不过是使他的党、使政府和军队现代化和加强力量的一个辅助手段。他有一切理由假定，万一中共依靠苏俄及其代表的支持对他的方案发生危害，他完全能够成功地对付他们；他甚至不仅深信能够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受他控制，而且相信，能够把他们完全溶化在他的党内。孙的打算比他的盟友的打算实现得更好。当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主要由于俄国的援助而强大起来，足以成功地进行早已向往的北伐，而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大部分开始感到受刚刚被北伐掀起的革命浪潮的严重威胁时，孙中山和鲍罗廷的一个亲信、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蒋介石开始逐步摆脱联盟。在蒋介石的周围聚集了老的和新的有产阶级的代表们，目的在于消灭中国共产党并将作为政治因素的工人运动镇压下去。

不用说，斯内夫利特不能为内部同盟^①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联盟承担直接责任。责任首先在俄国的领导人，当时他们控制着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他们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举行第一次反共政变后，继续不知厌倦地在广州按老办法干下去，甚至在1927年4月的上海血腥镇压和所谓国民党左派（1927年曾在武汉建立正式的国民政府）于1927年倒向蒋介石方面以后，仍然继续执行联合政策。他们压制（尽管有时是犹豫不决地）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运动，而这一运动却

① 指在一个规模较大的、涉及范围较广的运动中进行联合，却不结成正式的、权利平等的组织联盟。

是能使中国共产党抵抗反革命暴力的唯一有效的力量。

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极其消极的过程归根到底是实行联合政策的后果，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一种虚构的假设，认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可以暂时取得一致，这一政策要求共产党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从属于同国家机器和军事机构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运动。这一政治发展固然起初是由 1920 年的列宁提纲引起的，却没有试图实现提纲中包含的前提，而且很快就按照自己的规律自动向前发展，很难后退了。这尤其是因为，它成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因素，归根到底要由苏俄国内和俄共党内的权力配置情况来决定，因此苏联领导人把这称为与他们本国利害攸关的事情，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尽管如此，却不能否认，斯内夫利特在贯彻这一极其危险的联合政策时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这一政策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导致了灾难，后来曾遭到苏联国内的左倾反对派（1926—1927）特别是托洛茨基（1923 年以后斯内夫利特接受了他的影响）的激烈攻击。斯内夫利特显然还记得很清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印尼共产党只是在合并成伊斯兰教联盟以后才获得群众基础的。显然他认为，依靠这一策略可以找到对整个亚洲普遍有效的药方；因此他很不愿意用批判的态度来探讨这一样板固有的局限性，而在印度尼西亚这一局限性早已表现出来了。同样，他对于中国和爪哇的社会情况的基本差别也不能实事求是地估计。在半殖民地中国的东部几省，工业化程度已经不是微不足道的，同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它的阶级矛盾是更加发展的，不仅在资本主义中心如此，在农业内地的重要部分也是如此。上升的资产阶级同大地主的关系日趋密切，它懂得如何保证对军人的支配力量，这个资产阶级发现同自己对立的工人运动已获得就亚洲情况来说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殖民地爪哇的印度尼西亚土著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停滞状态(它的根源在于亚洲的过去)要强烈得多,资产阶级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工人阶层是弱小的,几乎没有组织起来,主要是半无产阶级性的。除此而外,斯内夫利特由于对国民党很热情,看来愿意将组织独立的原则和在工人运动中的直接影响——这两点在印度尼西亚是始终坚持下来的——放到十分次要的地位。无论是他特有的面向群众的倾向,还是他同亚洲的感情联系,在这方面显然都使他上当了。斯内夫利特确实对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小团体有反感,他往往准备为迅速联合成以工人为基础的派别而付出从马克思主义尺度看来高昂的代价。这种态度促使他好几年之久(与另外几个被驱逐的印尼共产党领袖一起)死抱住有可能恢复印度尼西亚的“内部”联合的思想不放,但是当这一联盟还没有在中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它在印尼已经瓦解了。斯内夫利特看不出,印尼共和伊斯兰教联盟的不可挽回的破裂并不能首先归咎于印尼共的缺点,不如说这样的联盟的可能性在客观上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印尼共产党促使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和社会分化日益发展,联盟是注定要瓦解的,尽管同中国比起来,由于伊斯兰教联盟领袖还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因此破裂不那么引人注目和带有戏剧性。

斯内夫利特从印尼活动时期以来对亚洲人民的反帝解放斗争一直热烈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投入了这个运动;因此他往往是透过有色眼镜来看政治形势的,这当然会不时妨碍他采取批判的估价。必须从这一背景来看他对伊斯兰教联盟、对国民党以及对孙中山个人的态度,他大大高估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倾向。他曾不加任何评论地在孙中山的个人报告上批道,他是布尔什维克。

斯内夫利特从中国战线上被排挤出去了。他同维金斯基、片山潜一同成为海参崴的共产国际局的成员,这可以说是伊尔库茨

克的远东局的继续。他的调动标志着他退居次要地位的过程的一个阶段，至迟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他同共产国际政策的距离愈来愈远了。尽管他自己的政策大部分已经实现，但他仍旧为这一事实感到遗憾：共产国际在面向国民党时还没有走得更远。在他看来，进一步承认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甚至在1923年2月7日血腥事件以后仍旧如此，这是应加谴责的；与此相联系的主要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对中国实行的一种大国政策的倾向，也是应加谴责的，他认为中东铁路应当全部交还中国。此外，斯内夫利特认为，共产国际过高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可能性。这一意见应当是首先针对维金斯基的，他是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的后任，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较好，因为他采取外交手腕办事，对中共的独立建设，对中共在工会运动中的独立性，对于在国民党内联合左派来反对右派以促其分化的做法都给以较高的估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即使没有坚决要求撤换斯内夫利特，但肯定已把他们对斯内夫利特的批评提交共产国际了。

与共产国际决裂

在1923年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的俄国的官僚化过程，以及对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斯内夫利特和亨·罗兰·霍斯特已开始对他抱有某种同情——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使斯内夫利特逐渐处于尴尬的境地。1923年底他卸去了在海参崴的职务，但为了中国和印尼的利益仍留在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中任职。在那里他再次企图保全自己作为殖民地问题专家的荣誉；在具体的中国工作部撤销以后，他当然只能为他最熟悉、最关心的地方——印尼效力了。所以，1924年初，他在莫斯科给“东方研究科学协会”作过一个关

于印尼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报告。但是，他再也得不到一个真正的领导职务了。尽管他在对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领导进行公开批评方面抱着十分小心谨慎的态度，但他已经够得上是一个反对派，因此不适合担任这种职务。结论是很明显的：如果他还想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并且想使自己的思想能有用武之地的话，那就必须考虑是否有可能在共产国际内把各国的反对派组织起来。在这方面，他首先想到的是要与德国党内的费舍—马斯洛夫左派的领导人进行联络，因为他们反对俄国党的领导在西欧各国共产党中间的巨大的控制权。

尽管在共产国际中他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他还是有很大的雄心壮志，想在国际范围内充当印尼共产党的顾问。他同印尼的许多领导人一直有联系，尤其是对他于1923年和1924年在莫斯科结识的谭·马拉克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只有通过荷兰才能比较容易地同印尼保持接触，所以，他希望能从荷兰继续指导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他建议在荷兰，首先是同（从印尼）驱逐出来的荷兰共产党人一起为印尼建立一个共产国际支部，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1924年4月，斯内夫利特重新在荷兰定居下来，而且这一次是永远定居下来了。1924年4月12日至15日，他参加了荷兰共产党代表大会。由于荷兰与殖民地的交通频繁，而且由于印尼共产党对印尼的海员有影响，所以从荷兰与印尼联系是很方便的。但是福克总督的政府1922年就切断了斯内夫利特从中国与三宝壟的通信，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的合法联络的机会。他的非法联系要仰仗印尼共的领导人，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新的印尼支部中起主导作用的司马温。这个支部以及它所办的《红色响导报》没有起作用，而且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因为由司马温、斯内夫利特和P.伯格马主编的《红色响导报》是以与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合作为

宗旨的，而印尼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却正在印尼越来越分道扬镳。这份报纸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是很值得怀疑的；几个月之后它就停刊了。由于斯内夫利特和另一些被驱逐出境的人即荷兰共产党中的“德文特派”领导以及印尼共产党人司马温之间的政治和派别对立，印尼的工作搞不下去了。尤其是在1924年初列宁逝世以后，在俄国的党、国家和共产国际内爆发的权力斗争，使得这种情况更加复杂化，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首领企图发展自己同莫斯科的关系。司马温并不代表印尼共产党实际遵循的路线，但他在这种权力角逐中毕竟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基本上消除外国人仍有可能对印尼共施加的影响。这种把与印尼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垄断起来的做法，造成了印尼的运动与外界隔绝的状况，因而从1924年起印尼的运动就逐渐走上了导致1926—1927年起义的冒险道路。造成这种必然走进死胡同、必遭失败的搞法的原因之一是，荷兰领导人退出以后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由于对印尼的社会和历史可能性在理论上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没有受到约束。那些被驱逐出境的人很可能是最早感觉到搞得不对头的，但他们势单力薄，无法进行干涉。此外，他们由于成见和缺乏情报，不可能对统一战线失败的原因以及印尼共的激进的偏向认真地进行分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对印尼问题既毫无兴趣，消息又不灵通，他们照例满足于印尼共在欧洲的领导人所提供的万事大吉的情报。即使他们进行纠正，其执行情况如何也无从掌握。

斯内夫利特陷入了只能扮演一个忧心忡忡而又毫无办法的旁观者的境地。尽管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亚洲问题专家罗易，在最后的时刻惊惶失措，于1926年6月11日征求斯内夫利特的意见，但事实上为时已晚，已无法阻止事件的进程。而且当时斯内夫利特已经向反对派方面走得很远，很快就要与共产国际决裂了。斯

内夫利特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生涯，在形式上几乎与印尼共的悲剧式的起义(1926—1927)一起结束了。不过他对亚洲的殖民地革命的兴趣仍然保持着，对印尼的兴趣尤其巨大。他所能影响的一切组织和报刊都很注意印尼的情况，并且为印尼的受到迫害的运动进行宣传，尤其是对“七省号”起义^①给予了支持并且对政府提出了抗议。在印尼共的一些领导人被流放到迪古尔去之后，他还设法同马尔科以及印尼共的其他一些老的知名人士保持联系并且给以支持。

尽管他对殖民地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但他只能用自己有限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亚洲问题。1924年4月1日，他被彻底解除了在共产国际中担任的职务，这就使得他只能从事荷兰的运动了。自从他在荷兰暂时逗留(1919—1920)以来，虽然左派营垒中的情况并非在一切方面都发展得很顺利，不过他还是能有所作为的……

(华一彦译)

^① 1933年2月25日，“七省号”巡洋舰在沙璜码头举行起义，在驶往泗水途中遭到荷兰殖民政府的轰炸。见印尼共历史研究所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四十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0页。——译者注

保尔·拉法格和他对 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

[法]克洛德·维拉尔

今天，在法国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中，保尔·拉法格显得有点默默无闻；^① 他的形象往往被丑化，被歪曲。尤其那些信奉和仰慕若尔日·索列尔的人，只要一谈到拉法格，无不指责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荒诞不经”，他的态度是如何“轻率和自以为是”，似乎拉法格只是一个喜好标新立异的浅薄文人，甚至是马克思的低级和庸俗的推崇者，他“只是把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了法国，这是他作为女婿起码应该办到的事情”。^②

当拉法格逝世时，他在法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层内（包括原来的盖得派在内），似乎并不享有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声名。当时发表的悼念文章、回忆和演说——无论盖得、饶勒斯、白拉克、迪布勒伊或多尔英瓦——，都只强调拉法格雄辩和论战的才能，他的青春活

①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巴黎没有一条街道以拉法格命名（但有让·饶勒斯大街、爱德华·瓦扬大街、盖得街等等）。在被称为“红色地带”的巴黎周围三个省（上塞纳、塞纳和瓦尔德马恩）的一百一十七个市镇中，有九十二条街道以让·饶勒斯命名，三十二条街道以盖得命名，而拉法格街只有十七条。此外，至今没有人为拉法格撰写传记，这也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征象。

② 见麦克·依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发端（1880—1897年）》。

力和一往无前的冲劲^①……

然而在国外，在第二国际的其他党内，拉法格具有很高的威望，他被认为是法国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在获悉拉法格去世时致电说：“拉法格的逝世使科学社会主义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学者和战士”。^②列宁在拉法格的墓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悼词：“早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俄国的觉悟工人和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就体会到，要深深地尊敬拉法格，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③

同盖得、饶勒斯、索列尔和瓦扬相比，保尔·拉法格也许可算是始终如一地努力运用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方法，创造性地来解决政治、哲学、宗教、伦理、美学等各种意识形态问题的唯一理论家。诚然，由于他过于教条或为了标新立异，由于他一时心血来潮或为了想出风头，拉法格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敢于思索和大胆创新。这种勇气难道不正是十分可贵的吗？

一 拉法格的思想演变

透过拉法格的毕生事业，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什么是这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本文篇幅有限，对于这个涉及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我们只能把它提出来，而不打算去解决它。

大家都知道，拉法格政治思想历程曾有几个重要阶段。早在

① 《人道报》1911年11月28日和12月4日，《社会主义者》1911年12月3日和10日。

② 《人道报》1911年11月28日。

③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页。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是一位拥护共和制的年轻大学生，由于攻读医学而走上了实证主义的道路，并在斗争的熔炉中发现了蒲鲁东主义。^①随后，拉法格流亡伦敦，自1865年起成了卡尔·马克思家里的常客；在马克思的影响和感染下，他很快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在第一国际中的活动（特别是作为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负责人），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交往，以及他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都使拉法格经受了锻炼和逐渐成熟起来。1882年4月，当他在法国定居时，他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具有最广泛和最深刻的认识的人。

在他身上还遗留多少蒲鲁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残余影响？卡尔·马克思斥责其女婿们的那句名言（“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②），至少就拉法格而言，究竟是由于拉法格为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作了辩护而激起马克思的一时气愤，或是它表明马克思对拉法格未能消除无政府主义影响而长期感到恼怒？拉法格在晚年对古斯塔夫·爱尔威以及其他爱尔威主义者采取了谅解的立场，而盖得派对爱尔威却厉声谴责；对此，我们应该作何解释？爱尔威断言，拉法格所以采取这个立场，因为他是一名“混杂在盖得派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事情是否果真如此？或者，这是因为拉法格没有象正在衰老中的盖得主义那样僵化，敢于断然赞同群众的政治罢工，并起而反对统一社会党向迷信选举的方向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并使拉法格深受教益的启蒙哲学，对于拉法格学习马克思主义究竟提供了多大的方便和造成了

① 参见拉法格1866年4月22日在《左岸》杂志发表的文章。

② 马克思1882年1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07页。

多大的障碍？简单说来，我们一方面可以指出唯物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还有某种机械论和卢梭关于“原始状态的人”的神话。

保尔·拉法格喜欢自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派的共产主义者”。^①他在同“导师们”的个人交往中以及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究竟接受和学到了什么？拉法格在他的《忆马克思》一文中，回顾了他和马克思一起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的晚间散步，就在沿着草地散步的时候，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经济学的知识，“也许他自己也不觉得就把《资本论》第一章的全部内容，随着他当时写的情节，一步一步地解释给我听了。每一次回到家里，我就尽我的能力把我刚才所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最初我追随马克思那深湛浩繁的思想进程非常困难。可惜我把这些珍贵的札记都丢掉了。因为在巴黎公社以后，我存在巴黎和波尔多的文件都被警察抢去烧毁了。我特别惋惜的是有一天晚上所作的笔记也丢失了。在这天晚上，马克思以他所特有的那种丰富的旁证博引和见解向我讲解了他那人类社会发展的辉煌理论。就象在我眼前揭开了一道帷幕一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把握住了世界历史的逻辑，并且能够找到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表面上如此矛盾的现象的共同的物质原因。这一切使我非常惊讶”。^②马克思去世后，拉法格从恩格斯给予的大量帮助、建议和批评中得益非浅。恩格斯说：“如果说我对他要求严格，那只是因为我认为这对他有好处，因为不时地给予一些严肃批评，他就会有显著的进步。”^③

如同盖得派的其他领袖一样，不懂德语是拉法格的一个障碍，

① 见拉法格的《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4页。

③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55页。

而他又不作认真的努力去加以克服。^①可是,用法文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十分有限;直到1895年,法国读者才读到《资本论》第一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由拉法格从《反杜林论》中摘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共产党宣言》(1895年出版)、《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这几部书。^②

语言的困难以及经济知识的欠缺说明了拉法格、盖得和杰维尔这三位党的“理论家”在《资本论》第二卷问世时何以表示出如此强烈的仰慕和惊讶,拉法格写道:我们“手捧着这部……令人肃然起敬的巨著,就象猴子把核桃捧在手里掂来掂去,不知怎样打开一样。我们打开书,一页又一页地翻阅这本奥妙无穷的著作。书中代数公式那么多,我们都惊叹不已。这些公式在我们看来都是神秘的符号。您原来预告的是有一百五十页公式,现在大概有三百页之多哩!幸好在这本使我们茫然若失的书里,间或可以碰到一些法语引文。”^③恩格斯曾告诫拉法格:“请尽量准确地表达原文。马克思这样的著作,草率地翻译是不行的”;^④六个月以后,恩格斯又说:“我坚决认为,您应该……从头至尾精心重读《资本论》。”^⑤

从1882年起,拉法格的生活或多或少地与由他和盖得共同领导的工人党结合在一起。那么,拉法格的演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和反映了法国工人党的政治思想演变?我们下面简单地来回顾一下这个演变的主要阶段。

① 恩格斯为此感到恼火,他说:“如果他现在还不开始认真学德文,那我真要把他看成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子了。”同上,第196页。

② 此外,《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曾分别于1885年和1887年在《社会主义者》发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早已脱销,于1896年才重版。

③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1卷第385页。

④ 同上,第257页。

⑤ 同上,第307页。

直到1889年，工人党还只是一个集中了几百名传播救世福音的布道士的小宗派。1890至1893年间，宗派逐渐转变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政党。在1893至1899年工人党的鼎盛时期，盖得派的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和口号日趋淡薄，而代之以选举的和议会的改良主义；它的爱国主义立场有时与沙文主义简直不相上下。在造成这一变化的许多因素中，值得指出的是工人党在理论上的游移不定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领会不深。工人党一般只是迫于环境才考虑理论问题，例如为了回答社会主义敌人的攻击和污蔑，或者根据比较复杂的斗争行动的需要。除去拉法格一人例外，盖得派全都不喜欢研究理论，因而很容易犯实用主义的错误。他们很少把马克思主义用作思考和研究的工具，他们对辩证法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不去分析法国和当时的特殊条件；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万能公式，甚至几句具有魔力的咒语。

自1899至1905年，法国工人党力图重新掌握对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但未能成功。工人党开始纠正过去在政治和理论方面所犯的错误，但此时的行动已经晚了，而且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始终缺乏深刻的理解，甚至连教条主义的领会也谈不上，因而得不到广大社会主义群众和同情者的支持。社会主义运动终于在1905年实现了统一，而盖得派没有能够成为这个统一的核心。盖得派在统一社会党内虽然仍作为一个派别而勉强存在，但它的思想越来越僵化了。然而，拉法格在1905年后依旧保持他的青春活力；他没有同盖得派的同志公开破裂，却在盖得派内采取了独特的立场。盖得的一个忠实门生以蔑视的口吻说，拉法格尽可能地站在一边，“耕种他的菜园去了”。^①

^① 见沙尔·博尼埃1911年12月3日致盖得的信。

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关于保尔·拉法格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我们将分别研究他如何分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如何批判资产阶级道德和宗教，以及他的社会革命观。

在保尔·拉法格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虽然在数量上占着主导地位，但除了个别例外，拉法格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并没有作出独特的、创造性的贡献。拉法格主要只是普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论点，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论点。

拉法格在1880年指出：“马克思把解释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建立在一个不容辩驳的基础上，资本的利润仅仅是不付报酬的劳动而已……剩余价值既不由机器也不由原料所产生。产生剩余价值的原因不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这个谜是官方的经济学家们怎么也捉摸不透的。工人的劳动力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商品，它在消耗自身的同时，能够产生出一种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①拉法格在他的《资本的宗教》最出色的一段文章里对这条规律作了以下的表述：“资本家在摧残和损毁雇佣工人时，也挤干他们的肌肉的和神经的劳动。而当被挤干的、精疲力竭的雇佣工人在他的挤压之下不再能提供形成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的时候，资本家就会把他们象厨房的废物和垃圾一样扔在街上。”^②

随后，针对“资产阶级经济主义者”或“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拉法格曾一再维护和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然而，

① 见拉法格1880年4月10日在《社会主义评论》发表的文章：《工人信贷和工业信贷》。

② 《宗教和资本》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103页。

他没有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主义内在环节——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资本积累过程等——的描述。无论如何，在盖得派中间，拉法格毕竟是唯一对价值理论作出了个人“贡献”的人，尽管这种贡献是微薄的。他的《交易所的经济职能》一文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片断札记，力图证明“交易所使所有资本回到平均利率或平均利润率水平”，“同等数量的资本可取得由整个社会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整除部分”。

作为马克思的好学生，拉法格强调侵蚀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特殊的和基本的矛盾：“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讲，在共产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与个人占有方式之间，有着二律背反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反题。正由于这个反题的存在，才有了痛苦和贫困，社会必将走向危机，从而解决这个反题。”^①

这个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逻辑和无政府状态”。^②“为以往各个时代所未有过的产品丰富和极度丰富，其后果本应为全体劳动者创造福利，现在却相反造成了他们的贫困。当商店里充斥着商品的时候，失业在社会上便立足生根，饥饿便闯入工人家里；人们因为生产得太多而饿死。”^③

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形式之间的根本矛盾，自然地表现为社会的一极——资本家——的财富积聚和“无产者的必然贫困”。这里，虽然拉法格把拉萨尔提出的“铁的工资规律”当作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摒弃，“盖得却错误地把它介绍到法国，也没有事先检验它是否真有科学的价值”。^④拉法格坚持了马

① 见《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

② 《财产及其起源》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165页。

③ 见《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

④ 参看拉法格1899年1月29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

克思关于工资的定义,认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但他没有把批判和分析深入进行下去。他同其他盖得分子一样,对实际工资、劳动力价值和需求的演变一概不予研究。可是,在二十世纪初,他注意到雇主采用的奖金制这个新的工资政策是进行剥削的一种新形式,是“慈善地从劳动者身上窃取剩余劳动的一种更加完善的手段”。^①

随着资本的急剧集中,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日趋深化。拉法格1903年发表的《美国托拉斯》无疑丰富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他在该书前言中强调指出,托拉斯体系的出现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的历史现象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最近四十年来发生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现象都退居第二位了”。^②拉法格阐述了竞争怎样辩证地自己消灭了自己;他说,“过去被称作至高无上的女王……资本主义生产、贸易和道德的条件”的竞争,通过自身的运动,“在促进资本集中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工业组织的托拉斯化”。^③他肯定了金融资本所起的推动作用,这个“强大的吸压泵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的各条渠道中去”。^④“托拉斯制之所以能够组织和扩展自己的大企业,是因为它们拥有雄厚的资本。这就是说,托拉斯必须以资本的高度集中为前提,因为这种集中是托拉斯化企业存在的必备条件。显然,托拉斯体系必须通过银行的统一组织将工业联成整体……银行和工业相结合是经济发展的必需”。^⑤

大垄断企业的存在不但不能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却只能促使危机的“扩大”和“加剧”。只要生产的目的依然是利润,危机将始终存在。尽管托拉斯进行了调节生产的尝

① 参看拉法格1902年11月9日至16日在《社会主义者》所写的文章:《奖金》。

②③④⑤ 均见《美国托拉斯》。

试，它们也逃脱不了独立工业企业的同样命运：“由于企业设备占去了巨额资本……它们不能不继续生产，而不考虑市场上商品已经过多”。更有甚者，托拉斯把它们巨额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于扩大和改善企业设备，从而造成了“生产资料的过剩”。^①

然而，托拉斯的设计者“不知不觉地和不由自主地做了件革命的事情”。首先，他们为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关于财富集中、中间阶级（即小资产阶级）日益消亡以及资本主义各国广大群众日趋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明。托拉斯制为未来的社会革命准备了人的条件：“在竞争中遭到破产而变穷了的工业家便和陷入托拉斯体系罗网的商人们一起形成一个人数日益扩大的不满阶层，他们叫嚷说，必须制定取缔托拉斯的法令。”^②此外，农民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而使“乡村局势不稳”。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损害，托拉斯的统治使罢工更难进行，这对雇佣劳动者是个更加沉重的压迫。与此同时，托拉斯比股份公司使所有权更加丧失个人的性质，“从而明显地证明了作为财产主人的资本家是毫无用处的，把资本家阶级的寄生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③拉法格由此得出结论说：“托拉斯体系不仅给工人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而且使这种不满情绪有了明确的方向；它明确地给工人们指出了他们应该努力追求的革命目标。”^④

总之，在所有的盖得分子中，唯有拉法格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研究、阐述和说明，他的《交易所的经济职能》和《美国托拉斯》两部著作，特别是后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算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前的具有独创性的论文。

①②③④ 均见《美国托拉斯》。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拉法格很少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研究法国经济的特殊条件和变化、法国资本主义结构及其环境的演变等问题。因而,他同其他盖得分子一样,对资本主义及其灭亡的认识过于简单和抽象。

三 资产阶级国家

“资产阶级国家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一台结构精密的机器。”^①拉法格多次揭示了国家的这一阶级性质,并致力于具体地研究法国的国家,这和他的经济分析恰好背道而驰。

首先,法国的大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他们怎样才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和把议会共和国据为己有?他们使用着各种不同的和互为补充的手段:“金融家 and 他们的傀儡充斥议会;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象路特希尔德这样的人,他们认为担任议员的职务有辱自己的身分;他们宁愿让自己的奴仆去当大臣。”^②此外,金融家们大肆营私舞弊,其低劣的形式有“巴拿马运河事件”所暴露的种种丑闻,而其最巧妙的形式则是给予议员以“荣誉地位和高额俸禄”。因此,众议员和参议员们成为“由人幕后操纵的傀儡”。^③除开“对国家的这种直接影响”以外,金融家“操纵交易所的市价,这在眼下是政治的晴雨表;他们利用收买的报纸来影响社会舆论”。拉法格由此得出结论说:“金融的强力并不依赖于政权的形式。”^④

大资产阶级用由他控制的国家为自己谋利。国家是使大资产

① 拉法格 1888 年 1 月 14 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什么是法国大革命》。

② 《财产及其起源》第 166 页。

③ 拉法格 1891 年 10 月 31 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金融家》。

④ 《财产及其起源》第 166—167 页。

阶级得以对其他公民敲榨勒索的工具。^① 国家置于“有产阶级的手中”，它的治理和立法只“根据有产阶级的利益”。^② 它维护阶级的税收制，^③ 它的关税政策以资产阶级是否能从中谋利（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为转移，它用武力为资产阶级在非洲和亚洲“打开广阔的剥削场所和盗窃场所”。^④ “国家的主要使命是保卫有产阶级的财产和保护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⑤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首要部件：“现代的军队无非是警察部队，它以维持秩序和保卫劳动自由等荒唐的理由为借口，被资本家用于奴役工人阶级”。^⑥ 其次是警察：“巡警和密探是资本主义进步的最可靠的征象”。^⑦ 最后，“司法机关以及附属于它的法官、狱卒、刽子手、监狱、流放所和断头台，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资本家的生命和财产；它让雇主平安无事地用专横的罚款窃取工人的工资，平安无事地制造工人的伤亡事故”。^⑧

因此，在法国，“议会制是资本家实行社会专政的政治形式，自由主义则是掩盖这个粗暴统治的假面具”。^⑨ 1908年，拉法格在统一社会党图卢兹代表大会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指出：“议会制是适用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它把国家的财产收入、武装力量、司法力量和政治力量统统交到资本家阶级的手里。”^⑩

① 拉法格 1891 年 2 月 18 日和 11 月 7 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法兰西银行》和《再论金融家》。

② 见《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

③ 见《保尔·拉法格对〈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的解说》。

④ 拉法格 1882 年 8 月 5 日在《公民报》发表的文章：《三位爱国者》。

⑤ 拉法格 1891 年 2 月 25 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公用事业》。

⑥ 拉法格 1891 年 5 月 13 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一年》。

⑦ 拉法格 1891 年 2 月 25 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公用事业》。

⑧ 拉法格 1891 年 3 月 18 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再论公用事业》。

⑨ 见《社会主义与夺取公共权力》。

⑩ 见图卢兹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

面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形式，社会主义者应采取什么态度？

在工人党的幼年时期，拉法格同这个宗派中的伙伴们一样，对于议会、竞选和改良表示极大的鄙视。为此，恩格斯嘲笑说，拉法格“现在可以安静地同盖得讨论革命的机会了”。^①在1890至1893年的转折时期里，拉法格发现，“普选现在已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因为工人们开始学会如何使用它了”；^②他并且希望，“再过几年以后，工人党将合法地、和平地执掌公共权力”。^③在1893年的立法选举后，拉法格认为，最后的冲刺已经开始，在即将到来的省议会选举中，“我们将接近最后的胜利”。^④米勒兰危机期间，拉法格积极从事法国工人党克服过去的理论错误和恢复革命立场的工作，这在他写的《社会主义与夺取公共权力》（1899年出版）这本小册子中看得尤其清楚。从那时起，他重又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完全徒具形式：“雇佣劳动者所能享有的唯一自由……将是饿死的自由……干活干得精疲力尽的自由。”^⑤在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了统一后，拉法格在图卢兹全国代表大会上赞同以下的观点：“人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将能使集体所有制渗透到个人所有制中去”；与此同时，他摒弃“那种认为改革只是弥补现社会的缺陷以延续其生存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我的朋友和我公开宣布，改革不是医治一切社会病痛的万应灵药。我们坚信，即使对工人阶级最有用和最有益的改革也不能使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勉强生活下

①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1卷第205页。当时，拉法格和盖得均被关押在圣伯拉惹监狱。

② 拉法格1892年10月14日致盖得的信。

③ 拉法格1892年9月11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

④ 拉法格1893年9月21日致考茨基的信。

⑤ 拉法格1901年2月17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资产者的胡说八道》。

去。”^①

四 对资产阶级道德和宗教的批判

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不是国家，而是道德和宗教。

拉法格在其全部著述中，以尖锐泼辣的笔锋，摧毁着资产阶级最基本的伦理道德。针对那些认为道德和观念脱离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而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拉法格竭力证明，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

早在1880年，拉法格就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号召：“我们满怀热情，轻装前进，向着磨盘般地压在工人身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开战。我们的主人资产者，这些拉伯雷和狄德罗的不肖子孙，他们向我们宣扬克制。根据他们的资本主义道德——这是对宗教道德的可悲的模仿——，一切有血性的人都要受到谴责。他们的理想是要把生产者改造成为不断地提供劳动的机器。让我们高举起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旗，让我们向资本主义制度和基督教的所有伪君子们宣告：人间将不再是工人阶级痛哭流涕的世界……朋友们，勇敢呀！我们要向资本主义的道德和社会理论发动攻击。让我们的批判摧垮资产阶级的成见，使我们的革命行动把资产阶级所有制彻底推翻。开战！开战！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长期的，时间是紧迫的！”^②

从那时起直到去世为止，保尔·拉法格坚持不懈地向着各种“形而上学的蠢人”以及资产阶级的神和半神猛烈开战。

① 见图卢兹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② 拉法格1880年6月23日在向《平等报》同事们赠送《出版自由权》一书时的题词。

在法国大革命后,胜利的资产阶级“把理性所带给旧的上帝身上的缺口修补起来,并且恢复它先前的权利。但是,由于失掉了对上帝的万能的信念,他们就在它的周围安设下一个完整的半神的参谋部:进步、正义、自由、文明、人道、祖国等等,——指望靠它来担负领导摆脱了贵族羁绊的民族命运”。^①

资产阶级的世俗神甫们(哲学家、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断言,进步神“引导人类发展和完善”。实际上,进步神把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引向肉体退化和精神堕落。^②

资产阶级“用文明的美名来装饰自己的社会制度,用人道的美名来装饰自己对待活人的方法。只是为了用文明的精神启迪半开化的民族……他们才从事殖民地的远征。而他们的文明和人道却表现在用基督教去愚弄的形态之下,采取了酒精毒害,掠夺和残杀土人的形式……他们也在本国拿这些文明和人道的美德大量施用于工人阶级。在这里作为资产阶级文明和人道的尺度是大批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失去财产,注定日夜做苦工,注定遭受周期性的失业,死于酒精和肺病”。^③

“正义女神允许和批准企业主抢劫工人阶级,这种抢劫是在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名义之下进行的。”^④

“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对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个女神充满了如此之高的热爱,以致他们甚至把她们的极幸福的名字也刻在监狱和流放所的大门上。他们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

① 《思想起源论》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11页。

② 参看《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载于《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44页。

③ 《思想起源论》第18页。

④ 见《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载于《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46页。

由、平等和博爱在监狱外和在监狱里一样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流放所。”^①

最后，“祖国女神有着妓女的反常嗜好，——她只向那些打她、抢她和背弃她的人拥抱和施与自己的抚爱”。^②

“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向雇佣劳动者宣扬勤劳和克制，学究地断言财产是劳动的合法所得，假如没有了富人，穷人也将死去。”^③资产阶级用崇高和美妙的言辞掩饰他们的剥削：“大量偷窃之后又归还一丁点儿，这就是慈善事业。合作社就是强迫工人参加资本家的财富的创造。共同参与利润就是对劳动果实中狮子的部分的侵占。”^④

宗教赶紧跑来救援道德；它教育工人要俯首听命，要忍受人间的一切苦难，以期待天国的享乐。因此，基督教的伪善是阻止下等阶级追求贪欲的最好的道德手段。

五 革命救世主思想

针对“资本主义万古长青”的种种颂歌，盖得派和拉法格一再宣告资产阶级社会必定灭亡，甚至在短期内必然灭亡。

拉法格从互为联系的三方面来阐述他的论据。

首先是从历史方面。拉法格的历史观主要受了维科的影响，而不是马克思的影响。在他看来，各社会和各民族都沿着相同的历史道路前进，经过相同的历史阶段（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封建主

① 见《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载于《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45页。

② 同上，第46页。

③ 见《出版自由权》。

④ 《宗教和资本》第105页。

义，再到资产阶级社会，然后回到共产主义)。拉法格从这种螺旋形的循环上升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说：“我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我们相信经济现象的发展命定地趋向于共产主义的复归”；^①他这里援引马克思的名字完全是文不对题的。

第二方面的论据比较坚实：“经济现象的发展”。拉法格认为：“共产主义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经济生活的深处。”^②

最后，资本主义“创造、结合、组织”了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将结束资本主义的僭夺并将集中起来的生产手段所已采用的共产主义的形式推广于全社会”；^③大工业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并把它集中起来，从而便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大工业使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以前的工具，听凭资本家窃取他们的劳动力，这就为无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宣传家所带给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④作了准备。因此，“推翻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人将不是来自欧洲的外部；他们就在我们工矿城市之中；正是资产阶级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⑤

拉法格一再赞扬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将解放全人类这个历史作用。早在1880年，拉法格就注意到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主人们的叫嚣和下流文人的附和都吓不到他们。无产阶级的意志必定实现，因为它人数众多，掌握科学的真理，它不怕牺牲去实现自己的理想”。^⑥

① 见《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

② 《财产及其起源》第177页。

③ 同上，第172页。

④ 同上。

⑤ 拉法格1886年4月7日在贝尔维尔的演说，刊载于4月9日《人民之声报》。

⑥ 拉法格1880年5月20日在《社会主义评论》发表的文章，《工人党所主张的农业信贷》。

拉法格和其他盖得分子一样，认为革命是命定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个人和阶级的作用都微乎其微。在《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这部小开本集子的头八页，命定的形容词和副词竟反复出现了五次之多！

由于对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情况看得过于严重，加上十九世纪的法国革命曾轻而易举地推翻了现制度，盖得派产生了自发主义倾向和革命救世主思想。他们既不研究如何获得革命胜利的手段，又不深入钻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这个无比复杂的问题。

拉法格著作中最有创见的部分——即他在当时的知识条件下以拓荒者身分出现的那部分著作——，一方面是他的战斗的文学评论，另一方面是他对比较神话学的研究。

拉法格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方面，主要是以一个出色、热情、尖锐的论战家和普及工作者出现的。他的创造性贡献表现为对托拉斯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

盖得分子——其中首先是拉法格——虽然有他们的局限性和犯有一些错误（鉴于他们的时代和战斗环境，这些错误大部分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为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革命的前景，并培育了阶级政党的萌芽，即法国近代的第一个工人政党。

译自《当代马克思主义史》1977年法国联合出版社版第3卷第183—199页。

（公直译）

第二帝国末年的工人活动家 欧仁·瓦尔兰(摘录)

[法]让·布吕阿

本文将阐述 1868 年 8 月至 1870 年 5 月瓦尔兰个人的历史，同时也介绍这个时期的法国工人运动。我们透过瓦尔兰在这期间的种种活动，将充分地看到他的工人活动家的本色。

帝国的危机终于开始了。1866 和 1867 年是严酷的两年。拿破仑第三远征墨西哥的冒险惨遭失败。1866 年普鲁士在对奥战争中获胜，使帝国深感不安。1867 年，经济危机袭击法国，造成了工资下降和小麦价格上涨等严重社会后果。一场社会动乱在酝酿着。为了度过危机和安抚工人，雇主们想方设法改善经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他们主动提出让大理石工人分享红利，但这一建议却遭到工人的拒绝。瓦尔兰写道：“工人们做得对……近来，资产者先生们把分享红利当作万应灵药，似乎这是消除劳动与资本间展开的伟大斗争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①如同雇主们的小恩小惠一样，社会恺撒主义力图控制工人互助团结的计划也遭搁浅。“把穷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由自己的头头用纪律来约束他们，使他们只能对主人俯首听命；利用他们自己的财力，再加上从

① 《马赛曲报》1869 年 12 月 31 日。

纳税人身上刮来的钱作补贴，使他们对主人感恩戴德，不致因过分的贫困而成为国家的危险；这是帝国用以笼络穷苦和无知大众的手段”。^①

到了1868年，帝国不得不稍作让步。从此，议员们有权向政府提出质询，但政府始终不对立法团负责。由于取消了事先的审批手续，报刊制度有所松动，但保证金和印花税“继续阻挡我们的去路，并对我们厉声断喝：穷人们闭嘴”。^②从此，公众集会未经准许即可举行，但不得议论宗教和政治问题。在工资问题上，原来规定唯雇主之言为信的1781年民法条款被取消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尚未被承认，但自1868年起，政府已容忍其存在。“我们所有的团体（工会——布吕阿注）都是非法的，它们只是由于当局的容忍而得以存在，但这种容忍已成为习惯和常例，当局再想反悔也不可能了”。^③

反对派并不因这些让步就偃旗息鼓，工人运动在继续壮大。1868年10月至1870年4月是第一国际的鼎盛时期。在1869年一年，共发生七十二起罢工，参加人数达四万零六百人，波及圣艾蒂安、菲尔米尼、埃尔伯夫、奥顿、卡尔莫、马赛、格列诺布尔、里昂、巴黎及其他各地。卷入罢工的不仅有修鞋、毛纺、制革、制帽、制鞋等传统的手工业，而且包括冶金、采矿、丝织（里昂的织工）等大工业。冲突的增加证明了“劳资斗争正日益加剧……那些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家责备国际煽动罢工和制造混乱！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不是国际制造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战争，而是这一战争的需要才使国际得以创立”。^④在1870年的头几个月，罢工运动迅猛高

① 《马赛曲报》1870年1月20日。

② 《贸易报》1869年6月20日。

③ 致里沙尔的信，1869年6月20日。

④ 《国际报》1869年5月7日。

涨，席卷克列索、里昂、巴黎等城市以及伊泽尔和亚尔萨斯等地区。据统计，自1月至7月，共发生罢工一百一十六起，罢工参加者达八万五千二百三十二人。里昂高等检察院的检察长1870年4月指出，这一空前情形“表明工人已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具有出色的组织性”。瓦尔兰的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瓦尔兰是个性格温和、善于自制的人，他沉默寡言，极其腼腆，甚至有点羞怯。但他为工人阶级服务则满腔热情，不知其他。“到了专横和罪恶被消灭，自由和正义普照大地的那天，我就不再是革命者了。在此以前，请您相信，专制制度越是要打击我，我就越要起来反抗，我对专制制度也更加危险”。^① 瓦尔兰衣着朴素而又整洁，他讨厌马虎落拓的作风。他善于演讲，但并不玩弄辞令。经常听他演说的欧仁·法叶说，瓦尔兰讲话“简洁而又明确”。瓦尔兰的朋友克莱芒斯——和他一样是装订工人——曾谈到，他的声音“深厚而低沉”，“说话缓慢和沉着有力”。他经常应邀主持工人集会，但从不滥用这一职务赋予他的权威。每当会议陷入混乱或不必要地拖长时，他能巧妙地抓住要点，提纲挈领地对讨论作出总结。这些集会推动了工人觉悟水平的提高。“八个月的公众集会使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积极主张改良的大多数工人都是拥护共产主义的。如同在1848年六月事件后不久一样，共产主义的口号今天激起了整个保守派阵营的强烈仇恨。波拿巴派、奥尔良派、教士和自由派无不异口同声地怒骂共产主义是奸贼、乱党和祸害”。^②

瓦尔兰密切关注罢工运动。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对罢工的声

① 致奥布里的信，1870年3月8日。

② 《平等报》，1869年3月30日。

援。从 1865 年起，各行业工会建立了一个联合储蓄会。“凡加入储蓄会的各行业工会在其会员的会费中每周提取五生丁作为互助金，这一款项不作它用，专门用于帮助罢工工人。”^① 由于罢工的次数增多和时间拖长，储蓄会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互助毕竟是有了一定限度的。为此，瓦尔兰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劝告：“募捐是应该采用的一个手段，但决不可滥用。”^② 如果罢工次数太多，储蓄会怎么能负担得起？他劝说卢昂市索特维尔区的棉纺工人“首先应该相互支援，以便在斗争全面展开后，再取得其他地区工人兄弟的支持”。^③ 每次罢工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对所有罢工全都适用的方法。有时应该把冲突全面铺开，有时则相反反应表现耐心。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力量对比。例如，1869 年秋，由于巴黎制革工人的罢工使雇主受到了重大的损失，皮革业雇主公会会员便互相声援，对遭受损失的那几名雇主给予补贴。瓦尔兰写道：“看来，组成全国工商联会的各雇主公会甚至有可能串通一起，让工人团体通过几次无休止的罢工把储蓄金消耗殆尽，从而把工人团体彻底搞垮。”^④

瓦尔兰始终重视工人的日常斗争，“尽管我们经常受到某些革命者的攻击，他们指责我们过于注意细小问题，却看不到整个制度都应该改变”。^⑤ 对于工资问题，瓦尔兰自然不是漠不关心的，但他认为缩短工作时间比提高工资更加重要。他坚信恶性循环的理论，认为提高工资势必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涨。他写道：“今天，罢工只是

① 致里沙尔的信，1870 年 2 月 19 日。

② 致奥布里的信，1869 年 1 月 8 日。

③ 同上。

④ 致奥布里的信，1869 年 11 月 16 日。

⑤ 《马赛曲报》1870 年 1 月 20 日。

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的努力似乎就在这循环中转个不停。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以应付由投机造成的物价上涨。投机者为对付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再一次抬高产品的价格，如此循环不已……”。^①相反，缩短劳动时间可以使工人有时间学习，思考他们受剥削的深刻原因和加强他们的组织。此外，罢工能促使“工人组织起来和互相声援”。通过罢工，工人可以表达更加普遍的要求。“人民渴望对产品实行更公正的分配；人民要求共享为少数人独占的利益……总之，必须解决社会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必须组织起来……”。

瓦尔兰指出，组织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武器。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同马克思的结论是一致的：“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②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话，瓦尔兰当然是知道的，因为它记载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上。

1869年春，随着危机的加深和工会的发展，瓦尔兰及其伙伴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工人活动家应在什么条件下参加反对派的活动，以及各工会“联合”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政治问题虽然是个经常性问题，但它在选举期间显得特别尖锐。大选将在1869年5—6月间举行，瓦尔兰认为工人不能袖手旁观。他于1869年1月8日写信给奥布里说：“我愉快地获悉，您决定作为工人候选人参加竞选（在卢昂——布吕阿注）。里昂也有同样的想法。马赛已来信向我们了解情况。我希望大家不久能就此问题协商一致；尽管顽固的蒲鲁东分子会弃权，我们将和形形色

① 《劳动报》1869年10月31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

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选举中较量一番，以表明人民与资产阶级已分道扬镳。”经过讨论，终于决定提出工人候选人单独参加竞选。实际上，参加竞选的工人候选人很少，在巴黎只有布里昂森一人，他是首都群众集会中最受欢迎的演说者之一。瓦尔兰撤回了竞选提名，但他在《致 1869 年的选民》上签了名。这份号召书提出的纲领值得重视，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宣布了未来的巴黎公社所执行的政策：废除常备军、武装全体公民；实行政教分离；官吏由选举产生；建立陪审团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由国家负责对所有人实行义务的、全面的世俗教育，学生上学期间发放伙食津贴，废除学衔特权；保障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保障公职人员独立行使职权的自由；实行累进税和取消所有的间接税；金融公司一概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把它们改造为银行、船舶、铁路、运输、保险、矿山等公益事业；禁止对地方利益的任何侵犯，市镇、省区和殖民地由当地自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管理。国际总委员会 1869 年 5 月 4 日会议宣布，这个纲领是建立在国际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选举是反对派的一大胜利，他们所得的选票占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而在 1867 年则只占百分之十九。在大城市，特别在巴黎和里昂，选举结果表明工人群众不投政府候选人的票。因此，政府加紧挑衅活动，并于 6 月 10 日进行了一系列逮捕。暗探混杂在人群之中。瓦尔兰写道：“在捕人的当晚和第二天，政府加强了军事布置。成连的骑兵如临大敌地在大街小巷来回巡逻。可笑的是任何人都没有起来抵抗，唯有一些贵夫人乘着敞篷马车跟在骑兵后面，准备亲眼看看这场幻想的革命。幸而，公众舆论没有上这场险恶阴谋的当。公民们没有拿起武器，他们没有向政府提供它为再一次拯救社会所需要的机会”。^① 6 月 16 日，军队向利卡

^① 《平等报》1869 年 6 月 19 日。

马里的矿工开枪射击，十三名工人中弹身亡。10月8日，在阿韦龙地区的奥班，又有十四人惨遭杀害……

瓦尔兰对反对派的大部分当选议员都不信任。“我们认为，自由派联盟那伙人和帝国是同样危险的。我们在1848年六月事件中已领教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反对他们。”^① 1869年7月6日至12日，卡尔·马克思化名阿·威廉斯在巴黎作短期逗留。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库格曼说：“那里运动的发展是非常引人注目的”。^② 六个月后，瓦尔兰又一次谈到选举：“在不久前举行的大选和补选中，社会主义派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人民欢迎激进党候选人，因而我们也不能不投他们的票，但这些候选人决不会履行社会主义派演说者要求他们许下的诺言，他们的一系列背信行为将使我们能够指出他们的无能和破除人民对他们的幻想。”^③

在帝国政府处于全面危机的形势下，必须加强全体劳动者的团结和组织。瓦尔兰对职员工会和工人工会间建立的联系特别感到高兴。他指出，这一事实“打破了历来把职员和工人分为两个不同阶级的坏传统”。^④ 瓦尔兰在1869年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里祝贺劳动者在团结和组织这两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运动发展得很顺利。在人类活动的各部门，人们开始团结起来。从此，不再只是产业工人感到组织的需要，店员首先已经向我们学习，看来，邮电、铁路等部门的职员也将以我们为榜样。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毫不畏惧地去迎接未来，就必须使全体劳动者同

① 《平等报》1869年6月14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12页。

③ 《平等报》1869年12月4日。

④ 《贸易报》1869年6月20日。

心协力”。^①

第一步首先在巴黎迈出。巴黎的工人团体数量是不少的，现在应该使它们联合起来。类似的计划很早就有，但实行起来还是困难重重，各行各业都有本位主义，政府又通过禁止集会设置了许多障碍。在瓦尔兰的坚持努力下，困难终于克服了，巴黎工会联合会于1869年11月14日成立。到1870年春，联合会集合了五十四个基层工会和四万名工会会员。瓦尔兰任联合会通讯书记，金属切割工泰斯任副书记。会址设在科尔特里广场六号（今科尔特里街十四号）。瓦尔兰的计划更加雄心勃勃，他于11月30日写信给里沙尔说：“你们里昂的情况如何？你们打算成立联合会吗？这是十分必要的事。一旦巴黎、卢昂、里昂和马赛联合会组织起来，我们马上就能成立全国联合会。这样，我们将获得巨大的力量，并在酝酿中的事件里发挥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召开。作为巴黎装订工人支部代表出席大会的瓦尔兰表示乐观。“在巴黎，国际并没有死去，相反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生气勃勃”。与法国代表团部分成员的意见相反，瓦尔兰主张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在讨论遗产问题时，他站在巴枯宁一边，主张立即取消继承权，这和受马克思影响的总委员会意见相反，后者认为，“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起点的主张只能使劳动者离开对现实社会的真正攻击目标”。瓦尔兰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有力地维护集体主义的立场，反对所谓“个体主义”的立场。他自称是“非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鉴于瓦尔兰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巴枯宁分子在巴塞尔曾想尽办法来笼络他。虽然瓦尔兰确实受到了巴枯宁某些论点

^① 《劳动报》1869年10月31日。

的影响,但他不是“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这样说并非无的放矢,因为在大会期间,巴枯宁的门生詹姆斯·吉约姆曾把瓦尔兰拉到一位代表的房间,竭力劝说他加入巴枯宁派。事情似乎没有完全成功,瓦尔兰宁愿保持其独立见解。1870年初,他拒绝在一份反对马克思的意见书上签字,并认为这份意见书是“不恰当的”。总之,决不能说瓦尔兰是巴枯宁的亲信,他甚至不是坚决的巴枯宁分子。

瓦尔兰在分析形势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实际的态度。他于1869年12月4日写道:“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之中,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任何社会阶级和公民阶层都不再相信帝国还能够维持下去。然而,帝国尽管已老态龙钟,但它垮台的日期却还定不下来,它的寿命也许会比许多人所预料的和希望的要长得多。”^①三个星期以后,他说:“我应该告诉您,在我们的会议上,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我们对革命还没有准备好,我们需要花一、二年时间,通过报纸、集会和组织工人团体来开展积极的宣传,才能真正控制局势和保证使革命成果不被社会主义共和派所夺走。”^②

因此,在瓦尔兰看来,掌握一份报纸对组织工人、展开宣传和进行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可是,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的机关刊物《劳动报》于1869年12月停刊了;该报历来得到店员工会的支持,随着店员罢工的失败,它再也维持不下去。1869年12月19日,由罗什弗尔创办的日报《马赛曲报》出版了,1848年革命时代的老人米里哀尔担任社长兼经理,并专门负责处理该报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稿件。这是必须利用的一个好机会,瓦尔兰和国际的其他

① 见《平等报》第46期。

② 致奥布里的信,1869年12月25日。

成员同意为该报撰稿。《马赛曲报》发行量很大，虽然时有起伏，但平均每天销售量总在五万份左右。除了国际成员的稿件外，该报还辟有《工人消息》的专栏，刊登召开工人集会的通知和有关报导。报纸还公布罢工捐款的清单。每当发生劳资冲突时，报纸均派员亲临现场采访。因此，《马赛曲报》于1870年初已成为法国工人阶级的日报，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瓦尔兰。

反对派的力量继续在加强。1870年1月10日，《马赛曲报》记者维克多·努瓦尔（原名伊万·沙尔蒙）被拿破仑第三的堂弟比埃尔·波拿巴亲王所杀害。这位青年人并不很出名，但他是《马赛曲报》的记者，而杀人凶手是皇室成员，这就足以引起巴黎人民的愤慨。1月12日举行葬礼的那天，十万人上街游行，起义一触即发。政府命令所有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帝国企图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未能得逞，瓦尔兰对此表示庆幸。恩格斯在2月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说：“真是幸运……在给努瓦尔送葬时没有出事；利用巴黎所有革命群众在发动攻击时把他们当场拿获，这正是波拿巴分子求之不得的事。”^① 瓦尔兰认为，全靠罗什弗尔的努力，运动没有偏离方向：“他表现出了足够的聪明和理智，因而没有下令让革命的优秀战士去送死。”^②

工会联合会于1月13日开会，总结1月12日事件的经验教训。联合会的代表在维克多·努瓦尔下葬那天曾会见了各工会的成员，但由于事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人主张“开战”，另一些人则主张“保持游行的和平性质”。瓦尔兰认为，“把领导权交给一个人或几个人”，这对人民的事业是危险的，“决不能让几个人左右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18页。

② 致巴斯特利卡和里沙尔的信，1870年1月19日。

运动的发展”。“我们决定，今后将密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变化并随时共商对策。群众的情绪很高，革命在前进，决不能让革命偏离方向。”罗什弗尔于2月7日被捕。瓦尔兰、马隆和贡博特共同签署了一项抗议书。抗议书不是出自瓦尔兰的手笔，但包含了他的基本思想。“革命党人切莫上当；如果单靠挺起胸膛不怕牺牲就能解决问题，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回答他们的挑衅。但现在的问题是要保证革命的成功。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们又要三思而行。杯子已注满了水，迟早会漫溢出来。应该让革命自己来选择爆发的时机。”^①

传讯瓦尔兰的传票发出了。2月13日，在参加了“锅社”的全体会议后，瓦尔兰被当局逮捕。消息传开，群情激愤。“锅社”全体社员提出抗议。避居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国际成员（包括弗兰克尔在内）“也在抗议书上签名，反对无故逮捕瓦尔兰公民，同时向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位英勇战士表示同情”。瓦尔兰被拘押在桑台监狱，于2月26日未经审讯即行释放。

3月13日，瓦尔兰在里昂圆形大厅主持了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他在离开里昂时表现十分乐观：“大部分里昂工人为生活所迫举行了多次罢工，罢工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受苦不单由于他们的经济条件，而且由于他们在现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罢工使他们寄希望于国际，希望通过国际取得其他各国兄弟的支持。他们过去把激进党的资产阶级议员当作革命者，随着这些议员的背叛，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从此彻底懂得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一项‘鉴于’的意义：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② 瓦尔

① 致里沙尔的信，1870年2月9日。

② 《马赛曲报》1870年3月30日。

兰离开里昂后来到克列索，并在该地建立了国际的一个支部。

瓦尔兰在外省旅行的同时，开始考虑把国际在巴黎的各个支部联合起来。联合各支部的主张完全是由瓦尔兰主动提出的。1870年4月19日，在一次有一千二百人参加的会议上，这一主张获得了与会者的支持。会议象往常一样由瓦尔兰主持。他在开幕词中强调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因此，我们不应该再相信那些用空洞诺言骗取我们选票、而在执政后抛弃和背叛我们的人。剥削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有的向我们许诺天堂的公正，以换取我们盲目地服从压迫者。有的则不经我们的同意，自作主张地制造出用以镇压我们的法律。他们在本阶级中选拔官吏，使之成为让天平偏向主人一方的有力砝码。这一切今天都应该改变。国际业已破除了民族间的偏见。我们已经懂得应该对始终站在百万富翁一边的所谓天命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受够了仁慈上帝的骗，它再也不灵了！那些所谓的平民演说家，当他们为了过议员的瘾而向我们乞求选票时，可以空口许愿，但对保护和争取我们权利的任何要求，他们却认为有损于他们的尊严；我们也不再相信他们了。我们向所有受苦和斗争的人们发出号召。力量和权利都在我们一边。我们应该自力更生，努力奋斗，反对现有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让我们为共同的利益而团结一致。让我们各团体联合起来，从而扩大我们的行动。”

保尔·拉法格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于4月20日写信对卡尔·马克思说：“这次会议开得何等好呀！与会成员都感到有统一行动的必要，工人阶级已明确地意识到自己阶级的独立性，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势不两立。假如您这位阶级斗争的骑士能参加这次集会，您一定会感到何等的兴奋。”就在这封信里，拉法格还

谈到瓦尔兰有“极大的影响”，有组织者的真正才能。

国际的巴黎支部设在科尔特里街。瓦尔兰定期向国际总委员会报告巴黎的情况，他作了大量工作，使工人的相互声援越出了国界。在他的努力下，国际从此坚决地把重点放在行动方面，而国际最早的法国会员却把该组织当作一个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团体。

4月23日，政府决定组织一次公民投票，对以下的主题进行表决：“人民赞同皇帝自1860年以来对宪法进行的开明改革……”。政府的手腕玩得确实十分巧妙。如果投反对票，这似乎是拒绝改革；而如果投赞成票，则是对帝国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主张弃权。瓦尔兰也持这个观点，他写道：“无论就局部或就全体而言，我们始终是反对帝国的。任何人如果认为有权向人民提出问题而不允许人民对问题进行讨论，我们都决不接受……我们坚决主张成立世界社会共和国。我们反对公民投票及其任何结果，因而我们恳请劳工弟兄以各种形式实行弃权。”^①

公民投票于1870年5月8日举行，投票结果为七百三十五万八千张赞成票对一百五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九张反对票，弃权票也很多（一百八十九万四千六百八十一票）。但从大城市的情况看，响应弃权口号的工人为数不多，他们一般都出于对帝国的仇恨，跟着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塞纳省的结果是十八万四千张反对票对十三万八千张赞成票；在里昂，有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八张反对票对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六张赞成票。反对票超过赞成票的城市还有圣艾蒂安、马赛、尼姆等。恩格斯于5月11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法国各大城市的选举结果很好。其他地方是假造的，可不必

^① 致奥布里的信，1870年4月20日。

考虑。”^①舞弊的事是可能有的。但还应该看到，大多数农民投了赞成票。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虽然也号召“乡村劳动者”弃权，但农村并没有受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相反，工人的立场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论他们投了反对票或是响应了国际的号召实行弃权。马克思对弃权的口号提得是否恰当没有发表意见，但他赞扬了法国的国际会员的作用。他写道：“我们的法国委员们向法国政府清楚地证明政治性的秘密团体和真正的工人联合会之间的差别。法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拘禁巴黎、里昂、卢昂和马赛等处的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他们有一部分人逃到瑞士和比利时去了），就有多一倍的委员在报刊上发表勇敢而坚决的声明，宣布自己是它们的继承者（而且还有先见之明地附上了自己的私人地址）。法国政府终于做了我们希望已久的事情——把是帝国还是共和国这样一个政治问题变成工人阶级的生死存亡问题！”^②

其实，政府自己也觉察到了危险。它懂得危险来自何方，早在公民投票开始前，它已于4月30日下令通缉国际的会员。瓦尔兰当时在中部地区巡回宣传。他在索恩河畔夏龙的一位1848年时代的议员沙尔·布瓦赛家里暂避。开始，他在人劝说之下准备去瑞士。后来，他又感到后悔，换了火车转回巴黎。由于他的住地被监视，他住在他的老朋友、装订工朗思兰家里。伙伴们纷纷来向他劝说：何必自投罗网呢？瓦尔兰这才下了决心，动身去布鲁塞尔。欧仁·安斯接待了他，他化名昂利·巴费尔特，并在安特卫普的一家装订作坊中找到了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帝国对国际巴黎支部进行了第三次审判。7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2页。

5日，在逃的瓦尔兰以及马隆、缪拉、埃利贡、潘迪、若昂纳尔和贡博特被判一年徒刑，其他被告被判两个月徒刑。国际巴黎支部被解散。几天后，战争就爆发了。

8月19日，瓦尔兰在致玛丽·雅茨凯维奇的信中，对时局的发展怀着满腔的忧虑，他写道：“我们历来认为可以信赖的两大民族，如今已被沙文主义的浪潮卷到了互相残杀中去，国际现在该怎么办呢？”他听说8月8日和9日发生了群众示威。“为什么巴黎人民在最初的军事失利后没有立即打碎帝国并让革命的法兰西去对付普鲁士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战争继续进行，人们打仗至少还有点道理，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人却为拿破仑第三和威廉一世去流血丧命，这真是令人沮丧！”

瓦尔兰的这些话表现了他的懊恼情绪，但他没有忘记维克多·努瓦尔下葬那天的事。他懂得无组织和无领导的危害性。“尽管巴黎人最近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不能使我满意，我真想到巴黎去看看，以便参加群众游行和采取必要的行动。”布朗基主义者冒险攻打拉维叶特消防营的消息也传到了瓦尔兰的耳朵里，他认为“这次袭击行动的组织者简直是发疯”，“他们没有想到，在向人民发出号召以前，应该摸摸人民的脉搏和弄明白人民是否有热度”。他说了一些十分尖刻的话，责怪农民投票支持帝国，同时却又“为我们的外省遭到蹂躏而感到痛苦”。他还为被捕同志的命运担忧。“他们怎能忍受圣伯拉惹监狱的拘押？”“无论如何，帝国在道义上已经死去，我希望我们不久将在巴黎见面。”

就在同一天，瓦尔兰还写信给昂利·巴赫鲁赫。他又一次抱怨自己陷于无所事事的境地，并接着说：“时机对开展宣传工作不太有利。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洛林和香巴尼平原上进行的杀人惨剧，忧虑地等待着这一流血斗争的结果，因而使社会问题完全被

遗忘了。但战争不仅直接造成对人力物力的摧残，并且将导致金融和工商业的凋敝，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问题将空前紧迫地重新提出。帝国现在已寿终正寝，改换政权已成为不可避免，恢复专制制度留下的创伤的任务也许将落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的肩上。但我有点担心，我觉得巴黎人民自公民投票以来变得萎靡不振了。在头几个败仗已暴露出帝国政府的腐败后，巴黎人民为什么没有把帝国扔到阴沟里去？议员们表现软弱，这我能理解；但人民竟跟着他们软弱，这使我深感痛心。法兰西要避免亡国的耻辱，决不能依靠帝国那伙残渣余孽。总之，革命的法兰西一旦诞生，单是把普鲁士国王赶走就远远不够了。”

9月4日起义的成功使瓦尔兰结束了流亡生活并离开布鲁塞尔，据克莱芒斯日记上的记载，瓦尔兰于9月11日已回到巴黎，但也有可能他到达巴黎的日期比这更早些。

* * *

最初信奉互助主义的瓦尔兰，到了1870年，已公开主张集体主义或非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这表明他与蒲鲁东已断然决裂，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看到瓦尔兰的立场有时和马克思的估计不谋而合，我们也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位法国活动家十分器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瓦尔兰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当时既没有流行，马克思自己也并不喜欢。此外，真正亲近马克思的公社社员还是弗兰克尔、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欧仁·杜邦和赛拉叶。

瓦尔兰是个十分典型的人物，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意识形态（蒲鲁东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的日益分离。抱住蒲鲁东主义不放的那些人，即“狭隘的”或“落后的”蒲鲁东主义者，很快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国际法国各支部的历史

上,人们可以划分两个阶段:蒲鲁东主义阶段和集体主义阶段。蒲鲁东主义的“开明派”战胜了“狭隘派”,这是应该归功于瓦尔兰的。我们已经知道,瓦尔兰在妇女劳动问题和教育问题上很早就同蒲鲁东的理论一刀两断,蒲鲁东在1865年发表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写道:“正如没有讹诈权、勒索权和偷盗权一样,也不应该有同盟罢工权,不应该有乱伦权和通奸权”。但是,瓦尔兰却全力以赴地帮助罢工者。不仅如此,他认为罢工以及各种工人斗争具有历史的意义。他写道:“国际工人协会支持罢工,因为这是劳动者为保住每天面包所应采取的唯一实际手段。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并不是要组织工人不停顿地同资本占有者作斗争。它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它准备实现劳动的彻底解放,使劳动者掌握为生产所必需的社会机构和天然要素。”^①在组织工人方面,瓦尔兰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当他着手把国际的巴黎各支部联合起来时,他与托伦发生了冲突。拉法格后来在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您知道,巴黎的蒲鲁东分子在第二帝国期间曾竭力反对巴黎各支部的联合,他们完全被排除在由瓦尔兰、阿夫里阿尔、罗班、马隆等集体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领导的运动之外。”^②

瓦尔兰最初有明显的非政治倾向。如同蒲鲁东的影响一样,这一倾向反映了工人活动家对资产阶级政客的不信任。1848年六月事件的伤口没有愈合,工人活动家再也不能容忍卡芬雅克式的共和党人了。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期间,瓦尔兰在一份有关波兰问题的意见书上签了名,这份意见书虽然对波兰的专制统治提出抗议,但在结论中却说:“作为出席一个经济性组织的代表大

① 《贸易报》1869年8月29日。

② 拉法格致马克思的信,1871年11月9日。

会的代表，我们认为对波兰的政体问题无权干预。”瓦尔兰对国家的性质缺少理性的认识，但他看到，帝国正倾全力为雇主效劳。因此，不反对帝国，就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工人的罢工必定遭到国家的强大军队的镇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相辅相成的。克列索的施奈德不正是立法团的议长吗？因此，不可能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截然分开。瓦尔兰于1869年8月6日写信给奥布里说：“您似乎认为我周围的人更关心政治革命而不注意社会改革。我应该告诉您，我们认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互相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单有政治革命，这还等于零；但通过我们经历的种种逆境，我们感到，只要我们在如此专横的现政府下生活，就不可能组织社会革命。”瓦尔兰在致巴枯宁分子吉约姆的一封信里强调说：“法国目前的形势不允许社会主义派不问政治。当前，尽快推翻帝国是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社会主义者必须领导这一运动，否则就是失职。”“如果我们置身于政治之外，我们将在面临彻底变革的法国无所作为。”^①

越到后来，瓦尔兰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越加坚决。看来，他遇到了一些阻力，他在1870年3月8日致奥布里的信中写道：“假如您以为我重视政治运动而忽视社会主义运动，那您就错了。不，我所追求的政治事业完全是从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的，但您应该明白，只要旧的政治国家不消灭，我们就搞不成任何社会改革！我们不能忘记，帝国目前已名存实亡，政府已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如果社会主义派竟为社会学的抽象理论所陶醉，总有一天当我们猛醒的时候，压在我们头上的主子将比现在的主子更加危险、更加有力和更加强大。我们在准备未来的社会组织的同时，必须时刻不忘政治运动。”他在1870年4月16日的《平等

^① 致吉约姆的信，1869年12月25日。

报》上写道：“我们反对政治冷淡主义，因为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造成有害的后果。参加政治活动是我们进行宣传的一种手段。我们的伟大目标显然是彻底改造社会关系。因而，一切宣传鼓动都附属于社会主义运动，并只是它的手段。这一点已为我们工人协会的章程所确认，而我们是不应该同这个章程相抵触的。”

瓦尔兰对协调一致的政治斗争的关心，部分地说明了他对外省的重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巴黎被孤立。如果我们想到过去的1848年的六月事件和未来的公社起义，就足以衡量出这一警告的重大意义。1月19日，瓦尔兰写信给巴斯特利卡说：“外省的援助可以分散政府的力量和使政府措手不及，这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不久以后，即4月26日，他又写信给里沙尔说：“马隆给我来了一封信，据说您问他是否我们在组织革命小组。您且放心，我们正忙于做这件事。但一旦斗争在巴黎搞起来了，我们能否依靠你们来牵制敌人？如果我们通知你们，我们这里要动手，你们里昂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掀起一场运动？我已就这个问题同巴斯特里卡商妥，我们对马赛寄予信赖。应该使所有工业中心全都准备好。”

通过罢工，工人们既意识到他们遭受的剥削，也意识到他们的力量。但这种觉悟并不是自发的，还必须有一些忠实、积极和聪明的工人，即象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这样的“活动家”，去发动工人和去反对个体主义思想。瓦尔兰说：“我们历来任人虐待和剥削，因为我们是分散的和没有力量的；今天，人们开始重视我们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卫的能力……不久，当我们大家团结了起来，我们就能互相支持；由于我们人数最多，而且归根到底全部生产是我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就能在法律上和在事实上要求享有我们劳动的全部产品，只有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①在瓦尔兰的推动下，装订工人工

^① 《劳动报》1869年10月31日。

会很早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此外，瓦尔兰既参加工会的活动，又参加国际支部的活动；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科尔特里街领导工会联合会和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是同一些人。大部分宣言由两个组织共同签署。它们的合作十分密切，简直达到不可分的程度。当然，在对国际巴黎支部第三次审讯案中，被告强调了两个组织的不同，但这只是为对付帝国的迫害而采取的谨慎措施。就瓦尔兰而言，他从没有同意工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分离的观点。

其所以如此，因为政治体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瓦尔兰写道：“可以说，迄今以来的政治国家无非是旨在建立权威和奴役群众的征服制的继续……权威的使命始终是要民众恪守为少数人利益而制订的法律。这一权威的严格和专横可以有程度的不同，但这并不改变经济关系的基础，即始终使劳动者听任资本占有者的支配。”因此，“即将到来的革命不应停留于简单地改变政府的名称”，“它应该解除劳动者所受的一切剥削”，既然社会财富是“集体劳动的产物，它应该用于为集体谋利”。①

取消所有“束缚我们的制度”是容易办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几乎完全一致，但建设就要困难得多，因为劳动者对此还没有达成共同的意见，少数人甚至还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之中”。②

瓦尔兰认为，未来的唯一出路是发展工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观点后来被否定了，但它在当时国际的法国支部成员中似乎占着上风。最初，工会会员“只想反抗资本的剥削或取得某些细小的改善”。但是，由于工会作为工人的组织而存在，它有利于工人“联络感情”，使他们习惯于“协商一致”，“管理自己的事务，

① 《马赛曲报》1870年3月11日。

② 致里沙尔的信，1869年11月20日。

集体讨论和研究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因为他们既是集体的成员，他们直接的个人利益也就不存在了”。这一分析同由马克思起草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是一致的。分歧点在于对工会未来作用的认识。在瓦尔兰看来，工会“是未来社会建设中的天然要素”，它“将行使社会机构和组织生产的职能”。^①这可能是蒲鲁东主义的残余或是巴枯宁的影响，也可能是在当时工人活动家身上依然十分活跃的手工业工人思想。总而言之，瓦尔兰认为，工会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变为生产者的组合。他反对实行“中央集权国家”的一切主张，反对“由国家任命厂长，再由厂长任命副厂长、监工、车间主任……从而造成劳动组织中自上而下的等级制，使工人成为没有自由和没有主动性的无意识的齿轮”。针对与卡贝的空想共产主义相类似的这种组织形式，瓦尔兰提出了建立在产品无偿交换基础上的另一种方案，这一方案和蒲鲁东的某些观点十分接近。“劳动者自己应有掌握和支配其劳动工具的自由，但必须以成本价格实行产品交换为条件，以便使各行业的劳动者相互提供服务”。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虽然也强调了合作社所能起到的决定作用，但他又补充说，全国生产应“按照总的计划”^②来调节。

在政治方面，瓦尔兰似乎寻求一种代议制和直接民主制共存的方案。他对普遍意志的“执行”和“表达”作了区分。他写道：“说得更清楚些，我们能够同意执行权的代行，因为人民不能亲自执行其意志，但我们不同意立法权的代行；应该由人民自己投票通过法律。”暂且，“必须把同行业的人联合起来，然后再把各行业联合起

① 《马赛曲报》1870年3月11日。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9页。

来；目前，我们的努力仅限于此，以后再干别的事情。”^①

9月4日，共和国宣告成立。瓦尔兰从事的工人运动无疑促使了帝国的垮台。但共和国的领导人恰恰是瓦尔兰曾提醒他的伙伴需要警惕的那伙人，因而更有必要加紧组织群众并揭露那些利用群众和背叛群众的人。这正是瓦尔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所要进行的工作。

译自法国《思想》杂志第176期（1974年7—8月合刊）第85—108页。

（承 中译）

^① 致安斯的信，1870年1月28日。

法国杂志发表关于 巴枯宁的新材料

[苏]娜·米·皮鲁莫娃

编者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本小册子中用不少篇幅揭露了巴枯宁伙同涅恰也夫盗用第一国际名义在俄国招摇撞骗，破坏革命运动的活动。苏联学者皮鲁莫娃利用法国杂志《俄国和苏联手册》上新发表的材料写了这篇文章，试图证明巴枯宁同涅恰也夫在纲领和策略方面都有矛盾，巴枯宁没有参与起草给柳巴文的信和《革命者问答》。皮鲁莫娃的论断是否站得住脚，有待研究，但是她所引用的一些新发表的资料有参考价值。现将这篇文章摘译发表，供研究工作者参考。

从1966年起，《俄国和苏联手册》开始连续发表1870年5月至8月，即巴枯宁与涅恰也夫决裂时期米·亚·巴枯宁写给谢·格·涅恰也夫、娜·亚·赫尔岑（赫尔岑的女儿）、格·亚·洛帕廷的信，以及涅恰也夫和娜·亚·赫尔岑之间的来往书信和其他文件。^①最初这些文件同亚·伊·赫尔岑及其家庭的其他文字材料

^① 《俄国和苏联手册》，高等实验研究院（索尔朋）。《手册》，1966年第7卷第4期（米歇尔·康菲诺《巴枯宁和涅恰也夫》）、《米·亚·巴枯宁致谢·格·涅恰也夫

一起由娜·亚·赫尔岑保存，她在父亲在世时就管理他事务上的来往书信。她的声望很高，革命流亡者中的活动家不止一次地请求她作为仲裁人出面处理某些复杂局面，请她复制和保存重要信件。娜·亚·赫尔岑逝世后，巴枯宁和涅恰也夫的信由赫尔岑的外孙女沙尔·李斯特保管，后来她把这些信交给了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几乎所有的信都是以复制品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是由娜·亚·赫尔岑抄写的，有一部分是谢·谢列布廉尼科夫抄写的。

这些信由《手册》分作数期发表，历史学家米歇尔·康菲诺写了绪论文章，并加了说明和注释。

这些文件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它们有助于澄清巴枯宁、涅恰也夫，多少也包括洛帕廷的活动和观点中许多不清楚的地方。信的篇幅约有六印张。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巴枯宁于1870年6月2日（更确切地说是6月2日到9日）写给涅恰也夫的一封信。

（1870年6月2日）》、《米·亚·巴枯宁致奥格辽夫和奥捷罗夫、谢列布廉尼科夫和塔塔（1870年6月9日）》、《手册》，1966年第7卷第2期（塔·巴枯宁娜和J·卡图《涅恰也夫传记资料：涅恰也夫同娜·赫尔岑的来往书信》）、《手册》，1967年第8卷第1期（米歇尔·康菲诺《巴枯宁同涅恰也夫的决裂。新发表的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娜·赫尔岑的信》、《米·巴枯宁致尼·奥格辽夫、娜·赫尔岑、B·奥捷罗夫和谢·谢列布廉尼科夫（1870年6月10日）》、《娜·赫尔岑致米·巴枯宁（1870年6月16日）》、《米·巴枯宁致尼·奥格辽夫、娜·赫尔岑、B·奥捷罗夫和谢·谢列布廉尼科夫的〈致集体的信〉（1870年6月20日）》、《米·巴枯宁致娜塔莉亚·赫尔岑（1870年6月26日）》、《米·巴枯宁致娜塔莉亚·赫尔岑（1870年6月18日）》、《米·巴枯宁致娜塔莉亚·赫尔岑（1870年7月16日）》、《米·巴枯宁致娜塔莉亚·赫尔岑（1870年8月2日）》）、《手册》，1967年第8卷第3期（米歇尔·康菲诺《关于“涅恰也夫案件”。新发表的米哈伊尔·巴枯宁和格尔曼·洛帕廷的信》、《格·亚·洛帕廷致米·亚·巴枯宁（1870年5月26日）》、《格·亚·洛帕廷致娜·亚·赫尔岑（1870年6月1日）》、《米·亚·巴枯宁致格·亚·洛帕廷（1870年6月9日）》、《格·亚·洛帕廷致娜·亚·赫尔岑（1870年7月5日）》）。除了谢·格·涅恰也夫同娜·亚·赫尔岑的来往书信之外，所有的文件都是用俄文发表的，同时有法文的译文。

大家知道，巴枯宁的“个人过失”，也就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充作物证的那封给柳巴文的信，对于把他开除出国际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1870年初涅恰也夫第二次来到瑞士时，巴枯宁正在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是为了赚钱而从事这件工作的。他通过丹尼尔逊和柳巴文从彼得堡出版商波利亚科夫那里得到翻译第一卷的稿约。

涅恰也夫要求巴枯宁完全转到组织新的宣传运动方面，并且宣称，柳巴文的事由他亲自处理。为了“处理”这件事，涅恰也夫以一个虚构的俄国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给柳巴文写了那封信，这封信在巴枯宁的生平中起了如此可悲的作用。

这封信中说：“委员会获悉，居住在外国的俄国贵族和自由主义的浅薄之徒中的某些人开始剥削某方面人士的体力和知识……其中有一个柳巴文……召募著名的巴枯宁从事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工作，并象一个真正的富农—资产者那样，利用他经济拮据的状况，付给他定金，从而使他承担了在工作结束之前不能中断的义务……委员会命令外国局向柳巴文宣布：（1）如果他和他那一类的寄生虫认为现在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对俄国有益，那就让他们把自己的渺小力量用来做这件事……让他（柳巴文）立即通知巴枯宁：由于俄国革命委员会的要求，解除他继续翻译的一切道义责任。”

接着，信中以威胁的语调陈述了立即免除巴枯宁对这项工作的“一切道义责任”的要求。

尼·吴亭告诉国际总委员会，这封信是在巴枯宁指使下写的或是巴枯宁直接写的。于是马克思请求尼·弗·丹尼尔逊提供信的原件。后者执行了这项请求，这封信就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

会上“起到应起的作用”。^①

然而，从最近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巴枯宁不仅同这封信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在1870年5月以前根本不知道涅恰也夫在柳巴文事件中的活动。巴枯宁本人在6月2日的信中以及洛帕廷在同年5月26日给巴枯宁的信中都证明了这一点。后一文件^②充分说明洛帕廷参与了巴枯宁同涅恰也夫的不可避免的决裂。

现在我们来谈谈伴随着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在理论上的决裂而产生的情况。载有涅恰也夫文章的《人民裁判》第2期于1870年冬出版。这时，巴枯宁断定，在纲领问题上，他不久前的同伙（最初他是这样看的）的表现不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相反，象一个权威体系的拥护者。

《钟声》第一期的出版（1870年春）使巴枯宁更加感到困惑。他写信对涅恰也夫和奥格辽夫说：“仔细阅读了你们重新出版的《钟声》第一期之后，我感到莫名其妙。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的旗帜是什么？你们的理论原则是什么？你们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总之，你们希望将来在俄国有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无论我怎样努力在你们杂志的字里行间寻找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惭愧地承认，我什么也没找到。你们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剥削人民劳动的捍卫者？是国家的朋友还是敌人？是联邦主义者还是集中主义者？”^③

总而言之，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之间的理论分歧到1870年春明朗化了。巴枯宁已经根本不相信涅恰也夫的个人信誉。法国历史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42页。

② 这封信与其他文件不同，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俄国研究中心。米·康菲诺在《手册》1967年第3期上发表了这封信。

③ 尤·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3卷第530页。

杂志上发表的材料证实了这一点。巴枯宁在1870年6月2日写给涅恰也夫的信中说：“早在去年，在同您个别谈话时，还有一次是在奥格辽夫家里并当着他的面我就曾清楚地告诉过您，我们不能再相信您了，因为，当您认为撒谎可能于事业有利时，撒谎对您是不算一回事的。”^①

另一方面，这些资料表明，尽管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理论上和道德上的分歧，但是，巴枯宁直到5月份仍然全力支持涅恰也夫。他在6月2日的信中解释了这种他所谓的“亲密的政治联系”的原因，他列举了下述理由：

“第一，……在您从日内瓦到俄国去之前，我们的纲领确实是一致的……

第二，……我承认您具有确实的和不倦的力量、忠诚、热情[……]和思想，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您有能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事业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真正的力量。

第三——是因为，我承认您是我所知道的所有俄国人当中最有能力完成这项事业的人，我曾对自己和奥格辽夫说，我们用不着另外的人了，我们两个人都老了，我们未必还能遇见另一个比您更适当和更有能力的类似的人……”^②

巴枯宁对于有可能同这个“有能力的”人继续联合的希望遭到了有力的打击。洛帕廷就好象是向巴枯宁揭开了用谎言和欺骗编织起来的帷幕。首先，洛帕廷使巴枯宁确信，涅恰也夫过去所说的从彼得保罗要塞逃跑、俄国的组织、似乎由他充任代表的委员会都只不过是神话而已。

① 《手册》1966年第4期第629页。

② 同上，第630页。

洛帕廷说：“涅恰也夫可以对你们这些身居俄国之外的人叙述所有这一切，但是他不敢当着我的面向你们再说一遍，他清楚地知道我对俄国所有的小组、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关系和事实。你们看到，他以自己的沉默证实了我关于他的逃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话，他自己知道，对这种事的最微小的情况和细节我都是最清楚不过的，关于他的朋友和他的虚构的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①

洛帕廷还谈到涅恰也夫怎样以“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封充满威胁的信，来“处理”巴枯宁同柳巴文的关系。柳巴文把这封信的副本和回信的副本寄到日内瓦给洛帕廷，但是要求不要发表这些文件。洛帕廷只把这些文件给与此事有关的人看过。根据娜·亚·赫尔岑的请求，这两个副本存入了她的档案。1872年，当柳巴文和丹尼尔逊把这两个文件交给马克思的时候，洛帕廷已经到西伯利亚将近一年，因而也不能向这一事件的所有参与者说明真实情况了。

根据《俄国和苏联手册》所发表的通信，巴枯宁同涅恰也夫之间往后的关系形成了下面这幅图景。巴枯宁从洛帕廷的谈话和后来的信里了解到他被涅恰也夫拖进了一个什么样的谎言和欺骗的深渊，他非常震惊。几天以后，他在信中对涅恰也夫说：“我亲爱的朋友，我无法向您表达，我为您和我自己感到多么难过。我不能再怀疑洛帕廷的话的真实性了。就是说，您一直在对我们撒谎。就是说，您的整个事业充满了腐臭的谎言，是建立在沙堆上的。就是说，您的委员会就是您……就是说，由于荒唐的和愚蠢的方针，由

① 这次谈话是当着涅恰也夫的面进行的。洛帕廷的话是巴枯宁在他6月2日写的信中转述的（《手册》1966年第4期第682页）。

于腐蚀了您自己,尤其是腐蚀了您的朋友的您的耶稣会式的体系,您为之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的整个事业垮台了和烟消云散了。我曾经深深地爱过您,并且直到现在还爱着您,涅恰也夫,我曾经坚决地,并且是过分坚决地信任您,因而看见您落到这样的境地,在饶舌者洛帕廷面前遭到侮辱,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痛苦。

我同样为自己感到沉痛。我为对您的信任所迷惑,把自己的名誉交给了您,并公开把自己同您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就在您不断地愚弄我的时候,我绝对信任您,我当了彻头彻尾的傻瓜——这对一个有我这样经历和年龄的人是痛苦的和丢脸的——更有甚者,我毁了自己在俄国的和国际的事业中的地位。”^①

洛帕廷去日内瓦不仅是为了揭露涅恰也夫,正如上面所说的,对他更重要的是向巴枯宁,特别是向涅恰也夫索取柳巴文和丹尼尔逊的信。洛帕廷在信中对巴枯宁说:“我的朋友中的任何人从来没有设想您会滥用掌握在您手中的文件,但是对于涅恰也夫,这些先生全都非常怀疑。”^②

巴枯宁无法归还信件,因为一部分信被他销毁了,另一部分不在他手中。但是他答应洛帕廷要解决这项争执。

涅恰也夫则在三个人一起谈话之后要求同洛帕廷单独见面。他对洛帕廷说:“为什么您要危害我,到处散布不利于我的关于我的谣言?就算我同您在观点上有很大分歧,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好,您也好,我们两人毕竟都属于反对派。我们不应当相互危害,而应当相互帮助,至少在我同您一致的那些方面应当如此。”作为对这一番话的回答,洛帕廷提出了要涅恰也夫交出丹尼尔逊写给他的便函的要求,他只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十天以后回答您。而

① 《手册》1966年第4期第684页。

② 《手册》1967年第3期第460页。

且这不取决于我一个人。”

欺骗在继续。尽管在了解一切情况的洛帕廷面前原形毕露，涅恰也夫继续扮演“委员会”的代表。按照《革命者问答》的规定，涅恰也夫现在必须使洛帕廷陷入谎言和阴谋的罗网，首先在巴枯宁的心目中败坏他的名誉。涅恰也夫向奥捷罗夫叙述了自己同洛帕廷的会见，把下面这番话硬栽到自己的反对者的头上：“老头子（指巴枯宁——作者）坚持不住了，交出了信，现在他攥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可以用一切办法对付他，因为他反对我们——没关系！”

洛帕廷写信向巴枯宁揭露了涅恰也夫的最近的这一次恶行，他对巴枯宁说：“我看到这样层出不穷的无耻行为时，真感到无可奈何。我曾同您一起惊呼：‘这是什么话！’为什么涅恰也夫认为每一个人都象他一样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必须说‘我们’？我敢向他担保，除他之外，只有那些女皇才会这样愚蠢地说话！为什么涅恰也夫还认为，所有的人都象他一样只是想如何能把别人攥‘在手心里’，……大多数正派人只关心使自己不要被任何人攥‘在手心里’。”^①

所有这一切都是洛帕廷在5月26日的信中告诉巴枯宁的，因为他要离开日内瓦前往巴黎，不能把谈判进行到底了。不过，他的信也象以前的谈话一样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巴枯宁下决心同涅恰也夫决裂，但是……要等到后者不执行他在纲领和道德方面的要求的时候。虽然希望这个耶稣会会员和狂热者发生道德上的根本转变看来毫无根据，但是巴枯宁还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继续想为真正的革命事业而“拯救”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写了1870年

^① 《手册》1967年第3期第470页。

6月2日那封信。

在一篇杂志文章的篇幅里不可能叙述这个有意思的文件的全部内容，我们只谈谈它的两个主要题目：巴枯宁对涅恰也夫主义的否定和对自己的政治纲领的论证。

通常把“涅恰也夫主义”这个名词理解为涅恰也夫所使用的一整套不能允许的手段。涅恰也夫在《革命者问答》^①中相当充分地阐述了他的策略的“原则”，即欺骗、挑衅、背叛战友、对一切不同思想者的恐怖活动，这些原则从来不是巴枯宁所特有的。因此不能同意康菲诺的意见，他认为，“由于遭到惨重失败，对巴枯宁来说，涅恰也夫事件是重新审查自己的观点的理由，甚至是对良心和重新认识自己整个世界观的某种考试”。^②

巴枯宁没有必要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他仅仅迫切需要对那些过去没有如此尖锐提出的问题十分明确地表明意见。现在，当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问题、对待战友的态度问题要求明确回答的时候，巴枯宁发表了自己的信条。

他对涅恰也夫写道：“请想一想，当我把您叫作绿林好汉，把您的问答叫作绿林好汉问答的时候，您是怎样对我生气的，您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最彻底地放弃自我，放弃一切个人的要求、满足、感情、依恋和情谊，这应当成为一无例外的所有人每天正常的、自然的状态。您曾经想，甚至现在还想把您自己的自我牺牲的狂信、您自己的真正高涨的狂热变成共同生活的规则。您的想法是荒唐的和不可能的，您是想最彻底地否定人和社会的本性。这种愿望

① 这个文件过去和现在在研究者中间都引起过长时间的争论。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尤·米·斯切克洛夫和波·巴·科兹明）都认为它出自巴枯宁之手。但是，可以认为，新发表的文件使人解除了对巴枯宁的这种怀疑。

② 《手册》1966年第4期第583页。

是有害的，因为它使您白白浪费您的精力，总是把精力用得不是地方。任何一个人，不管他个人如何有力量，任何一个团体，不管它的纪律多么完善和组织多么强大，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战胜本性。是的，我亲爱的朋友，您不是我们这样的唯物主义者，而是唯心主义者、预言家，好象是革命的僧侣，您的英雄不应当是巴贝夫，甚至也不是马拉，而是一个叫做萨伏那洛拉^①的人，您的思想方式更象……耶稣会会员，而不象我们。”

巴枯宁在谴责了涅恰也夫所推行的“耶稣会式的控制、警察式的陷害和撒谎的体系”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以绝对真诚、平等和无条件团结为基础的革命者组织的原则。他的要求是铲除“卑鄙的不信任、狡诈的控制、间谍行为和相互告密，没有和正面严格禁止一切背后议论。当一个成员对另一个成员有意见的时候，他必须在全体会议上当着那个成员的面提出。应当实行所有人对每一个人的共同的兄弟般的监督，这种监督决不是纠缠不休的、繁琐的，主要的不是恶意的，而不应当实行您的耶稣会式的控制体系，这种监督应当成为对每个成员的道德教育和每个成员的道德力量的支柱，成为兄弟般的相互信任的基础，而团体的整个内在力量以及外在力量都是建立在这种相互信任之上的”。^②

在往后的年代里，巴枯宁同涅恰也夫主义在革命流亡者队伍中的重复出现继续进行了斗争。1874年他在给萨任（阿尔曼·罗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最后，你要懂得，在耶稣会式的欺诈的基础上建立不起任何有生气的和牢固的东西；为了自己的事业的成功本身，革命活动不应当在卑鄙和下流的欲望中寻找支柱；没有高尚

① 萨伏那洛拉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多明我会会士，曾领导1494年佛罗伦萨的人民起义。——译者注

② 《手册》1966年第4期第668页。

的因而也是人道的理想，任何革命都不能胜利。”^①

在坚持对革命者抱真诚态度和激烈谴责“耶稣会式的欺诈”的同时，巴枯宁也懂得在同政府和敌对党派的斗争中采取这种方法的必要性。“仅仅宣传真理”在同敌人的斗争中不会有多大效果。革命者是在进行战争，“而哪里有战争，那里就有政治，那里就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使用暴力、狡诈和欺骗的必要性”。^②

巴枯宁 1870 年 6 月 2 日信的第二个最重要的主题是纲领问题。康菲诺认为，对于巴枯宁这样一个在他所创立的理论的问题上无疑是有原则的人来说，涅恰也夫在理论上的无原则性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个看法可以说是正确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巴枯宁如何坚持不懈地和有根据地向自己不久前的战友解释基本的意识形态原理，他在自己的秘密组织方案的二十一项规定中表述了这些原理，并在信末的“最后通牒”中重申了这些原理。

巴枯宁首先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革命性质的问题。他写道：“首先，我的体系的不同点是，除了自发革命或人民的社会革命之外，它不承认别的革命的好处，甚至不承认别的革命的可能性本身。我深信，任何别的革命都是卑劣的、有害的、危害自由和危害人民的，因为它将给人民带来新的贫困和新的奴役……

总之，秘密团体的唯一目的不应当是建立人为的、人民之外的力量，而应当是唤醒、团结和组织自发的人民力量；由此可见，唯一可能的、唯一实在的革命军队不是在人民之外，而是人民本身。人为地唤醒人民是不可能的，人民革命是事物的力量本身引起的，或者是历史潮流引起的，这股潮流在地下令人觉察不到地，然而是不

① 《巴枯宁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书信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455页。

② 《手册》1966年第4期第674页。

间断地，但多半是缓慢地在各个人民阶层中流动，越来越多地包罗、浸润、滴入这些阶层，直到从地下冲出地面，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各种障碍，消灭阻挡它的道路的一切。”^①

大家知道，人民革命的主题贯穿于巴枯宁的一切著作。但是，在巴枯宁给涅恰也夫的信里出现了对他来说是新的思想——这里提出了关于周密地准备革命的必要性的问题。巴枯宁写道，革命者的“秘密团体”“必须首先避免任何冲动和任何急躁”；它们“应当不是为了近期举行起义，而是以进行长期和耐心的地下工作为目的而建立和组织起来”。^②

问题的这种提法使巴枯宁的观点同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接近。但是必须记住，巴枯宁始终保持着自己关于人民的独特概念。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尊重人民，尊重他们的传统和成规，但是，他们不能同意使革命的策略和战略完全依靠人民的本能，依靠理想，正如巴枯宁自己所写的，这种理想“大概有四分之三是不自觉的”。准备革命的辩证法要求不仅仅是而且主要地还不是向人民学习，而是教育人民本身——巴枯宁尽管号召进行“长期和耐心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工作），但是忽视了这个主要因素。

表现为崇拜人民行动中的“无意识”和自发成份的特殊的人民崇拜最终决定了巴枯宁对“强盗”的赞赏。由于“强盗”历来是所有人民力量中最积极和最具有反抗性的一支队伍，在巴枯宁本人的世界观中就有意无意地把社会范畴同历史范畴混淆起来了。他把破坏的欲望和革命性等同起来，被他看作真正的革命力量的即使

① 《手册》1966年第4期第642—644页。

② 同上。

不是卡尔·穆尔^①式的理想的强盗，至少也是斯捷潘·拉辛时代的自由的强盗帮伙。巴枯宁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十九世纪已经不存在任何能够表达农民的社会抗议的强盗。

当然，巴枯宁以前就有过为革命而利用“强盗”的意图。但是，在谈及革命者的行为的道德和伦理准则的致涅恰也夫的信里，他努力援引新的论据，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论证自己的思想。

他写道：“可是在我国有谁不是强盗和贼呢？政府、官方的和私人的投机者和商人不是吗？我们的地主、我们的富农不是吗？无论是抢劫还是偷窃，或者是一般的任何反人类的暴力，对我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我承认，如果我不得不在高踞王位或享有各种特权者的抢劫和偷窃同民间的偷窃和抢劫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一边，我认为它是自然的、必需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合法的。我承认，从真正人道的观点出发，人民的强盗远远不是美好的。可是在俄罗斯有什么东西是美好的呢？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我们的上流显贵们或市侩们的文明的、纯洁的世界更肮脏的吗？这个世界以自己的西方圆滑形式掩盖着思想感情、关系和行动的惊人的腐化，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掩盖着凄凉的和无出路的空虚！相反，在人民的腐化中存在着天性、力量、生活，终究存在着许多世纪的历史牺牲品的权利，存在着反对任何腐败的根本起因，即反对国家的强大抗议——因此，也存在着未来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站在人民的抢劫一边，并认为它是对俄国未来的人民革命最有意义的手段之一。”

包括作为激励和团结的酵素的“强盗”在内的人民是革命的军队。巴枯宁认为，这支军队的参谋部应当由平民知识分子组成。他

① 卡尔·穆尔是席勒的剧作《强盗》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对涅恰也夫说：“中专学生、农民和小市民的子弟、小官吏和破产贵族的子弟……但是，对于这类人应当切实组织起来并使之道德化。可您却以自己的方式来腐蚀他们，并从中为自己培养叛徒，为人民培养剥削者。”

在这里，对巴枯宁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问题和利用人民生活的阴暗因素作为革命支柱的问题发生了冲突。“如何使这类人道德化呢？”——巴枯宁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立即做了回答：“直接地、有意识地在他们之中唤起并在他们的思想和心灵上树立争取全体人民和整个人类解放的唯一的、占据整个身心的热情。这是一种新的唯一的宗教，它的力量可以触动灵魂和创造起拯救作用的集体力量。这就是今后我们的宣传的唯一内容。它的最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应当在建立一支人民的辅助力量的同时成为一所对全体成员进行道德教育的真正的学校……”^①

巴枯宁的目的在于使“这个世界”道德化的计划是空想主义的，甚至简直是天真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赋予道德教育问题的意义倒是值得注意的。无疑，涅恰也夫主义的经验迫使他更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他建议涅恰也夫采纳的新的秘密团体纲领草案中列入这类要求。

巴枯宁阐述了自己的纲领和伦理要求之后，在信的末尾再一次向涅恰也夫提出一项条件：首先要完全真诚，放弃“警察和耶稣会式的体系”，放弃关于“可以在人民之外和没有人民参加而完成革命”的荒谬思想，采纳“《人民事业》第一期所阐述的社会革命纲领”和信中所阐述的“组织和革命宣传计划”。如果涅恰也夫同意，巴枯宁建议建立“新的牢固联系”，设立“管理国外的一切俄国事务

^① 《手册》1966年第4期第648—656页。

的国外局”，出版“具有鲜明的革命社会主义纲领”的《钟声》。

6月9日，巴枯宁把信写好了，并把它寄给奥格辽夫、奥捷罗夫、谢·谢列布廉尼科夫和娜·亚·赫尔岑，请他们抄写和保存副本，然后交给“男爵”（涅恰也夫）。第二天他又给他们寄去了对上面引用过的洛帕廷的信的答复。巴枯宁写道：“请您们立即把我的答复寄给洛帕廷，但是首先要抄一个副本，以便把它读给男爵听和作为文件保存在你们处。”

在这封信里，他专门对奥格辽夫提出请求，请他给自己一项关于他不参与巴赫美提也夫基金的事务的书面证明，巴枯宁说：“奥捷罗夫写信告诉我，你由于害怕危害事业而不干了……但是，亲爱的奥格辽夫，这不象你，这种耶稣会式的和国家式的想法完全不是你的本性，不符合你的性情和习惯——真理和正义第一——这才是你一贯的口号。难道你到了老年就愿意和能够成为一名耶稣会会员吗？这无关紧要，况且这同事业根本没有关系。实际上，我们现在应当最终懂得，涅恰也夫尽管有各种可贵的品质，使他赢得了你我的信任，但是他本身仍然不是事业，事业是事业，他是他，把他同事业等同起来就意味着贬低和毁灭事业。”^①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奥格辽夫还继续受着涅恰也夫和他关于“事业”的观念的某些影响。尤·斯切克洛夫推测，“到6月中奥格辽夫更多地是站在涅恰也夫一边”，^②我们认为他是对的。

总起来说，娜·亚·赫尔岑对涅恰也夫有自己的看法，因而认为不可能同他继续合作。而奥捷罗夫、谢·谢列布廉尼科夫和奥格辽夫的立场直到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因为他们6月份写给巴枯

① 《手册》1967年第1期第88页。

② 《苦役与流放》1934年第3期第10页。

宁的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康菲诺用日内瓦集团整个说来对涅恰也夫抱否定态度来解释另一个文献——1870年6月29日的《致集体的信。致奥格辽夫、塔塔、①奥捷罗夫和谢列布廉尼科夫，如果〔……〕参加你们的集体，也给〔……〕》。②

这个文件具有特殊意义。它证明巴枯宁非常尊敬被他看作是涅恰也夫的优点的那些品质，证明他力图向自己和其他人解释涅恰也夫的缺点，让他们理解他的缺点，并在某种程度上为之辩护，证明他非常希望无论如何要说服朋友们相信同“男爵”按照早些时候提出的新条件继续合作的必要性。

看来，巴枯宁在6月2日的信中揭露涅恰也夫时的火气已经平息了。他似乎把一切都重新考虑过，撇开了个人的痛苦和委曲，企图“客观地”介绍他的朋友们对之已有清楚了解的这个人物。

他写道：“我们的朋友男爵决不是道德高尚和没有瑕疵的人，相反，他是有很多毛病的，同他打交道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也有巨大的优点：他专心致志和全力以赴，而别的人则浅尝辄止；他能吃苦耐劳，而别的人只能养尊处优；他动手做，而别的人只动嘴说；他存在着，而别的人没有；他有棱有角，可以牢牢地抓住他和控制他；而别的人是圆滑的，肯定会从你们手中溜掉；但是，别的人是经常讨人喜欢的，而他则根本不讨人喜欢。尽管如此，我还是宁可要男爵，而不要任何别的人，而且同别人相比，我也更爱他和更尊敬他。”③

接着，巴枯宁回顾了涅恰也夫的耶稣会式体系的形成过程，分

① 塔塔即娜·亚·赫尔岑。——译者注

② 最后一个字是巴枯宁删的。《手册》1967年第1期第98—112页。

③ 《手册》1967年第1期第100页。

析了他的错误，最后他写道：“对于男爵来说，回头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一个宝贵的人才，比我们所有的人都优秀、纯洁、忠诚、能干、有益，所以我们应当撇开自己灵魂中渺小的自尊念头，撇开一切个人的感情和自己的委曲，——塔塔，我这是特别针对你而说的——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地帮助他从漩涡里挣脱出来，使他有可能在相互诚实、信任、完全光明正大的基础上站到我们队伍里来，走在我们队伍的前面——因为他毕竟将是我们当中最不懈的和无情的积极分子。”①

7月2日，巴枯宁来到日内瓦亲自向涅恰也夫进行解释。奥格辽夫参加了谈话。巴枯宁说明了一切要求，其中包括对于在这之前不久涅恰也夫的信徒弗·谢列布廉尼科夫偷走他的文件一事表示愤慨。巴枯宁在写给塔朗迪埃和姆罗契科夫斯基的信中对涅恰也夫的回答是这样叙述的：“是的！这是我们的体系——既然我们认为不完全同我们一起走的人都是敌人，我们就一定要欺骗他们和败坏他们的名誉……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因为你们总是说你们负有国际义务，从来不愿意完全献身于我们，我们就要得到保障，以防万一需要的时候能对付你们。为此，我认为自己有权偷你们的信，并认为有必要在你们之间散布不和，因为绕过我们和撇开我们而存在着如此牢固的联系，对我们是不利的。”②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巴枯宁的信念的全部热情都白费了。涅恰也夫没有采纳这位老革命家的任何劝告，并顽固地继续坚持自己的“体系”。他表现得野心勃勃和恬不知耻，他要求奥格辽夫交

① 《手册》1967年第1期第110页。

② 《巴枯宁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书信集》第395、405页。

出另一半巴赫美提也夫基金的余额(七百四十点五法郎)。

娜·赫尔岑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做了这样的描述：“他们不间断地争论到晚上。晚上七点钟弗拉基米尔·谢列布廉尼科夫送来一个涅恰也夫写的条子，上面说，〔我们〕必须做出解释。弗拉〔基米尔〕·谢列布〔廉尼科夫〕不相信我不在家，不相信我刚刚同萨沙·雷赫尔一道出去了。晚上十时贝斯特罗夫带着巴枯宁的便条跑来，巴枯宁为我担心，他劝我离开几天，并把基金的余额交给奥格辽夫。贝斯特罗夫呆了一会儿，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在涅〔恰也夫〕、弗拉基米尔·谢列布廉尼科夫和沙尔企图硬闯进来的时候，来帮助我，但是谁也没来〔……〕。〔第二天〕奥格辽夫冒着三十八度的可怕炎热于一时来到。这个可怜的人非常为我担心，他怕涅恰也夫对我采取粗暴行为。可怜的奥格，他还得有多少次要被自己的‘孩子’弄得失望啊。他取走了基金，即为数七百四十点五法郎的余额。他交给我一张收据，以备涅恰也夫和弗拉基〔米尔〕·谢列布廉尼科夫来要〔钱〕时给他们看，然后，他就同谢明·谢列布廉尼科夫一起去把基金交给了银行家列维尔登。”^①

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组成的一方同涅恰也夫和弗·谢列布廉尼科夫组成的另一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表面上很和睦地分手了。这是因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打算：涅恰也夫想利用巴枯宁在伦敦和巴黎的熟人和联系，巴枯宁则想赢得时间，以便通过某种方式收回那些被弗·谢列布廉尼科夫和涅恰也夫偷去的文件。但是，他很快就认为有必要提醒自己的朋友，首先是塔朗迪埃和姆罗契科夫斯基注意涅恰也夫的危险性。后者很快就知道了巴枯宁的行

^① 《手册》1967年第1期第81—82页。

动。1870年8月1日，巴枯宁和奥格辽夫收到下述便函：“为什么你们在象犹大一样同我吻别时不告诉我，说你们将给你们的熟人写信。你们最近写给塔朗迪埃的信和吉约姆关于参加你们一贯在理论上倡导的事业的危险性的警告是卑鄙的仇恨引起的最不光彩和最下流的行为。你们违背了任何健全思想和事业的利益，你们一定是想要身败名裂。那就等着瞧吧！再见。”^①

第二天，巴枯宁把这封便函寄给奥格辽夫和塔塔，他写道：“朋友奥格，请看，这就是我们的孩子的信。我于昨天晚上收到，今天把它寄给你，以便尽快使你得到安慰，同时也自我安慰。没什么可说的，我们都是傻瓜，赫尔岑如果还活着，他将如何嘲笑我们，他将何等正确地辱骂我们！”^②

巴枯宁在信中对塔塔说：“您喜欢这封信吗？我们的狂信者在或多或少是真诚的残忍方面甚至超过了罗伯尔·马凯尔，^③我甚至开始怀疑他的残忍是否真诚，我们大家，尤其是我，只能痛心疾首地呼号：我们是大傻瓜！今后要讲科学——遗憾的是，年纪老了，能够利用科学的年月所余不多了。”^④

对巴枯宁来说，涅恰也夫事件到此结束。法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献有助于把巴枯宁同涅恰也夫决裂的画面几乎完全修复，有助于弄清楚巴枯宁的世界观和活动中一系列重要的方面。

译自《苏联历史》杂志 1968 年第 4 期

（顾家庆译）

① 《手册》1966年第2期第122页。

② 《巴枯宁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书信集》第402页。

③ 罗伯尔·马凯尔最初是著名的法国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塑造的一个恶棍的形象，后来著名法国画家奥诺莱·杜米埃又利用这个名字画了一套石版画，创造了一个以各种身分出现的坏蛋的形象。——译者注

④ 《手册》1967年第1期第120页。

文献和资料

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部分解说*

〔法〕保尔·拉法格

—

对人类社会及其起源的最新研究表明：所有人类社会开始的时候都是共同占有土地及其产品。个体所有制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限于纯属个人使用的物品：诸如野兽的毛皮、从敌人身上缴获的战利品、装饰品、武器等，这些物品通常和所有主的尸体一道埋葬。个人使用既是产生个体所有制的起因，也是个体所有制的最大限度。

土地及其产品的个体所有制出现得较晚：个体所有制在封建制度下要承担各式各样的捐税，法国是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时，个体所有制才具有绝对的或资产阶级的性质。当然，个体所有制是在侵犯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基础上，经过多少世纪，通过暴力和欺骗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然而，甚至在最资产阶级化的国家，它也从来未能把集体所有制全部兼并过去，因为公共产业（市镇财

* 1883年，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在圣·珀拉惹监狱中合写了《工人党的纲领：它的历史、绪论和条款》一书，对法国工人党1880年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作了通俗解说。这里发表的是小册子中关于纲领绪论部分的解说，是由保尔·拉法格起草的。——编者注

产、国有森林等)还普遍存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因此,纲领的绪论中说“个体所有制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

个体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个人的使用自己所有或专有的财产,在小农业和小工业时期,一直保持这种特征。农民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织布工人用自己的手摇织布机进行生产,雕刻家使用自己的刻刀,画家使用自己的画笔,木匠使用自己的工具。他们不仅是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而且是实际上的所有主,因为他们亲自使用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自己操作自己所拥有的工具。财产和所有主紧密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财产的生产能力取决于所有主的灵巧和精力;如果所有主抄手不干,或者年老体衰,生产能力就不可能不受影响。因此,所有主在生产中起着有益的作用。

但是,随着地产的扩大,随着工业的变革和机械化,个体所有制的使用性、实际性和有益性逐渐趋于消失。当农民的小块土地发展成为一、二百公顷以上产业的时候,从事耕作的就不再是所有主,而是分成制佃农或一般佃农、长工或短工了。当手摇织布机变成了机械纺织机,手锯变成了机械圆锯的时候,所有主就不再织布或锯木了,而是雇用工人去从事这种劳动。财产就成了法律上或名义上的东西,所有主则失去了对财产的个人使用,他和财产不再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财产的生产能力和所有主的个人技巧无关,而且也不会因为他游手好闲或年迈体衰而受影响。所有主在生产中不再起任何作用。他只是在掠夺生产者,即掠夺那些由于使用财产而应成为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的人,而这些生产者的劳动不但要创造出相当于他们每天所消耗的东西,而且还要为所有主创造剩余价值,即利润;雇佣劳动者的人数越多,受剥削越厉害,这种利润就越高。

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既然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利润掠夺者，那么，完全可以让路特希尔德取代多尔富斯，让梅纳尔·多里昂取代施奈德，而生产能力并不会因此有所下降。所有主甚至可以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家公司（例如卡伊公司），或者成为股东或债券持有人的团体。矿山、铁路、运河、冶炼厂就是这种情况，那些财产证书已变成无人称的东西，可以畅行无阻地转手流通，在交易所里一天之内几次转换法律上的所有主。

这就结束了所有制的个体性质，或者正如纲领的绪论所说的，“所有制的个人占有方式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淘汰”。

工业进步淘汰了所有制的个人占有方式，同时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它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创造了这种形式的物质和精神因素。

当人们还没有蒸汽犁、收割机、脱粒机以及其它农业机械的时候，可以继续保留小块土地并以这种形式由个人占有。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到来，只有把原来的小块土地合并而成的大片土地才可以存在。这使得土地集中势在必行。这种集中促使并要求实行土地的社会占有，且不说地产在股份公司的手中日益成为未分割的，即共同的产业。

工业方面的变化也是一样，而且还要迅速：个人可以占有的手摇织布机、纺车、手锯以及其它几乎是家庭式的工具已经被纺纱厂、锯木厂、机织厂所取代；这些工厂汇集了几十副锯子、几百部纺织机、成千上万个锭子。这便是工业的集中，是大型手工工场[manufacturiers]^①机构的社会占有的前奏；这些机构现在就已经

① 准确的用语应为“mécenifurrier”（机器工场），因为它不是手工劳动，而是使用机器劳动。但是由于法语中还没有这个词，不妨可以仿效英国人，他们把机械化工业都包括在fabrique（工厂）这个词里面，所以我们最好是用 usine（工厂）、usinier（工厂的）这样的词来指机器生产。

越来越不再是某一个人的产业，而成为未分割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同产业。一条铁路拥有大量车箱、机车、车站以及这种集体设备的其他部分，怎么能确定它的每个股票持有者的个人财产究竟是多少呢！

这种集中，是商业的规律，也是工业和农业的规律；它和它所带来的那种股份集产制是“所有制的集体占有方式的物质因素”，绪论谈到这种占有方式时，说它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所创造的”。

小块土地和工具是个人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说，一个人就足以经营或运用这些小块土地和工具。但是，大地产、纺织厂、纺纱厂、机器锯木厂则必然是集体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说，要靠大批工人的合作才能进行生产。

自耕农必须自己从事生产——自己耕耘、播种、收割、脱粒、修剪葡萄枝、收获葡萄和酿酒；个体工人，例如细木匠，就得自己挑选木料，设计家具，制作和装配各部件；而在机械化的工业和农业中，分工非常精细，所有操作都由各工种的工人同时去完成。大农业需要化学家对土壤和肥料进行分析，需要机械师开动蒸汽犁，需要专门家进行选种，如此等等。一个机械工场不能没有场长、会计、司炉、壮工、工头等。这些生产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制作整件产品，而是要由大家一起协作进行生产，各人所占的比例不定，也不可能确定。例如在一公尺呢绒中，且不谈纺织工，怎么能够算出机械师、司炉、工头、场长、壮工在那上面所付出的劳动量呢！所有这些人，虽然身份不一，但对于生产这一公尺呢绒都是缺一不可的。虽然——更正确地说因为——这些人所属的类别不同，但他们都是必不可少的，简直是谁都缺少不了谁，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时间随心所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当纺织工六点或七

点钟就到织布机旁等候蒸汽把机器开动，那么，最不守纪律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司炉也不能等到十点钟才上班。只有对现代化生产毫无概念的人才会认为，不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而且在任何时期，个人都可以在机械工场中随心所欲^①地工作，个别人可以任意开始或中止全体人的工作。劳动者一走进这种工场的大门，无论是场长、机械师或壮工就都得放弃自己的意志和个性而仅仅成为庞大机械的一个自动化不等和重要程度不同的齿轮，受这个机械支配，被这个机械带动。

集体劳动或共同劳动的必要性，各劳动者之间的互相依存，这些都是财产的集体占有方式的精神因素，这些因素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当然，精神因素还不仅是这些。

现代化生产最特殊的现象之一，就是生产力的指挥转到非所有主即无产者的手里。工程师、化学家、场长、工头、领班等等，一句话，工业的整个指挥班子都是从广大雇佣劳动者中招募来的。不管这些经济领导人的科学知识水平有多高，也不管他们个人的才能有多大，他们跟自己所指挥的工人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只是在工资的数额方面有别于工人——还加上他们表现得傲慢一些。尽管他们之间大部分人对于每天只领五、六个法郎的工人可

① 拉伯雷(无政府主义的文人试图拿他来替自己辩护)可以在他的德廉美修道院门上刻上：“做你所愿做的事”。不过，我们那些玩弄词藻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却没考虑到：首先，当这位十分大胆的中世纪的思想家在纸上建造他的理想的修道院的时候，那种把人变成机器的仆从的机械生产还没有出现；其次，这所修道院不是一个生产场所，而是一个娱乐或消费的场所。然而，在消费方面“做你所愿做的事”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拉伯雷在这方面是个预言家。他预料到我们所要走向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产品异常丰富，可以随意消费。但是，自由消费和自由生产之间，存在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可能做到的（而且也是将要做的），那就是为每个人和所有人逐渐缩减个人不能自由行动的劳动时间。

以表现出奴才的傲慢无礼，但他们仍然和后者一样都得听任游手好闲的产业主或金融家的支配，这些产业主或金融家的个人意愿对他们和对工人同样都有约束力。由于无产阶级既提供了生产的体力因素，也提供了生产的精神因素，因而，有朝一日，整个产业主阶级都会消灭，其财产将实现集体化或社会化，但生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丝毫损失。

换句话说，或者概括一下：人类社会以共同或集体所有制开始，个体所有制则是从纯属个人使用的物品（装饰品、武器等）开始，接着是占有房屋、土地、工具、资本，到了资产阶级掌握社会权力时，个体所有制才具备了它的绝对形式；然而，原始的集体所有制却从未完全消失。

随着个体所有制的扩大和实行机械化，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就不再使用其产业，而成为掠夺雇佣劳动者的人，由雇佣劳动者去使用这种产业，也只有雇佣劳动者才能使这种产业发挥效益。

这样，个体所有制就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个体所有制的扩大和实行机械化，越来越以集体的方式使用这种产业。它需要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集体，并导致新的高级集体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是靠损害个体所有制建立起来的，正如个体所有制也是靠损害最初的集体所有制才建立起来的，二者同样都是势在必行。

二

由于生产资料（工厂、土地、商店）在其使用方面越来越成为集体的，而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却仍然是个体的，这样，就产生两种结果：产品积聚在非生产者的所有主（资本家）手中，而非所有主的

生产者却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更加贫困。

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不为他们自己所掌握，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劳动者并不拥有他们集体使用的工具。他们享用的那部分劳动产品只限于维持生计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方面，而游手好闲的所有主对于劳动者为维持生计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即工资，总是力图而且必然要加以削减的，因为这是增加其利润的唯一手段。

因此，所有主就尽量延长工作日，而且延长得太过分了，使得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得不通过法律来进行干预，限制滥用工人的劳动力。在工业家之间所进行的斗争或竞争中，胜利是属于从工人身上榨取无偿劳动最多的那些工业家；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廉价抛售，垄断市场。因此，任何一个“好老板”（如果有好老板的话）都不可能超出微乎其微的限度去改善他的那些象机器一样的工人的状况。在雇主阶级当中，非但不去关心这种改善，反而竞相责备其雇佣工人偷懒，指责他们因为提出各种要求而使民族工业遭到破产。^①

因此，为了降低劳动力的费用，工厂主竟然彻底破坏工人的家庭；继雇用妇女之后还雇用儿童，让他们在工场中累断筋骨。妇女和儿童是比男子更为廉价的工具；所以，不管他们是愿意还是被迫，都被卷进了工业的齿轮机构中去，然而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掩盖不顾年龄和性别的资本主义剥削的丑恶，却一味在侈谈提高工人家庭的福利。

工厂机械的改进也并非为了其他目的。这种改进促使劳动简单化，同时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以使雇主节省一部分人员，用

① 1883年5月召开的中部地区可能派代表大会也随声附和资本家的这些怨言，把“提高工资”也列为“法国工商业不振”的原因之一。（第七项决议）

普通工人去代替熟练工人(因为后者的报酬较高),用妇女和儿童去代替成年男子。由于机器的使用和改进而被赶出工厂的失业工人,在饥饿的驱使下,不得不廉价出卖劳动力;从而他们就不由自主地成了压低在业同伴工资的工具。最终的结果是为劳动繁忙时期造成一批工业过剩人口即后备军,有了这支后备军就可以在平时克扣工资和延长劳动日。当本国的工业过剩人口不足的时候,那也不必担心;对老板来说,并不存在国际主义的罪过,他总是有来自外国的人力资源可以利用,而且越来越加以滥用;他可以从意大利、德国——必要时从中国——的饿鬼储备库中吸收所需要的人力,以此压低劳动力的价格,让本国同胞去忍饥挨饿。

机器的普及、发展和自动化,使产品和老板的利润成百倍地增加,但给雇佣生产者带来的只是劳动和穷困的加重。雇佣生产者为其主人创造的财富愈多,给自己制造的贫困就愈甚。他们所生产的和他们可以消费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的工资只够维持生计;他们生产的产品越多,他们就越是无法买回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

日益普及的职业训练以及其他训练也不会产生别的效果。工人阶级所组成的活的机器的完善,使得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用较少的人力完成同质等量的劳动,它使生产增加了,但是使又一批生产者遭到失业。

只要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者成为那些劳动工具占有者手里的工具,也就是正如纲领的绪论所说的那样,只要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工厂、船舶、银行等等),不管在任何制度下,所有进步都会反过来损害劳动者。

只有当生产者阶级破除了生产资料的个体占有,并以集体占有或社会占有来代替它的时候,生产者阶级才能不分性别和种族

获得自由，^①亦即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掌握现有的一切以及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切。

三

只有剥夺资本家阶级才能对已经变为集体使用的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或集体化。

那些回避说出剥夺这个字眼的革命者——因为有这样的人——认为不要以此吓唬群众；他们就象害怕这种做法、试图通过市镇竞争或举办公用事业来代替剥夺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一样，没有看到或不愿看到：

(1) 剥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变革的规律；

(2) 由于现制度的自然和必然的发展，所说的剥夺越来越易

① 而且，正如绪论所说的，在这种解放全社会的变革中获得自由的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现制度下的那些享受特权者(资本家)，可能自以为他们现在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真的是自由的吗？他们甚至连自身都保护不了，经常要受到工人阶级因贫困而引起和传播的瘟疫、伤寒、霍乱等的威胁，而且有时自己也被传染上。他们为了防止群众“袭击”而不得不以军队、法官、警察等形式加以维持和发展一支盲目的、消极的力量，但这支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发动雾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二日这一类政变的；因此，他们并不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力量而在政治自由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障。至于他们的财产(对于这些来路不正而又十分庞大的财产，他们就象海上遇难者抓住轮船的残骸那样，紧紧抱住不放)，由于各种折换(这是一种局部的破产)、邦图弗德式的暴跌、不可靠的公证人、娜娜式的贪得无厌的女人(这是对于迫使无产者的妻女卖淫的一种报复)，他们的财产不也是越来越保不住吗？

当然，尽管那些因破产而弄得家破人亡(每年六千家以上)或因生产过剩危机而垮台的资产阶级会象工人阶级一样从集体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社会中获得好处，但是却不要指望资产阶级去建设这种社会，也不要指望贵族阶级，因为贵族阶级作为所有主，本来可以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但它不是去促进、而只能说是“容忍了”这场革命。

那些特权阶级一向表现出不可能为自己成员的真正、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表面的利益。因此，必须不顾他们的反对，用革命的方式去解放他们。

于实现；

(3) 只有剥夺才是对被剥夺者的唯一补偿；

(4) 生产条件越来越使剥夺成为必不可免。

被奉为本世纪之神的工业进步的结果是对那些从前用自己的工具在家里劳动的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进行剥夺。他们被剥夺了：

(1) 他们的劳动工具。这些工具在他们手中已无用处，成了可以付之一炬的木头(纺车、刨子、织机等)；

(2) 他们多年学得的技艺。这套技艺已被车床所取代；

(3) 他们的家庭。由于妻子儿女都到工厂中去干活，这些家庭已空无一人；

(4) 他们的劳动果实。这些果实已由个体或集体雇主(老板、股东、证券持有人等)在利润或股息的名义下集中起来，纳入金库。

这就是现代化生产的过程，它完全是建筑在大鱼吃小鱼所造成的废墟上，可以说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都是如此：象“卢浮”和“邦马舍”这类特大商店的繁荣就是靠大批小铺子倒闭所造成的，正如“克列索”和“费夫—里尔”的发迹也是由几百个小作坊的破产而造成的一样。

相反，工人党纲领所要求和追求的剥夺是剥夺大产业主，为穷苦者谋利益，也就是剥夺少数掠夺者为大多数被掠夺者谋利益；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夺剥夺者。

对那些剥夺群众的人，只是让他们退还而已；这些剥夺者的人数由于彼此间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正在一天天减少。他们对生产漠不关心，象苏丹一样对生产一窍不通，这样，工人党的任务不但可能而且更易于实现。其实，领导生产的不是他们，而是一批优秀的雇佣劳动者。因此，剥夺他们的财产对于铁路、矿山、冶炼厂、炼

制厂、纱厂、织造厂等毫无影响，生产活动将一如既往，照样进行。

另一方面，唯有这种剥夺才是有补偿的；而到目前为止进行的所有其他剥夺都是没有任何赔偿的。试问，由于机织厂的出现而被剥夺的手工织布工人的赔偿金在哪里呢？由于铁路的建成而被剥夺的马车夫和卡车司机的赔偿金在哪里呢？由于自来水总公司的开设而被剥夺的挑水工的赔偿金在哪里呢？由于“布西科”和“雅吕佐”这样的大商场的建立而被剥夺的服饰用品商、衬衫商、鞋匠、地毯商等的赔偿金又在哪里呢？

在实行社会剥夺的情况下，将建立一系列保护儿童、老人和防止疾病等真正公用事业；那些名义上的受损者，即以前的资本家，也和其他人一样，可以享受这些公用事业，而且还会让他们参与掌管全部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等公共财产并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分享共同生产的果实。

鲁昂全国代表大会把马赛和哈佛尔大会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光荣地在纲领的绪论中明确地补充写上这种社会剥夺。这种剥夺不仅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或资本主义所有制给劳动者阶级带来超额劳动和贫困所引起的。它的出现是一种经济必然性，因为在机械和蒸汽的作用下，生产资料变得异常庞大，使得个体所有主无力指挥和控制。生产资料支配这些所有主，后者已无法按照消费的需要进行生产。生产资料迫使所有主让产品充斥市场，造成十年一度的生产过剩危机。这种生产危机比一次大战或一场瘟疫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它扰乱了整个社会结构，只有掌握自己的劳动工具和社会劳动产品的社会才能预防和制止这种危机。^①

① 例如，通过对需求的统计，以此作为生产的尺度和准则，同时可按照这些需求分配劳动者到社会活动的各个部门，并限制各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

四

但是，为了公益而剥夺那些谋私利的剥夺者的所有权，首先得由组成工人党的生产者阶级取得政权。资产阶级依靠所掌握的国家保护它所掠夺的财产，因此，正如我们绪论中指出的那样，要从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首先必须从政治上或政权上对它进行剥夺。

而且在这方面，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工人阶级的任务大大简单化了。过去——还不到三十年以前——，大资产阶级从勤劳和富有生气的小资产阶级那里找到了反对工人起义的盾牌和利剑。1848年，不仅巴黎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外省的中产阶级，完全步调一致地反对六月的起义者。那些新的资本老爷们对于这种效劳——真是救命之恩——究竟如何报答呢？他们竟不断榨取自己的同盟者和救星。大商号扼杀小店主，大工业家拧死小工业家，金融家掏空小资本家——甚至中等资本家——的腰包。小资产阶级不但不再维护大资产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而且由于不断被剥夺，已被抛到敌人的行列里。1871年，在二十几万张支持3月18日反资产阶级运动的选票中，有一半以上是属于小商业和小工业方面的。外省大量小资产阶级都同情巴黎起义；好几个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还用武装支持了起义，同时巴黎的一些资产者第一次在工人的指挥下参加了战斗。

1848年，巴黎和外省的国民自卫军争相屠杀那些“主张均产者”。1871年，尽管梯也尔得到路易·勃朗、格雷波和朗格卢瓦之流的支持，而且还一再号召，并以高额军饷为诱饵，但他连一个连的民兵也未能动员去屠杀官方电讯中所说的巴黎“共产主义者”，即公社社员们。

大资产阶级既不知道也没能力保卫自己，它只好把这一差事托付给警察、宪兵和被俘的士兵；由于出卖法国工业^①，凡尔赛镇压巴黎无产者的盟友俾斯麦把这些士兵交付给大资产阶级。

当大资产阶级还没有失掉全部锐气，当它还和小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要求组织国民自卫军的。它以自己能够保卫自己的财产和人身为荣；而波旁王朝却对大资产阶级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力量已经表示怀疑，因而不得不于 1830 年永远走上流亡之路。今天，大资产阶级由于觉得再也得不到它的受骗者和受害者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它怯懦万分；尽管国民自卫军不过是也只能是一支资产阶级民团而已，因为玩刀弄枪必须要有闲余时间，但大资产阶级竟要求解散整个国民自卫军，把这看作自身安全的首要条件。在共和制度下反而解散自卫军，那更是说明问题。

为了保卫自己所积聚的赃物，大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只有依靠警察和军队了。但是，警察的棍棒用来对付无害的游行示威者可能绰绰有余，而要对付战士那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至于军队，尽管今天还起保卫作用，明天将是个危险。军队陆续将健壮的居民吸收入伍，培养工人学会使用武器和集体作战，换一句话说，它在为行将到来的工人革命培养一批训练有素和遵守纪律的士兵。

正如纲领的绪论中所说的那样，唯有革命才能使生产者阶级夺取政权，并使政权服务于从经济上剥夺占少数的法国资本家以及实行生产力的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化。^②

① 法兰克福条约规定给予德国及其产品以最惠国待遇，但这不是互惠的。

② 为了避免任何曲解，我们应当指出，工人革命之后，只能是剥夺那些拥有由集体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诸如大地主，工厂主，冶炼厂主，银行、铁路、矿山、船舶等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任何革命政府都不可能也不愿意剥夺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剥夺雕刻匠的雕刻刀，剥夺细木匠的刨子和锤子。而且，一个胜任

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将不是靠关于要使用炸药的激烈言论，靠个别一些人物的英勇狂热行为，也不是靠和警察进行地方性搏斗或者局部拿起武器就能引起的。它也不会由于激进派首领或可能派首领的那一套政治经济玩艺儿，或由于连资产阶级国家也不得不实行的那一套工人改革而被制止或推迟。它将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欧洲的工业发展以及美洲和大洋洲的农业竞争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动荡而爆发。

可以说任何个人甚至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加速或制止象十九世纪所孕育的那样一场革命，但是一个明确认识到以经济变革为目标的政党是可以领导这场革命的。从马赛、哈佛尔和卢昂全国代表大会诞生的工人党正是要发挥而且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1848年2月24日和1870年9月4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让临时政府和所谓国防政府的资产者登上本阶级的国王和皇帝尚有余温的宝座。当劳动者大失所望，幻想破灭，拿起武器要求应得权益时——1848年6月是一次，1871年3月又是一次——，已经为时太晚了。这一点，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些新当权者——他们就是新的有产者阶层——已经有时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把不久以前还在互相争斗的资本家阶级各派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已经能够以血腥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工人的要求，因而他们实际上先发制人，主动挑战，例如关闭国有工场，夜袭蒙马特高地的炮台。

无论是1848年还是1870年，无产阶级都没有领导革命的准备。无产阶级虽然能够夺取胜利，但却不会利用胜利的果实，原因是没有纲领和组织。即使假定它仍然还掌握着巴黎，但它在任其自治

的革命政府还要让他们摆脱剥削他们的高利贷者和商人，并帮助他们减轻如此繁重而又报酬低微的劳动，直至通过事例使他们相信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具有优越性的时候为止。

的各省中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同时它也不懂得进行哪些经济改革。它的执政结果只是暴露了它的无能。它的胜利仅仅是暂时的。革命时期的困难之处，不在于夺取政权，而在于保住政权。

只有当各工业中心都发动起来并互相支持，而且在这些工业中心——它们是我们的积极的和第一线的队伍——中找到一些知道该做什么而且身体力行的人的时候，执政的无产阶级才能保住政权。

为此，应该使法国各地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领导人物熟悉有关剥夺资本家和实行国家占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一任务不久将落在他们身上，而且时间日益临近；同时应该使他们对立即实行的第一批改革措施取得一致意见。

在马赛、哈佛尔和卢昂举行的无产者代表大会因此制定了纲领，这是有关我们一旦掌握了国家以后所要实现的目标和实施办法的唯一纲领。

工人党过去致力于传播这个纲领；党不过也只能是个指导者和组织者，它用一切办法进行组织和指导：口头宣传（集会和报告会），书面宣传（书籍和报刊），实际行动的宣传（罢工、请愿、竞选等）。

当然，工人党之所以参加竞选，并不是为了赢得几个参议员或众议员的席位（它可以把这些席位让给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痔疮患者），而是因为在竞选期间可以让平时对会议最漠不关心、最无动于衷的那部分群众受到我们的教育，还因为在竞选期间可以迫使那些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物亲自出马，暴露他们的不良意图和无能，因为他们作为候选人角色是无法逃避表演的。

如果我们有些人真的闯开代议机构的大门，那也不过是为了在那里继续进行关于剥夺的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利用

资产阶级议会这个场所，把那些与拥有财产的资产者联成一体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物逼得走投无路。

译自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工人党的纲领；它的历史、
绪论和条款》1883年巴黎法文版第29—53页。

(建 恩译)

革命的次日*

〔法〕保尔·拉法格

美好的法国对进步向来是采取同情态度的。但是这里的一切事情只有通过暴力、经过革命才得以完成。为了阻止东京人占据总统的职位，不得不在巴黎以暴动相威胁；^①为了在各剧院装上电灯，竟需要对二百多人处以火刑。

在其他欧洲大国，资产阶级是逐步地、在不发生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取得政权的，在法国则引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革命。

法国统治阶级是很反动的，只有诉诸武力才能促使他们采取最微不足道的进步措施。从1815年起，在法国就存在贴着形形色色标签的议会制度，但是为了实行某些议会改革，例如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普选权等等，必须诉诸革命，从那时以来，革命以天体运行那样的周期性反复出现。下一次革命的期限很快就将到来。因此，弄清楚社会主义者在革命的次日将做些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是

* 本文原载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1887年第113、114、115、116号。拉法格在文中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面临的任务和应采取的措施作了探讨。
——译者注

① 这里所说的东京人指茹尔·费里，因为他参与了侵略越南北部（当时法国人称越南北部为东京）的殖民战争。当茹尔·费里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巴黎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译者注

有益的。

1871年，政权落到人民手里，但是那时人民还没有作好取得政权的准备。在革命时期夺取政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保持政权，尤其是运用政权，则要困难不知多少倍。

公社在占领巴黎后没有能够采取任何一项真正社会主义的措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未能这样做，可以用许多原因来加以解释，但现在不是说明这些原因的时候。

让资产者不要为公社的错误而兴高采烈吧！他们尽可以相信，如果有朝一日事态的发展导致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那时社会主义者将采取激进的、直接的措施，使幸灾乐祸的反动派无法再恢复从前的局势。



在革命的次日社会主义者将面临三项巨大的任务：

1. 组织革命政权和采取措施保卫这个政权；
2. 立即满足人民的需要；
3.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革命政党将遇到三个阶级，它们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这些阶级是：大工业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及其附属物——小工商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将在各工业城市中占统治地位，这些工业城市都将成为革命中心并建立联邦，以便把农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并克服在一些商业城市和沿海城市（例如哈佛尔、波尔多、马赛等）中出现的反抗。

在各工业城市中，社会主义者必须夺取地方机构的权力，武

装工人并且按照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布朗基曾说过，谁有武器，谁就有面包。他们将打开监狱的大门，释放那些小偷，而把诸如银行家、资本家、大工业家、大财主这样的大窃贼关进去。不会虐待这些人，但将把他们当作人质，以担保他们本阶级的良好行为。

革命政权将通过简单夺取这样的方式而建立起来，只有当新政权完全掌握局势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才会实行真正的普选制，以便使自己的行动得到确认。资产者曾经很久不让穷苦阶级获得选举权，因此，如果在革命政党巩固自己的胜利以前剥夺所有原先资本家的选举权，他们不应对此大惊小怪。

在十九世纪，不仅革命口号来源于巴黎，而且巴黎为整个法国进行了革命。革命运动之所以会这样集中，是因为十九世纪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一般的议会危机，伴随着街垒、枪击以及关于伟大的原则、关于自由、正义和其他无稽之谈的浮夸言词。巴黎人是一伙不可救药的轻信者，他们热衷于情节奇异的演出；政治活动家可以为他们安排随便多少这样的演出；但是正当大街上发生激烈的冲突时，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茹尔·法夫尔和茹尔·费里之流从反对派偷偷地爬上了刚刚被推翻的前任们留下的肥缺，而在经济关系方面一切原封不动。

但是，由于即将到来的革命势必是经济革命，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执政者来代替另一些执政者，它将同时在巴黎以及所有工业中心爆发。一旦建立起地方革命机关以后，这些机关必须通过派遣代表或其他方式建立中央政权。中央政权必须承担义务采取符合革命利益的普遍措施，并且防止组成反动党派。

但是为了使工人群众支持地方和中央的革命政权，为了使革命（即使是遭到失败的革命）留下任何反动派都无法消灭的成果，

必须立即满足城乡工人的需要，必须彻底动摇资产阶级制度，必须着手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

二

革命政权只有在得到工人群众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够抵抗反动派猛烈而又奸诈的进攻，因此，它必须立即采取满足工人们的最迫切需要的措施，把工人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必须回复到原始时代的社会观，并且承认国家的全体男女公民是一个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大家庭中已不再存在长子权；革命政权必须采取措施满足他们的最重大需要，以等待可以对全部产品实行平均分配的時刻的到来。

因此，将在每一个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必须向全体居民提供住房、衣服和粮食。

为此它将颁布法令，宣布所有房屋都是国家财产，对住宅进行登记，把游手好闲的富人迁出他们的私邸，把位置最好的房子分配给有很多孩子的家庭。在有六七层大楼的巴黎和各大城市，它将把下面的几层分给怀孕的妇女，而迫使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搬到五层楼和六层楼，让他们爬爬楼梯，以便减少他们身上多余的脂肪。工人们由于贫穷不得不居住的那些有碍健康的破旧小房将加以拆除和烧毁，以改善卫生；为了使这件事情进行得更快些，将用炸药来炸毁它们。要烧毁的不是宫殿，象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而是破旧的小房和茅屋；该是工人阶级搬到他们所建造的宫殿和私邸中去居住的时候了。

革命政权将把诸如“邦马舍”、“卢浮”、“普伦坦”等大商店收归国有。如果这些商店从前的老板胆敢从店里偷走哪怕一个线团，

革命政权就要把他们当作窃贼对待。在每一个街区和街道都要成立委员会，负责在工人中间分配这些大商店里的东西，工人们将第一次穿上他们自己制作的用漂亮结实的料子做成的衣服。

在向劳动人民提供住房和衣服之前，必须设法使他们得到食物。革命政权将在各城区开设大的共产主义食堂，那里向居民（不管是懒惰的还是勤劳的）每天提供起码可以吃饱的食品。厨房是公共的，而那些愿意在自己家里吃饭的人可以领取自己的一份，但是必须鼓励共同进餐的习惯，因为人们在进餐时最容易互相接近。在十八世纪的革命时代，巴黎公社曾组织过这样的聚餐会：在大街中间摆着一张张桌子，每个居民把自己的食物带到这里一起进餐。

为了能够向居民免费提供食品，革命政权将没收粮店、酒库和城堡、旅馆、啤酒店的地窖里所存的酒类以及其他物品，立即安排市镇的粮食分配，并为此同市郊的菜农和小农达成协议。这种分配方式取消既掠夺生产者又掠夺消费者的中间人，从而使农民有可能得到更有利的产品价格。

把农民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在法国是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大任务之一：必须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普遍措施，例如取消抵押贷款和各种债务，废除各种赋税和新兵招募等等。必须毫不动摇地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减轻他们的劳动，向他们提供优质的种子和肥料，而农民则用土地上的产品来偿还。

在1848年，为了使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以及临时政府的其他资产者成员有可能建立共和国，工人们“决定饿三个月的肚子以支持他们”。而在期满以后，当工人们要求他们履行自己的诺言时，站住了脚跟并掌握了局势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则用发射霰弹来报答。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革命政权将在开始时使工人们过三个月的舒适生活。

在革命的次日采取这些社会主义措施的政权将是不可战胜的；它会得到广大工人的支持，工人们将为终于找到这样的致力于满足他们需要的政府而感到惊讶和赞叹。

三

超越于个人争吵和派系纠纷之上的伟大思想，即废除个人所有制的思想，鼓舞着社会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这些自由放任主义的所有主原则的不自觉的代表，甚至象布鲁斯和若夫兰这样的可能派，这些资产阶级利益的无耻捍卫者，也受到共同的鼓舞。废除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不是自发地在人的脑子里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循序发展的经济现象在思想上的反映。

个人所有制有什么特点？它的特点是，所有主本人经管自己的财产，而不使用雇佣劳动，确实如此，农民作为从头到脚都浸透了所有主本能的人，当他由于年迈无法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就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儿子，为的是不让雇工来耕种这些土地并进行播种。土地是农民唯一心爱的东西。对于农民来说，放弃自己的土地就象割去他的内脏那样痛苦。尽管如此，农民还是决定分自己的土地。财产是劳动的成果这一句法国古老的谚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事实。由此可见，真正的所有主（从这个词的古老意义上看）是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是自己居住在自己小房里并自己加以修理的房主，是自己买卖自己小店里的商品的小店主，是用自己的锯子斧子干活的木匠。这些所有主占有的一切确确实实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的财产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不是他人劳动的成果，因为他们经管自己的财产，而没有使用雇佣劳动。

但是难道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具有这些特点？难道矿场、铁路

和运河的股票和债券的持有人、成百上千公顷土地的占有者是真正的所有主？难道他们曾经什么时候在自己的企业里劳动过或者自己耕种过自己的土地？他们只知道这个财产会给他们带来利息，而作为非所有主的雇佣工人则在属于他们所有的财产中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须修改那句古老的谚语，而这样说：财产是劳动的成果和对懒惰的奖赏。

资本家自己不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的财产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从而也就消灭了个人所有制的极重要的特征。

所有主—资本家在属于他所有的财产中是绝对无用的。铁路的全体股东和债券持有人都可以淹死在芒什海峡或地中海，而欧洲的铁路将同从前一样继续运载乘客和货物。所有主—资本家是无用的，他消费的东西却多得惊人。富人以及为之效劳并满足他的需要和奇想怪念的奴仆和其他人员所吃的一切，是纯粹亏损性的消费，就象把煤放在露天烧掉，而不是把它放在锅炉中燃烧，把得到的热能变成动力。既然资本家是无用的，就应当把他消灭，以便减少社会生产的费用。社会革命必须实现这种节约：它并不消灭财产，象无政府主义者狂妄地要求的那样，而是使之摆脱寄生虫。

在革命后的第一天革命政权将颁布的第一个法令是没收资本主义财产（矿场、纺纱厂、银行、炼铁厂、铁路等等）并把它变为国有财产的法令。

四

象贝·马隆公民和科兰的信徒们那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为，国家可以代替所有主—资本家，借助于工会来经营大型的劳动工

具(铁路、矿场、炼铁厂、纺纱厂等),这些工会将变成得到国家贷款的承租人合作社;另一些社会主义者则主张,国家继续在从前的基础上经营大型的劳动工具,但是同时对工人的状况作某些改善,例如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等等;他们的理想是完善资本主义的生产机构。

我们认为,通过建立革命政权这一事实本身,国家及其所有的机关(邮政局、电报局、警察、官吏、军队、国债等等)都将废除。

国家是为了替资本家利益服务以及镇压和奴役无产阶级群众而精巧地建造成的机器。暂时取代国家的革命政权必须破坏资产阶级机器,完全依靠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并奠定新制度的最初基础。

革命政权不应当使国家继续成为邮政局和电报局的主人,铸造货币,管理铁路(它已经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样做),不应当使国家成为棉纺厂的主人、工厂的厂长等等——象拉萨尔所希望的那样,而应当使工人们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和老板,自己的厂长。

革命政权不应当把厂长、劳动规章和工资定额强加给邮递员、电报局和铁路的职工、矿工和翻砂工人,与此相反,这些工人将互相商量,选举出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车间主任,并且在相互之间分配经营所得的收入。我这里谈到收入,只是因为革命的次日必须保持资本主义的劳动报酬,但是我们预料到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工人将不再领取工资和个人收入,而是平均地享用所有的社会财富。在革命的次日,革命政权所代表的民族把劳动工具交给生产者支配;一些专门委员会负责确定各企业承担的职责范围,也就是对向企业提供的效劳的报酬,对折旧、修理和改善设备所作的扣除,并确定为了使社会全体成员都得到粮食、住房和衣

服必须向社会基金提交的数额。

在革命的次日要完成的工作是大量的，因此不应把革命政权变成纺纱厂或制鞋厂的厂长而增加它的工作，相反，必须加快发展工人群众中所有那些将负责领导社会劳动的机关。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是有的，因为正是雇佣工人现在领导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必须把他们集合起来，建立负责调整生产和公平地分配产品的委员会。

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使正义、道德、自由以及许多世纪以来使人类受到愚弄的其他无稽之谈获胜，而是使工作尽可能少一些，智力和体力方面的享受尽可能多一些。而要达到这个真正无愧于人的目的，只有不断改善机械设备，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实行合理的分工，只有使社会的生产和需要互相适应。

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都将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在实现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还不得不保存货币形式的工资，并且根据向社会提供的效劳以及所作的努力确定工资额。我们认为，工人们将比任何一个国家官吏能够更好地在相互之间分配劳动时间和经营所得的收入。

不过，在这一方面只能表达一些愿望；这种或那种道路和行动方式将由事件的发展来决定，十分可能的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各种不同改造方式将根据各种条件不同地配合起来。

在革命的次日人们将渴望娱乐一番。在十八世纪，农民们冲进了城堡和市议会，夺取了各种封建的和甚至资产阶级的文据并加以烧毁，他们大放焰火，在那上面可以看到这样的题词：废除什一税，彻底停止交纳代役租等等。必须恢复这些公共庆祝活动。我们必须焚毁国债簿，各种各样的契据，以及各种道德说教文章和神学书籍，而最主要的是焚毁全部民法典和刑法典，在这部可怕的

书中，汇集了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卑鄙肮脏行为，我们还必须把法院的建筑物改作猪圈，但是将找不到那么多肮脏和丑恶的动物放到那里去。我们将不是象自由思想者所要求的那样把教堂烧掉，而是把它改成饭馆和跳舞厅，小礼拜堂将改成雅座，人们可以在那里喝酒，每个人可以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娱乐。

在革命的次日必须武装工人，并且按照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免费提供住房、食物和衣服，没收资本主义财产并实行国有化。这种半共产主义制度哪怕只实行了一个月，尝试过它的民族就将永远被社会革命争取过来。

译自《拉法格选集》1925年莫斯科
俄文版第1卷第328—337页。

(李枫秋译)

共产国际的五年

(决议和数字)

[苏]A·季维尔编

I 共产国际的活动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

“由于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经常提出新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使世界革命有被扼杀的危险；由于社会主义的叛徒们的政党企图……协助自己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再度欺骗工人阶级，最后，由于从革命中取得了异常丰富的经验，以及整个运动的国际化，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召开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一事，首先提到日程上来。”

(摘自《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邀请书》，1919年1月24日)

“由于无产阶级行动有协调一致的绝对必要，所以需要成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

(摘自《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
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我们的任务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清除运

动中的蜕化的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杂质，动员世界无产阶级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的力量，从而促使和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

（摘自《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告世界无产者宣言》）

一、总的形势

（一）国际形势

“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崩溃。殖民地的骚动，以前没有独立的弱小民族的骚动，无产阶级的起义，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军队的瓦解，统治阶级完全无法再掌握人民命运的处境——这就是当前整个世界的形势。”（摘自《共产国际纲领》）

“战后马上使不下十二亿五千万人遭受殖民压迫，遭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十二亿五千万，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战败国和陷于殖民地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二亿五千万，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陷于依赖美国的地位，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从属地位……最后，不到二亿五千万的居民属于战胜国，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享受瓜分世界的利益……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从属地位，就是在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尖锐化了。”（摘自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所竭力反对的经济生活国家化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现在的问题在于今后谁将是国家化生产的体现者，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摘自《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用一切力量、挖空心思、坚决地准备在行将到来的内战中镇压无产阶级，不怕犯下任何罪行，使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方遭到饥饿和屠杀。”（摘自列宁的文章《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7月14日）

（二）工人阶级的形势

“整个德国在国内战争的紧张局面下陷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在德国，没有一个市镇的工人阶级不发动起义来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权的。在巴尔干半岛，阶级斗争在沸腾，正在转变为国内战争。在土耳其，革命爆发了。在奥地利和捷克，工人们团结在共产主义的光荣旗帜下。在法国，声势浩大的工人示威已经开始了。在意大利，斗争达到高潮，共产党人在号召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英国，罢工的浪潮已在冲击全国。工人苏维埃正在各处建立起来。在美国，工人阶级已经上街游行了。在日本，工人骚动正具有日益广泛的规模。在中立国荷兰、瑞士，成千上万的工人不久以前参加了政治罢工。”（摘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1919年五一节的宣言》）

（三）黄色国际

“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的机会主义性质，终于在事态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采取革命的斗争方法时，暴露无遗，造成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破产。如果说，1870年的战争打击了第一国际，并说明该国际的社会革命纲领还没有得到坚强的群众力量的支持，那么，1914年的战争就粉碎了第二国际，并说明劳动群众虽然紧密团结，却处在业已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附属机关的政党支配之下。”（摘自《共产国际告世界无产者宣言》）

“……假如国际不是被那些在危急关头拯救了资产阶级的叛徒们控制的话，战争刚刚结束的许多交战国家，以及人民已经武装

起来的某些中立国家，很可能会迅速地发生革命，那时候结局就会不同了。”（摘自列宁 1920 年 3 月 6 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会上的演说）

“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的破产，最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完全不能了解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完全不能了解它的历史地位及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必然性。”（摘自列宁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 年 4 月 15 日）

“借甜蜜的调和词句来拒绝不可避免的国内战争（如考茨基之流的先生们所做的那样），就等于直接背叛无产阶级，就等于在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摘自列宁的文章《论第三国际的任务》）

“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同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谢德曼辈，同为资产阶级执行刽子手职务的谢德曼辈站在一个组织里。”（摘自列宁的文章《论第三国际的任务》）

（四）苏俄的形势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封锁俄国，把苏维埃共和国看做传染病的策源地，竭力使它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 这些先进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国家，拥有全副武装，在军事方面独霸全球，却象害怕烈火那样，害怕从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饥饿的、落后的、据他们说甚至是半野蛮的国家散播出来的思想传染病。”（摘自列宁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二、国际共产主义会议的召开

1919 年 1 月 24 日，（1）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协同、（2）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国外局、（3）匈牙利共产党、（4）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5）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6）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以及（8）美

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由列宁、托洛茨基、卡爾斯基、魯德尼揚斯基、杜达、罗金、西罗拉、拉柯夫斯基和雷恩施坦签署,发出了关于“召开新的革命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邀请以下党派和团体参加:(1)斯巴达克联盟(德国)、(2)俄国共产党(布)、(3)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4)匈牙利共产党、(5)波兰共产党、(6)芬兰共产党、(7)爱斯特兰共产党、(8)拉脱维亚共产党、(9)立陶宛共产党、(10)白俄罗斯共产党、(11)乌克兰共产党、(12)捷克社会民主党革命派、(13)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捷斯尼亚克派”^①)、(14)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15)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左翼、(16)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7)挪威社会民主党、(18)丹麦“阶级斗争”派、(19)荷兰共产党、(20)比利时工人党革命派、(21)、(22)法国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中基本上支持洛利欧同志的派别与组织、(23)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24)意大利社会党、(25)西班牙社会党左派、(26)葡萄牙社会党左派、(27)不列颠社会党、(28)英国社会主义工党、(29)英国产业工人组织、(30)英国世界产业工人协会、(31)英国工厂工长运动革命派、(32)爱尔兰工人组织中的革命派、(33)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34)美国社会党革命派(德布斯派和社会主义宣传联盟)、(35)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协会、(36)澳大利亚世界产业工人协会、(37)美国国际产业工人同盟、(38)东京及横滨社会主义团体(以片山同志为代表)、(39)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以明岑堡同志为代表)。

三、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

1919年3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上,由(1)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2)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3)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4)匈牙利共产党的代表们提出关于成立共

^① 即“紧密派”。——译者注

产国际的议案。

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团(参看《第一次代表大会》一章)一致通过提案,德国代表团弃权。

提出关于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由下列代表签署:德国——麦克斯·阿尔伯特,俄国——И·列宁,奥地利(德意志)——И·К·格鲁别尔,匈牙利——А·鲁德尼扬斯基,瑞典——奥托·格里姆龙德,瑞士——弗里茨·普拉廷,美国——鲍里斯·雷恩施坦,巴尔干联盟——Х·拉柯夫斯基,波兰——温什利赫(尤罗夫斯基),芬兰——И·西罗拉,乌克兰——斯克雷普尼克,拉脱维亚——К·盖利斯,爱沙尼亚——汉斯·佩葛尔曼,亚美尼亚——艾库尼,伏尔加河流域德国人移民区——Г·克林格尔,俄罗斯东部各民族——雅雷莫夫、弗兰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昂利·吉尔波。

四、结论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百年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天才的预见,这个天才的理论已开始成为现实……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摘自列宁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9年3月2—6日)

“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

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摘自列宁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大家知道，而且每个人都根据本国的经验看到、感觉到和体会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沸腾起来…… 这个运动正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尽管还有种种动摇，尽管遭到严重失败，——它正迈向苏维埃政权。”

（摘自列宁的文章《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1919年3月5日）

（一）代表大会的组成

十九个政党和组织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三十三名，十六个组织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十九名。

有表决权的代表：1、德国共产党；2、俄国共产党；3、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4、匈牙利共产党；5、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6、挪威社会民主党；7、瑞士社会民主党（反对派）；8、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9、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捷斯尼亚克派”，罗马尼亚共产党）；10、波兰共产党；11、芬兰共产党；12、乌克兰共产党；13、拉脱维亚共产党；14、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15、爱沙尼亚共产党；16、亚美尼亚共产党；17、德国人移民区共产党；18、俄罗斯东部各民族联合团体；19、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有发言权的代表：1、捷克共产主义派；2、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派；3、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派；4、英国共产主义派；5、法国共产主义派；6、荷兰社会党；7、美国社会主义宣传联盟；8、瑞士共产主义派；9、土耳其斯坦；10、土耳其；11、格鲁吉亚；12、阿塞拜疆；13、

波斯；14、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5、朝鲜工人协会；16、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

(二) 议程

1、成立第三国际；2、各政党代表报告；3、共产国际行动纲领；4、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5、伯尔尼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6、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7、共产国际宣言；8、白色恐怖；9、选举。

(三) 主席团

主席列宁；成员阿尔伯特、普拉廷。

(四) 报告

1—15、各国的报告；16、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报告人列宁；17—18、关于共产国际行动纲领——报告人阿尔伯特和布哈林；19—20、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和伯尔尼会议——报告人普拉廷和季诺维也夫；21、关于俄国共产党和红军——报告人托洛茨基；22、关于白色恐怖——报告人西罗拉。

(五) 发言人数——二十三。

(六) 讨论问题总数——四十三。

1、一般政治问题总数——十；2、组织问题总数——三；3、个别国家问题总数——十五；4、委员会数目——二；5、决议案数目——八；6、呼吁书数目——四；7、提纲数目——一。

(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选举

下列政党的代表应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俄国、德国、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巴尔干联盟、瑞士、斯堪的纳维亚。

(八) 重要决议

1、关于成立第三国际；2、关于共产国际行动纲领；3、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和伯尔尼会议；4、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

盟。

(九) 重要呼吁书和提纲

1、共产国际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关于成立第三国际); 2、给世界各国工人的备忘录(关于苏俄); 3、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

(十) 结论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这不仅记载了俄国人、俄罗斯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而且记载了德国、奥国、匈牙利、瑞士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一句话,这记载了国际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才是牢固的事业。”(摘自列宁的文章《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

“1919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向全世界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宣布共产主义的纲领。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任务》,1920年5月14日)

“1919年3月4日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是伟大的、难忘的日子!各国劳动人民将永远纪念这个日子,压迫者和剥削者则将永远对它咬牙切齿,直到我们把资产阶级脏东西从地球上清除为止。”(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巴黎,伯尔尼,莫斯科》,1919年)

“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仅撕下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假面具,而且撕下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爱国主义和和平主义假面具。”(摘自拉狄克的文章《世界革命的五年,共产国际的四年》)

“卡尔·马克思曾经站在第一国际的摇篮边;当第一国际于1873年死亡时,他曾经站在它的床头旁。他在给同志的一封信中

说：‘不要担心，朋友，如果说现在国际死亡了，那么再过几十年，新的国际将以更加相适应的精神复活起来。’现在，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在实现。第一国际恢复起来了，它活在我们大家的心中，活在每一个诚实的和有觉悟的工人的心中……这个第三国际已在1919年3月4日成立。”（摘自季诺维也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

（1919年2月6日^①—1920年7月19日）

“1919年的共产国际主要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团体。1920年的共产国际则成为向资本主义堡垒进行直接攻击的工人人们的战斗协会。”

（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共产国际今昔》）

一、总的形势

（一）国际形势

“国际联盟，所有协约国，全体资产阶级无力为恢复欧洲的经济生活作出某种重大的事情。资产阶级无能对付它所面临的和需要解决的任务，如果它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话。”（摘自季诺维也夫在1920年7月19日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事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和覆灭。卡普和卢特维茨将军试图在德国发动反革命政变。

^① 应为3月6日。——译者注

(二)工人阶级的形势

“目前，阶级斗争几乎在全世界都具有内战的性质。”(摘自季诺维也夫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在美国，第三国际的拥护者遭到火和剑的迫害，逮捕事件成千上万起地发生。在德国，我们党不得不将大部分成员转入地下。在奥地利，白色社会民主党人长期来以最残酷的方式迫害第三国际的拥护者。至于匈牙利就更不用说了，在那里任何一个诚实的人，就连稍微被怀疑为柏拉图式地同情共产国际的人也要遭到杀害。在法国，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优秀代表不久前刚刚被投入监狱；在瑞典，一些最著名的同志由于同情共产国际而遭到几个月的监禁。在民主芬兰，独立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不久前都遭逮捕。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白色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公开地扮演着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角色。”(摘自季诺维也夫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懂得，在国际工人阶级由于帝国主义战争而经受的危机之后，工人阶级必然会经受一次巨大的思想危机，这是十分自然的。工人阶级本来应当了解自己的使命并从自己的队伍中推举出新的领袖，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来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叛徒。”(摘自季诺维也夫 1920 年 8 月 12 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三)黄色工会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欧美工人政党要治好这种病症比我们要困难。我们都知道，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医治这种病症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没有取得最后的决定的胜利，全世界工人政党、无

产阶级革命政党远没有肃清资产阶级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摘自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二国际的情况是：第二国际（伯尔尼和卢萨恩）已恢复，德国独立党、法国统一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瑞士社会党、西班牙社会党、美国社会党、俄国孟什维克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退出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成立。阿姆斯特丹国际参加国际联盟劳工局。

（四）苏俄形势

封锁在继续。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的活动

（由于在下列引文中已经说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一时期的工作条件以及缺乏经过加工的材料，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资料很不完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总的工作条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在活动的初期。残酷的封锁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同欧美共产党人的联系方面造成了极大困难……”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除俄国共产党外，还应有六个政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德国、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巴尔干联盟、瑞士、斯堪的纳维亚。然而情况是这样：德国党未能派出自己的常任代表；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的代表最近才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只是断断续续地派出自己的代表；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不久前才成立，它的代表于1920年春才来到；匈牙利党没有自己的代表；瑞士党虽派有代表，但不久就走了。这样一来，俄国共产党中央和它所专门派出的代表同志们不得不承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几乎全部日常工作

作。代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有巴拉巴诺娃、别尔津、布哈林、沃罗夫斯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列宁同志和其他人也作为俄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参加重要会议。执委会利用有威望的外国同志到来的每一个机会，吸收他们短期参加执委会的工作。”（摘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二）执行局的组成：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有巴拉巴诺娃、沃罗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克林格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迈耶尔、鲁德尼扬斯基、克林格尔。

（三）执行局会议数目——五十以上。

（四）通过呼吁书的总数——五十六。

1、一般性质的呼吁书——三十一。

2、向个别政党发出的呼吁书——二十五。

德国——七，斯堪的纳维亚——四，法国——三，美国——二，匈牙利——二，捷克斯洛伐克——一，东方——一，俄国——一，乌克兰——一，芬兰——一，巴尔干——一，意大利——一。

（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解决的重大问题

1、一般性质的问题：

共产党人参加议会——同“左倾”观点进行斗争。

反对“左派”共产党人抵制工会和为共产国际争取工会。

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的必要性。

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意义（同美国的工团主义者进行斗争）。

同黄色国际进行斗争。抵制伯尔尼和卢萨恩。

7月21日总罢工。

2、国际共产主义和革命组织的问题：

召开工运活动家第一次国际会议并建立红色工会第一个国际

支部。

参加召开共产主义青年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成立青年共产国际^①。

筹备妇女共产主义者国际会议。

3、个别国家的问题：

美国——争取两党合并。

德国——反对共产主义队伍内的分裂，反对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参加工会和关于卡普叛乱问题上的错误。弄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德国人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芬兰——帮助党转入地下，任命党的临时中央。

乌克兰——乌克兰共产党和鲍罗齐巴分子^②实行合并。

奥地利——克服党内危机的工作。

巴尔干——建立联盟。

法国——筹备成立统一的共产党。

英国——弄清英国运动的特点。

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建立联系并试探谈判。

东方——召开由东方国家革命政党代表参加的会议，筹备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

(六) 重要的呼吁书

1、一般性质的呼吁书：

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告各国工会书。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告各国劳动者书。关于1919年五一节告全世界劳动者书。关于抵制黄色国际告各国工人书。关于苏俄两周年纪念告各国无产者书。

① 旧译“少共国际”。——译者注

② 即“斗争派”。——译者注

关于凡尔赛和约告全世界劳动者书。告各国劳动者书——号召起来保卫世界革命。关于武装干涉的新形式告英、法、意、美工人书。关于波兰问题告各国工人书。关于1920年五一节告全世界劳动者书。关于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2、个别国家的呼吁书：

致匈牙利、意大利、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党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关于加入共产国际致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呼吁书。关于议会制和争取苏维埃的斗争给意大利共产党的通告信。关于巴库代表大会致东方各民族的呼吁书。关于德国内战告德国和全世界工人书。关于德国独立社会党致德国工人的呼吁书。致巴尔干和近东无产者的呼吁书。关于声援俄国工人阶级而开展鼓动周致斯堪的纳维亚工人阶级的呼吁书。

(七)出版物

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定期刊物二十种。用各种文字出版的不定期刊物二百种。

(八)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派和日期

1919年3月19日——意大利社会党米兰委员会。

4月8日——挪威社会民主工党。

5月10日——瑞典社会主义民主青年团。

6月14日——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

6月22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捷斯尼亚克”派)。

7月20日——波兰共产党。

7月16日——瑞士的意大利社会党人。

7月16日——瑞士社会民主党。

8月——美国社会党。

8月——东加里西亚共产党。

- 9月——阿尔萨斯-洛林社会党。
- 9月——美国的乌克兰社会党联盟。
- 9月——芬兰工人组织。
- 10月——不列颠社会党。
- 10月——巴伐利亚独立党人。
- 11月——丹麦社会民主党一部分。
- 12月——波希米亚、洛林和墨西哥的社会党。
- 12月——南斯拉夫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120000人)。
- 12月——朝鲜社会党人。
- 12月——欧洲青年工人代表大会(220000人)。
- 12月——西班牙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一少数派。
- 12月——在斯堪的纳维亚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共产主义决议(300000人)。

1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并与第三国际发生联系。

三、结论

“现在离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一年多一点，我们就战胜了第二国际。现在苏维埃思想不仅在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当中已经传播开来……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进行宣传，只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基本的思想，只是在发出斗争的号召，我们还只是在考虑究竟在什么地方有人能走这条路，而现在，我们到处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到处都有了无产阶级的部队，虽然有时组织得不好，还需要改组。”“我们还没有取得最后的决定的胜利，全世界工人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政

党远没有肃清资产阶级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我们都知，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医治这种病症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摘自列宁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我们志同道合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我们旗帜的感召力在日益扩大。共产国际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世界先进工人的心，但是我们也不能向自己隐瞒，我们对国际运动的组织影响还比较薄弱。我们还远没有成为一个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国际组织。”（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

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7月9日—8月6日）

“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会在中途碰到许多困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或者指出一些实际工作的规则，使得我们今后在亿万人当中能够有组织地、协调地、有步骤地进行工作。”

（摘自列宁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现在我们希望成为规模巨大和性质有所不同的组织。现在我们希望的不是成为一个宣传团体，我们希望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应该在这方面作出新的贡献。我们希望组成一个战斗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宣传共产主义，而且实现共产主义，并希望

为此目的而建立一个国际组织。”

(摘自季诺维也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报告)

一、代表大会的组成

(1)有表决权的政党四十八个，有发言权的政党十六个——总共六十四个政党和组织。

(2)有表决权的代表一百六十九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四十五名——总共二百一十四名代表。

(3)政党：

有表决权的：1、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2、阿塞拜疆共产党；3、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4、美国独立社会主义青年团；5、英国世界产业工人协会；6、英国“斯图亚特王家”工厂；7、亚美尼亚共产党；8、比利时共产党；9、保加利亚共产党；10、匈牙利共产党；11、加里西亚和布哥维那共产党；12、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13、德国青年团；14、荷兰共产党；15、荷属印度共产党；16、格鲁吉亚共产党；17、格鲁吉亚青年团；18、丹麦共产主义教师俱乐部；19、丹麦左派社会党；20、爱尔兰工党；21、爱尔兰世界产业工人协会；22、西班牙全国劳动联盟；23、意大利社会党；24、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联盟；25、朝鲜共产党；26、拉脱维亚共产党；27、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28、墨西哥共产党；29、挪威工党；30、挪威青年团；31、波斯共产党；32、波兰共产党；33、俄国共产党；34、俄国青年团；35、土耳其共产主义组织执行局；36、芬兰共产党；37、法国第三国际委员会；38、法国社会党；39、法国青年团；40、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41、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翼；42、瑞士共产党；43、瑞士社会民主党(左翼)；44、瑞士青年团；45、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46、南斯拉夫共产党；47、爱沙尼亚共产党；48、青年共产国际。

有发言权的：1、郇山工人世界联合会；2、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3、澳大利亚产业工人协会；4、英国青年工人全国同盟；5、匈牙利青年共产国际；6、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7、德国工团主义者；8、布哈拉共产党；9、印度；10、中国工人党中央局；11、爱尔兰共产党；12、崩得；13、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者党；14、芬兰社会主义工党；15、法国共产党；16、爱沙尼亚独立社会党人。

二、代表大会主席团

罗斯梅、列维、塞拉蒂、列宁、季诺维也夫。

三、议程

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结报告。2、各政党代表的总结报告(书面)。3、世界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4、关于议会制问题。5、工会和工厂委员会。6、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后的作用和结构。7、民族和殖民地问题。8、土地问题。9、对待新出现的中派的态度。10、章程。11、组织问题。12、青年运动。13、选举。

四、报告

1、国际形势——报告人列宁。2、关于波兰的形势——报告人马尔赫列夫斯基。3、关于党在夺取政权前后的作用和结构——报告人季诺维也夫。4、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报告人列宁。5、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报告人季诺维也夫。6、关于议会制问题——报告人布哈林。7、关于议会制问题的副报告——报告人波尔迪加。8、工会运动——报告人拉狄克。9、土地问题——报告人迈耶尔。10、共产国际章程——报告人卡巴克契也夫。11、可能成立苏维埃的条件——报告人季诺维也夫。12、世界语——报告人派斯当纳。

五、发言人数——六十九。

六、讨论问题的总数——五十。

1、一般政治问题——十；2、组织问题总数——二；3、个别国家问题总数——八；4、委员会数目——十；5、决议数目——九；6、呼吁书数目——十一。

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选举

1、俄国——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布哈林、柯别茨基；候补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别尔津、切普洛维奇、斯大林、巴甫洛维奇。2、德国——列维；候补委员：迈耶尔。3、法国——罗斯梅。4、英国——奎耳奇。5、美国——里德。6、意大利——塞拉蒂；候补委员：西撒尔。7、奥地利——雷斯涅尔。8、斯堪的纳维亚——弗里斯。9、保加利亚——沙布林。10、南斯拉夫——米尔基奇。11、远东——朴。12、近东——苏丹-扎德。13、芬兰——曼涅尔。14、波兰——拉狄克。15、荷兰——怀恩科普、扬松。16、拉脱维亚——斯图契卡（有发言权）。17、格鲁吉亚——齐哈卡雅。18、青年国际——沙茨金。

八、重要决议

1、关于夺取政权前后党的作用。2、关于共产国际对议会制的态度。3、关于土地问题。4、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5、关于工会的工作和工厂委员会的意义。6、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章程。7、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九、重要的呼吁书

1、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宣言；2、告各国无产者书。关于苏俄向波兰进攻的意义；3、告全世界工会书。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消极意义；号召加入红色工会国际。

十、重要的委员会：

1、关于党的作用。2、关于议会制。3、关于工会运动的任务。4、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5、关于土地问题。6、关于加入

共产国际的条件。7、章程。8、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十一、结论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成立大会。代表大会第一次制定了章程。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作用的一些主要决议；简单扼要地确定了共产国际的策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一些同志，如对一部分英国人、美国人和意大利人进行斗争，他们感到自己是左倾反对派。例如，在英国同志参加工党的问题上，英国人几乎一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参加工党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认为，我们无疑必须参加每一个群众性组织，成立支部并在其中争取影响。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共产主义团体作了明确指示，要他们参加象工党和工会这样的组织。

此外，我们还不得不在议会制问题上同我们的左派进行斗争。波尔迪加及其同伙在这个问题上向我们宣了战。许多瑞士的和比利时的同志们支持他们。我们反对这种观点，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是共产党人不应拒绝革命的议会制。”（摘自季诺维也夫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我们坚决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英国的工厂委员会和法国工团主义者所表现的左倾。”（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共产国际的策略》）……“我们也坚决反对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集团的左倾。第二次代表大会是谨慎地对待这些左倾反对派的，它耐心地解释了这些‘左派’同志们的一切错误，并同其中的许多人取得了革命的合作。”（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斗争的一年》，1921年5月24日）

“在著名的二十一条中有了进一步的说明。它的矛头是反对机会主义、中派和半中派分子的。我们的左派不是敌人，而只是有宗派主义情绪的朋友；而我们的右派则完全是敌人营垒。在第二

次代表大会期间，总的形势是这样：加入共产国际是时髦的事。每一个比较狡猾的中派分子都试图加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右派，因此制定了二十一条。”（摘自季诺维也夫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二次代表大会使每个政党懂得，加入共产国际不仅是权利和荣誉，而且负有义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条件是将改良主义分子和半改良主义分子从共产国际所属的一切政党中驱逐出去。”（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

“其次，我们讨论了土地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后备军，这个后备军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必须带领一部分农民跟随自己，并至少使另一部分农民中立。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我们的土地问题决议，只有几个人弃权。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因为我们回答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我们城市无产阶级群众的政党应当如何随机应变，以便从最初之日起就从农村得到一批又一批的后备军。”（摘自季诺维也夫在1920年8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其次还讨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现在东方正在觉醒，千千万万的人们只对第三国际抱着信任态度。参加我们代表大会的有第一批东方的共产主义代表，他们是第一批春燕；我们有印度、土耳其、波斯、朝鲜和其他一系列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的代表。我们同他们一起制定了共同斗争的提纲。当他们站立起来时，整个地球将会颤抖，那时大家就会明白，资本主义的最后时刻来临了。我们在提纲中说，根据列宁同志的倡议，在没有工人而农民占着多数的那些国家里，苏维埃制度也是可行的。”（同上）

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

(1920年8月6日—1921年6月22日)

“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主义的策略基础。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全世界工人运动中，为捍卫这些极其重要的原理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斗争的一年》，

1921年5月24日)

“我们应该在国际范围内建立铁的纪律……我们说过，我们需要的不是无形的组织，而是统一的、集中制的国际工人阶级组织……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协调的、统一行动的国际。”

(摘自季诺维也夫在1920年7月13日彼得格勒

苏维埃会议上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一、总的形势

(一)国际形势

“世界经济危机目前达到了顶点。在英国，失业人数曾经达到五十万。物价日益上涨，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失业者现已达一百万。在法国，失业现象在日益增加，商品储备日益积压，银行缩减了信贷。这类危机必将迅速蔓延到各国，实际上危机已经来临。工厂开始倒闭，商品交换开始萎缩。诚然，在一些国家里，至少是大托拉斯还在增加，但是它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再有以往那种稳定平衡的世界，而是随时有可能遭受彻底崩溃的世界。被危机的规模

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对工人发动了总进攻。萧条在工人中间产生了一种过滤现象，摆脱了工头，重新审定和减少了工资。在这可怕的失业现象严重的时刻，恢复了十小时工作制。”（摘自季诺维也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二）工人阶级的形势

“我们看到在欧洲和美洲有成百上千万的失业工人，此外还有无数工人不能充分就业。不久前，英国煤矿工人进行了令人震惊的罢工，这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极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意大利，铁路和邮政人员的罢工开始了。在德国，镇压的枪声还没有沉寂下来，前几天又在巴伐利亚爆发了为期三天的罢工。在法国，工会运动内部的斗争正在高涨，在许多大的工会中，斗争正以革命派对机会主义派的胜利而告终。”（同上）

（三）黄色国际

“工会国际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帮助工人们进行斗争。相反地，它竭力使问题模糊起来并到处削弱工人们的反抗，因为它的政策不是斗争的政策，而是阶级合作的政策。工会国际的首领们使工人们解除了武装，并向工人们宣扬妥协。这就是共产国际所以认为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国际联盟国际劳工局的黄色联合会的原因。”（摘自罗斯梅的文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名誉主席托马斯的命运就是第二国际命运的最好象征。当煤矿工人罢工爆发时，托马斯将罢工出卖了。叛卖行为是如此地可耻，以致他不得不暂时去美国。当他乘船在美洲大陆上岸时，美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以示威抗议来迎接他。”（摘自季诺维也夫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退出第二国际但没有参加共产国际的许多政党在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这个联合会博得了第二半国际的

绰号，因为它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动摇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共产国际年鉴》，1923年）

（四）苏俄的形势

“内战结束了。由于向和平建设过渡，产生了新的困难……在这个转折关头，俄共党内必然出现意见分歧。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大争论发生了。但是可以预期，通过这场争论，党将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统一……由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再一次审查了对待农民的态度并……在经济政策方面制定了最现实的路线。”（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斗争的一年》）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的活动

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组成（见第二次代表大会）。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数目——三十一。

3、执行局成员：

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柯别茨基、迈耶尔、鲁德尼扬斯基，以后还有贝拉·库恩、塔尔海默、贝克尔、罗斯梅、拉狄克。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局会议数目——六十。

5、讨论问题的总数——一百九十六。

（1）组织问题总数——六十八。

（2）个别国家问题总数：德国——二十一；美国——十二；罗马尼亚——十二；意大利——十二；捷克斯洛伐克——十；东方——十；英国——九；法国——七；保加利亚——七。

6、呼吁书总数——五十一（数字不全）。

一般性质——十六。

个别国家——三十五：

德国——九；意大利——七；捷克斯洛伐克——四；法

国——三；奥地利——二；巴尔干——二；英国、美国、卢森堡、瑞士、西班牙、罗马尼亚、崩得、波兰各一。

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的重要问题

(1)一般性质的问题：

同机会主义斗争，反对共产党内的中派和半中派分子。

把优秀的力量从社会党内分化出来，使他们同共产党人合并。

渗透到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去。

在确立对议会制的正确观点方面进行工作。

(2)国际革命组织的问题：

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建立东方各民族委员会。

筹备召开青年共产国际世界性代表大会。

支持红色工会国际，同阿姆斯特丹国际进行斗争。

(3)个别国家的问题：

意大利

共产党同改良派在里窝那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第一次冲突，会上共产党坚持自己路线的纯洁性，从而发生分裂，共产党人退出意大利社会党。

德国

争取建立强有力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取得成就。争取控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法国

争取控制法国社会党并对它进行清洗。

捷克斯洛伐克

建立群众性的政党并为它的纯洁性而斗争。

瑞典

在使半和平主义政党向共产主义政党发展方面进行工作。

挪 威

同党内的中派影响进行斗争。

英 国

联合各共产主义派别。

美 国

争取联合,争取与群众的联系,争取进行合法工作。

南斯拉夫

同已经成为非法政党内部的中派分子进行斗争。

8、重要的呼吁书

(1)一般性质的:

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告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所有无产阶级组织书。关于阻止鲁尔被占领告各国无产者书。关于第二半国际的宣言。给茹奥、斐孟、乌德格斯特(阿姆斯特丹)的公开信。关于世界黄色工会首领代表大会。关于武装干涉致英法工人书。关于向波兰建议签订和约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书。关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是俄国反革命帮凶的呼吁书。

(2)个别国家的:

意大利

关于选举告意大利无产阶级书。关于工会告意大利社会党党员书。关于同改良主义进行斗争。关于同共产党合并致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和全体党员书。关于夺取工厂的运动告意大利无产阶级书。

德 国

关于五名中央委员退出统一共产党中央。关于哈雷代表大会的结果告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德国独立党党员书。关于加入德国共产党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和全体党员书。关于建立德国统一共产党告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书。

美 国

关于准备发动革命告北美和南美工人书。

法 国

关于成立共产党给法国同志们的信。

9、合并、分裂、退出

“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挪威、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瑞士、比利时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和中间派第二半国际拥护者之间的分裂已是既成事实。在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也是不久将来的事。在意大利，共产党人成立了独立的政党…… 在美国，所有共产主义派别的合并也是不久将来的事。”（摘自共产国际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给各政党的邀请书）

三、结论

“共产党成长了、巩固了、壮大了。在庸夫俗子们看来，在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看来，国际工人运动中最近一年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一片混乱。有位庸人说：‘到处是分裂，到处是激烈的争吵，没有秩序，不听老一辈人的话，把老的领袖们赶走，等等’。事实上，以往的一年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无穷争吵、分裂、内部斗争的一年。按其本质来说，这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摆脱旧的、腐朽的、反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而胜利发展的一年。这一年来的基本结论是：工人运动内部的分化已近尾声…… 工人阶级充分理解了自己的使命，全世界先进工人找到了正确的共产主义方向。”（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斗争的一年》）

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

“到群众中去！深入到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全部日常的和细小的斗争。参加工人的各种组织。在每一个工人组织中不倦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把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系统地、坚定不移地训练工人群众去迎接面临的战斗。为建立地下组织而进行过细的工作，耐心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把工人武装起来。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共产党，清除机会主义者、中派主义者和半中派主义者。首先要争取工会中的工人。”

(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共产国际的策略》)

一、代表大会的组成

1、代表政党和组织的总数——九十八。代表的政党——六十三，其中有表决权的——四十三；代表的组织——三十五，其中有表决权的——二十八。

2、代表总数——六百零三。

有表决权的——五百零二，有发言权的——一百零一。

3、政党：

顺序号	有表决权的政党	党员人数
1	德国统一共产党	360 000
2	法国共产党	131 000
3	意大利共产党	70 000
4	俄国共产党	550 000
5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360 000
6	英国共产党	10 000
7	波兰共产党	(非法)
8	乌克兰共产党	61 000
9	挪威共产党	98 000
10	南斯拉夫共产党	85 000
11	保加利亚共产党	37 000
12	芬兰共产党	40 000
13	西班牙共产党	10 000
14	罗马尼亚共产党	40 000
15	瑞典共产党	14 000
16	拉脱维亚共产党	—
17	瑞士共产党	7 000
18	奥地利共产党	18 000
19	荷兰共产党	4 000
20	比利时共产党	1 000
21	爱尔兰共产党	—
22	阿塞拜疆共产党	16 000
23	格鲁吉亚共产党	11 000

(续上表)

顺序号	有表决权的政党	党员人数
24	立陶宛共产党	—
25	爱沙尼亚共产党	3 000
26	丹麦共产党	1 000
27	波斯共产党	2 000
28	土耳其共产党	(非法)
29	澳大利亚共产党	3 000
30	阿根廷共产党	5 000
31	爪哇共产党	4 000
32	墨西哥共产党	1 000
33	亚美尼亚共产党	5 000
34	白俄罗斯共产党	—
35	希腊共产党	2 500
36	匈牙利共产党	(非法)
37	土耳其斯坦共产党	—
38	巴斯克利亚共产党	—
39	吉尔共和国共产党	—
40	卢森堡共产党	500
41	北美合众国统一共产党	13 000
42	远东共产党	—
43	日本共产主义派	—
		总计: 1 963 000

(2)有发言权的政党: 1、南非国际社会主义同盟。2、加拿大社会党。3、朝鲜共产党。4、中国共产党。5、印度共产党。6、巴勒斯坦共产党。7、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8、意大利社会党。9、英国社会党。10、波兰崩得。11、挪威工党。12、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13、奥地利鄱山工人世界联合会。14、比利时社会党。15、蒙古人民革命党。16、埃及共产党。17、卢森堡社会党。18、鄱山工人世界联合会共产主义者。19、丰弗基尔亨^①社会党。20、君士坦丁堡共产党。

(3)有表决权的组织: 青年团组织——二十八。

(4)有发言权的组织: 1、德国妇女联合会。2、法国工团主义者。3、法国工团主义少数派。4、英国反议会派。5、西班牙工团主义者。6、土耳其斯坦革命同盟。7、东方行动和宣传协会。

二、代表大会主席团

詹纳里、季诺维也夫、肯宁、科拉罗夫、洛利欧。

三、议程

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2、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的任务。3、共产国际在革命时期的策略。4、过渡时期。5、同阿姆斯特丹的斗争。6、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和共产国际。7、共产党的组织建设。8、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9、东方问题。10、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国际。11、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2、妇女运动。13、青年运动。14、选举。

四、报告

1、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报告人托洛茨基;

^① 匈牙利地名,即佩奇。——译者注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结报告——报告人季诺维也夫；3、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报告人拉狄克；4、关于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报告人季诺维也夫；5、关于同阿姆斯特丹的斗争——报告人赫克尔特；6、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报告人列宁；7、关于青年运动——报告人明岑堡；8、关于妇女运动——报告人蔡特金；9、关于合作社运动——报告人美舍利亚科夫；10、关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报告人肯宁。

五、发言人数——八十。

六、讨论问题的总数——四十八。

1、一般政治问题总数——七。2、组织问题总数——四。3、个别国家(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俄国、东方)问题总数——五。4、国际组织问题总数——三。5、委员会数目——九。6、通过决议数目——七。7、通过提纲数目——八。8、呼吁书数目——五。

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选举

在代表大会上拥有四十票的政党(共四个)享有两票；在代表大会上拥有二十至三十票的政党(共十四个)享有一票；俄国共产党享有五票；其余政党享有发言权。

八、重要的决议

关于策略 代表大会谴责了在起义的先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通过“强制”手段“强化”工人运动的错误理论。

关于工会 继续贯彻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并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证明正确的路线。

组织问题 制定了关于共产党内部组织、党的工作、党员的劳动义务的明确指示。

关于同阿姆斯特丹的斗争。

关于妇女工作。

关于共产国际、共产党和青年组织的相互关系。

九、重要的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策略问题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工会问题委员会。东方委员会。

十、重要的呼吁书

告全世界工人书。关于斗争的前景。关于塞拉蒂派的错误告意大利工人书。

十一、结论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表明，一些不可靠的分子开始离开我们。”（摘自季诺维也夫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方面同所谓的‘左派’，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及半无政府主义派划清了明确的界限，另一方面同右派分子划清了明确的界限。”（同上）

“第三次代表大会阐明了我们的任务，即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并发动无产阶级的极重要的社会阶层。”（同上）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内容表现在，共产国际使自己的策略适应了新的条件…… 共产国际基本上仍然通过以前的途径来达到以前的目标。但是，共产国际估计到新的困难，根据需要缓和了步伐，实行了退却，为的是明天更好地实行进攻，在先锋队脱离后备队过远的地方，使先锋队的热情冷却下来。共产国际成立两年来，工人运动的组织性无疑大大加强了。但是群众斗争的自生性，即自发的因素开始在减弱；两年来，敌人有所加强。资产阶级团结和组织起来了，从战后初期的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重整自己的队伍，并以强大的对手，有些地方甚至是凌厉的对手出现在我们面

前…… 在这两年中间,社会民主党竭力帮助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1919年时,可以一举取得的东西,现在则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达到。这就是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以需要适应新的情况制定自己的策略的原因。”(摘自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共产国际的策略》)

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

(1921年7月12日—1922年11月5日)

“这困难的一年是资本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步骤地发动进攻的一年,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联合的一年,是苏维埃俄国发生饥荒的一年,是充满无休止的罢工而工人阶级在罢工中几乎都遭到失败的一年——正是这一年表明,共产国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共产国际不害怕全世界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共产国际依然存在着,并将使敌人胆颤心惊。”

(摘自季诺维也夫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一、总的形势

(一)国际形势

“世界资本对工人阶级发动有组织的、系统的总攻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二)工人阶级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

“这一年来,东方的运动发展起来了…… 现在几乎任何一个东方国家都存在着共产党的核心…… 象日本、印度、土耳其、波

斯、中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共产党已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无穷的潜力，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先进工人的力量正在那里积聚起来，它们将带领被压迫群众走向国际革命的胜利。”（摘自季诺维也夫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工人阶级转入退却…… 在全世界，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罢工…… 但是，绝大多数罢工都以工人阶级的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些罢工只是由于资本的进攻而引起的。工人阶级经济组织的数目减少了。工会在1920年拥有大约两千五百万会员，而在1922年只有一百八十万会员。”（同上）

“遭到挫折的罢工和资本的胜利攻击使无产阶级意志沮丧…… 工人群众经受着长期失业之苦…… 当然，这样的情况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它是不能忍受的…… 群众看到，靠过去的办法已经不行了。罢工遭到失败，或者说已经取得的成果立即化为乌有，另一方面，由于货币贬值，工人群众分裂为各种派别，与此同时，资本家则团结起来…… 他们开始明白，出路就在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怎样联合，通过什么途径联合…… 在这一点上群众还不大清楚…… 这类运动已经开始，这一事实说明，存在着深刻的和自然的需要来反对资本的进攻。这说明，群众已经不自觉地走上了与改良主义的不坚定政策决裂的道路。”（《共产国际年鉴》）

（三）黄色国际

“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只会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联合中得到好处。这两个组织是反革命的组织。对于革命的无产者来说，少一些屏障，使我们的整个斗争在简单而明确的范围内进行，是有好处的。两个阵营，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诺斯克的国际，社会叛徒们的国际…… 另一方面是我们世界性的协会，全世界工人的

协会，即共产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联合……标志着正在重新准备反对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白色恐怖。”（摘自季诺维也夫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由于我们少数工会变得越来越严格，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转而采取分裂工会组织的策略…… 在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在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工会。在我们业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的地方，他们开始在开除我们的拥护者。”（摘自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8月5日—7日俄国共产党全俄代表会议上关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四）苏俄的形势

“我国大饥荒的必然趋势已经明朗化…… 我们应当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呼吁，请求在饥荒的年代里支援俄国无产阶级…… 我们的敌人已经广泛地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摘自季诺维也夫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的报告）

二、共产国际的活动

一般资料

1、召开的会议：全体会议二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二十八次。主席团会议七十五次。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一次。德国党和法国党关于赔款问题的会议一次。

2、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构中讨论问题的总数：一千零四十二。

（1）一般政治问题总数——九十三。

（2）组织问题总数——九十四。

（3）个别国家问题总数——三百五十五。

俄国——五；北美合众国——十七；南斯拉夫——十二；德国

——二十九；法国——四十八；捷克斯洛伐克——八；英国——十六；意大利——三十三；波兰——十六；巴尔干——一；匈牙利——二十六；挪威——九；西班牙——三；东方——三；保加利亚——四；罗马尼亚——二；南非——三；郇山——十一；爱沙尼亚——四；奥地利——九；南美——四；比利时——一；加拿大——一；中国——一；瑞士——八；芬兰——五；日本——一；东加里西亚——一；荷兰——十；印度——十；瑞典——九；波斯——八；土耳其——八；丹麦——六；乌克兰——四；崩得——四；卢森堡——四；希腊——二；爱尔兰——二；埃及——二；花勒子模——一。

(4) 国际组织问题总数——七十二。

3、委员会数目——一百七十六。

4、出版物问题——二十八。

5、呼吁书数目——一百二十四。

6、决议数目——十九。

7、派遣代表团问题——六十七。

8、各种代表大会的问题——十四。

9、参加会议人数——二千三百四十九人。

10、活动方面的重要问题：

(1) 一般性质的：

1、运动

“过去一年中，我们试图进行一系列国际性的运动，例如有利于救济饥荒或者与社会革命党人审讯案有关的运动。但是最有意义的是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运动。”（摘自季诺维也夫向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2、制定纲领

“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纲领委员会，国际工人运动的优秀力量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此外，在共产国际的一些西方大党内也成立了纲领委员会……我们认为，准备制定日本共产党纲领的专设委员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摘自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8月5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全俄代表会议上关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3、工会运动方面

“我们一直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必须保持工会运动的统一……我们也曾主张通过从内部逐步争取工会的办法来保持工会运动的统一。”（同上）

4、合作社工作、青年工作

共产国际在合作社工作和青年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2）个别政党方面的：

1、意大利

“意大利发生的事件之所以特别重大，是因为意大利运动的危机具有国际现象的一切特点。在世界各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工人运动都经受着与意大利工人运动所经受的同样的危机，而意大利的教训最清楚不过地向各国政党表明共产国际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在那里感受到了塞拉蒂派的骇人听闻的背叛……但是，不到一年……塞拉蒂不得不公开声明，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改良主义者一起反对我们。”（摘自季诺维也夫在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2、法国

“目前的情况是，法国共产党刚刚成立。那里一切都还没有就绪，那里发生的分裂也还不是最终的……党内还存在和平主义的传统，因此也还存在半无政府主义的和半工团主义的传统……”

党还没有物色到自己的领导者……这也是我们几乎在共产国际每个大的支部中都遇到的问题…… 法国党或许能够不经特别的震荡就摆脱危机…… 法国同志极真诚地愿意沿着共产国际的道路走。他们已经成长壮大了，他们现在有权接受真正的批评。”（同上）

3、德国

“德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中最大的政党之一，它已经摆脱了危机…… 它已经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了左倾分子……和一切病态的半改良主义分子。一年来，它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群众性罢工和工人示威游行、流血斗争等等。…… 它在工会中已经取得巨大的实际的胜利。”（同上）

4、捷克斯洛伐克

“在捷克斯洛伐克曾有两个政党和几个派别，共产国际无疑是竭诚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现在那里已经实行了联合。在工会问题上，我们有许多疏忽的地方，然而，我们党成功地引导工会组织中的大多数工人站到红旗下面来。”（摘自季诺维也夫向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5、挪威

“那里几乎仍是一个老的政党，旧的 联邦主义传统还存在。”（同上）

6、波兰

那里有一个地下的、然而群众性的政党。在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部分地同共产国际存在着分歧。但是，党内正在出现转变，本身将会消除这些分歧。

7、东方

在日本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政党，它已同一些优秀的工团主义

者联合起来。

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中国，共产主义分子正在聚集，正在形成比较有力的核心。

三、结论

“最近一年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在许多方面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这十五个月期间，在一定意义上说解决了共产国际最近未来的命运。”（摘自季诺维也夫向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地和具体地了解每个国家的生活，了解某些大国的工人运动。一年来，我们同个别一些支部建立了联系。”（摘自季诺维也夫在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去年一年非常明确地证明我们对右派的态度是正确的……我们同出卖无产阶级的右派一劳永逸地划清了界限。至于左倾分子，那么三月的教训是卓有成效的。现在，世界革命已经进入新的有机的准备阶段……我们工作的意义在于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以便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成立了一系列这样的政党，这些政党逐渐地经受住了考验。现在，除了俄国以外，我们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挪威有了群众性的政党。我们在意大利也建立了这样的政党。”（摘自拉狄克的文章《世界革命的五年，共产国际的四年》）

（待续）

译自A·季维尔编《共产国际的五年》，《共产国际》杂志
1924年第1期附录第5—35页，莫斯科俄文版。

（谷 松译）

列宁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大事记

〔苏〕A·И·娜尔齐索娃编

弗·伊·列宁的全部活动是与国际工人运动和被压迫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没有一天不在研究与世界革命过程有关的各种问题。列宁的国际活动真是不可胜数。

这个大事记收集的事实只是与共产国际有直接联系的活动。大事记的基础是列宁全集^①的注释、公布的文件、回忆录和用俄文出版的其他各种资料。

尽管这里列举的材料远未包括列宁在共产国际各方面工作的全部事实，但是，将它们收集在一起，列宁为建立、发展和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进行的不倦斗争，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8年

12月27日或28日 列宁写信给格·瓦·契切林，谈筹建第三国际的各种问题（第37卷第719页；第50卷第227—230页）^②。

① 《列宁全集》的引文只注明卷次和页码。

② 这份大事记的出处都是《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的卷次和页码。——译者注

1919年

1月21日 列宁写《给欧美工人的信》，号召先进的无产阶级分子团结在本国共产党周围(第37卷第454—462、725页)。

早于1月24日 列宁主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左派社会党和小组的代表会议；同会议参加者一起修改和签署《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第37卷第726页)。

经列宁修改和批注的邀请书初稿现在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37卷第552页；《苏共历史问题》1969年第2期第58—63页)。

2月26日 列宁指示在克里姆林宫安排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住宿和膳食(第37卷第733页)。

2月下半月 列宁写《关于德国独立党的宣言》一文(但未写完)(第37卷第485—486、734页)。

2月 列宁制订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议事日程问题表。列宁提出的问题都反映在大会通过的议事日程上(第37卷第734页；第54卷第501页)。

2月 列宁写《对“第三国际基础”提纲的批注》(第54卷第734—736页)。

2月底至3月1日或2日 列宁研究提交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写提纲要点和初稿，确定提纲的定稿(第37卷第539—540、734页)。

3月1日 列宁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小组预备会议。这次会议是为讨论组织问题而召开的(第37卷第734页)。

早于3月2日 列宁同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德国共产党代表胡·埃贝莱因(麦·阿尔伯特)晤谈，向他详细了解关

于德国共产党的情况(第37卷第734页)。

胡·埃贝莱因代表他的党表示反对立即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和绝大多数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赞成立即成立共产国际。胡·埃贝莱因反对立即建立共产国际的发言成了严重的障碍,因为当时除了俄共(布)以外,德国共产党是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最大的一个党(《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莫斯科,1934年,第31—50页)。

早于3月2日 列宁为格·叶·季诺维也夫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提纲写评语(第37卷第734页)。

3月2日 列宁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委;担任第一次会议主席(第37卷第489—490页,第734—735页)。

3月2日至6日 列宁访问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住所,同他们交谈。在谈到农民问题时,列宁要求每个代表写关于本国土地问题状况的书面意见(第37卷第735页)。

3月3日 列宁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37卷第735页)。

3月3日 列宁同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卡·施泰因哈特(格鲁伯)晤谈。

卡·施泰因哈特在回忆这次会见时写道:“我很快得到通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今晚要与我谈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坐在他的书桌前面,讨论会议工作的进程。列宁向我介绍了最初几次会议的成就。俄国代表团提出了成立共产国际的建议,而他列宁是支持这项建议的。但是,德国代表胡·埃贝莱因以自己的党没有授权他对此表态为理由,反对立即成立共产国际。因此,俄国代表团不得不暂时撤回自己的建议。列宁说,我的到来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我是被直接授权来赞成立即建立国际的代表,因此,列宁在3月4日上午会议上这样做了介绍。列宁说,奥地利代表由于自己无法

决定的原因，未能参加大会的最初几次会议，但表示支持立即建立共产国际的提议。奥地利代表为此发表声明，与其他代表们一起吁请大会再一次把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列入议程。这个声明应当有四名代表签署。如果会议同意审议这项声明，请允许我来说明理由。他，列宁，深信奥地利代表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建议将得到全体代表的支持。

1919年3月4日就是这样度过的……”（〔卡·施泰因哈特〕格鲁伯：《同伟大的列宁会见》，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莫斯科，1966年，第115页）。

3月3日或4日 列宁写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提纲的决议（第37卷第510、735页）。

3月4日 列宁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在会上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报告；投票赞成《共产国际纲领》和成立共产国际；签署关于取消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和将它的文件移交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声明（第37卷第491—509页，第735页）。

3月5日 列宁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第37卷第736页）。

3月5日 列宁写《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一文，阐述第三国际成立的意义。该文发表在1919年3月6日《真理报》上（第37卷第512—514、736页）。

3月6日 列宁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致闭幕词。

列宁受俄共（布）代表团的委托在《共产国际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上签名（第37卷第511、736页）。

列宁直接参加了《宣言》的文字修订工作。卡·施泰因哈特（格鲁伯）在回忆这一点时写道：“1919年3月4日下午，我同埃贝莱因一起参加大会宣言的最后定稿工作。我同埃贝莱因不仅要把它译成德文，而且要在文字上加

工。晚上，列宁来了。他同我们一起研究宣言，从晚上十点一直工作到凌晨六点。列宁毫无倦意，同我们逐段逐句朗读，使宣言不仅内容严谨，而且文字非常精炼。列宁只是在此以后才结束工作。我们曾多次为某种表述发生争论，但每次都是以列宁取得胜利而告终”（〔卡·施泰因哈特〕格鲁伯：《同伟大的列宁会见》，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116页）。

3月6日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大会上发表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演说（第37卷第515—520、736页）。

3月22日 列宁得到匈牙利革命的消息，同时转告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并在第七次会议上宣读。代表大会委托列宁向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发贺电。列宁曾将自己写的贺词用电话通知莫斯科无线电台，然后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名义草拟了一份拍给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贺电。电报说，只要一有可能，就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拍发给布达佩斯（第38卷第216、525页）。

3月23日 列宁写（用德文）拍给布达佩斯贝拉·库恩的电文，询问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组成情况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的策略（第38卷第217、525页）。

3月25日 列宁主持由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俄共（布）中央新委员会会议并介绍第三国际情况（第38卷第526页）。

3月底 列宁为灌制唱片朗读八个讲话，其中有《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38卷第230—231、529页）。

4月7日左右 列宁同匈牙利共产党员拉斯洛·鲁达施交谈匈牙利形势和世界革命运动。

拉斯洛·鲁达施是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团团员。但由于苏维埃俄国当时遭受封锁，他只是在1919年3月底才到达莫

斯科。列宁大约在4月7日接见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先问(好象是用德语)我想用哪一种语言同他交谈。

他说:我们可以说德语、法语或英语,反正这三种语言对我都一样,我都说不好。

我选用了德语,而在初谈几句以后,我就感到列宁的德语不仅比我说得好,而且精通这门语言。

列宁的谦逊使我吃惊”(拉斯洛·鲁达施:《会见列宁》,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269—270页)。

4月13日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者昂利·吉尔波的小册子《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写序言(第38卷第297—298、535页)。

4月14日 列宁写《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的提要(第38卷第536页)。

4月15日 列宁为《共产国际》杂志创刊号写《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第38卷第301—309、537页)。

4月23日 列宁写论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共产党人的策略的密码电报的电文,由贝拉·库恩转交给奥地利共产党和巴伐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第38卷第541页)。

不迟于4月27日 列宁同慕尼黑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德共党员阿·库列拉交谈巴伐利亚的形势(第38卷第543页)。

阿尔弗雷德·库列拉在回忆中写道:“我在1919年4月20日到达莫斯科。几天以后,我得到通知说,列宁要同我谈话。这次邀请使我感到有点意外,但我猜到了他要见我的原因。当我在途中的时候(我的旅程很艰苦,经历了整整一个月),在巴伐利亚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莫斯科当时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很弱。显然,列宁得到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使到达的消息。这个人来自慕尼黑,他在那里领导一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为了更好地了解那里发

生的一切情况，这个人就成了补充情报的活源泉。果然，这个第一次长达一小时以上的谈话，主要是列宁想尽可能从这个‘源泉’了解详细的内情”（阿尔·弗雷德·库列拉：《同志，您是干什么工作的？》，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281页）。

4月27日 列宁写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的贺词（第38卷第321—322、543页）。

5月28日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期写《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一文（第38卷第389—398、559页）。

6月15日 列宁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上除讨论其他问题以外，还讨论了匈牙利共产党人关于在布达佩斯召开共产主义青年团国际会议的建议（第38卷第566—567页）。

7月14日 列宁写《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一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第四期上（第39卷第90—109、586页）。

7月 列宁同慕尼黑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德国共产党党员阿·库列拉和匈牙利青年团代表谈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任务和青年共产国际的纲领（第39卷第589—590页）。

阿·库列拉在回忆这次会见时写道：“这次谈话从一开始就涉及很多问题。列宁在这方面作了透彻的分析，这个情况并未使我感到意外。我知道，他在侨居瑞士期间非常认真地研究了青年运动的各种问题。我们本应谈谈怎样设想我们的任务。列宁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由于我们青年人的幼稚，希望在会议文件中有一个包括一切问题的出色提纲，我们把问题看得非常简单。临别时，我们还上了一堂颇为有益的政治策略课……”

列宁建议我们在纲领草案中加入不仅承认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条文，而且应当加上新的青年国际有权成为共产国际支部的条文”（阿·库列拉：《同志，您是干什么工作的？》，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285页）。

8月5日 列宁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会上讨

论了如何对待议会制等问题(第39卷第590页)。

8月19日 列宁写信给意大利社会党党员扎·塞拉蒂和康·拉查理。列宁在信中支持意大利社会党人反对伯尔尼黄色国际的斗争。

“我们对你们的运动知道得很少,我们也没有什么文件。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材料已向我们证明:我们同你们都是反对欺骗工人群众的伯尔尼黄色国际而拥护共产国际的”(第39卷第150、592页)。

8月28日 列宁写信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

这封信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第五期上(第39卷第160—166、594页)。

7月16日,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写信给列宁,请他说明对议会制的态度。她说,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有非常强烈的反对议会制的倾向。列宁在回信中说:“毫无疑问,如果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把拥护苏维埃政权但不赞成参加议会斗争的工人抛弃,那它们就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第39卷第160页)。

8月 列宁同III·阿胡尔斯基谈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第39卷第594页)。

9月18—20日 列宁为《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第五期写《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第39卷第192—194、597页)。

文章指出:“共产国际在1919年的几个月内,已成为全世界的国际,它领导着群众,并坚决反对伯尔尼和琉森的伙伴们组成的‘黄色’国际中的社会主义叛徒”(第39卷第192页)。

9月26日 列宁参加俄共(布)中央全会。会上讨论了第三国际的问题和其它问题(第39卷第598—599页)。

10月10日 列宁写《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第39卷第212—223、601页)。

这篇文章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第六期上,文末的结论指出:“第

三国际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一系列空前辉煌的胜利。它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局部性错误和毛病并不可怕。我们要直接地公开地批评这些错误和毛病,要使一切文明国家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群众很快地把各国背叛社会主义的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这种人各国都有)驱逐出去。

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胜利一定属于共产主义”(第39卷第223页)。

10月11日 列宁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接受斗争派政党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第39卷第601页)。

斗争派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在分裂以后于1918年5月成立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1919年3月取名乌克兰社会革命共产党(斗争派),8月改称乌克兰共产党(斗争派)。

斗争派曾两次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申请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国际,要求承认乌克兰主要的共产党。1920年2月26日,共产国际为此通过决议,建议斗争派解散他们的党,同乌克兰共产党(布)合并,决议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想在乌克兰建立第二个平行政党,就是企图分裂劳动者的队伍(第39卷第521—522页;第40卷第371页)。

10月14日 列宁写信给荷兰共产党人(第51卷第57页)。

这封信是应荷兰共产党人代表塞·鲁特格尔斯的要求写的。他被共产国际派到荷兰去组织共产国际西欧局。鲁特格尔斯回忆说:“我受委托向西欧同志传达关于这个局的指示,并且参加它的工作。

1919年10月14日,在我离开的当天深夜三点钟,我被叫到列宁那儿去作最后一次叙谈……

他在谈话时给我许多指示,并向我提供了许多国外通讯处……接着,他还谈到了他的荷兰朋友,他希望他们积极地 and 顺利地宣传我们的思想……

最后,我请列宁同志写几句致荷兰同志的贺词。这份贺词我是在荷兰收到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1935年第2—3期第90—91页)。

10月24日 列宁在给国家出版社社长瓦·瓦·沃罗夫斯基的信中严厉批评了草率地出版小册子《第三国际,1919年3月6—7

日》的行为(第39卷第605页;第51卷第70—71页)。

列宁写道:“这本小册子编得糟透了。完全是粗制滥造。没有目录。简直就象一个不学无术的白痴或懒汉,在喝酒的时候,把全部‘材料’、论文、发言稿凑在一起,乱七八糟地就印出来了。

没有序言,没有记录,没有确切的决议原文,没有把决议和发言、论文、评论区分开来,什么都没有!真是一件空前的丑事!

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竟被这种小册子玷污了”(第51卷第71页)。

10月28日 列宁写信给外国共产党人:《致洛利欧同志和倾向第三国际的全体法国朋友》、《关于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和《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第39卷第251—258、606页)。

11月19日 列宁接见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中国旅俄工人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泽荣(刘绍洲),同他交谈中国革命和联合会的工作(第39卷第610页)。

刘绍洲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享有发言权。他在大会期间见到了列宁,并进行了交谈。

刘绍洲在回忆1919年11月19日同列宁的交谈时写道:“他同第一次会见我一样,非常亲切地欢迎我。在整个谈话当中,我始终感到这位伟大人物具有吸引人的感召力。列宁向我详细询问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情况。我当时很年轻,远不能正确理解国际政治,加上对中国发生的事件知道太少,不能告诉他什么新的或有趣的消息。

我本人却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教益。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的命运、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和苏维埃俄国人民亲近的重要意义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深刻思想。”

刘绍洲在交谈时给列宁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给的证件,其中说,他是“捍卫在俄国的中国公民和工人利益的唯一全权代表”。这个证件还吁请一切

机关对本证件持有人给予协助和方便。刘绍洲回忆说：“出乎我意料之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用红墨水笔在这个证件上加了一句批语：‘我也恳请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对刘绍洲同志尽力给予各种协助和方便。’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9年11月19日”。

(刘泽荣[刘绍洲]：《同伟大的列宁会见》，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290—291页)。

12月28日 列宁拍电报给在哥本哈根的马·马·李维诺夫，要他收集一切有关左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种思想派别的材料，特别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歪曲或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并且把它们寄给莫斯科(第40卷第464页，第51卷第106页)。

1920年

1月2日 列宁委托秘书向国外订购“用各种语言出版的全部左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书籍和小册子，以及有关战争后果、经济、政治等方面最重要的书刊”(第51卷第110页)。

1月4日 列宁给格·瓦·契切林写信(转给在哥本哈根的李维诺夫)，要他务必最详细地选购西方社会主义书刊寄回俄国，“收集用各种语言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以及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和书籍，有关各次代表大会的每项决议、所有的报告和会议记录等等之类的材料，每样四五份”(第51卷第110—111页)。

1月20日 列宁写俄共(布)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它曾建议谈判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复信稿，把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给共产国际和俄共的信的复信要点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被选入复信最后定稿小组(第40卷第54—61、472—473页)。

不早于1月23日 列宁同来到莫斯科的美国和加拿大工人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乔治·哈迪交谈世界产联的策略问题，要他研究布尔什维克的文献，并从自己的藏书中选了几本书送给他，其中有《国家与革命》一书（第40卷第474页）。

列宁在1月23日给秘书的便条中写道：“‘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书记哈迪要求会面。

给他打个电话，问清楚，他什么时候走。……会面是必要的”（第51卷第123页）。

2月6日 列宁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写的关于斗争派问题的决议草案交会议批准（第40卷第122、478页）。

2月8日至14日 列宁写关于“国际恢复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的评论。这是法国社会党提交即将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草案（第40卷第346—350、479页）。

2月14日 列宁写《政论家的短评》一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20年第九期上。该文分析了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独立工党对第三国际的立场（第40卷第129—139、480页）。

2月14日至25日。 列宁写信给让·龙格转法国社会党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信中指出，法国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主要条件是将阿尔贝·托马、马赛尔·桑巴和布拉克（亚·德鲁索）这样一些著名的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第40卷第357—358、480页）。

2月22日 列宁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斗争派决议草案写批语。列宁在批语中坚决认为，“斗争派应该受到谴责的错误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它的反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第40卷第159、482页）。

3月6日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第40卷第203—211、486页)。

“在世界上一切国家中,甚至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中,一切有头脑的工人都联合到第三国际方面来了,都在思想上靠近第三国际了。这充分保证共产国际能在不久的将来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有保证的”(第40卷第211页)。

3月—4月 列宁写《论妥协》一文,但未写完。在这个文件中阐述的观点,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发挥得更详细(第40卷第289—291、492页)。

4月—5月 列宁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第41卷第1—104、618页)。

本书主要的研究工作,列宁是在1920年4月进行的。手稿在4月27日完成。增补部分于5月12日写成。本书是专为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而写的,大会代表每人发给一本。它是要帮助各个年轻的共产党找到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纠正他们初期活动中的错误,向各国共产党介绍布尔什维克最丰富的经验,介绍他们的战略和策略,以便用这些经验武装各兄弟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阐明的各项重要原理和结论奠定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第41卷第480页)。

5月初 列宁写便条给格·瓦·契切林,请他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手稿并提出意见(第41卷第618页;第51卷第186—189页)。

“我想请您和法国贝尔格(如果您忙的话,就请介绍一名十分了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同志)看一下我那本小册子或有关英国的那一章,并告诉我,我书里有没有错误或不妥之处。如果没有什么困难的话,非常希望能用铅笔在旁边写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第51卷第186、189页)。

5月5日 列宁为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增补》,写便条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列·米·卡拉汉,

要他找1920年3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那里登载了菲·屠拉梯同该报罗马新闻记者的谈话；列宁还提到了《苏维埃报》第七号和第八号，因为那里讨论了意大利社会党可能发生分裂的问题（第41卷第620页）。

5月5日 列宁在大剧院同率领捷克斯洛伐克左派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鲍胡米尔·什麦拉里交谈欧洲的形势，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民族问题、建立捷克和德国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以及对波战争。当时由于波兰刚向苏维埃俄国发动进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基层委员会的代表们正在大剧院举行会议（第41卷第620页）。

鲍·什麦拉里写道：“……列宁在离开以前，甚至没有忘记同一个小民族的小人物谈话，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关怀。他拿出便条本，撕下一页，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几句话，留下的便条转送到了我手中。它是用德文写的。有个别词还加上了一个或两个着重号。它的译文如下：

‘什麦拉里同志。如有什么需要，在你竭尽全力以后，如果不能得到答复或无结果（很遗憾，这在我们这儿是经常发生的事），请直接告诉我（电话记录：克里姆林宫，交换台，三楼），或者写信，信封上注明：亲启，某某寄。致崇高敬礼。列宁’”。

（鲍·什麦拉里：《日记摘录》，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314页）。

5月12日 列宁根据从国外收到的新材料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增补》（第41卷第623页）。

5月12日—13日 列宁审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增补》打字稿，根据收集的新材料进行修改，并给排字工人写了指示（第41卷第624页）。

5月21日 列宁同鲍胡米尔·什麦拉里交谈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方针（第41卷第626页）。

鲍·什麦拉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5月21日，我在所住的‘沙瓦’饭店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当晚去克里姆林宫列宁住处见他，列宁这一次同我详细谈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关于如何进行工作，为第三国际尽量争取‘左派’社会民主党群众组织的大多数，如何在成立共产党时不要失去参加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基本工人群众，我得到了许多忠告。

我从莫斯科回来，前后判若两人。我全心全意地走上了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向布尔什维主义发展的道路”（鲍·什麦拉里：《日记摘录》，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314—315页）。

5月28日 列宁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除讨论其他问题以外，还讨论了建立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所收集的国外书籍和各种定期刊物的图书馆问题（第41卷第628页）。

5月30日 列宁写《给英国工人的信》，同日将信送给格·瓦·契切林，要他在看信后提出意见（第41卷第124—128、629页；第51卷第203页）。

1920年5月，英国工人代表团到达苏维埃俄国。5月26日，列宁接见代表团。列宁在《给英国工人的信》中写了同代表团会谈的情况，评述了某些“有威望的工人领袖”。“如果谁在思想上继续充当资产阶级的奴隶，继续抱着‘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主义之类的小市民偏见，那么不用说，这种人忽然想要自称为共产党人，并且加入第三国际，就只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更大的害处”（第41卷第126—127页）。

6月初 列宁介绍尤·马尔赫列夫斯基为《共产国际》杂志第十二期写的文章《土地问题和世界革命》。列宁在《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对这篇著作的评价很高（第41卷第169、629页）。

6月初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土地问题提纲初稿》（第41卷第169—182页、第629页）。

6月初 列宁同索·阿·洛佐夫斯基（后来成为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交谈关于建立国际产业工会理事会的问题（第41卷第

630页)。

6月1日 列宁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除其他问题以外)筹备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第41卷第630页)。

6月1日 列宁主持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增加第三国际印刷厂粮食供应问题发言(第41卷第630页)。

不迟于6月5日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写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要点(第41卷第437—438、631页)。

6月5日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写《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41卷第161—168、632页)。

6月5日至14日 列宁阅读格·瓦·契切林、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H·П·拉吕斯基以及巴什基尔、吉尔吉斯和土耳其斯坦的领导干部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评论和意见，并对契切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评论写了批语(第41卷第632页)。

6月10日 列宁接见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匈牙利共产党代表(第41卷第633页)。

“列宁在长达两小时以上的交谈中，听取了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的活动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成就与错误及其失败原因的汇报。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引用了这些消息……”(Л·勒吉《列宁和匈牙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7年，第45页)。

“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正式接见了来自二十二个国家(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美国、爱尔兰、比利时、丹麦、卢森堡、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四十二位代表。列宁同他们交谈了各国的形势、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和政党及其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并对代表们提出了许多有关未来工作的建

议。在列宁接见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这些代表中,有许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鲍胡米尔·什麦拉里、马赛·加香、威廉·加拉赫、安东尼·扎波托兹基、贝拉·库恩、赫里斯托·卡巴克契也夫、克拉拉·蔡特金、约翰·里德,等等”(《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宝库》,莫斯科,1968年,第199页)。

不早于6月10日 列宁了解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И·涅杰尔科夫(И·沙布林)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保加利亚共产党工作和巴尔干与土耳其民族运动情况(第41卷第633页)。

6月12日 列宁写文章评论《共产主义》杂志第一期至第十八期。这是一份为东南欧各国在维也纳用德文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41卷第135—137、634页)。

6月12日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第41卷第634页)。

迟于6月12日 列宁阅读斯大林于1920年6月12日从克列缅楚格的来信,其中谈了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列宁对信中谈到联邦和邦联问题的地方加了着重点和评语。列宁指出:“联邦可以有各种形式”(第41卷第634页)。

6月18日 列宁写便条给阿·姆·赫列尔,要他把“证实改良主义者(尤其是屠拉梯之流)违反纪律和决议的重要文件编出清单,把最重要的翻译出来”。这个便条是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而写的。俄共中央政治局委托随同意大利代表团的俄共(布)中央一名代表赫列尔,“从意大利书刊中收集反对屠拉梯和其他改良主义者的引文,以及收集所有必要的其他材料”,以便揭露意大利社会党队伍中的改良主义(第51卷第217—218、431页)。

6月18日 列宁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直接向德国“独立派”各地方组织发出号召书、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和保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住宿、膳食和交通联络工具等问题的建议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在彼得格勒举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庆祝大会的建议和其他问题(第41卷第635页)。

6月19日 列宁指示苏维埃第二大厦管理主任,要他尽力协助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芬兰共产党员(第41卷第636页;第51卷第218页)。

6月19日 列宁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发表讲话。这次会议讨论了为筹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而发表的关于欧洲和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通报(第41卷第152、636页)。

6月19日 列宁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会见法国社会党代表团。

1920年夏天,法国社会党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代表大会派出代表赴莫斯科就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可能性进行谈判。会谈进行了五个小时。马赛·加香在回忆这次谈话时写道:“6月19日,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同我们举行会谈,交换意见。列宁讲了话。他是用流利的法国话讲的。

他首先向社会党和它的两位代表给共产国际写信表示感谢……

列宁说,法国党需要一种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并指导它争取解放的报纸,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报纸。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则需要党内建立一种由大家,首先是在负责岗位上获得荣誉的党员所严格遵守的严格纪律。应当锻造一个团结的、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严守纪律的阶级政党”(马赛·加香:《难忘的会见》,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84页)。

不早于6月21日 列宁审阅莫·格·拉费斯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的意见(第41卷第636页)。

不早于6月21日—不迟于7月25日。 列宁审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校样,并做了某些修改(第41卷第636页)。

6月22日 列宁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除其他问题以外)爱沙尼亚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第41卷第637页)。

6月23日 列宁接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Д·比奇(英国产业工人联合会)、律·德利尼埃尔和雅·沙杜尔(法国社会党)(第41卷第637页)。

6月26日 列宁接见意大利工人代表团和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共产党代表戴·怀恩科普,要他转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给荷兰代表团,并请他们提出意见(第41卷第638页)。

6月30日至7月8日 列宁收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团代表戴·怀恩科普的来信,其中谈到:不是所有的“论坛派”(即荷兰共产党党员)都同意“左派”观点。列宁得信以后,将“荷兰论坛派”一词从准备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英文本中删去,改用了“某些荷兰共产党党员”的说法,并将怀恩科普的来信全文收入该书的《增补》部分(第41卷第103—104、640页)。

6月至7月上半月 列宁写《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41卷第201—204页、第640页)。

7月1日 列宁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齐也娃,要她向彼得格勒打电话,请速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校样,并了解提纲的出版日期(第41卷第641页)。

不早于7月2日 列宁审阅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对他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土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第41卷第641页)。

不迟于7月4日 列宁写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

任务的提纲初稿(《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内容与为反对“时髦地”歪曲这个口号而斗争的决议要点》)(第41卷第439—451、641页)。

7月4日 列宁写《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的提纲》(第41卷第183—201、641页)。

7月4日 列宁写拍给在彼得格勒的季诺维也夫的电文,告诉他在第二天将送去《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的提纲》和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的提纲(第51卷第231页)。

7月5日 列宁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齐也娃,要她抄写《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的提纲》,并在同日发送彼得格勒(第41卷第641页)。

7月5日 列宁阅读意大利社会党都灵支部提交米兰全国委员会的报告(由安·葛兰西写的)译文。这个报告曾登在《新秩序》报上,标题是《为了社会党的新生》。列宁读后,写了一个便条附在译稿上:必须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登这个报告,或者用活页(译成法文)印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译文作了一些修改,加了批语:“译文很糟,但仍须出版”,并在边页上写道:“速送校样给我”。1920年7月20日,这个报告发表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期上(第41卷第641—642页)。

7月7日 列宁在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谈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和发言的日程(第51卷第232—233页)。

7月7日 列宁同英国“厂工会委员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约·托·墨菲交谈,向他询问关于英国革命运动和南威尔士矿工斗争的情况(第41卷第642页;第51卷第229、435

页)。

墨菲在回忆同列宁的交谈时写道：

“他立即向我提出了许多关于英国革命运动的问题。这些问题既简单，又深刻，涉及事物的本质。……我离开列宁同志时，感到在我一生所会见的人当中，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象他那样谙熟自己的事业”(约·托·墨菲：《我同列宁的第一次会见》，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316—317页)。

7月7日 列宁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俄国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和党中央鼓动委员会关于组织“第三国际日”的建议，等等(第41卷第642—643页)。

7月7日 列宁同法国社会党代表——《人道报》主编马·加香和党的书记吕·弗罗萨尔晤谈(第41卷第642页；第51卷第229、435页)。

7月8日 列宁复信给筹建大不列颠共产党的临时联合委员会(第41卷第157、643页)。

7月8日 列宁将戴·怀恩科普的来信和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英文译稿的修改声明送给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米·格鲁森贝尔格；列宁在附函中写道：“……请检查一下，英文是否好。”(声明的内容：荷兰党对“左派”不负责任，说这是某些荷兰人的事情。)(“只印这份声明和我那份关于对文稿进行修改的声明”。)(第41卷第643页；第51卷第234页)。

7月8日 列宁委托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齐也娃转告彼得格勒，要求“速送关于中欧各党的提纲”，以便第三国际委员会的法国代表A·罗斯梅能在提纲发表以前提出自己的意见(第41卷第643页)。

7月10日至19日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写报告初稿和提要(第41卷

第452—455、643页)。

迟于7月15日 列宁审阅在列宁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一书(德文本),提出了文字修改意见,并在他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做了一些记号(第41卷第644页)。

7月16日 列宁参加党中央全会。会上审议了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问题。列宁被批准为俄国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第41卷第644页)。

7月17日 列宁口授给彼得格勒的话传电报内容,要求根据《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俄文修订本校订该书的德文本、法文本和英文本(第51卷第242页)。

7月18日 列宁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去彼得格勒参加大会开幕式(第41卷第645页)。

不早于7月18日 列宁审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的两本样书(法文本),并做了文字修改,并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的提纲》中做了一些记号和加上重点(第41卷第645页)。

早于7月19日 列宁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它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一个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提纲,并草拟了提纲的详细要点(第41卷第202—203、646页)。

早于7月19日 列宁审阅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英文本样书,并做了文字修改(第41卷第646页)。

7月19日 列宁到达彼得格勒,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第41卷第646页)。

7月19日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

选为主席团委员，并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第41卷第215—235页，第646页)。

7月19日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以后，列宁同代表们去马尔索沃广场向革命烈士墓献花圈，并在乌里茨基广场为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而召开的工人、红军战士、水兵等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晚上八时，列宁离开彼得格勒回莫斯科(第41卷第158、646页)。

不早于7月21日 列宁对自己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速记记录做了某些修改(第41卷第647页)。

7月23日 列宁主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英国厂工会委员会代表杰·坦纳的发言写了评语；发表论共产党作用的演说(第41卷第236—240、456、647页)。

7月24日 列宁被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团选为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以及土地问题等委员会的委员(第41卷第647—648页)。

7月24日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记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并注明各国代表的人数(第41卷第648页)。

7月24日至29日 列宁对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伊朗共产党代表阿·苏尔坦-扎德关于东方社会革命前途的报告写了评语。1920年7月28日，苏尔坦-扎德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会上就东方社会革命前途问题做了报告(第41卷第457、546、648页)。

7月25日 列宁记下了(用德文)巴·列维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意见(第41卷第458—459、648页)。

7月25日 列宁写《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二十条》，并提交大会委员会会议审议(第41卷第212、648页)。

7月25日 列宁参加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他写的提纲；列宁对马·罗易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做了一些文字修改(用英文)和记号；在讨论罗易报告时发表讲话；写便条(用法文)向扎·梅·塞拉蒂或意大利代表团某团员询问：为什么没有一个意大利同志出席委员会会议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第41卷第648页；第51卷第244页)。

7月26日 列宁会见从格拉斯哥(苏格兰)前来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威·加拉赫，并同他交谈(第41卷第648页)。

威·加拉赫在回忆这次会见时写道：“我立即感到，我不是在同高不可攀和态度傲慢的‘伟人’交谈，而是在同列宁交谈。他是一个伟大的党员。他对每一个无产阶级战士都是笑容满面，言谈亲切”(威·加拉赫：《列宁》，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330页)。

7月26日 列宁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他写的提纲(第41卷第648页)。

7月26日 列宁参加联合委员会会议。它由大会基本任务委员会委员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委员组成。会上讨论了列宁写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的提纲》(第41卷第649页)。

7月26日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报告(第41卷第241—247、649页)。

不迟于7月28日 列宁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简讯(用法文)(第41卷第460—461、649页)。

7月28日 列宁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法国社会党代表——《人道报》主编马·加香和党的书记吕·弗罗萨尔——返回法国以前同他们(用法文)晤谈(第41卷第649页)。

马·加香在回忆同列宁的这次会见时写道：“我们在7月28日同列宁会晤。我们的谈话一直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他在克里姆林宫一间设备严肃大方、面积不大的办公室里非常亲切地接见了我们。

他向我们详细地询问了法国的形势。其实，他不问也瞭如指掌。列宁一再对我们说，他非常敬仰我们国家的过去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列宁认为共产党人就是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雅各宾党人。因此，他深信第三国际的思想将在法国取得胜利，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国家纯粹的革命传统”(马·加香：《难忘的会见》，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85页)。

7月29日 列宁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上午会议。当法国社会党代表马·加香和雷·列弗夫尔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争论中发言时，列宁记下了关于法国社会党以及其他问题的发言要点(第41卷第649页)。

早于7月30日 列宁同不列颠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威·麦克莱恩和托·奎尔奇晤谈(第41卷第650页)。

威·麦克莱恩在1920年描述这次晤谈时写道：“列宁同志欣然同意同我和奎尔奇同志晤谈。他在不久前的这次晤谈中同我们讨论了英国工人运动状况。他善于发现我们的弱点，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善于发现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弱点。他那种近乎神奇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我们根据列宁的著作，知道他具有抓住和发现自己敌人弱点的惊人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深信他对自己的朋友也具有同样的能力。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曾以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而引为自豪，而列宁同志使我们感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实在太

少。他关于不列颠未来工作的指示对我们是巨大的帮助”(威·麦克莱恩：《列宁》，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348页)。

7月30日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演说(第41卷第248—254、650页)。

不早于7月 列宁审阅《共产国际》杂志1920年英文版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写了批语，并对自己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的提纲》做了一些文字修改(第41卷第651页)。

8月2日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晚上)会议上发表了关于议会制的演说(第41卷第255—259、651页)。

8月3日 列宁同印度共产党员马·罗易晤谈；写便条给格·瓦·契切林，要他接待罗易和万涅卡(捷克革命社会民主党代表)(第41卷第652页)。

8月6日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发表关于英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团体加入工党的讲话(第41卷第260—267、652—653页)。

8月6日 列宁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就俄共(布)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问题通过了推举列宁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会上还讨论了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的其他问题(第41卷第653页)。

8月7日 列宁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1卷第653页)。

8月11日 列宁接见中国旅俄工人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泽荣(刘绍洲)并写便条给尼·克列斯廷斯基，要他接待刘泽荣(第41卷第654—655页；第51卷第256页)。

8月11日 列宁接见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爱尔兰

工人党代表Π·克维兰德(第41卷第655页)。

8月14日 列宁接见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勒普梯和M·维尔日(法国五金工人和挖土工人工会)、卡·施泰因哈特(格鲁伯)和卡·托曼(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赫·卡巴克契也夫(保加利亚共产党)、巴·列维、恩·迈耶尔等(德国共产党)、万·奥维尔斯特拉坦(瓦龙共产主义联合会,比利时)、Γ·朗格塞特(挪威工人党)和贝拉·库恩(匈牙利共产党)(第41卷第656页)。

赫·卡巴克契也夫在第一次同列宁交谈以后,按照他的要求送来了一批保加利亚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卡巴克契也夫在回忆时说:“在我将一批保加利亚文的小册子(约15卷)送给列宁几天以后,我得到通知说,列宁请我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我猜不出列宁叫我去见他的原因。但是,不言而喻,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并且立刻去到克里姆林宫。列宁就在他的办公室愉快和亲切地会见了我。

我给他送来的一包书和小册子都放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

列宁说:好呀,你们在短时间内就能出版很多优秀的鼓动书刊!现在能够这样做的党很少。你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出色。他信手翻阅了几种新的小册子,并要我介绍它们的内容。列宁的热情接待使我深受鼓舞和鞭策,因为他对我们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的书刊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这使我们感动,我们党的自尊心受到尊重……

这一次我在列宁那儿耽的时间不长,因为大会的很多代表在临走以前都匆匆而来,在接待室同这位十月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再次握手告别,聆听他的必要的指示。我也同列宁匆忙告别。他要我代他向布拉戈耶夫和保加利亚全体同志问候。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同列宁晤谈”(赫里斯托·卡巴克契也夫:《同列宁晤谈》,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345、346页)。

8月15日 列宁写《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第41卷第268—

273、656页)。

《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是列宁就奥地利共产党抵制议会选举的决定而写的。1920年8月31日，即全党代表会议开幕前夕，它在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上发表。列宁的信帮助了奥地利共产党人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采取正确立场。1920年9月1日，代表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党参加议会选举的决定。奥地利共产党人是在争取工人阶级的革命统一的口号下参加选举的(第41卷第527页)。

8月17日 列宁同约翰·里德晤谈。里德要求帮助在共产主义出版刊物上撰稿的政论家美国共产党员路易·弗雷熟悉俄国的书刊(第41卷第656—657页)。

8月18日 列宁同威·加拉赫交谈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作用。列宁反对在苏格兰建立单独的共产党，主张在刚组成的英国共产党队伍中为革命事业进行斗争(第41卷第657页)。

威·加拉赫在回忆这次谈话时写道：“列宁在他家里对我的谈话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要我坐下。于是，我们开始谈党的建设及其在领导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在此以前，我没有一次特别想过党的问题。但是，现在我开始真正懂得了共产党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

列宁坚决反对在苏格兰成立单独的党。

他说：你们必须在刚成立的英国党内进行工作。

我坚持说：我不能同某某和某某进行工作。

在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无产阶级革命是他的全部谈话内容中最活跃和动人的题目。

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种谈话”(威·加拉赫：《列宁》，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332页)。

8月18日 列宁接见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左派”——《人民权利》报编辑部编辑瓦涅克和克拉德诺市工人组织的书记A·扎波托茨基；

丹麦共产主义教师俱乐部的玛·尼尔森；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的西·潘克赫斯特(第41卷第657页)。

8月27日 列宁签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的信(第41卷第660页)。

8月27日 列宁写信给因工作过度劳累而患病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席爱德华·马丁，并向他致最美好的祝愿(第41卷第660页；第51卷第269—270页)。

列宁写道：“我知道，你是由于为共产国际过分紧张地工作而生病的。约翰·里德同志和我谈过这个情况。

请您接受我最良好的祝愿，最真挚的谢意，并请您相信，我将竭尽全力帮助您”(第51卷第269—270页)。

8月至9月 在《共产党人》杂志(第3—4期)上发表了列宁应这个杂志编辑部请求而写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文(第41卷第274—276、661页)。

9月6日 列宁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除其他问题以外)讨论了必须按期公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第41卷第663页)。

9月8日 列宁同威·明岑堡谈青年共产国际的当前任务(第41卷第664页)。

9月11日 列宁同卢森堡社会党代表E·雷伊兰德谈关于成立卢森堡共产党的问题(第41卷第665页)。

9月20日 列宁接见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卡·施泰因哈特和瑞士共产党员威美尔曼(第41卷第667页)。

9月22日至28日 列宁同克拉拉·蔡特金交谈国际妇女运动、苏维埃俄国妇女的地位和道德等问题(第41卷第669页)。

不迟于9月24日 列宁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他委员签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呼吁书》(第41卷第669页)。

9月24日 列宁写《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第41卷第295—297、669页)。

9月24日 列宁同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A·M·施勒辛格交谈关于美国共产党对提拔尤·德布兹担任副主席的问题(第41卷第669页)。

9月25日 列宁收到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B·古尔的信,其中谈到弗·贝奈什于7月12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右派会议上的发言。列宁阅后,拍了一个电报给在布拉格的俄国红十字会协会全权代表索·伊·吉勒松,要他在报刊上立即发表,并转给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说明所引用的贝奈什同列宁的谈话,其中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在捷克斯洛伐克似乎不能实现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列宁从未会见过贝奈什(第41卷第670页;第51卷第287页)。

9月25日 列宁同麦·格拉西阿谈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分裂、建立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问题(第41卷第670页)。

“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它在会上被认为第三国际的西班牙支部,并享有执行委员会的席位。列宁接见了西班牙代表麦林诺·格拉西阿,因为他对西班牙问题,特别是对农民的地位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西班牙共产党史》,莫斯科,1961年,第25页)。

10月1日 列宁同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托出国的B·A·德格特交谈意大利和法国的工人运动及其领导人情况(第41卷第673页)。

10月6日 列宁同英国共产党人威·波尔交谈英国共产党的策略问题(第41卷第675页)。

10月11日至11月4日 列宁写便条给阿·姆·赫列尔,要他收集和翻译关于意大利社会党都灵集团情况的材料(第51卷第299页)。

10月13日 列宁接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米·格鲁森贝尔格(第41卷第677页)。

10月16日 列宁写信给《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说他不能满足编辑部请他为该刊写新文章的要求,并建议转载他在1906年写的小册子《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中有关论述专政的章节,他答应为它写前言(第41卷第678—679页,第51卷第308页)。

10月20日 列宁写《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来代替前言(第41卷第369—391、679页)。

10月21日 列宁写便条给彼得格勒《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说他昨晚已将《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的文章手稿和他的两本书(《十二年》文集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小册子)寄给编辑部,并要求在以后退还给他(第41卷第680页)。

10月23日 列宁接见克拉拉·蔡特金(第41卷第681页)。

克·蔡特金写道:谈话专门涉及世界妇女运动。她当时正在准备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革命妇女运动的提纲。“列宁指出,必须竭力做到使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严肃认真地研究问题。光是这件事就会克服许多同志的各种偏见。一般来说,女共产党员首先应当进行这件工作,而且要认真地进行。

列宁风趣地说:‘别象善良的老大娘那样噘噘喳喳,而要象战士那样,大声说话,开门见山。代表大会不是沙龙,而小说中所描述的沙龙,是太太们卖

弄风骚的地方。代表大会是一个斗争舞台。我们在这里是要追求为革命行动所需要的知识。请你们证实自己能够进行斗争。当然，首先是进行反对敌人的斗争，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也要进行党内的斗争。问题正是在于争取广泛的妇女群众”（克拉拉·蔡特金：《札记摘录》，见《外国同时代人回忆列宁》，第72页）。

10月28日 列宁同返回美国的C·X·阿胡尔斯基谈苏美关系和建立两国之间贸易联系的前途，在美国建立工人和农场主的政党以及共产党对这种政党和其他问题的策略（第41卷第684页）。

不早于11月3日 列宁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在1920年11月3日就接受让·龙格——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及其集团加入共产国际所做的决议写批语，认为此事不合时宜，并且提出说明这样决定的几点主要理由（第41卷第686页）。

11月4日 列宁写《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一文（第41卷第409—423、686页）。

11月11日 列宁接见法国共产党人昂·吉尔波；写便条给“俄国共产党党员和在苏维埃各级机关工作的全体同志”，要求他们相信吉尔波，向他详细介绍工作情况（第42卷第553页）。

11月26日 列宁同英国共产党人威·波尔晤谈（第42卷第559页）。

12月10日 列宁同罗马尼亚社会党代表晤谈（《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宝库》第199页）。

12月10日 列宁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届非常代表大会的代表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和丹尼尔·安吉亚诺就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和其

他问题进行交谈(第42卷第564页)。

在1920年7月召开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主张加入第三国际,并决定派出两名代表去莫斯科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列宁花了很多时间同西班牙社会党人代表丹尼尔·安吉亚诺和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进行交谈(《西班牙共产党史》第26页)。

12月11日 列宁写《关于自由的假话(代后记)》一文。这是11月4日写的《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一文的后记(第41卷第424—428页)。

两篇文章都是在《关于自由的假话》总标题下刊登在1920年12月《共产国际》杂志第十五期上(第41卷第409—428页;第42卷第564页)。

12月20日 列宁同法国共产党人昂·吉尔波晤谈(第42卷第567页)。

(待续)

译自《共产国际史论丛》1970年莫斯科
俄文版第242—273页。

(吴式之译)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方 光 明

《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一书,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的第一部,即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费南德·克劳丁是西班牙共产党的老党员。青年时代起即参加工人运动,1937年被选为西共中央委员,1947年起一直担任西共政治委员会委员。1965年,因犯了“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罪行”而被开除出党。从此,他就专心著述,1969年12月写完本书。全书包括结束语共十章,约六十万字。

作者从分析共产国际以来国际共运的每个进程入手,论述了国际共运必须走民族化、民主化道路的观点。

全书从共产国际的解散写起。作者认为,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完全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无视各国革命的民族特征,无视兄弟党之间的平等协商的原则,结果给共产国际本身造成了危机。因此,作者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偶然的,它是共产主义运动漫长危机的总暴露。共产国际为什么会违反民族化、民主化要求

呢？作者的看法是：（1）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许多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前途的看法过分乐观，以为世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来，为了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就必须有一个“世界党”。共产国际就是为了满足这种“虚假的需要”才建立起来的。建立之时，条件其实并不成熟。建立以来，必然要在政治组织路线上违反客观实际；（2）由于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的巨大成功，共产国际就把苏联党的经验强加于各国党，要各国党不顾本国改良主义政党的影响和工人阶级的实际觉悟水平，都以苏联党为榜样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又要各国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表示绝对服从；（3）由于各种反动势力联合反苏反共，共产国际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本来各国无产阶级起来保卫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是完全正义的，但斯大林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要各国党把各国革命利益绝对置于苏联本国利益之下。结果国际中心的领导实际由苏共中央领导。作者认为，这三点是国际共运没有民族化、民主化的原因。

作者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述，认为他们尽管对客观革命形势的估计有时也有过分乐观的地方，但他们对整个国际共运的民族化、民主化的看法是正确的，是值得重视的。在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在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坚持认为：只要每个党在总的目标上是为着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在具体做法上，国际就不能横加干涉。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不能让少数人来随便支配工人阶级的行动。在第二国际时，恩格斯也反对不顾各国实际，随便模仿德国党。在共产国际初期，列宁也认为共产国际不能“太俄国化”。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列宁在逝世前的看法与十月革命刚胜利、共产国际刚建立时就不一样了，他更多地要各国共产党学习，学习，再学

习。但列宁逝世过早。在同反对派斗争中，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教条化，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而其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

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本来是指狭义的革命，即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广义的革命概念，不仅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且是指一系列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广义革命而言，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苏联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的极大多数的情况下更是不可能的。然而，斯大林为了在政治上打垮反对派，认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这样，他不仅违背了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违背了他自己在1925年上半年所表述的观点，而且也违背了革命的现实。可是，长期以来，国际共运竟屈从了这个“理论”，开始，为了保证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过早地发动了德国革命，任意地叫人民阵线为“到处建立苏维埃”的冒险政策服务；后来，竟为了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又要各国无产阶级放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用所谓“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来代替国际阶级斗争。作者认为：苏联为了在一国建设共产主义需要“和平”，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却需要战争，怎么能够让各国无产者的解放斗争、让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服从苏联一国的需要呢？但令人可悲的事实是：正是这种“一国的需要”长期地支配着国际共运。作者认为：这是造成国际共运危机的根源。

本书为了挖掘这种根源，引述了大量国际共运的史料，许多史料都是我国史学界所陌生的。它详细记述了法国人民阵线的历史，分析了西班牙1936—1939年共和国失败的教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交枪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十分推崇中国革命

和南斯拉夫革命的经验，认为这两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也就是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把马列主义民族化的结果。那里的革命不是“外来的”，是在本国土地上产生出来的。那里的革命领导人也不是莫斯科委派的，而是紧密同本国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本书提出的某些理论问题是值得商榷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但是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和例举的一些事实和材料，对于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来说是有参考价值的。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 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叙 一

1979年，西德帕德博恩出版社出版了西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郭衡钰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一书。全书共336页，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建立，1919—1924年”，共九章。第二部分：“统一战线破裂的准备，1925—1926年”，共九章。这两部分约占全书的一半篇幅。第三部分：“统一战线的破裂，1927年”，共十三章，也约占全书的一半。作者在前言中说，第一、

* 外文书名：“Die Komintern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Die Einheitsfront zwischen der KP China und der Kuomintang 1924—1927”。

二两部分具有绪论性质，第三部分是本书的重点。这一部分详细叙述了1926年7月北伐以来直到1927年7月统一战线最后破裂为止的军事政治发展以及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这一关键时期的政策，与此相联系，也分析了俄共（布）党领导内部的有关争论。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引用了大量德、英、日文的材料和台湾出版或重印的中文书籍。其中的德文本共产国际文件（包括历次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全会的记录）以及共产国际的主要刊物（《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新闻通讯》），我们国内迄今还远未收集完全，台湾出版的资料在国内也很难见到。由于掌握了这些材料，作者能比较具体地分析共产国际及其领袖对待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事件和问题的态度，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线索。例如，本书中关于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同苏联顾问的矛盾和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926年）和第八次全体会议（1927年）等等的论述，内容都是比较丰富的。书后附有三十余页的参考文献目录，搜罗很广，颇有价值。

作者的基本观点是：1921年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创立中国共产党是一次“人为的早产”，因为当时建党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面临艰巨的任务，既要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帝民族斗争，又要提高工人和农民的阶级觉悟并向他们灌输阶级斗争思想。中国共产党对此毫无经验，不得不依靠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决定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以列宁的思想为基础的，但没有坚持列宁提出的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党派合作时必须遵循的条件。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国际没有及时指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却仍旧要求它保持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没有认识到国共分裂不可避免，当然也不可能提醒中国共产党为此作好准备，以致共产党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措手不及，

损失惨重。在这以后，共产国际没有看到革命已开始进入低潮，继续在工人和农民运动问题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出“左”的指示，在工农运动遭到挫折后才被迫承认革命处于低潮。尽管如此，它并没有严肃地总结经验和教训，进行自我批评，因此斯大林在1936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又提出了右倾的主张。

作者认为，二十年代中国革命有两个核心问题：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联盟问题，夺取政权的手段即武装斗争问题。作者认为，在这两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提出了三大法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本关于马林的传记

——《亨克·斯内夫利特政治传记》

商 鼎

荷兰弗里佐夫·梯歇尔曼著，阿姆斯特丹1974年荷兰文版；
波洪1978年德文版，148页。

亨克·斯内夫利特即马林，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初期活动起过重要作用，在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过去从未出版过他的传记，本书是第一本，内容简要，包括了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各个主要阶段。全书共九章：（一）引言——斯内夫利特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二）工会工作和政治；（三）共产国际内的讨论；（四）中国；（五）与共产国际

决裂；(六)革命社会党；(七)与独立社会党合并；(八)与托洛茨基决裂；(九)战争时期。书后附有注释和文献目录。

作者在卷首的序言性短文“为什么写这本书？”中说，这本书是他在编辑一部关于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资料汇编时的副产品，是根据该书引言草稿中的一节写成的。由于斯内夫利特是印尼(爪哇)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却又很少为人所知，因此在资料的引言中必须对他的活动加以介绍。最初的纲要完全根据已在著作和杂志中发表的第二手材料，未利用任何档案材料。1972年底，作者决定将引言的这一部分扩大成一本小册子单独出版，为此进一步查阅了一些最重要的杂志，并根据斯内夫利特的档案补充了内容。不过档案的1924—1942年部分开放较晚，尚未来得及加以利用。

作者还说明，由于对两次大战之间荷兰工人运动特别其左翼的历史的研究还很不成熟，因此本书的重点放在斯内夫利特在1919—1940年之间的政治发展上。关于斯内夫利特在印度尼西亚的活动，作者将在《1914—1918年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一书的第一卷中提供资料并在引言中详细论述，因此本书只作了简单的介绍。

正如书名所表明的，本书以叙述马林的政治活动为主，基本未涉及个人生活和家庭情况。书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国的部分(本刊本辑已将有关章节译出发表)。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合作并且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要是由马林提出并且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中共领导接受的。这一统一战线策略虽然符合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中关于共产党应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运动合作的精神，但马林在实践中

并没有坚持保证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和对工人运动的直接影响这两条原则。他的这一态度所产生的影响为蒋介石后来背叛统一战线和镇压共产党创造了条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作者认为苏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对此也负有责任。作者对马林在印尼活动时的策略的评价基本与此一致,而且认为马林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贯彻的策略就是以他在印尼的经验为基础的。当然,作者并没有因此否认马林对印尼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卡尔·考茨基的回忆录

——《回忆与探讨》*

启 迪

本书是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的一部自传体著作,是由他的儿子本内狄克特·考茨基于1960年出版的。全书587页,由两部分组成,涉及的基本上是同一个生活时期。第一部分《回忆与探讨》是该书的主体,是考茨基1936年82岁时动笔写的,到84岁临死前搁笔,所以,这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在写作过程中,考茨基参阅了他保存的关于自己青少年时代和自己家族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现在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考茨基写作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描述自己的成长过程,并说明自己的政治

* 卡尔·考茨基《回忆与探讨》(“Erinnerungen und Erörterungen”),1960年海牙德文版。

观点和学术观点是怎样形成的。

《回忆与探讨》共分六章。第一章“我的祖先和我的青年时代”从曾祖父谈起，直到父母的婚姻和他自己的出生，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家世。在这一章里，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奥地利 1850 年至 1870 年的戏剧事业，读者可以由此窥见奥地利文化生活的一斑。对学校教育的描写也是如此。

第二章“1871—1875 年的狂飙突进”讲到巴黎公社对他的影响和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第三章“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1875—1880 年）”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这里考茨基披露了自己的一则日记。他于 1875 年 1 月 11 日写道：“新的一年顺利开始了。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历和学习了很多东西……昨天在我的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卢比康河已经渡过。我被接纳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只有当叛徒我才会重新离开它，我要真当了叛徒，就把我吊死在电线杆子上吧！”事实是严酷的，考茨基后来果真当了叛徒，当然考茨基本人是始终不承认这一点的。

继入党之后考茨基详细地介绍了他选择职业的各种考虑和尝试，包括当律师、画家、剧作家、导演等；介绍了他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党组织内的活动以及奥地利党本身的状况，最后谈到他这一时期的理论著述。

第四章专门谈卡尔·赫希伯格。大家知道，赫希伯格是个富商的儿子，曾被马克思斥责为“捐资入党”的人，是由于写作《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而遭到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评的苏黎世三人团成员之一。考茨基在书中怀着感激、偏袒的心情谈起赫希伯格。他简要地叙述了赫希伯格的经历，介绍了自己于 1880 年到赫希伯格那里任学术助手的经过。赫希伯格给考茨基的年薪相当可

观,为三千马克,从而使考茨基免受为生活奔波之苦。考茨基的一半时间可以自行支配,另一半时间帮助赫希柏格研究解决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论题。

在最后两章,作者介绍了自己的伦敦之行和担任《新时代》编辑的前后经过。考茨基到达伦敦之后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频繁交往中受益匪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在谈到共产主义的这两位大师时,始终怀着景仰和尊敬之情。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描述是为了替自己吹嘘和辩解的。这一部分的结尾写到1883年左右。

本书的第二部分《回忆录》,篇幅很小,包括的年代从他出生直到巴黎公社。这是考茨基1921年在维也纳写的。那时正值他的第一个孙女出世,考茨基为了使他的子孙后代对他的经历、至少是青年时代的经历永远铭记在心,所以写了这篇东西。凭记忆信手写来,没有参考什么资料,本来是不供发表的。

本书正文前有本内狄克特·考茨基写的出版前言,其中也提供了考茨基的一些传记材料。书末附有一张考茨基的家庭谱系表和一份人名索引。

国外动态

英共筹备建立工运档案馆

据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1981年6月号报道：英国共产党宣布将建立一个档案馆，对其收集的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各种历史文献和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从而使这批材料得以充分利用。

英共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历史文献和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党内外的一些团体和组织曾经发布和出版的，其中包括各种报纸、杂志、印刷品、复制的文件、会议记录、手稿和其它各种文字材料（照片、广告、传单、标语等）以及英共从已故詹姆斯·柯鲁克曼那里得到的一批美术珍品——国际工人运动著名人物的肖像和十八世纪以来的政治漫画。

英共过去一直没有对这批珍贵的文献和资料加以整理。为了更好地促进国际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工作，英共决定建立一个档案馆，将这些文献和资料整理归档，并将广泛征集有关资料。目前建馆的地址已有着落，但建馆所需资金尚缺。为此，英共已设立一笔专门的建馆基金，并呼吁各界人士积极捐款。

（黎 明）